

三十年战争终结

〔越〕 陈文茶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三十年战争的终结

〔越南〕陈文茶 著

严 谊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说明

本书虽是陈文茶个人回忆录，但具有史料价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不屈不挠、决战决胜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万家墨面没蒿莱”，“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样的越南人民决不会长期坐视黎笋集团背叛胡志明主席的遗训、背叛越南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听任其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为其充当炮灰。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9月30日会见黄文欢同志的谈话中所指出：越南结束了抗法抗美战争后，出兵侵犯柬埔寨，共打了40多年仗，这在全世界也算是创纪录，可以获得金牌了；一个国家靠别国输血维持，怎么能搞建设，人民怎能摆脱贫困，这样下去事情总会发生变化的。虽然越南人民的斗争是长期的，但我不相信会再打40年，越南人民的斗争终将获得胜利。

原书1982年在越南出版，我们现在出版中译本，提供给广大读者阅读参考。中译本略有删节。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新战线.....	(9)
第二章	只能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43)
第三章	惩罚违反协定的敌人.....	(67)
第四章	前所未有的一个雨季.....	(106)
第五章	新阶段是这样开始的.....	(143)
第六章	千载难逢的时机：春季总进攻 和总奋起.....	(184)
第七章	决定性的战略决战：具有历史 意义的胡志明战役.....	(223)
第八章	旧制度的末日：胡志明战役 完全胜利.....	(259)
尾 声	进西贡实行军管.....	(286)

前 言

1978年，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主张曾在战场上工作和战斗过的干部，撰写自己亲身参加我们民族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的回忆录，并建议我写一些1975年春季大捷中有关B2战场的情况：“B2战场怎样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为辉煌的春季大捷作出了什么贡献？”

是的，B2战场同全国其它战场一样，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任务，为我们民族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小的贡献。B2战场的土地，B2战场的人，以不愧为英雄越南祖国的一部分，不愧为英雄越南民族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回忆和记述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是一种荣誉，也是B2战场所有干部、战士和每个人的责任。我接受了总政治局的建议。

我想，作为一个主要战场，B2战场的贡献不仅在于进行的战斗、献出的粮食、修筑的道路以及人们的生命，比这更加伟大、具有战略和组织艺术价值的是：这里的实践推动了战争的胜利进程，为实现党中央的主张、路线作出了贡献。当然，也不都是辉煌的胜利，个别地方、个别时候，也遭到过暂时、惨痛的失败。这一切都是事实，是宝贵的经验，是谱写英雄时代交响曲不可缺少的音节。因此，如果只记述最后胜利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即使是十分伟大的胜利，也是一个重大缺陷。要想得到明媚的春天，不能不度过

阴冷的冬天；要想取得旱季的胜利，就不能躲避前一个艰难的雨季，舍本逐末难以说明问题，也说不准确。

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决定把我了解和记得的有关B2战场长期抗美战争的全部情况都写出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思考，搜集资料，会见过去的干部，重返昔日战场，力求忠实地再现当年事件演进经过……；必须依靠许多同志的帮助和合作，依靠曾在B2战场的各个岗位和地区工作过的广大同志的共同回忆。但我决心要从事这项工作，把它看做是自己对解放战争最后的，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B2战场是我非常热爱的地方，从八月革命^①前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直到革命完全胜利和祖国统一，几乎我的一生都在那里生活和服务，也许我还将选择这块土地作为我永远安息的地方。

我把全书分成五个阶段来写：

第一阶段 从1954年日内瓦协议到1960年崛起运动。

第二阶段 从1961年到1965年，卓有成效地抗击特种战争。

第三阶段 1965年到1968年，挫败美国局部战争。

第四阶段 1969年到1973年，抗击战争越南化和把美军赶出越南。

第五阶段 从1973年巴黎协定到取得彻底胜利（1973—1975）。

我从人们记忆犹新的最后战略阶段（第五阶段）开始写

^① 八月革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5年8月19日越南人民在首都河内及其后在全国各地举行的武装起义。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发布《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起，因为它符合许多人，特别是B2战场同志们要求。

B2是什么意思呢？可能至今还有许多人不太清楚。为便于读者了解本书中记述的事件，我认为有必要对B2战场作一点介绍。

“B2”是一个代号，代表抗美援朝时期祖国最南端的一个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人。当时，我们把北纬17度线以南的整个越南南方分成四个战场：B1战场，通常称为第五联区，包括从今天的广南—岷港省到富庆省的中部沿海各省。B3战场即西原地区，包括嘉莱、昆嵩和多乐省。B4战场为原广治省和承天省。B2战场即从原嘉义省（今多乐省部分地区）林同、顺海直至金瓯角、昆仑岛、河仙省、富国岛的南方其余部分。它包括广阔的山林地带，雄伟的长山山脉的末端，地势从多乐、林同省北部海拔一千五百米至二千米的高山地区到南部东区逐渐平缓。紧接着它的是辽阔肥沃、人烟稠密的平原地区——湄公河流域。这里有我们著名的抗战根据地乌明森林、同塔梅平原……。这里地形平坦、一望无际，气候湿润，稻田、园林、村落相间，土地被同奈、帅腊、万古、湄公等江河以及许多小河、运河和水渠交错分割成许多片。有的地区几乎全年淹没在水里，有的地区是半年水淹，半年乾涸，还有的地方四季缺乏淡水。它有长达上千公里的海岸线和蕴藏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宽阔的大陆架，还有象头顿、西贡、美荻、芹苴、迪石等大小海港和内河港口。这里有整个南方最发达的公路系统，它经过美国的加固和建设，能保证和适应美军机械化军事行动的需要。伪政权的首都西贡就在B2战场范围之内，人口曾一度达到四百万，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也是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中

心。西贡和大叻、藩切、边和、西宁、美萩、永隆、芹苴、金瓯、迪石等许多大城市连在一起，构成美伪军的基地系统。这里也是推行新殖民政策的中心，传播美国腐朽生活方式、推销美国商品和为庞大的美国远征军以及南越伪军提供服务的地方。美伪把南方从边海河到湄公河平原分成四个战术区。西贡市位于第3战术区内，自成首都特区，是指挥首脑机关所在地，侵略战争机器的中心。

B2战场约占整个南方土地面积的二分之一，人口的三分之二，相当于敌人第2战术区的一部分加上第3、4战术区面积的总和。

为便于指导和指挥这场无比残酷的战争，我们把B2战场分为四区一市，即：6区（中部地区南端）、7区（南部东区）、8区（南部中区）、9区（南部西区）和西贡—嘉定市。^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国与柬埔寨四分之三的境界是在B2战场范围之内。这里有1号、22号和13号公路，湄公河、楚商河、永济运河以及许多小路、小河将两国连接起来。越柬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在谋生、贸易、交流、姻缘等方面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可以沿边境地区的道路、河流顺利来往。从

① 各区包括的省分：

6区：广德（嘉义）、宣德（大叻）、宁顺、平顺、林同、平绥。

7区：福隆、隆庆、福绥（巴地）、平隆、平阳（土龙木）、边和、西宁、厚义。

8区：隆安（新安）、建祥（木化）、建丰（沙沥）、定祥（美萩）、鹤贡、建和（槟榔）。

9区：朱笃、安江（隆川）、永隆、永平（茶荣）、风莹（芹苴）、巴川（朔庄）、建江（河仙、迪石）、章善（薄寮）、安川（金瓯）。

西贡—嘉定特区。——原书注

古到今，越柬边界两侧两个民族一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共同的幸福并肩战斗，有福同享，患难与共。因此，敌人恼羞成怒，进一步扩大侵略，将魔爪伸向我们两国。

B2战场的人正直、朴实、性情豪放，同北部、中部地区一样，具有祖先世代相传的美德和热忱的爱国心。他们有着永恒的信念，永远心向无限敬爱的胡主席，心向首都河内——升龙^①。

挥剑征战辟国疆，

千古怀念升龙城。

（引自黄文艺诗。黄文艺是抗法战争时期南方的一名军事指挥员。）

B2战场的人为自己具有悠久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救国传统而感到自豪，如阮中直、张定的抗法运动，阮庭炤的刚直不阿和布衣英雄阮惠的赫赫战功。在藩切市芽龙码头，英明领袖胡主席起程前往国外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时留下了深情、亲切的脚印……。在1940年南圻起义和1945年八月革命总起义运动中，革命的先驱者们洒下了无数的热血……。所有这一切都不断教育和激励着B2战场的人民。他们一旦觉醒就随时奋起，为独立和自由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 * *

我曾在祖国和民族辉煌的年代中生活、战斗，写下这些想法与回忆，只是希望尽到一个幸存的战士的义务。首先是对B2战场，确切地说是对我十分热爱的B2战场的人们的义务。他们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分散居住在山林沼泽地区，或是集中生活在街道、村庄，都为祖国南北统一、共同

① 升龙——越南首都河内市原名，1831年改称河内。

建设社会主义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特别是那些来自从凉山到金瓯角祖国各地、牺牲在B2战场上的朋友、亲人、同志、战友、认识和从不相识的人。他们为了独立和自由，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B2战场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为祖国和民族的伟大胜利立了大功。对！只有象他们那样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奋斗终生的人，才值得子孙后代刻骨铭心永世怀念。我要经过正确的思考，把自己所知道的和记得的，其中许多是亲眼所见的B2战场的土地和人，把它们的变化情况、发生的事件以及崇高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是一项十分神圣的任务，也是历史和人民的命令。

然而，由于自己的知识和写作水平有限，加上篇幅的限制，每一卷书只能集中地谈某一些问题。因此，十分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在这本书里把B2战场上越南人创造的奇迹都写出来。他们在长期的、轰轰烈烈的抗战中，坚强、勇敢和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天才的领导和指导方针，为历史性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与才智。我只希望能在自己了解的范围内，多少写出一些，贡献给至今幸存的人们和我们的下一代。这也算是向在B2战场上为民族和阶级而献身的人们所作的一点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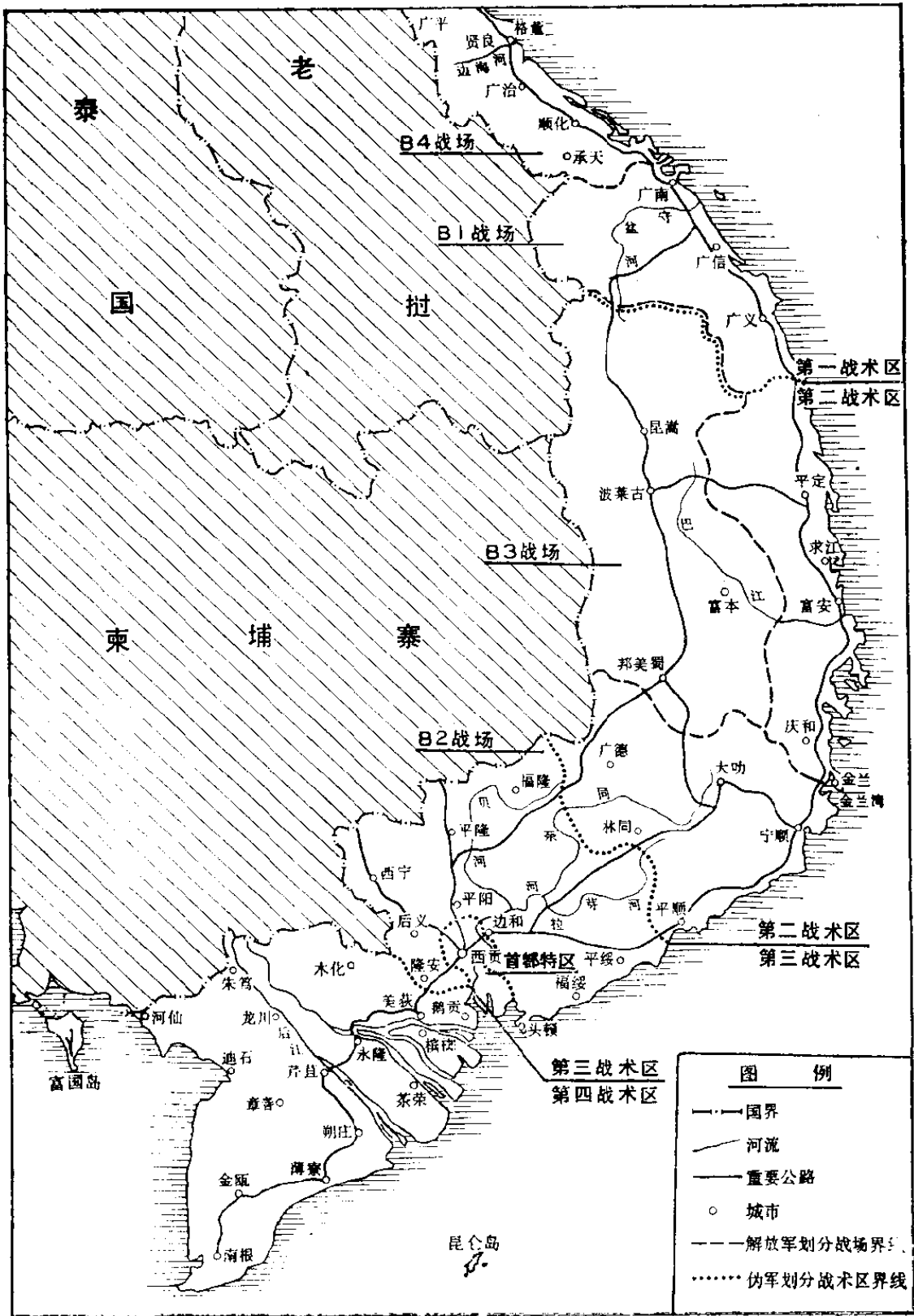
考虑到责任是如此的重大，我给自己作了一条规定：要写得完全符合事实，写有人知道的和从未为人所知的事实，写有人喜欢和有人不喜欢的事实。因为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将无情地摒弃那些违背事实的东西。我希望各地的读者，特别是曾在B2战场工作过的同志们，对本书的缺点与不足之处提出意见与补充。我将感到十分荣幸并预致谢意。

在此，我谨以激动的心情，感谢许多同志和朋友从各方

面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并向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意见与合作。

我谨对国防部、第7军区、第9军区和胡志明市战争总结委员会中负责资料工作的同志们，对原B2战场各省军事指挥部的同志们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阮曰佐上校和武尘雅大尉，他们费了许多功夫搜集材料，同各地联系，对本书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1980年春



第一章 新 战 线

“和解通牒”后

B52轰炸机投下的一串串炸弹猛烈和连续地爆炸，震动了南方司令部指挥所的地下室。接着，挂在树上的警报喇叭响起了值班员的声音：“B52轰炸机三批九架，在A区和南方司令部与南方参谋部之间的上空投弹三批，没有伤亡。”

我们继续交班。一位参谋进来报告：“总司令部电报说，巴黎协定已经签订了。”

我不觉笑了笑，想到了这战争与和平（假如和平是真的）奇特的交替时刻。美国人可真会抓紧利用长达十多年战争的最后一秒钟，派遣铁乌鸦B52送来了寓意深沉的“和解通牒”！

无论如何，巴黎和平协定签订^①的消息确实使大家松了口气。指挥员们一个个喜形于色。这些久经骄阳曝晒的面

^① 从1945年9月到1954年5月，越南人民打败了法国殖民主义者，于1954年7月签订了日内瓦协议，解放北半部国土。日内瓦协议签字后，美国趁机取代了法国，1961年起，美国在南方发动了“特种战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南方人民进行了抗美救国战争。1964年美国又制造“北部湾事件”轰炸北方。1965年3月美海军陆战队在岷港登陆，发动了“局部战争”，同时加强对北方的海空袭击。1968年5月，越美双方在巴黎开始谈判，1973年1月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军被迫全部撤出越南南方。

孔，看起来都消瘦了，但还健康。这是战场上近十个月连续奋战所获得的宝贵嘉奖。战斗的目的就是要迫使敌人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一个战略阶段。

这场军事行动拖得太久，持续紧张，人人累得精疲力竭。各军区、单位都向南方司令部报告所取得的胜利，我军同敌人每时每刻争夺的位置。与此同时，也不断报来困难、缺员、缺粮、缺少弹药，特别是指战员们疲惫的情况。第9军区（南部西区）司令部的电报直截了当地建议南方司令部下令立即结束战局，休整部队。部队已经没有力气再打仗了！但是，我们的敌人非常顽固。他们虽然在战场上遭到了惨败，在谈判桌上理屈词穷，被迫于10月签订协定，但后来又出尔反尔，翻脸不认帐。我们怎么办？停止行动，休息，任务完成了吗？不！必须继续战斗。我们要打得他们懂得什么是革命者的意志。

在这样的时刻作出决定是很不容易的。停下来，事物将向一个方向发展。再努一把力，多争取些胜利，事物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必然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振作起来，在似乎精疲力竭，似乎没有粮食、弹药再继续作战的情况下，在南方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既稳妥、巧妙又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还击，击落大批B52飞机和其它各种类型的飞机。在河内、海防的12个日日夜夜里，象远古鸿子貉孙^①神话故事中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显然，事情发生了质变：我们时代最阴险和残暴的敌人——头号帝国主义，不得不低头屈服，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保证将美军及其仆从军全部撤出越南南方，承认越南

^① 越南古代鸿庞氏和貉龙君的传说。

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驱逐美帝，打倒伪政权。①

前进！战士同胞们，

哪个春天比南北团聚更欢畅。

亲爱的胡伯伯，您的这些指示体现了我党天才的主张。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美帝已被驱逐出去，伪政权也将被推翻，南北必将团聚。我们愿全力以赴，尽早实现您的夙愿。

这是我们听说巴黎协定确已签字时产生的第一个想法。一段漫长而又艰苦的历程已经过去。战争决定性的转机到来了。整一整行装，养精蓄锐，走完其余的路程，其复杂和困难程度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天际的曙光。

1973年1月上旬的一天，在密林深处根据地的南方指挥所地下室里，气氛活跃异常。我们正注视着战场和各单位的情况，但重点是紧张地讨论严肃和有效地执行巴黎协定的计划与措施。有多少事情要做呀！迅速整顿力量，对我们早就了如指掌的敌人保持警惕……。突然，一位参谋进来交给阮明洲同志（南方司令部参谋长）一份急电。阮明洲同志很快地看了一遍，神色严肃，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发愁。他把电报递给我。电报的内容是，中央指定我担任驻西贡的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啊！真太突然了。南方局、南方军委早就对代表团的成员作了安排，并且已经中央同意。现在突然在最后的时刻更

① 胡志明主席1969年新年贺信中的诗句。

换团长，并要我在两、三天之内赶到西贡。

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在战场上，工作中，我遇到过许多次意外的事情。但是，这次出乎意料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既觉得有趣又感到担心。担心的是，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太陌生，太紧急了。在我还没来得及想象这项工作的时候，就得赶紧收拾行装启程，更谈不上为这条新的战线作准备了。这条战线跟战场完全不同。在工作中，上级交给我这样突然的任务并不是第一次。我已经习惯了。相信上级领导，相信同志和同事，相信自己，我坦然地接受了任务。说实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感兴趣的成分对我来说就更多一些。可爱的西贡呀！很久以前，从法国殖民者占领时期，我就在那里生活，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有过胜利，也尝到过失败的滋味；我曾经在这里战斗，后来被迫远离了数十年，现在又要在同胞和同志们的关注下，在敌人重重包围中返回这里。我过去熟悉的街道、市场、工厂、贫困的劳动人民住宅区，现在肯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西贡人民还记得我们吗？我当时决心离开，正是为了以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重新返回。有一次，我曾经作出努力，要返回西贡，但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次，也还不是彻底回来，但它象美丽的梦境一样充满趣味。顷刻间，对西贡许许多多的印象，过去的，现在的，象电影一样在脑际映现。黄文泰同志见我坐着一声不吭，对我说：“怎么样？接受任务啦！祝贺你！”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拥抱我，亲吻我，屋里立即响起祝贺和希望的话语、爽朗的笑声，不再是开会工作的那种气氛了。

我同黄文泰同志说了几句话之后，便去作准备。家里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负责。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看看周围多年来早已熟悉的景物，

我突然对暂时离别产生了激动的心情。轻风吹过，飘来了丛林中形形色色野花的浓郁芳香。屋前谷地中，狭长的田野上，一群群小鸟匆匆地啄食着秋收时节掉下的稻粒。溪水沿着田野潺潺地流过，飞机轰炸后留下的稀疏树木刚刚长出细小的嫩芽。今天，好像一切景物都充满着欢快和惜别的情意。如果不是南方司令部副政委陈度和政治部主任黎文想同志进来，使我从沉思中惊醒，还不知道我会这样静静地呆多久。

陈度同志问我：“你还需要什么？你对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和成员满意吗？”

我同意保持原安排不变，只要求给我增加阮友智同志。阮友智同志是情报干部、军队英雄，在西贡呆了三年多，几个月前，在发现有可能暴露的迹象以后，刚回到根据地。他非常了解西贡，熟悉每一条街道，在西贡颇有一些熟人。除在一般工作中可以助我一臂之力以外，如果敌人同意我们用自己的司机，他还将给我开车。

黎文想同志说：“中央还问你用什么名字，马上电告，以便及时通知巴黎，由我们的代表团转告美伪方面。”

长期以来，我和大家一样从未用过真名，常常使用化名，并且不时更换，目的是给敌人的侦察监视活动制造某些困难，为我们的活动保密。不同的阶段或执行不同的任务时用不同名字，是常有的事。现在，接受了一项新任务，我将面对面地出现在敌人面前，当然要取个名字。我几乎没有经过思考，就马上取名叫阮越洲。阮越洲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亲弟弟。他是1969年在主持芹苴市委会议时牺牲的。我们兄弟俩一起^①在西贡生活，在法属时期一道参加秘密的革命活动，并一起从法国的志和监狱被释放出来，又一道参加了1945年八月革命总起义，一同离开可爱的西贡去参加抗战。

今天我将重返这个城市，不由得想起了亲爱的弟弟、生死与共的同志，能够用这个永远不会忘记的名字，那将是多么幸福啊！但是，后来有一天，当我像平时一样吃饭时，突然想起，我这次不是作为一个陌生人去西贡，用别的名字太不方便。因为西贡人民当中，肯定有许多人并没有忘记过去那些参加抗战的子弟。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寄予信心和希望。敌人当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如伪总理陈善谦、伪军少将林文发和其它一些将领。他们在大叻的军事学校毕业以后，1947年曾经去同塔梅参加抗战。我当时是第8军区司令员，曾经收留并安排他们在军区的军政学校学习和集训。因为吃不了苦，缺乏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后来他们逃回去投降了卷土重来的法国殖民者，继续为法国主子、后来又为美国主子服务，直到现在。就是连美国方面，他们也可能有我几十张照片。正因为这样，还是用敌人和朋友早已知道的名字更好一些。南方局和南方军委的同志们一致同意。于是又建议中央批准并电告巴黎通报对方：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是陈文茶中将。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赶忙为新的工作草拟了一项全面计划，重新检查了代表团的组成。我同副团长陈文名同志就任务、人员、器材工具，特别是通讯联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决定各项措施，并委托他代表我领导一切工作的实施。

陈文名同志家乡在霍门，从小生活在西贡，1945年抗法战争开始时就参加了抗战，现在是南方司令部副参谋长，主要负责组织和领导战略情报团的工作。他是个西贡通，对敌人很了解。我相信他的才干，我想敌人对他也会敬畏几分。他身体强壮、又白又胖，有风度，洒脱大方。

我召集有参谋、政治、后勤等机关参加的南方司令部会议，深入、具体地讨论了谈判与战场之间相互配合的一切措施。我强调，如果在西贡四方会议桌上，敌人对我有所顾忌，我们在履行巴黎协定方面能取得某些胜利，那主要是由于战场上我们部队的力量，是由于我们外线同志们发挥的威力。我们保证，在敌人的首都，在亲爱的同胞们的心目中，我们都将无愧是英雄的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代表。

1973年1月28日，是我们必须到达西贡的日子。已经约定好由美国派直升飞机到善言来接我们。善言位于西宁以北，就在22号公路上，过去有个小小的居民点，靠林业营生。抗美援朝时期，美国把当地居民赶走，建成了美军的军事据点，由一个战团驻守，有飞机场、仓库和操场。美军从这里出发向周围地区进行破坏和扫荡。1972年初（这时伪军已代替美军），善言虽然不是“阮惠”战役^①的主攻方向，但在这次战役中，我方全歼了该据点的守敌。这时，善言仍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旧战场，树木被烧得光秃秃的，田野、道路上布满弹坑，到处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被击毁的美式坦克、装甲车、大炮和卡车。只剩下飞机跑道可供直升飞机使用。向敌人发出我们抵达时间的通知以后，我们向善言派出一个侦察组，把原来的战壕修成牢固的工事，在约定的时间前后在那里监视敌人。侦察组的同志每隔十五分钟就向我们报告那里发生的一切情况。与此同时，我们一个装备齐全的干部团正在禄宁机场为代表团准备真正的出发地点。而我们代表团则正在不慌不忙地准备提前过年。我们知道，一到西贡，必须紧张地投入工作，所以，尽管还有四、五天才过阴历年，我

① 1972年南部东区我军发动的一次战役。——原书注

们还是争取在解放区的“家里”，共同欢度这个充满惜别之情的民族节日。1968年春，整个南方也提前过旧历戊申年，然后冲锋上前，发动总进攻和一致奋起，粉碎了美帝的侵略意志，使白宫惊慌失措，五角大楼丧魂失魄，迫使美国进行战争降级，在巴黎坐下来同我们谈判，并在今年春节结束了漫长的巴黎和谈。这个春季——癸丑年春，我们又提前过年，然后进入敌军巢穴，要求他们正确地履行协定，看看他们还玩弄什么花招，他们真正想干什么。

在南方司令部地下室里，年夜饭散发出扑鼻的香味。没有什么佳肴美酿，但有年糕和粽子，有自己生产的猪肉，还有野猪肉，有西瓜，有酒，有本地土产，也有来自河内的礼物。南方局、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以及南方司令部的同志们，各机关团体代表，解放军记者……，同我们代表团一起过年。气氛极为亲切热烈，个个喜气洋洋，每杯酒都洋溢着欢乐。我们互相祝贺胜利，预祝谈判桌上和战场上都取得成功，重逢之日比今朝更加欢畅。我们正热热闹闹吃着年夜饭，忽然，来自善言的电报：“在约定时间，未见美直升飞机来接代表团。但有两架敌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两周，投弹数批。弹片和坦克、装甲车碎片在我们掩体周围乱飞。此后平静。”大家又相互斟酒，共同举杯祝我们代表团成员身体健康，赞扬我们的精明和警惕性，热烈祝贺我们代表团在反对美伪卑劣的背信弃义行径中，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人们谈论着刚刚发生的善言事件，议论着美伪违反巴黎协定的可能，以及代表团任务和战场工作的复杂性。饭桌上的话题就更加丰富了。每个同志都抱有强烈的信心和在任何情况下夺取胜利的信念。每双眼睛都闪烁着充满活力的、春天的光辉。外面温暖的阳光穿过树梢，照亮整个林区。空气

干燥凉爽，令人心旷神怡。林间小道两侧，到处盛开的白色小花，与树梢上金黄色的叶子交相辉映。今年，根据地的春天也来得早，好象景物都争相分享人们胜利的喜悦。

禄宁是南部东区解放区的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市镇，位于通向柬埔寨、老挝的13号公路上，离西贡一百公里。从禄宁往北是通往邦美蜀、西原的原14号公路，往南是17号公路，同我们的西宁北部根据地相连。自从1972年4月解放以来，禄宁成了使防守西贡的伪军担惊受怕的军事要地，是B2战场解放区的政治中心。禄宁地区有适合热带植物生长的、肥沃的红土，有法属时期留下的一望无际的橡胶林，榴梿、红毛丹、芒果、牛奶果等果树郁郁葱葱，还有成百亩价值很高的胡椒、咖啡。禄宁过去是平隆省的一个县城，是伪第3军防区西贡外围第一道防线上一个坚固的据点。在我方开展命名为“阮惠”的战役中，这里是主攻方向，是敌人外围防线上必须拔除的最关键的一个点。现在，我们不仅拔除了敌人在这里建立的一个个坚固的团级据点，还歼灭了伪第3军的许多坦克装甲团和精锐的战团，生俘许多敌兵和军官，其中包括荣大校。后来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和诚意，把他交还了美伪。因此，禄宁成了我们胜利的象征，敌人可耻失败的标志。我们要对方派直升飞机到禄宁来接我们代表团，是让他们永远记取过去遭到的沉重打击，而我们代表团则从这光荣的地方，雄赳赳地进入伪政权的首都。

在敌人对约定的地点善言进行轰炸，玩弄诡计之后，我们立即向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且重新确定了到禄宁来接我们代表团的日期。在经历了善言的可耻失败之后，他们对我方采取的高明对策，总该有所醒悟了。我们希望他们不再玩弄卑鄙伎俩。当然，我们也有充分的防范措施。我们知道

敌人的本质是决不会改变的。敌人轰炸善言，企图消灭中央联合军事委员会我方军事代表团的行动遭到反对以后，他们又出动军队，对已经约定好接运波莱古、美萩地区联合军事委员会我方代表团的地点，和接运芙拜、大叻、昆嵩、新安等地联合军事小组我方成员的地点进行扫荡、破坏和轰炸。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利用一些小事，无理取闹，无视协定条款，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妄图消灭我们。每次发生类似事件，我们就马上在西贡四方会议上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只好表示道歉，把责任推给地方保安部队，并答应加以纠正。我们完全知道，他们只是口头上应付，敷衍塞责。初期发生的这些事件，使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看法：从小事到大事，美伪都是在有计划地破坏巴黎协定。

难道历史会再度重演？法国遭到严重的失败以后被迫签订1954年日内瓦协议，以后又和美国一道撕毁和拒不执行协议；今天美伪受到沉重打击之后被迫签订巴黎协定，这次还会玩弄撕毁协定的把戏吗？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有了经验。我们战斗、谈判，都是为了签订一项对革命有利的协定。我们将努力为履行协定的全部条款而斗争。为了民族的独立自由，我们随时准备牺牲生命，战斗到底。同时我们也伸出民族和解与和睦之手，挽救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但是，我们有过去血的教训，不会轻易地相信我们的敌人会忠实地履行协议，因而我们对其出尔反尔的态度丝毫不感到惊讶。我们为可能发生的两种情况作好了两手准备：既可能由于我们有效的斗争，由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压力，敌人不得不正确履行协定；也可能撕毁协定。我们将努力争取前者，我们也随时准备对付后一种情况。

1973年2月1日，到了约定时间，一队美国直升飞机，按

照我方规定的飞行高度和航线，在禄宁上空盘旋一周后，从机场北端降落。机队由一名美军中校指挥，随同的还有一些伪军军官。可以肯定，飞机飞行时，他们不但完全可以看清机场、街道，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清楚地看见了部署在市镇外围的层层防空阵地和坦克。这些阵地和坦克都处于临战状态，随时准备用来对付可能发生的敌人出尔反尔的行动。那天，禄宁镇真像过节一样热闹。革命红旗迎风招展。机场上气氛严肃，秩序井然。各界同胞、广大干部和部队衣着整齐，高高兴兴地从各地赶来，聚集在机场上。金星红旗和半蓝半红的旗帜^①汇成旗帜的海洋，还有数不清的标语口号，欢迎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的胜利签订，要求严正和彻底履行协定，欢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军事代表团等等。群众集会在欢腾、热烈的气氛中举行，附近的美国直升飞机无声无息地等待着。各界、各团体的代表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都讲到欢迎协定签订，要求严正履行协定，要求和平与民族和睦，向我们代表团表示祝贺，希望并相信代表团的斗争必胜等等。我代表我们代表团感谢干部战士们和同胞们隆重而亲切的欢送，表示将铭记他们对代表团的嘱托与希望，保证不辜负他们的信任。美军军官和机组人员，故意显得温文尔雅，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伪军官们都茫然不知所措，气鼓鼓地坐在直升飞机里，不敢出来。

集会结束了，按照禄宁机场指挥部的命令，美国直升飞机发动了引擎。我回过头亲切地看了看同志们、同胞们和禄宁的景色，然后同大家一一握手。我同文朴同志和黎世赏同志拥抱。文朴同志是南方司令部政治局副局长，前年曾和我

^① 越南南方共和的正式旗帜。

一起参加了禄宁的“阮惠”战役。黎世赏同志负责南方的宣训工作，曾和我一同出差走遍了长山公路。黎世赏同志对我说：“我要把今天亲手拍的人民满怀信心欢送代表团去西贡的照片送给你。”在依依惜别声中，在欢动的旗林花海之中，我们代表团向人们挥手告别，然后排成两行，严肃地登上直升飞机。我乘坐的那架直升飞机由一名美国少校指挥。他显得彬彬有礼，小心地检查了我的座椅后才走下飞机，默默地向我敬礼，请我上飞机。他扶我坐好，还替我系好安全带，然后才退过去坐到他的座位上。直升飞机机群按队形有秩序地起飞，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侧身致意，然后沿着13号公路直飞西贡。不仅机场上的人群向我们的直升飞机挥手，似乎所有的禄宁人，在路上、在院子里、在田地中，都在高兴地向我们挥手致意。这是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地区里出现的感人至深的一幅和平景象。直升飞机上的美伪军官面对这种景象有什么想法呢？就在几天前，与这种景象完全相反，也是这些直升飞机，制造了无数的死亡，使多少家庭离散。它们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凄凉景象，地上连人影也没有。那个美国少校忽然转过身来，朝我笑着，恭敬地说：“你们胜利了！”

机群顺着13号公路飞行，经过平隆、豆乌、真城、保邦、莱溪、边葛……，这些地方都是多年来我方与美伪军反复激战的战场，记载了南部东区的战士们不畏艰险、英勇奋战所建立的无数显赫战功。下面的树林，过去是古树葱郁、小树茂密，今天却树木凋残，景象荒凉，地面上弹坑累累。B52飞机地毯式轰炸留下的痕迹比比皆是，森林都被毁光了。难怪美国人会以为他们B52轰炸机所过之处，地面上一切生物难以幸免，并且大吹大擂地渲染B52飞机是恐怖的战

争之神。我们正飞越西贡河，看到平利桥矗立在深及河底的铁丝网当中。飞机越过安富东，然后到达新山一机场。在新山一机场的军用跑道上降落后，我们代表团向机组人员感谢致意，握手告别。大家穿着整齐的解放军军装，在机场上整齐地排成一行。军官们提着公文包，佩着手枪。战士们头戴荷叶帽，肩背背包，挎着自动步枪。但是，每个人脚上都穿着有名的抗战鞋。不知道美伪是否懂得我们的用意，但那天在场的许多国内外记者都非常敏感。他们不停地拍电影、照像。当看到记者们把镜头对准抗战鞋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外国记者曾经这样写道：“……他们脚踏朴素的抗战鞋，雄壮地步入新山一机场。这次他们还是穿着1968年戊申年的那双抗战鞋走进越南共和国首都西贡。”（1973年2月1日合众国际社。）是的，记者们说的完全符合事实。为了得到今天这样一个场面，戊申年，抗战鞋在西贡的街道和许多重要的地区，也包括这个新山一机场以及在整个南方所有的城镇，都曾经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这次，抗战鞋是带着诚意来到西贡的。将来肯定会有有一天，在西贡解放的时候，抗战鞋将再一次重返西贡。我把我们代表团的队伍从头到尾打量了一番，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他们眼睛明亮，满面笑容，昂首挺胸，威武雄壮，一个个显示出胜利者的自信。他们来自全国各战场的不同岗位、不同单位，年纪也各不相同，有的是抗法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的是崛起之夜才参加革命的，有的是戊申年新春^①在西贡拿起枪杆参加斗争的，也有的刚够当兵年龄。但他们都曾为13号公路上禄宁战役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站在记者们的镜头前，面对周围密

^① 指1968年新春，越南南方军民对伪政权发动的进攻。

布的美伪军警好奇、惊恐和窥探的目光，显得那么朴素、平凡、镇定自若。人群中出现了身着匈牙利和波兰军装的人。原来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中的匈牙利和波兰同志也到机场迎接我们。他们向我们表示，必要时，随时可以提供协助。我向他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在办完简单的手续之后，我们上了汽车。全都是美国的黑色小轿车，有福特牌的，有雪佛莱牌的。车队驰往美伪在新山一机场为代表团安排的驻地“戴维营”。

戴维营，过去是美国的一座兵营，今天重新进行了修缮，由许多木板墙和铁皮顶的简易房屋组成。一排排笔直的平房，中间有宽阔的走道，偶尔才有一、两棵树。骄阳似火，炙热灼人，特别是在中午。白天十分闷热，加上四方传来的各种飞机和直升飞机震耳的响声，嘈杂的喧闹声，谁都感到烦躁难忍，哪还能舒舒服服地去思考工作和休息。幸而这里的气候还好，太阳落山以后就凉快了，但仍然摆脱不了连续不断的金属撞击声的干扰。真不虚为一座兵营！对战争中的士兵这就足够了，但作为外交使团的住处则连最起码的条件都不具备。美伪真会捉弄我们。他们一定花费了不少功夫才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和我们代表团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驻地。

我们的车刚开进大门，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黎光和、刘文利、胡光化、裴诚信等同志，还有其他许多同志，都是熟人，他们一涌而上，把我们车队团团围住。我们一下车，黎光和同志就送给我一束从首都河内带来的鲜花。大家都跑过来互相拥抱，笑声、拍打肩膀声不绝于耳。场面太令人感动了，真正体现了同一个母亲——祖国的孩子们之间的骨肉情谊。我们的祖国多年来一直在战火中痛苦挣扎。在战

场上同残暴的敌人进行战斗的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今天又在满布敌军的敌人心脏里重逢，为了崇高的目的，为了和平、民族和睦而共同斗争，的确是亲切的、高兴的。

我转过身同段焯同志拥抱。他是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已先期到达西贡参加副团长级会议，讨论工作程序问题。我们代表团团员杨廷草同志，也从巴黎来到西贡，还转来了阮氏萍同志和巴黎代表团给我的信件以及热烈的祝贺和问候。

西 贡 六 十 天

戴维营驻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黎光和同志的代表团，另一部分给我们使用。美伪还给两位团长各准备了一套相当漂亮的住房，两套连在一起，一样的款式。每套房间都有客厅、办公室、餐厅、卧室、洗澡间和卫生间。房屋门窗严实，装有空调设备、电灯、电话和其它相当考究的设备。但是，我们懂得他们的“好心”。因此，我们各自在代表团使用的房子中，收拾出一个房间来作卧室和办公室。把团长的那两套房子关掉，交给专家们去检查。经过一段时间搜查，不知道花了多少天，同志们让我们看了在客厅和办公室桌子上找出来的几个很小的窃听器。我们相视而笑，不知道这是美军还是伪军的杰作，还是木工兼电子专家们的精密玩具。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件，如干扰电波，破坏我们同根据地的通讯联络，截收我们的电报……。好了，说这些干什么，这本来是电子时代的美国常干的事。这些事同后来华盛顿的水门事件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并且对最小的事都早有防范。这只不过是尚未结束的战争的继

续，敌人已经使用了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从大规模杀伤的现代化武器到窃视、窃听用的最精密的电子、雷达、激光设备，从麦克纳马拉防线到戴维营。驻太平洋美军 1973 年 3 月 15 日出版的《星条旗》报承认“美国在本世纪进行的第三场最大的战争刚刚结束。越南战争是消耗弹药最多、破坏最大和利用科技成果最多的一场战争。”

美国将其现代化技术滥用于侵略、杀人和诈骗的目的。越伪既无技术，又很愚蠢，美国主子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执行中也尽量有所创造，每天专门搞些小动作，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给我们代表团制造困难，例如限制商人进戴维营给我们送食品和用具，禁止记者，特别是老百姓同我们代表团接触和谈话，设法阻挠我们外出，尤其是在西贡街道上的往来，常常故意弄坏车辆，让护送代表团活动的军警姗姗来迟等以制造困难。他们甚至还用直升飞机、坦克进行威胁，用金钱美女收买、引诱我们。对我们在其它地区的军事代表团和地方军事小组，他们的态度更加恶劣。住房差，不卫生，拥挤、闷热，缺乏必要的设备。如在美萩地区，敌人将代表团或军事小组住地安排在同心根据地刚搬走的一个养鸡房里，室内臭气熏天。他们供应变质了的食品，如在顺化，有时送来的罐头因过期太久都鼓胀变形了。在西贡举行的四方代表团会议上，我们对他们的故意亏待不断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派调查组调查和解决，而美国却把责任推给伪方。美国代表团伍德沃德少将假惺惺地说：“十分遗憾，美国方面对这些疏忽之处一无所知。越南共和国方面负责这些工作，他们告诉我们一切都好。”几次都是这样，越伪代表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或者把责任往下面推，往地方上推，指责下面执行得不好，然后同意派出调查组，保证修缮住房、

增加设备，但事后一切依然如故。

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流氓、恶棍，配合宪兵、警察，对联合军事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小组中正在执行任务的越南人民军军官行凶，如扔石块和脏东西，甚至使用铁棍、刀子、锤子打伤我方人员，如黎成仁少校和邦美蜀联合小组的两位大尉以及顺化的六位同志。陈欣午同志在广义省的德普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组一起执行任务时，被打得不省人事。各联合军事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小组中的我方军官和战士都是不久前在战场上立过许多战功的人。在历次作战中，他们都象猛虎一样进行过十分英勇的战斗。现在，在敌人控制区新的斗争战线上，他们对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胜性，总是信心十足，非常沉着、坚定，在任何卑鄙的、威胁或利诱的行为面前毫不动摇。我们为有这样的同志感到无比自豪，我们无限感激这些十分平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胡伯伯部队的战士。

美伪玩弄这些卑鄙的伎俩，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创造良好的气氛，共同正确地履行巴黎协定，也不是为了因战争家破人亡、互相敌对多年之后，创造一个民族和解与和睦的气氛。面对美伪这种行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们真正愿意停止战争，带来和平。显然，他们也毫不掩饰自己蓄意破坏协定的险恶居心。

巴黎协定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首先必须执行的就是停火问题。协定的第2、3条和关于实现停火的议定书，对完全结束战争行动、各武装力量留驻原地等都有十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1973年1月28日停火生效之日起到现在（以至直到1975年4月30日），在整个越南南方的各个战场上，没有哪一天停止过枪声。

就在停火生效时，阮文绍伪政权还出动一个战团的兵力，由坦克开路攻占了我方的越门。我们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消灭了入侵敌军，保卫了解放区。在四方会议上，我们有力地控诉了他们违反协定的行动。越伪代表团团长吴游中将强辩说：“我们于1月28日上午7时58分（不是1月28日上午8时停火生效时间）完全占领了越门。”我反驳说：

“1972年5月，越门就被我们解放了。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你们的军队在停火生效以后，制造了这次非法入侵事件。但是，我向中将通报一个最新消息，由于警惕性高，我们解放军在用喇叭喊话，呼吁他们后退，不要违反协定无效之后，已经消灭了入侵的军队，挫败了这次冒险行动。这对那些不愿遵守协定、不尊重自己签字的人是一个教训。”他们灰溜溜地无言以对。

为了制止敌人的飞机飞越我控制地区，我们要求立即讨论有关实现停火问题议定书的第3条：“各联合军事委员会将立即商定此方的军事运输机、各种军事运输车辆和军事运输船舶要通过彼方控制区的走廊、路线和其它规定。”美国和越伪代表团对此置若罔闻，似乎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在2月16日的会议上，美方玩弄手段，通报紧急情况称，一架C47飞机在安禄以南被击落，两名美国飞行员受重伤。紧接着在以后几次会议上，美方都向我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派调查组。我方同意调查，但强调指出，在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对飞越解放军控制地区飞机的飞行走廊、高度等问题尚未商定之前，谁也不能对飞机的安全承担责任。最后，美国只好闭口不谈了。显然，我们一方面依靠协定的法理进行斗争，同时坚决反击各种违反协定的事件，迫使美伪对我们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在战场上，无论哪个地方，只要我们的力量

薄弱或疏忽大意，即使违反协定的事实俱在，敌人仍无视我方抗议，百般抵赖。如伪军占领广义省的沙莹事件，1972年，我们就已解放了沙莹地区，控制了穿越该地区1号公路相当长的一段。停火生效以后，伪军出动整师的兵力发动进攻，重新打通1号公路。我们有力地揭露了这次违反协定的事件，要求派调查组，但美伪故意拖延，不了了之。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情，美荻省4号公路沿线一些村庄，1月28日前是我方控制区，1月28日以后，敌人连续出动军队进攻，并深入我方控制区建立据点。由于我们当地的武装力量疏忽大意，缩手缩脚，怕开枪还击会违反协定，致使敌人占领这些地方，并且在会议桌上蛮横无理地硬说这些村庄本来就是他们的。停火问题是巴黎协定中最关键的问题，而阮文绍伪政权不把它放在眼里，公然从根本上破坏协定。他们在1973年的“李常杰”计划中提出五大战略措施：

一、把蚕食和绥靖计划作为中心措施。

二、建设强大的军队和政权作为支柱。五年内使越南共和国军队年轻化、有效化和现代化。

三、破坏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中不利于越南共和国的条款。

四、在经济上包围封锁对方的同时，在1973—1974年恢复经济（1973—1978年长期经济计划的一部分），特别是工业。

五、依靠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军和空军，保持威慑力量。

他们还加紧进行所谓“扩展领土”战役，“插旗”战役，出动步兵和直升飞机到处插旗。他们为此准备了一百六十万面伪政权的三条旗。

越南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1973年4月6日发表的通报初步总结说：“从1973年1月28日到3月28日的两个月时间内，西贡政权违反巴黎协定的事件达70,000多起，包括蚕食行军19,770起，炮击23,000多起，出动飞机对解放区进行轰炸和扫射3,375起，在伪政权控制区警察搜捕行动21,075起。”

根据敌人的材料，到1973年10月止，他们在整个南方增设据点1,180个，比1973年1月28日以前多控制7,253个村庄。

十分明显，尽管美伪已经在巴黎协定上签字，他们仍然毫无顾忌地按其既定计划，竭力进行绥靖和蚕食活动，增强军队实力，企图改变力量对比，以利于他们独占整个越南南方。在1973年3月南方两方代表团团长的一次会议上，代替吴游的越伪代表团团长余国栋中将在陷于窘境时说穿了真相：

“我不赞成巴黎协定，因为它只对你们有利。”我严肃地批判他说：“这就清楚了，连越南共和为履行巴黎协定而派出的代表余国栋中将都不赞成协定，反对协定，那你们违反和破坏协定是必然的，是很容易理解的。”余国栋惊慌失措，急忙进行辩解：“我个人不赞成……但是，……因为……，已经签订了协定，我们要履行，没有破坏……。”

众所周知，巴黎协定签订之前，美国加紧向越南南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加强伪军力量，弥补越伪1972年的严重耗损，并竭力为伪军提供充足的储备，一旦美军撤走，使伪军仍能保持强大的力量。基辛格曾在美国举行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撤走后，越南共和国仍然必须保持强大。”巴黎协定生效后，这一工作仍在加速进行。所有这方面的数字，许多资料都有记载，各国新闻界也有许多报道，并作了充分的统计，我想不必在此赘述。

不仅如此，美军及其仆从军虽然被迫按照协定全部撤出越南南方，但他们却把最新式的装备、后勤仓库和基地交给阮文绍军队。

巴黎协定第5条和第6条规定，协定签字后60天内，将完成自越南南方全部撤出美国军队和其它国家军队、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包括军事技术人员和与缓靖计划有关的军事人员、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事宜，拆除美国和其它外国的所有军事基地。有关停火的议定书第8条也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和协定第5条中所述的其它外国撤出时，应带走他们所有的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

为了保证正确履行上述各项条款，协定第3条明确指出，一俟停火生效，美国军队在撤军计划实施前留驻原地，其方式由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决定。

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负有配合、观察和检查上述第3、5、6条实施的任务，特别是国际委员会必须监察和监督上述各条款的履行。

在新山一举行的四方代表团团长的历次会议上，我们不断要求美国告知撤军和拆除军事基地的计划，以便派联合小组前往观察和检查。天天如此，美国代表团团长伍德沃德少将总是支吾其词，转移话题。但是，有一天，他装模作样地郑重通报说：“为严正履行协定，美国方面已经排除了水雷和地雷……。”他大声地念着数字、时间、地点……，然后谈到撤军：“已经把包括同盟军在内的8,000名军队撤出越南南方。”我当即提出抗议：“我们不能接受美方这种弄虚作假的通报。没有谁会相信伍德沃德少将提出的8,000名或者其它任何数字，而不认为这可能是编造出来的。我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哪一个外国在进行任何一次撤军之前都必须事

先通报，以便按规定让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到实地观察 检查，并让国际委员会到实地监察和监督。不这样做，任何数字都是无效的。我不能不认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美国士兵或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士兵撤出越南南方。”

过了许多天，1973年2月16日，美国致函我方，正式同意让四方联合军事小组到各地观察美国和南朝鲜军队撤退情况，并允许拍照。他们被迫让步了。通过监督撤军，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当年踏上越南土地时都是武装到牙齿的，撤出的时候却没有任何枪炮，带的全是行李、用具，笨拙地提着陶瓷做的象和五行山的石器等纪念品。我们的同志质问他们，他们回答说：“武器装备已经用轮船运走了。”看，他们就是这样进行欺骗的。

直至1975年伪政权遭到彻底失败时，美国十分气恼，并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寻找一切狡诈办法给伪军增加了许多装备，到头来还是招致彻底的失败？它在悔恨交加之余道出了真相：“我们的军队撤走时留下的数量庞大的装备和物资，加上后来增加的援助，照理说，越南共和国军队应该有足够的力量同对方较量才对。”（威尔登·A·布朗的《最后一架直升飞机》一书第十章结尾部分）

至于拆除军事基地的问题呢？

美国伍德沃德少将严肃通报说：“我们受权答复你们，现在，我们在越南南方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基地了。所有基地都已在协定签订前就交给了越南共和国。目前，美军驻在越南共和国暂时借给的基地里。”

真是不择手段的、明目张胆的欺骗。

一旦帝国主义制定了计划，有了目标，他们就按照侵略者的方式行事，恬不知耻地胡说八道，不管对象是谁。

照道理，国际委员会有足够的发现这些奸诈的问题，有权作出恰当的结论，谴责美伪违反协定的行径，以制止破坏协定，继续进行战争的行为。国际委员会包括四个国家：匈牙利、波兰、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加拿大退出以后由伊朗接替，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

必须坦率地指出，加拿大几乎就象是属于美国的，在国际委员会中袒护美国，替美国无理争辩，掩饰错误，必要时就使用否决权。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是格汶大使，此人看来外表老练，但是，听说喜欢独断专行、仗势欺人，而且傲慢无礼、目中无人。有一天，格汶大使表示想对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进行礼节性拜访。我们随时准备接待他，并认为是同这位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坦率交谈的好机会。我按在戴维营中可能办到的条件作了充分的准备，并在会客室接待了他。我走到汽车跟前接他进来，并请他同我坐在一张沙发上，这是会客室中的贵宾席。陪同他前来的有加拿大代表团的政治助理和一名译员。我方有代表团成员武东江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这次会见的主要翻译是我们的译员阿勇同志，在四方代表团团长历次会议上，都是他给我做翻译。阿勇是一个颇有才华的青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嗓音宏亮，翻译时知道该强调哪些必要的段落。

一般礼仪性的寒暄过后，格汶谈到国际委员会的作用和成绩，特别是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在停火、交还各方人员、美军及其仆从军撤出越南南方等方面的作用和成绩。所有这一切完全是有意表白国际委员会是得力的，客观的，公正的，特别是以嫁祸于人和威胁口吻，含蓄地指责我方在战场上多次违反协定，因而至今枪声未息。我十分沉着和有礼貌地坐着，一边坚持听他讲，一边尽量完全弄懂他每句话的意

思。这位大使也许感到自己讲得长了，够了，便停了下来，以探询的目光看着我。我不慌不忙地请客人们用水果、抽烟，然后开始讲话：

“亲爱的格汶大使阁下，您所说的关于国际委员会在监察和监督履行巴黎协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必须采取客观立场的见解，非常对。我坦率地对您说，在我国国土上，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连绵不断的破坏性战争，关于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签订以后，仍然到处枪声不断，我们是感到十分痛心的。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越南民族那样懂得和渴望和平，越南民族为了找到真理知道怎么战斗，也知道怎么坚持。但是，大使阁下，一切事情都有其原因。请阁下允许我回顾几页过去的历史。我们的民族在1945年取得了独立。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侵略我国。我们被迫战斗了9年，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杰出胜利之后，才签订了日内瓦协议。那时候也有个国际监督委员会，其中就有加拿大的代表，大概阁下知道得很清楚吧！”格汶点点头表示同意。我接着说：“然而，当时还是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对报界宣称：‘尽管法国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如果必要，美国仍将单独行动，向世界上的那个地区派遣军队。’这是《纽约时报》的一段叙述；而美国确实是这样做的。”

格汶举手打断了翻译的讲话，自己讲了很长的一段。我对阿勇说，你把我的话继续译完，什么时候我讲完、停下来了，你才能听他的话和翻译他的话。阿勇又大声地继续翻译我的讲话。

“我谨提供一个数字，让大使阁下有所了解：从1955年到1960年，美国有800多艘运载武器和各种军事装备的船只开进越南各港口，特别是岘港。在此期间，美国给吴庭艳政

权提供援款达16亿美元。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这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协议。但是，当时的国际委员会不是置若罔闻，就是替美国掩饰，或者由于受到某些压力，对这种非法行为不予制止。因而，在我们越南国土上仍然枪声不断，战火继续蔓延。加拿大是当时国际委员会中的重要成员，当然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格汶再次打断我的讲话，抢着讲了很长的一段，如果不是我叫阿勇继续翻译我的讲话和阿勇翻译的声音比格汶的声音还大，格汶准备不停地讲下去。

阿勇的确是位才能出众的青年。他的声音压倒了格汶的讲话，格汶只好停下来，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同时还装出吃惊的样子。格汶可能从未受过这种挫折，遇到过这种窘境。我接着说：“今天，事情却在重演。巴黎协定签订前后，美国用轮船、飞机向越南共和军队运送武器和装备，支持他们破坏协定，推行蚕食与绥靖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和其它国家军队撤走时，又把武器、物资、仓库和军事基地都交给阮文绍军队。这是明目张胆地违反巴黎协定。”

讲到这里，格汶好象再也受不了了，他欠着身子，连连摆手，结结巴巴连话也说不清了……。我只好安慰他说：

“请大使冷静一点，我再讲几句就完了，就让您讲。”接着，我继续讲：

“这一次，如果国际委员会和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不互相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客观地、有效地采取行动，制止一切类似的违反协定的行径，那么，我想，枪声停不下来就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了，原因何在也就十分清楚了。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太重大了，我们没有满足越南人民、加拿大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和平愿望。加拿大政府两次参

加有关两个协定的国际委员会，对自己的作用将作何考虑？下面，请大使讲吧！”

这次，格汶不再象刚才那样气势汹汹地抢着说话了，态度和蔼，低声地说：“陈文茶中将阁下，老实说，我对日内瓦协议一无所知……那时，我不知道……那些事情……我也不关心……。”接着，他把话题转向西贡的气候和越南的水果。

我高兴地请客人喝啤酒和汽水。

大家都努力保持亲切和谅解的态度。格汶又说话了。他谈起了他为欢迎加拿大外交部长夏普访问西贡时举行的盛大招待会。那天，出席招待会的，有西贡伪政权的一些头面人物和美国大使邦克，还请了国际委员会和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我们都参加了。

“陈文茶中将阁下，您果真是那天招待会上的一颗明星，西贡上空的一颗明星。”

“大使先生，那是一颗明星，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正义之星，而我作为它的代表感到荣幸。”

“不，不，我想说的是您个人的突出作用。”

他竭力避免称赞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虽然临时革命政府早已不止在西贡，而且在巴黎和世界上享有无可争辩的威望。为了反对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美国和阮文绍伪政权都提出了一条原则：在越南南方，将来永远只有一个唯一的政府，那就是阮文绍的越南共和国政府。

格汶接着又说：“中将是一位伟大的战士。”

这次，我真有些尴尬了。虽然我早已明白他的用意，但是，我没有料到他会如此吹捧我。幸而我猛然想起了1964年合众国际社对我们的战士的评价：“越共游击队是神话式的

人物。他们是可怕的敌人，是令人敬畏的敌人。”

我微笑着，不慌不忙地说：“谢谢大使，您过奖了。的确，我们解放军战士爱祖国，爱人民，为了‘没有什么能比独立、自由更贵重的了，’舍身忘我地战斗，取得了胜利。美国和各国报纸、通讯社把我们描绘成神话式的人物……，是最杰出的、最伟大的。我能作为他们在西贡的代表，为正确履行巴黎协定而斗争，从心里感到骄傲。然而，这个协定是他们付出多少鲜血才得来的啊！”

格汶大使起身告辞。在院子里，他建议为我们这次会晤拍照留念。他拿出带来的照相机，交给我们的摄影记者照了几张合影。

在西贡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六十天，是工作繁重而又紧张的六十天。我们南北方两个代表团竭尽全力为履行巴黎协定而斗争，但结果相当有限。国际委员会中的匈牙利和波兰代表团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和兄弟情谊，同我们密切合作，共同斗争，互相保护，互相帮助。

国际委员会中匈牙利代表团的少将副团长，身材高大、壮实，穿着整齐、漂亮的匈牙利军装，在初次工作会晤时，他就以诚实的口吻对我说：“匈牙利的党、国家、军队和人民派我们到越南来，是为了越南人民的和平与幸福，为了世界和平。我们把越南革命的胜利看做是自己的胜利，所以，随时准备为它作出牺牲。这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原则，我们不怕死，当然也不怕苦。”

多么感人的肺腑之言，真不知怎样感谢他！他是来自遥远国度的工人阶级的使者，是怀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在艰苦的日子里来到我们身边的同志。

六十天过去了，回顾这一阶段的情况，由于美伪早已确定其目标和计划，因此最主要的问题停火就没有实现。战争在继续进行。让我们听听阮文绍在守德对伪军官们的讲话吧！

他说：“只有在越南共和国军队不再支持我，美国军援只能应付防御需要，越南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不再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越南南方重要地区时，越南共和国才履行有关停火的条款。”

显而易见，美国的忠实走狗以为他是胜利者，顽固地破坏停火，不论有无协定，都要将战争继续下去。

美国及其仆从国已经撤军。美国的走卒们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南朝鲜卖身投靠帝国主义，派兵参与杀害我国人民，他们的军队也都已彻底从我国滚出去。1973年3月15日上午，驻南越美军司令部举行降旗仪式，撤走了。下午，在新山一机场设有办公大楼、报纸称之为“东方五角大楼”的美国驻南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实际上是美国指挥全部美军、仆从军和阮文绍军队的最高司令部，美国在越南的庞大的侵略战争机器，也降旗滚蛋了。

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巧合，就在第二天，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军事代表团都乘车来到“东方五角大楼”。美国宪兵在路的两侧列队，庄严地向我们行礼致敬，我们两个代表团下车后径直走向客厅，参加美国军事代表团少将团长举行的招待会。我们在“东方五角大楼”里高兴地笑着，喝着美国酒，谈论着风和日丽的天气。

美国军队也滚蛋了。但是，他们留下了各种武器、军事基地和变相的军事人员，帮助支撑阮文绍走狗政权。

关于按协定交还有关人员问题，我们要回了在战争期间

被他们抓走监禁的一些人。我们军事代表团成员阮氏蓉少校专门负责交换俘虏事宜。她工作非常积极、泼辣，走遍了南越从边和到昆仑岛、富国岛的每座监狱。她是四个军事代表团中唯一的女同志，英文、法文都讲得很好。她人漂亮，工作老练，斗争坚决，使美伪感到敬畏，我们也引以为骄傲。她争取时间向尚被监禁的我方人员传达了巴黎协定有关交换俘虏的条款，为要求改善监狱条件，要求完全释放被监禁的人员进行了斗争。美伪玩弄阴谋诡计，企图扣留我方人员，但是，我们自己解救出不少干部和战士。这些同志曾经英勇奋战，不幸落入敌手，受尽了敌人的野蛮虐待。

我们也交还了被我方监禁的全部美伪俘虏。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六十天面对面的斗争，我们对敌人更加了解了。美国只是为了要回俘虏，好对美国人民有所交待，把美军撤回国是因为美国人民要求。美国仍然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妄图继续赖在越南。越伪原封不动地保持了阮文绍的“四不”方针：不给“共党”土地，不中立，不同“共党”联合，不同“共党”对话。尽管如此，敌伪也不得不在巴黎的越南南方两方会议上，在新山一的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两方会议上坐下来同我们谈判。当然，他们谈判态度不严肃，无理狡辩，信口开河，今天同意了，明天一笔勾销。连最小的问题，首先是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旗子颜色和标志问题，他们也出尔反尔，拒不执行1973年1月31日副团长会议达成的协议，即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旗子、臂章和车船、飞机上的标志都用桔红色的规定。在一次团长会议上，他们建议我们重新讨论，用别的颜色。我们打掉了他们的意见。什么事情一旦达成了协议就要去执行，不能拖拖拉拉。在会议中间休息时，越伪代表团副团长潘和协准将坐到我旁

边，小声对我说：“中将不认识我吧，我早就认识您啦！”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潘和协说：“我曾在第3师（1945年八月革命时期）当过兵，可惜当时你们这些老大哥们互相不和，要不然，也许我现在还在中将的手下参加抗战呢！”他笑嘻嘻地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原来如此，潘和协这里说的“老大哥”包括我在内。抗法战争初期，我是霍门——巴点——德和联郡解放军一个单位的指挥员，在西贡周围一带活动。第3师师长是阮和协，第4师师长是李惠荣……。1945年，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第4师被击溃。第3师溃散一段时间后，投降了法军。这两个师的一些部队在润德、安仁、霍门——嘉定西和美菽、德和（隆安省），经常抢劫、骚扰人民群众，我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据说，潘和协实际上不姓潘，“潘和”是法文“弗朗索瓦”的谐音，因为他的名字叫弗朗索瓦·协，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越南人。他自称小弟，意思是想恳求“老大哥”同意改换旗子的颜色。他说：“中将先生，桔红色与红色相近，看起来太吓人了。”

既然他自称“小弟”，我也就摆出“老大哥”的架子说：“干吗吓人，红色是象征前途光辉灿烂的颜色，有什么好怕的。你应该懂得，桔红色在国际上是通用的颜色，很远就看得见。这是最合适的颜色，而且好看。同时，双方同意了的事情就要做，不要翻来复去的变化，浪费时间。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他还跟在后面一再恳求，但是，我坚决打掉了它。虽然如此，越伪还是拒不执行。类似桔红色这样的事情还很多。

* * *

根据巴黎协定规定，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将在60天的期限之内结束活动。快到停止活动的那些日子里，美国舆论和

西贡报纸就散布说，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将延长活动期限，不知道他们又要玩弄什么阴谋。是为了延长美国代表团合法留驻西贡的时间？是为了让越伪紧紧依附美国，继续得到美国人保护？是为了把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留下来，企图再解决一些有利于他们的问题，如寻找失踪的美国军事人员？还是为了降低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威信？但是，我们坚决要美国军事代表团撤回美国，让黎光和同志的代表团返回河内。至于我们代表团，中央已经决定，当转到两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工作时，黄英俊少将担任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当然我要撤回去。但我撤回到哪里去却成了难题。去河内吗？没有任何理由。去禄宁？美伪会制造困难，不提供方便，甚至玩弄不可告人的阴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当时美伪的意图起码要将我留在新山一。按照他们的意思，让象我这样在解放阵线中地位很高的干部重返战场，无异于“放虎归山”。把这样一个人留在他们手里作人质，肯定是有用的。我们早就清楚地知道，一切事情都是由美国主子决定的，越伪只不过是唯命是从的奴仆。通过这60天，更使我肯定了这种看法。我能否回河内这件事也同所有的事情一样，如果美方同意，一切都会很顺利。必须设法使美国同意送我回河内。

3月29日晚，我约美国代表团团长伍德沃德在戴维营我方代表团驻地会晤。伍德沃德、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威特金准将和翻译索瓦多少校准时到达。索瓦多少校头戴蓝色呢便帽，他曾在头顿的政权一所培养绥靖干部的学校里当过顾问。

我告诉伍德沃德，由于通讯联络困难，我刚接到一个迟到的消息，还有一个美国俘虏被我军关押在茶荣。为了体现

我们正确履行巴黎协定的诚意，我们把这名俘虏交还给他们。明天，双方就派干部商谈有关交接最后一名俘虏的事宜。从我个人来说，我想，这是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以纪念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中共同工作的60天（我的意思是说，通过这件事，伍德沃德肯定会升官或得到褒奖）。

伍德沃德喜出望外，一再感谢我。为了表示感激，他极力装出亲密的样子，问候我的健康，问我个人最近有什么打算？

这句话问得正中下怀，太及时了，我就希望能这样。我连忙说，我个人打算去河内一趟，并顺便访问老挝。

伍德沃德和威特金满以为我有意想帮助解决美国和阮文绍在老挝的俘虏问题，但不便也不敢询问。伍德沃德显得十分热心，随即问我：“中将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如果少将能够提供交通工具的话，我明天上午就走。”

“没有问题。明天上午，我安排一架C130飞机送中将去河内。”

我说了些感谢的话，并提醒他说，明天上午，我方军官将同美方军官会晤，安排有关交接在茶荣的美军俘虏的事宜。

他又一次感谢我，并问我明天上午去河内的C130飞机是否要等我返回西贡？如果不等，我怎么回来？（因为美国代表团将结束其活动，并于3月31日撤回美国，在此以后，就必须靠越伪提供交通工具。）

我微笑着应付他说，我可以绕道巴黎回西贡，趁此机会也可游览欧洲一个著名的首都（肯定伍德沃德又以为我要去会见我们在巴黎的代表团）。

伍德沃德十分高兴，极力称赞我的计划，然后起身告

辞，而且他没有忘记告诉我明天上午派出飞机。

1973年3月30日上午，越伪军官驾驶着一辆黑色小轿车到驻地来接我们，并且恭恭敬敬的将我们一直送到飞机舷梯旁。到飞机场为我送行的，有黎光和少将、黄英俊少将和我们南北方两个代表团中的同志们；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匈牙利和波兰代表团的同志们；还有美国代表团团长伍德沃德少将夫妇。我同每个人亲切握手告别，通过充满情感、依依不舍地握手，向同志们暗示祝贺胜利，向朋友们表示感谢。伍德沃德祝我一路平安，交好运，还说以后派飞机去河内接我回来。实际上，我并没有向他提出这种要求。我祝伍德沃德夫妇幸福，然后登上飞机向大家挥手告别。在美国的C130飞机上，我坐在美方好意安排的驾驶室里。同我一起乘飞机回河内的有联合军事委员会中研究综合情况的干部阮光明中校、黎怀欽大夫、翻译阿勇、警卫阿华，还有从西贡到河内去的其他一些同志。我就这样结束了在敌军心脏里度过的非常激烈、紧张的六十天。

我坐在飞机上，这是第一次沿着祖国从南到北，联结西贡与河内的航线上飞行，我心潮澎湃。这里，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山河，是世世代代的人民用血汗建设起来的。绿色的村庄，重叠的山峦，漫长的海岸线，雪白的海滩，辽阔的大陆架，真是千姿百态！三月灿烂和煦的阳光，给景物增添了更加奇妙的光彩。我们的祖国啊，美丽多娇！千百万勤劳勇敢、聪明才智的越南人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有今日的锦绣河山。我心中无比感激我们的鸿貉祖先，不觉地想起了胡伯伯，想起了那年他老人家在义山雄王庙前对我们部队的讲话：

雄王们建国有功，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一致卫国。

胡主席的话已经深深地印在越南人民的心坎里。没有任何敌人，不论是大西洋彼岸的头号帝国主义，还是过去的黎昭统，今天的阮文绍，都将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无论如何我们的祖国一定能够获得独立、自由和统一。

飞机已经到了红河平原上空。祖国的心脏、可爱的首都就在眼前。我在河内生活和工作过很长时间，几次离别重归。但是，这次重返与过去几次大不相同，就象久离家乡的孩子，同人间多少艰难险阻搏斗之后，回到温暖的家里，见到亲爱、善良的母亲那样，感到异常的激动。我回来了，终于回到了慈母的身边，不久又将启程远行，可以肯定将比上次更会有意义。

三天之后，从西贡来的一架C130飞机在嘉林机场降落，飞机是来接我回西贡的（正如伍德沃德那天允诺的那样）。我派阮光明中校去告诉美机指挥官，我还不能回西贡。阮光明同志写了一分通报，明确地说，陈文茶中将忙于公务，还不能回西贡。他让飞机返回新山一机场，以后也不必再来接他了。阮光明同志也没有忘记代表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已经回到河内，生活在充满欢乐的气氛中，在朋友、同志、骨肉同胞的自由舒畅的气氛中，这使我更加思念还留在新山一机场的同志们。他们为了现阶段斗争任务的需要，不得不在敌人的包围中紧张地生活和工作，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的敌人十分顽固、恶毒，谁知道在同志们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解放区的同志们必须竭尽全力，同代表团的同志们紧密配合，夺取革命的胜利。代表团的同志们，有我们，有我们的人民，包括西贡市的人民，你们绝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战友重逢，欢庆胜利。

第二章 只能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回到河内后，我见到了党中央、政府、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领导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取得的成绩和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个人在同美伪进行六十天面对面斗争之后所得的结论以及对形势的看法等等。我也听到了领导同志对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工作的看法和评价，对敌人阴谋和我方下一步行动的估计和设想。我休息了两三天之后，即着手准备并参加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越南南方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扩大会议。

沿长山公路乘车北上的南方局和南方司令部的范雄、阮文灵、陈南忠、黄文泰、武文杰等同志也都相继到达河内。我们就B2战场情况专门召开了会议，就总的形势估计、近期形势演变的看法和未来的设想统一认识。我们还同出席会议的五联区战场的武志功、朱辉琨同志及B3战场的黄明草同志交流了经验。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73年4月下旬举行，南方各战场都有代表参加。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巴黎协定的签订，意味着我们在抗美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迫使美国结束对北方的破坏性战争，迫使美军及其仆从军全部撤出越南南方；特别是，在经过六十天执行巴黎协定之后，我们进一步掌握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这次会议旨在重新估价形势，估计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力量对比，指出越南南方在新

的战略阶段的前进道路。这是全体干部、战士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直到这时，各个战场以至中央各级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实际上并未一致，如对巴黎协定的评价，战场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如何执行协定和如何对付敌人日益严重地违反协定的行径。就是各个战场情况的变化也不尽相同，因为各个战场敌我双方的条件完全不同，对战争全局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也不一样，战场领导人对问题的考虑、认识和采取的行动也存在差别。这些都是不容改变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某个战场发生的实际情况，就对整个形势作出估计并提出主张，那将不可避免地要犯危险的错误，除非这个战场存在许多具有共性、能够代表全局的东西，并对战争全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如果不能正确估价每个战场的作用，势将导致在力量部署及战略、战役、战斗方案等方面的错误，当然也会影响战争的胜负。在反对美国侵略、解放祖国的战争中，我们并不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依靠党的英明、民主和集中的领导，我们及时纠正了错误，赢得了胜利。革命是群众的事业，每一阶段革命的成败都是千百万人、首先是领导集团的思想 and 行动的成败。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败事在你、成事在我的情况。在革命的每个阶段，历史的每个关头，正确的行动和主张都是集体思维和认识的结果，是无数人，包括从最高领导人到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没有任何人一贯正确，也没有任何人一贯错误，因为大家都是人。最崇高、最英明的是能够认识错误，坚决、及时地纠正错误。即使是集体，也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但集体肯定比个人专权犯的错误要少得多。我们党和民族的天才领

袖胡主席曾经用一句十分简练而又深刻的话总结我们党和民族的传统：

“团结、团结、大团结。成功、成功、大成功。”

这里的团结不仅是指行动上的团结，而且是在思考、认识、思想和意志方面的团结。胡主席本身由于融会贯通了这一传统，才使他成为一个十分简朴、谦逊的人。他是所有人的智慧的结晶。他的思想也就成了所有人的思想。胡志明道德闪耀的光辉普照山河，照亮了每个越南人的心。胡主席不仅十分了解自己，而且非常了解所有的人。他公道正直，对人充满深情。

我们的民族也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过程中，用下面一句谚语总结了自己的传统：

“独木难支，
众志成城。”

越南民族是这样做的，胡志明也是这样做的。

记得当时各个战场都有许多干部向我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巴黎协定签订了，而伪军、伪政权垮的不多？”

或者认为：

“现在美国被赶走了，伪政权不仅没有被推翻，反而更加强大了。”

“过去一个时期是美国失败的过程，同时也是伪政权在政权、军队及经济等方面生存和壮大的过程……。”

一些表面现象，加上美伪不可告人的阴谋及其狂妄的计划，使得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形势的实质。

巴黎协定一生效，敌伪就派兵占领了我们的一些重要地

区，如广治承天省的越门、广义省的沙莹、美萩省的4号公路、巴地省的2号公路、隆川省的七山等。敌人不仅蚕食我方在1月28日前不久才开辟的许多地盘，而且还占领了我方早就控制的一些地区。与此同时，敌人还向双方反复争夺的地区以及敌人控制区出动大批军队和警察，进行扫荡和绥靖，铲除我在敌占区中的小片游击区，消灭“豹斑”状态，进一步完整其控制区。几乎在所有的战场上，敌人都在新占领的地区修筑据点，并在其控制区、战略要道沿线和城市周围增修了大量据点。1973年1月至4月，仅在美萩、鹅贡、建祥和槟榔4个省的24个乡、129个村庄中，敌人就增修了287个据点。同一时期，美国又加紧从本国、日本和菲律宾运来大批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巩固和发展伪军。美国向伪军提供了各种现代化武器，如坦克、M48装甲车、号称战场之王的美制175毫米大炮和F5E飞机等。伪政权不择手段地大规模抓兵。每月平均抓到15,000名青年，不仅为其主力部队迅速输送了充足的兵员，而且还储备了为数众多的后备兵源。他们把大批青年送到新兵训练中心接受训练，当时各地都到了容纳不下的地步。伪保安军和民事防卫队也大大增加。敌人成立了保安联团，代替主力部队在地方上机动作战。仅1973年上半年，敌伪在整个南方的保安营就从189个增加到337个。在各大城市，敌人大力发展警察，特别在西贡成立了许多野战警察营。美伪的计划是，继续发展伪军，使之成为一支拥有110万兵力的现代化、年轻化和有效化的强大军队，并且特别重视加强技术兵种。敌人计划把空军各种类型飞机增加到1,500—1,800架；把机械化部队扩大到31—35个装甲团……。

敌人在加强伪军的同时，全力巩固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

伪政权。派绥靖官员下到各乡、各村；把伪军官派到各乡建立分支区作为实行法西斯镇压的主要工具；采用各种手段，如巩固“连家连户”，发展“团体化群众”等，进一步强化对人民的控制。敌人培植了大批密探和特务，派到双方争夺地区和我解放区进行活动。为了支撑阮文绍伪政权，为了随时支持在印支（主要是在越南南方）的仆从军队，美国在东南亚部署了一支机动军事力量，其中包括4艘航空母舰，735架战术飞机和173架B52战略轰炸机。

凡此种种都是美伪在巴黎协定签订之后加紧进行的。可以说，协定签订以后，敌人进攻我方的次数更多了，对人民的箝制更紧了，在各地都给我们造成不少困难。

与此同时，我们方面由于经历了从1972年4月以来的连续战斗，干部、战士都已精疲力竭。消耗了的兵员来不及补充，部队衣衫褴褛，缺少扛枪打仗的人，粮食弹药日益减少，很难抵挡敌人的进攻。一些地方不得不撤退，让敌人控制了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加之一些干部和少数地方组织怕还击敌人会违反协定，在执行瓦解伪军的敌运政策方面出现了右的、危险的倾向。具体地说当时有“五不”：不准进攻敌人；不准回击前来扫荡、蚕食的敌人；不准包围敌据点；不准炮击伪军据点和不准建立战斗乡。以为这样就可以稳定局势，避免引起紧张，从而实现民族和解与和睦。一些地方把前线部队撤回后方休整。认为如不撤下来，以后这些部队就有可能被消灭。实际上，一旦我们的武装力量撤出来，敌人马上就卷土重来，破坏我基层群众组织，消灭我基层党组织，消除那里的“豹斑”状态。

在此背景下，面对初期的混乱情况，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干部认为巴黎协定签订后，我方力量大为削弱，敌人力

量相对增强；敌人取得了许多新胜利，而我方则吃了亏，进一步受到损失，由此得出结论：当前，敌强我弱，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对敌人有利，对我不利，对革命有危险。基于这种认识，产生了一些错误主张和行动。我将在下面谈及这些具体问题。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完满地解答了各个战场和干部们的一切疑问。会议科学、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对形势作了深刻的估价，提出了将南方革命引向胜利的英明主张。会议取得的成果经党中央讨论一致通过，成为党的21中全会决议。为了取得一致，政治局会议经过了相当热烈，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讨论。许多不同意见，对战场形势的许多不同看法，彼此交锋……。我参加这次会议深刻地感受到了每个与会同志的高度责任感，正确反映战场实际的诚实态度，以及为了真理、为了爱国主义、为了团结、为了坚持客观实际而坚决斗争的精神。这是我党民主、集中的工作方法，是产生一切正确主张和获得完全胜利的秘诀！

激 烈 的 争 论

从一开始，讨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我强还是敌强的问题。分清强弱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对情况作一般的而不是具体的研究，不可能正确地判断谁强谁弱；只强调深入具体，而不深入最带有普遍性的具体情况，去谈论谁强谁弱也未必完全正确，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同时，还要考虑到强在什么地方，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强，什么时候弱，是暂时的还是基本的，以及事物、强弱本身的运动和转化的可能。还必须真正懂得什么是力量。比如巴黎协定签订后，

伪军每个主力营的兵力迅速增加到400—500人，粮食、弹药充足；与此同时，我们的兵力却得不到补充，每个主力营最多200人，而且弹药不足，粮食缺乏。再如美军及其仆从军撤走后，伪军总兵力从70万增加到110万，而我方在战场上的兵力最多只达伪军的三分之一。如果从这样的具体数字中得出敌强我弱的结论，那就不可能是正确的。除了物质数量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他许多因素的总和，例如，在当前及今后的战役或战略、进攻或防御作战中，战士们精神面貌，部队的技术力量和战斗素质，以及战术的运用，干部的指挥艺术，部队的部署及其任务等等。这里还未谈及更大、更广泛的问题，即政治因素、战争目的、人民群众的向背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军队离不开的东西。在目前进行的这场正义的解放战争中，正如党的无数次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同时使用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既用军事力量、也用群众的政治力量进攻敌人。谈论强弱不能只看军事一面，而应当看到各个方面，包括敌我双方的政治因素。

在几十年的战争中，我们曾多次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作出估计。1959年是南方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吴庭艳伪政权把铡刀拉到各地，实行法西斯血腥镇压。当时只有吴庭艳的军队在战场上横冲直撞，象个武士似的耀武扬威，无一对手。然而，党中央第15次全体会议决议，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崛起运动，解放了大片土地，使美国惊慌失措，不得不发动特种战争，以挽救吴庭艳集团。当时，如果没有革命的、辩证的眼光，就不可能看到我方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力量，而只看到敌人的具体力量。1965年，各地参加革命斗争的群众已经相当多，特别是湄公河平原地区，但在数量上仍超不过敌人控制区的人口。（当然，谁也不能认为敌人控制区的群众就

都是敌人的。)我们的武装力量中游击队较强,主力部队才开始组建少量的团,当时B2战场只有两个团能够打仗。敌人除保安队、民卫力量外,还拥有十个装备精良的师和成万名美国顾问,还有美国直升飞机、战斗机、军舰的掩护和直接参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动了平野战役,歼灭敌人许多营和装甲支团,击落敌机多架,使战争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我袭击边和机场、发动平野战役及巴嘉、波莱古战斗胜利之后,美伪清楚地看到了伪军有被消灭、伪政权有垮台的危险。为此,美国不得不大规模向越南南方派兵,妄图解救危机,把特种战争转变为局部战争,推行美国“灵活反应”的全球战略,充当国际宪兵的角色。在美军大量进入南方之前,如果比较当时的敌我力量,只看到具体数量和单纯的物质技术,谁敢保证说我们力量强大,有可能消灭伪军,推翻伪政权呢?后来,约20万美军一下子涌进南方,并且拥有各种现代化装备。它们凭借占压倒优势的快速机动火力,展开了1965—1966年旱季战略大反攻。当时我们认为美伪并不强大,而且已陷入被动。我们继续坚持进攻战略,发动了保邦——油汀战役,赢得了战场主动权,取得了许多胜利。1968年,美军增加到近50万,拥有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而且还雇用了一些其它国家的仆从军。然而,我们摸准了敌人的弱点,认识并高度发挥了我方的力量,进行了古今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戊申新春总进攻和总奋起。戊申之战,我们不仅打击了城市里的敌人,包括美国在伪首都西贡的侵略战争首脑机关,同时也歼灭了敌人许多重要的有生力量。这一战略性的进攻打败了美国的局部战争战略,迫使美国实行战争降级,接受巴黎谈判,并转而推行“战争非美化”、“战争越南化”的战略。从此我们粉碎了

美帝的“灵活反应”全球战略。美国这个国际宪兵作茧自缚、不寒而栗，“美国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幻想成了泡影。另一方面，在戊申新春攻势中，我们未能对当时具体的敌我力量对比作出正确的估计，没有完全看到敌人力量的强大，和自己条件的限制，提出了超越我们实际能力的过高要求。就是说，我们没有根据科学的分析，没有仔细权衡各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从主观愿望出发采取行动。正因为如此，尽管这次进攻是天才的、有独创性的、适合时机的决策，组织实施果敢、出色，整个战场配合默契，全体指战员无比勇敢、舍生忘死，取得了极其巨大的胜利，在越南南方和印支地区造成了富有战略意义的转折。但是，我们也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特别是各级干部蒙受了重大牺牲和损失，使我方力量明显削弱。后来，我们不仅无法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在1969—1970年间历尽了千辛万苦，才使革命在风浪面前站稳脚跟。当然，革命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哪一次胜利不是付出了牺牲才取得的，但是在戊申新春攻势中，如果我们经过周密的、符合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提出更为恰当的要求，那么我们的胜利会更大，将大大减少许多干部、战士和人民的流血牺牲，后来革命形势的发展也肯定会大不相同。1972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之后，我们依靠人民、战士卓越的革命精神，克服了某些困难，医治了部分创伤，努力发展了革命力量和革命形势。虽然我军主力还未能全部返回越南南方，我们就参加了柬埔寨、老挝的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同时，我们正确地估计了双方力量，向敌人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取得不少胜利，在广治、西原和南部东区多处突破敌人坚固防线；在东河、德都、新景、禄宁、布多、西宁以北等地区开辟了相互连接的

大片解放区。后来又与北方的“空中奠边府”大捷相配合，终于粉碎了美国凭借实力进行谈判的意图，迫使其签订了有利于我方的巴黎协定。

显然，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革命战争的每一个阶段，正确估价敌我力量，认清敌我双方的弱点，正确估计双方力量的对比，是导致正确决策、将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党在领导越南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过程中，从未离开过对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包括国际上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对比的估价。在这方面，总的来说我们是正确的，虽然有时在个别地方和某些具体问题上犯过错误，但正确方面是主要的，这才决定了革命的胜利。实际上哪有什么完全正确的东西。不要怕提到错误，只怕看不见和不愿改正错误。每当错误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时，就一定会犯右倾畏敌或者左倾主观的错误，由此而产生的计划和行动必然碰壁。因此，在估计形势和力量对比时，必须集中集体智慧，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判断和结论，这就是决定路线主张的出发点。

巴黎协定的签订最清楚地体现了当时战场上的力量对比。美伪极力在南方争夺地盘，决不轻易丢失土地；采取了最恶毒、野蛮的手段，出动B52飞机集中轰炸河内、海防，封锁越南北方。然后，美伪也对双方力量对比作了详尽的估计。他们正是在对双方的力量、意志作了充分估量之后，才决定接受对他们不利的一些条款，同意在协定上签字。我们方面也是在对敌人力量及其意图和我方的力量作了详细的估计之后，才签署这一有利于我的协定。可以说，巴黎协定是在敌我双方充分衡量了彼此力量的强弱以及世界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签订的。巴黎协定的签订标志着美国承认失败。但只

承认失败到这一步而已。这也标志着我们取得了胜利，而这胜利也是有限的。然而，美国的这一失败和我们的这一胜利业已证明革命比反革命强大了。怎么能认为是敌强我弱呢？

巴黎协定所获得的、影响整个战局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美军及其仆从军从越南南方全部撤走，美国停止对我国北方的破坏性战争。它的妙处在于，这一条件似乎符合“战争越南化”战略，符合“区域联盟、自我防卫”的尼克松主义，而不是美国败北而逃。它的妙处还在于可以帮助美国将军队撤回国内，满足美国人民的要求，使美国摆脱难以继续在海外维持一支庞大军队的困境。如果这种困境继续下去，美国只会遭到越来越多的失败，甚至有完全失败的危险。根据巴黎协定规定，美国从越南南方撤军事宜须经双方协商后方能进行，这样可以使美国少丢一点面子。但对我们来说，上述条件对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革命形势的发展极为重要。协定签订之前，我们必须同得到美国海、空军，包括B52战略轰炸机大力掩护的伪军、数十万美军及其仆从军作战。协定生效后，美军及其仆从军将全部从战场上撤走。伪军失去了美军这个靠山，再也得不到美国海、空军的有力掩护。伪军的火力比美军差得多。尽管伪军力量有所增强，美国主子增援了物资和武器，包括较前更为现代化的武器，但要发挥新兵种、新装备的效率还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战训练和锻炼。要保证那么多伪军装备现代化，并非轻而易举，在一两年内也难以实现。这还不说巴黎协定签订后，由于人民群众情绪的影响，伪军士气低落，精神不振。从各部队和地方报回的战场实际情况看，巴黎协定签订后，伪军炮兵火力和空军作战能力大为减弱，并有日益下降的趋势。炮兵和空军对步兵的支援很差，命中率低，弹药也有限。伪军向来习惯于依赖

美军，现在要单独作战，又缺乏美国的有效支援和掩护，因此士气十分低落。可以说，巴黎协定签订后，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十分重要的变化。伪军战斗力明显下降，我方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情况如此明朗，还认为美国虽已撤走，但伪军得到了加强，比我们强大。这真是毫无根据的推理，无异于自己想象出一个魔鬼来吓唬自己。

巴黎协定规定，美国将停止其驻于任何地方的陆、海、空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一切军事活动。……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北方将具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发挥其全国根据地的巨大作用，有条件更好地履行作为南方革命大后方的职责。南方的革命力量强大了，全国的力量强大了，胜利完成光荣的革命事业是无庸置疑的。当然还要克服不少困难，同时也要充分看到自己存在的弱点，避免主观主义，努力克服弱点。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疲惫不堪，急需补充和巩固。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力量太小，民运工作很差……。但我们是在胜利和强大的态势下，满怀信心地去克服这些弱点和困难的。

由于缺乏这样的认识，当时曾担心我方在敌占区纵深的力量被消灭，怕我们的解放区被敌人占领，因而产生一些急躁情绪，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21中全会决议纠正了上述主张，否则后患无穷。这个错误主张是：我方主动放弃与敌人争夺的地区，造成界线明显的敌方控制和我方控制两种地区，以尽快稳定局势。这就必须重新调整和部署力量；从敌占区撤回部队进行巩固和休整，并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速完成上述工作，毫不迟疑地明确划定双方的控制区，以确定切实的斗争方针。

显然，这正是阮文绍伪政权所希望的。敌人特别害怕战

场上双方力量交叉的“豹斑”态势，这样到处都有我们的力量，包括各大城市及他们的首都。敌人知道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别动队战士和游击队员的活动能力。他们也知道我们在敌占区、游击区每一小股武装力量的作用。这里的每一个同志、每一小股武装都是对准敌人要害的枪口，都是人民的精神上的依托，都是当地秘密群众组织的支柱。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在宣扬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鼓舞人们投身反压迫、反对剥削和不平等的斗争。他们做得多，说得少。他们的形象犹如黑夜里的灯光，光焰开始虽小，但愈来愈亮，光芒四射，永不熄灭。这里的每个党员、战士和每个小单位都有排、连、营，甚至更大的战斗单位作为他们的后盾。这些战斗单位分散在敌占区、争夺区和解放区，互相联系，形成一个统一体。这是哪一环都不可缺少的完整的系统。这就是革命战争和人民战争的严密阵势。它使敌军紧张不安，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感到处处都要重兵把守才能放心。美国不是认为他们需要5个人、后来又增加到10个人甚至20个人才能对付我们一个人吗？然而我们有的同志却情愿“主动”地把在敌人控制区和争夺区的部队撤回来，自己取消南方革命中很有威力的、使敌人丧胆的犬牙交错的形势，难道这不是帮助敌人实现它们经过多年轰炸与绥靖而未能做到的极其重要的事情吗？如果认为这样做是为巩固我们的力量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一旦我们的力量强大起来，再派回原地活动，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只不过是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们的幻想。我们B2战场的实际情况是，只要我们主动放弃、撤出某个地方，用不了几天敌人就会填补进去，实行扫荡，建立据点，控制群众。而一旦撤出再想重返失地，开辟新区，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重新把群众组织起来，就无异

于从头做起，工作比没有基础的地方还要困难得多，不知道又会有多少同志、同胞要付出鲜血的代价。曾经在敌后和争夺区工作过的同志们对此有更深的体会。我们的同志或单位紧紧依靠基层组织，建立起一个政治组织或一个游击根据地，这对刚刚结束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是多么宝贵呀！失掉这样一个基层组织或一个游击根据地，我们是多么难过和痛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把它恢复起来。

320 团 事 迹

在这里我想讲述一段320团指战员英勇无比的光辉事迹。¹1969—1970年，他们接受了到隆安省的德惠、边沥、芹德、芹约、新柱、周城、新安地区活动的任务。这是我们大家都难以忘怀的时期。1968年戊申年新春攻势之后，美国向越南增派了部队，增运各种武器、弹药，使侵越美军兵力达到整个战争的最高峰，并对我方进行疯狂的反扑。美伪连续进行极其残酷的扫荡和绥靖活动。许多地方的人民惨遭杀害或被关进战略村，大批基层组织遭到破坏，不少同志壮烈牺牲。特别是一些城市周围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居民稠密区。隆安就是这样的地区。隆安在西贡附近，从西北到西南环抱着半个西贡市。这里人口稠密，土地肥沃，是湄公河平原的大门，是连结平原地区与西贡市，连结同塔梅与西宁北部革命根据地的要冲。隆安省在抗法、抗美斗争中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隆安省人民非常爱国，非常坚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曾送给他们八个大字：“忠勇坚强、全民杀敌”。美伪集中力量对这里进行破坏，曾把这里作为推行绥靖政策的试点，但这一切都遭到了沉重的失败。

在这个地区，除伪军以外，还有美军“热带闪电”25师的部分兵力和9师3旅协同伪军一起活动。我还记得隆安的同志们当时曾对我这样说过：“敌人确实实行了战争降级，但这个梯子的脚却放在隆安。”这是最后一级梯子，因此战争越降级，聚集到这里的敌军就越多，战斗也就越残酷。多么生动的比喻，听了谁都会笑出声来，但它却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我们决不能让敌人在那里得手，否则将对整个南方的革命运动产生不小的影响。南方司令部经过反复讨论，再三斟酌，决定调320团加强隆安，同当地军民一起保卫革命运动，保卫基层组织和游击根据地。320团是一支战功卓著、久经战斗和艰苦考验的部队。它是一个独立作战的主力团，长期以来经常集中活动，熟悉并擅长山地作战，现在被派到一个人口稠密、地形平坦、河流密布的平原地区活动，必须以连、营为单位，采取多种形式，灵活作战。许多情况下要以排、班为单位分散作战。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打仗杀敌，而且要学会动员、组织群众，做瓦解敌军和除奸灭霸的工作，还要组织、引导和配合游击队或县大队进行活动。要将一支集中活动的主力部队派去执行这样分散的任务，可以说已不成其为主力部队了，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但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环境下，不这样做不行。

在这场持续几十年之久的战争中，我们的活动形式是千变万化的。战场形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作出上述这样的决定决不止这一次，也不仅是在某一个地方。当某个地方的游击队和地方部队遭受挫折，未能及时巩固，而我们又须要保卫那里的革命运动时，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也有在平原地区不适于使用主力部队的情况，以为只要派主力下去，就可以在平原地区打开局面，事实并非如此。我将

在下面详细地谈到这一问题。

1968年12月18日，我代表南方军委和南方司令部到西省某地工作，向集结在这里的320团交待任务，为新的工作做准备。我挎着背包，手拄藤杖，裤腿缩到膝盖上，脚穿抗战鞋，徒步走了十来天。我和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一起跋山涉水，穿过林中蜿蜒崎岖的道路，淌过涡流湍急、水深齐胸的河流。眼前的热带森林呈现出一片荒芜景象，过去古木参天，青藤缠绕，今天，在炸弹和化学毒剂的袭击下，已经成了荒山秃岭，断枝残叶依稀可见，看了真令人痛心。我的警卫员阿雄是个身材矮小、结实的小伙子。他的老家边葛也有许多森林。晚上，我们把吊床系在几棵还有树叶的大树下，两个吊床靠得很近。虽然经过一整天疲劳的行军，阿雄还是翻来复去地摇晃着吊床，难以入睡。我问他：“阿雄，干嘛不好好睡，休息好了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他回答说：“噢，看你一动不动的，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我在想，我们的森林被毁坏得太多了，真可惜呀！几十年才能长成这么大一棵树。”他指着我们身旁那棵被炸弹连根拔起的大树接着说：“我老家现在也被炸成平地了！”我激动地安慰着阿雄，同时也是安慰自己：“等消灭了敌人，将来我们祖国会更加壮丽的。我国人民有充分的才能和创造力，甭担心，我们的森林还会郁郁葱葱的。”

到了320团驻地，树林稍密一点。部队营房是用树枝和树叶（在南方随处可见的一种干燥时也不易着火的叶子）搭起来的草棚。每间草棚刚好住下一个班。我和我的警卫班也分到这么一小间。隆安省委及省军事指挥部的代表比我们早一天到达。他们也是来参加工作会议的，同320团的参谋们讨论协同作战的计划。我见到了团长阮德魁、政委黎文明以

及两位副团长红海和程玉箴同志。这几位可爱的、十分勇敢的同志已经在1969—1970年的战斗中先后壮烈牺牲了。我还会见了团的参谋、政治、后勤机关以及各营的许多优秀干部。今天，这些同志有的已经成了烈士，有的已经成长、老练起来，将320团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有的被分配到祖国各地，担负起别的工作重任。

会议在我到达一小时之后开始，是在一片干净的树林里举行的。不需要会场，也没有桌椅，同志们有的坐在折断的树干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

我们在树上挂起一张南部东区的地图。我拿着一根青嫩的竹子，严肃地向320团直接传达了上级命令。团干部们对即将前去活动的隆安地区情况都不熟悉。我自己从抗法战争时期到现在一直在那一带活动，足迹遍及每个角落，对那里的人、地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于是，我就向大家作了详细的介绍。接着又对该团的任务、作战方针和方法，敌人在隆安每个地方曾经和将会使用的战术，我方为了胜利必须采取的战术和技术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我还谈了动员群众、组织游击队和帮助地方部队工作的方法，谈了320团各单位同当地乡、县以及该团同省武装部队之间的配合问题。最后，我还就该团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以及在以小组或其它各种组织形式分散活动的情况下，干部、战士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问题作了指示。

同志们花了两天时间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不太明确的问题，最后由我作了解答。

我们只在白天工作。一到晚上，我就趁着月色和星光到各小草棚去跟干部、战士们聊天。我们从故乡、家庭、南方战局、首都河内一直谈到美国形势、世界形势。真可谓包罗

万象、应有尽有，有严肃的，也有开玩笑的，既可交流个人思想、又可提出疑问。每天晚上我都要很晚才能回到自己的草棚里休息。就这样时间还是不够用，没有能到所有的草棚走一走。通过几天紧张严肃的工作，我同320团的同志们建立了令人难忘的亲密感情。全团指战员从上到下都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兴奋地议论着、设想着未来的战斗和等待他们去克服的艰难困苦。

320团全体指战员所度过的极其艰苦的岁月是难以形容的。他们和地方部队、游击队以及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对敌人寸土不让，寸土必争，凭借水椰子树作掩体，顶住了敌人的狂轰滥炸和疯狂进攻。有谁记述过他们的战斗生活呢？白天，他们泡在沼泽地的污泥浊水中伏击敌人的直升飞机和战斗机，反击美军9师3旅空降兵打了就跑的扫荡行动；晚上，他们同群众一道出谋献策，讨论作战计划，从敌人的战略村购买并运回粮食和弹药。人们怎能忘记夜渡万古河时的紧张场面和焦虑心情。把一个连调到邻县竟要用五、六个晚上，要穿过周围碉堡林立、铁丝网和地雷密布的封锁区。320团的同志们日复一日地把前线的伤员一个个背回后方，又把武器、弹药和新兵送到前线，沿途要穿过近百公里双方力量犬牙交错的地区。他们的口号是“坚持到底、主动进攻”，“为了革命成功，活着在这里战斗，死了在这里葬身”。今天，芹德、新柱、德惠、周城等地的人民，每到清明扫墓时节，总是为320团无名烈士墓培上新土，修葺一新，表达缅怀之情，寄托他们的哀思。就这样，320团同当地人民一起保卫了革命基层组织，保卫了各县、乡和游击队的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1975年春，320团作为第8军区8师下属的一个单位，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歼灭伪军整营、整团以

致整个第7师的战斗；同当地人民的奋起斗争相结合，解放了整个前江地区。320团同各个战场上其它单位及地方力量一样，以自己光辉的战斗业绩，为B2战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由于在战场上有这样的典型事例，南方局和南方军委才没有同意将前线部队撤回后方，而是下令就地巩固和休整，维持由三种地区组成的犬牙交错的形势；同时也积极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意见。

两种地区还是三种地区？

但是，两种地区还是三种地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通过各个战场上激烈、紧张的较量，形成了以下三种地区：一是我方力量强大的地区。我们在这种地区驻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人民群众可以参加各种群众组织的活动，参加政治、敌运、军事等形式的对敌斗争。二是敌人力量强大的地区。在这种地区，敌人实行军警统治，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剥削。我们只能秘密地组织群众，也有我们的游击队、别动队和特工部队活动。人民群众秘密掩护我们的干部，并通过各种公开、合法的办法躲过敌人的眼睛。这里的游击根据地能够隐藏武器、粮食，游击队可以活动，有时还有地方部队或主力部队的小分队出没。当然各地都离不开革命运动的中心因素——党支部的领导。三是我方控制区和敌方控制区之间的地区，我们称它为争夺区。这种地区面积大小不等，双方力量不相上下，互相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情况复杂多变，每日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大部分群众站在革命一边，有各种革命力量和革命组织。县、省的地方部队经常到这种地区活动，偶尔也有地区或上级派出的主力

部队穿插进来，袭击敌人或配合地方部队作战。敌人经常对这种地区发动进攻和扫荡，用飞机扫射，把群众驱赶到敌人控制区去。可以说，在这里，双方每时每刻、不分日夜地进行各种形式的较量。有的地方，白天敌人控制，晚上我们控制。一方极力将另一方挤走，把该地逐渐变成自己控制的地盘。因此，争夺区经常发生变化，犹如大风中的一堆沙土。这边的风大，沙子就被吹到对面，占领对方的地方，反之也一样。只要还存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方，只要这两方还在极力争夺地盘和群众，就仍然存在争夺区。只有双方斗争停止，也就是说一方屈服，一方完全胜利，争夺区才会消失。巴黎协定并未使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结束，就连协定关于结束武装斗争的规定也没有做到。如上所述，敌人不断地违反协定，蚕食我方领土，其意图是要达到只有一个政权即伪政权，只有一支军队即伪军的目标。在此情况下，我们自己却主张要坚决划定敌人控制区和我方控制区两种地区，以便在每个地区实行适当的斗争方针，稳定形势，重新巩固和建设我们已经遭到削弱的武装力量，建设我们的政权和经济区，等等，真可谓同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还记得，在南方局为出席政治局会议而召开的预备会议上，大家都认为，根据B2战场的实际，任何情况、任何时候，都应当坚持在这三种地区的斗争。除非我们放弃斗争，才会丢掉争夺区。实际上就不只是丢掉的问题，而是逐渐把我方的控制区变成了争夺区，争夺区将变成敌人控制区，最后，我方控制区和争夺区都没有了，唯独只有敌人控制区。同志们还分析说，实际在战场上从来不会出现稳定的局面，因为敌我双方都不会放弃斗争，即使没有武装斗争，也还存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过程中，党中央派往广治承天战场

研究战场实际情况的陈友翼同志回来了。他向会议汇报说，广治承天地区已划定了敌我双方的控制区，铁路以东到海边为敌人控制区，铁路以西至越老边界为我方控制区。我方已将部队撤至路西。目前局势稳定，同志们都非常高兴……。

我们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稳定只不过是暂时的。一旦敌人休整好了，势将向铁路以西发起进攻，届时如我进行还击，则将再次出现争夺区，那时的争夺区已是在铁路以西了。无形中我们把地盘和群众奉送给了敌人，帮助敌人破坏了双方犬牙交错的“豹斑”态势，使敌占区进一步完整。特别是路东地区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居民稠密，几乎包括所有城、镇和大城市。这样分区对敌人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阮文绍伪政权及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所曾研究出三种分区方案，把它作为在巴黎谈判中进行斗争的基础：

- 1.按横向把南越分成两个地区，横线以北为“越共”区（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以南为阮文绍伪政权区。

- 2.按纵向把南越分开：靠越老、越柬边界的山区为“越共”区，该区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交通不便。沿海地区为伪政权区，这里经济富庶，人口稠密。各方面都便利。

- 3.就地停火，各方保持自己的地盘，形成犬牙交错的控制区。

在这三个方案中，敌伪最害怕的是第三个方案，即“豹斑区”。他们认为，这样就不可能实现停火，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因为人民群众很可能起来反对和消灭他们。他们控制的地区如不完整，将很难进行经济建设，很难实行有效的统治……。他们最喜欢第二个方案即纵向划分，因为这样划分完全有利于他们。他们认为在美国的帮助和支援下，他们不需要多久就能够富强起来，可以掌握更多的群众，从而消

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独占越南南方。

我们在谈判桌上进行了斗争，正是因为是在战场上付出了大量的流血牺牲，才迫使敌人不得不接受就地停火，为什么现在我们却平白无故地自己去搞纵向划分呢？

21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当前南方的革命势力处于1954年以来最强大的时期”，“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新胜利使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空前有利于南方革命的变化”。

战场形势的发展日益证明上述看法是十分正确的，越南南方的革命力量完全超过了反革命力量。

差不多两年以后，在实际情况已经明朗的时候，黎德寿同志在1974年12月召开的，讨论1975—1976年战略计划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大意是：总的说来，巴黎协定签订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过低地估计了自己。战场的实际情况表明：五联区作战时，担心敌人从背后袭击，上级下命令坚决打，就取得了胜利。广治承天地区也害怕敌人。湄公河平原仅12月份就捣毁敌人非法建立的据点500余个。一个月完成了旱季六个月计划指标的70%。现在实践清楚地表明是我强敌弱。而上次讨论21中全会决议时，却在我强还是敌强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21中全会决议还指出：“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掌握时机，坚持进攻战略，灵活指导，把南方革命推向前进。”决议给各地区提出的斗争方针和方式是：“解放区……必须建设和巩固……，”“争夺区……必须保持我们的势力，并逐步壮大，”“敌人控制区，……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确定这一战略、提出这样的任务，就把那些迄今还相信

美伪会执行巴黎协定，认为可能取得和平与稳定的思想压下去了（并未完全消除），同时也部分地消除了害怕敌人强大的思想。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确定，我们必须对违反协定的敌人给予坚决还击。21中全会决议指出：“目前，全国革命的主动、积极和最有利的方向是：高举和平和正义的旗帜，通过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迫使敌人履行巴黎协定，从而战胜敌人”。十分清楚，我党从一开始就认为，巴黎协定是我们的一个胜利，我们要同敌人斗争，迫使其严正履行协定，正义在我们一边，我们一定胜利。我们已经签字，我们尊重自己的签字。我们也要迫使对方尊重他们的签字。不允许美伪明目张胆地破坏协定。为了捍卫革命成果，我们必须惩罚违反协定、进行蚕食和绥靖的敌人。我们不是在有利于敌人进攻的地方被动还击，我们必须主动打击敌人，向敌人的进攻出发地和对敌不利的地方发动进攻。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在1973年9月通过广播电台向敌人公开发出警告，使国际上理解我们的正当立场。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警告，使美伪有所醒悟，以免我们被迫诉诸武力。履行巴黎协定的各种条件依然存在，谈判大门仍在巴黎和新山一敞开着。阮文绍可能以为他们真的很强大，以为美国主子仍然是他的坚强后盾。因此，更加无视协定和我方的警告，加紧进行战争挑衅，妄图永远统治越南南方。美国也认为，美军虽然撤走了，但通过推行战争越南化战略，美国将会永远留在越南南方。

让我们听一听美国人威尔登·A·布朗在《最后一架直升飞机》一书中的叙述吧：

“……阮文绍仍然认为有美国的援助和尼克松的秘密保证，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些保证至今有效，当美国向他提

供更多的喷气式战斗机和其他现代化武器时，他感到这一保证得到了加强。甚至到了1975年美国国会禁止美国继续支持南越的战争时，阮文绍还因为有尼克松的保证而从容自若。我们的援助计划和诺言使阮文绍产生一种人为的安全感，从而拒绝了同对方和解和协商的一切努力，并无视巴黎协定。在巴黎协定签订后的第一年里，阮文绍发动了一些小规模进攻，把共军从湄公河平原的一些地方赶了出去，并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很多据点，把难民安置到新占领的地区，甚至派兵对柬埔寨发动突然袭击。”

“安东·刘易斯说：‘阮文绍不愿让任何形式的政治解决途径取得成功，从而削弱他的政府’。”

“阮文绍禁止人们在各地区之间来往，把政治犯改为普通犯，以便长期监禁他们。除了他自己的政党以外，禁止其它任何政党活动。阮文绍不仅拒不执行巴黎协定的各项条款，而且还把在南越宣传巴黎协定视为罪恶活动。在停火即将实现时，阮文绍还调动军队发动进攻、进行挑衅。阮文绍要我们暗地里支持他违反协定的行动，而且似乎他也得到了我们的支持。在停战前夕，华盛顿迅速向阮文绍运送了一批价值10亿美元的新武器。有消息说，1975年2月初，阮文绍曾对一名美国记者说，自从巴黎协定签订以来，美国从未向他施加压力，强迫他向共党方面作出政治让步——即实现巴黎协定有关和平的条款。”

“希帕勒写道，‘马丁大使和美国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阮文绍的上述冒险行动，也没有做任何事情去说服阮文绍履行巴黎协定。’”

事情已经清楚，违反协定、蓄意强化战争的到底是谁。违反协定的人一定会遭到惩罚。

第三章 惩罚违反协定的敌人

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我们同中央军委同志一起具体讨论落实政治局决议问题。1973年6月1日，B2战场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讨论代表团返回战场前给前线的指示电内容，并安排重返南方事宜。我们还须同总参谋部、政治总局、后勤总局和各兵种司令部会晤，使这些单位的同志们了解战场实际情况，听取他们在业务方面的指导，在计划和物资技术方面取得他们的有效支援。接着，我便匆匆准备起程了。

重回丛林

离开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又要回到丛林，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自己的战斗单位，我的心情又高兴，又激动。这种朴素的愉快心情使我发现自己身上不知从什么时候产生的一种感情：我已经以根据地之家，以战场为故乡，把机关和部队的干部、战士当做自己家里的人。当我接到任务，离开战场，去西贡参加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工作时，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就象离开家乡似的，有一种抑郁寡欢的眷恋之情。现在眼看又要返回根据地和战场，我就象即将回到可爱的家乡一样，从心里感到高兴。几十年的战场生活，天南海北，历尽沧桑，但只有密林才能打动自己的心灵。因为，我已下定决心，紧握枪杆，终身为独立自由而战，从而使我

的一生同战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又不完全是这样。直到今天我提笔写它的时候，才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在漫长的、战火纷飞的年代，留恋战士生活和战斗集体的理由。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而建立起来的神圣的战斗情谊是多么美好、多么高贵啊！在那些忍饥挨饿的日子里，我们分吃很少一点山薯、野菜和野果，你推我让地喝着从山下取来的泉水。在长山路上，我们背着沉重的东西，翻山越岭，连续行军几个月。当我们精疲力尽的时候，你给我一匙糖，我给你一点儿盐，甚至拿出最后一块奎宁，大家相互照顾，坚持到目的地。每一个活下来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祖国正需要每一个战士，但是，我们也把生命看得轻如鸿毛，为了救自己的同志，可以毫不犹豫地冲去，随时准备牺牲。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的忧愁就是你的忧愁。听说你打了胜仗，干得比我好，我就愉快地向你学习。听说我打了败仗，你为我担忧，想方设法帮助我。一切为了共同的事业，一切为了革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丛林”中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在洋明洲、D战区、同塔梅、乌明森林等根据地，战友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同志、战友之间的感情就像森林一样广阔无边，像山泉一样长流不息。这种感情是从胡伯伯那里学来的。他老人家对祖国，对劳动人民和战士充满无限的深情。这种感情超越时间和空间，到处都有，始终如一。

有谁经历了这样的生活而不倍感留恋呢？对啦，既不是战场，也不是丛林吸引了我，而是人心，是为人处世之道使我感到眷恋。

在整个长山之路上，敌人的轰炸比以前大为减少。一切活动都欢快多了，舒畅多了。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兵站，从

一支部队到另一支部队，看到大家都有条不紊地工作，效率较前成倍提高。同志们见到从河内南下的代表团都很高兴，都想知道在路线、主张方面有什么新精神。政治局对新的形势、任务作了什么决议没有？各单位、各兵站的负责干部悄悄地问我：B2战场准备怎么干？前景如何？并答应全力支持。我听了十分感动。同志们全力支援战场，保证战场上的需要，但这里不也就是战场吗？他们不仅支援前线，而且还在枪林弹雨中进行不亚于前线的英勇战斗。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他们只想到自己的同志，一切为了自己的同志和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祖国在战争期间处处都是这样。大家万众一心，听党的话，相信党，为了南方革命的胜利，为了祖国统一而生活、工作、战斗和牺牲。

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部分落后、畏缩不前和违反纪律的人，一些贪生怕死、逃避上战场的人。这种人占的比例极小，几乎不值一提。

在艰苦而又危险的行军途中，我憧憬着胜利。胜利以后，我们将拥有从谅山到金瓯角，从边界到海岛的大片河山，有着辽阔的天空，无边的大海。我们将有四、五千万过着新生活的越南人。我们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新人。这种新社会和新人的精神和道德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必须彻底肃清美国新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虚假繁荣以及享乐社会中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的生活方式和陈风陋习，取缔赌博，消除那些由于追求庸俗的个人欲望而导致丈夫抛弃妻子，儿子遗弃父母，朝三暮四，反目成仇等社会现象。新社会必须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和公平的社会，人人都有条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参加建设祖国，建立人人都自由、温饱和幸福的生活。

新人应该是德才兼备的人。德，表现在人与人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以及在家庭、社会的为人处世上。大家都相亲相爱，互相敬重，忠实、真诚和始终如一。这同那种当面笑嘻嘻，背后捅刀子、“口蜜腹剑”的人毫无共同之处。必须具备越南的道德、共产主义的道德，这两种道德结合起来便成为胡志明的道德。

才，表现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具体成果上，而不在表面的夸夸其谈和吹嘘炫耀。言行不一，说的话就毫无价值；经不起实践证明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每个人都应当在学习、工作、战斗、生产和生活中起模范作用，在和睦、模范的家庭和秩序井然的社会里生活。自己不以身作则，说话就没有人听，家庭不和睦，就谈不上建设有秩序和公平的社会。我想，我们将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由纯洁的人们组成的纯洁的社会。

我还幻想修一条公路。我曾在 559 兵团指挥部同该兵团司令部的同志们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我们议论说：革命成功以后，国家统一了，我们要把这条 559 号公路——东长山路——即著名的“胡志明小道”，建设成真正现代化的胡志明公路。这条公路将沿着长山山脉，由南向北延伸，在 559 号公路的路基上加以改进，修成一条路面宽阔、符合标准的现代化公路。每一站都修一座纪念碑，记载下每段路以及英雄们、先烈们的功绩，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这条贯穿祖国国土的大动脉，了解这条当年的统一之路。通过这条大动脉，从首都河内，从社会主义北方向南方输送血液，保证南方生存和胜利。将来，如果可能，我们再修建一条与该公路并行的铁路。胡志明公路、胡志明铁路将成为不断发展壮大的祖国的真正大动脉。一切幻想都将成为现实。今天，我们为革

命胜利而舍生忘死地战斗，明天，我们的后代将会把祖国建设成为文明、幸福和富强的国家。

6月底，西贡河水已经上涨，水流湍急。471团（属559司令部）派了两艘船送我们继续南下，渡过了无数的激流险滩。每穿越一道激流险滩，周身都感到毛骨悚然。一个战士坐在后面稳稳掌着舵，眼睛凝视着前方。另一名战士威风凛凛地站在船头，两手紧紧握着一根长长的竹篙，随时准备撑船绕开那些露出水面或隐藏在水中的礁石。我们的船顺着急流南下，好几次觉得船几乎要撞到石头上。我们有时乘车，有时乘船，不知经过多少次十分亲切的欢迎和依依不舍的惜别，记不清征途中见过多少人。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男的还是女的，几乎人人都是一样，脸上带着充满骨肉情谊的笑容，怀着一颗颗热爱祖国的红心，都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镇定精神。一见面就使人感到亲热，分手时又使人留恋不舍。

一上岸，我就见到了南方司令部保卫处副处长黄文久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他们开来几辆嘎斯车，把我们接回根据地。黄文久是负责我们外出或参加战役的专职保卫干部，在确保安全和行动迅速方面很有经验。我和他紧紧地拥抱，并和所有的人一一亲切握手。黄文久端详了我一会儿说：“看起来，你稍稍瘦了一点，但还壮实。听说你回来，大家都很高兴。我还以为再也没机会为你安排外出工作或参加战斗了呢！”

“你以为我会在西贡长期呆下去吗？说实在的，我倒愿意。如果可能，我愿意留在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尔后到两方联合军事委员会以至民族和解与和睦委员会里工作。但敌人不愿意这样。他们不要和平，一心要战争，因此，我又只

好回到丛林里，回到你们当中。”

我们的车队傍晚时分到了驻地。半年时间不知发生了多少事情，但是这里的景物和天地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南方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阮春温同志和自从我回南方工作后一直在我身边工作的保卫干部黎文叔，以及军医组的姑娘们阿春、阿秋、阿香，炊事班的阿连、阿心等都跑到大门口热烈欢迎我们。

进了院子，我看了看四周。院子里的青菜和香蕉、柚子、杏、柿子等果树，长得郁郁葱葱。抗法战争时期原309营的老战士九勇同志干得正欢，他向我夸耀着他的成绩和心愿：

“近来，敌人减少了对这里的轰炸和扫射，所以树木才长得这么茂盛。有朝一日，和平实现了，这些被毁坏了的山林又会变成苍翠的果园和菜园。那时，我就回到我的老家美荻的锦山去欢度晚年了。”九勇转过身，继续向我介绍：

“你看阿才和阿草，秘书组正在为他们筹办婚礼，请大家喝喜酒呢！”阿草和阿才不好意思地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办公室副主任坚战和公务组的几个年青人阿蝶、阿革、阿流却大声地笑着拿他们取乐。大家争先恐后地问候我，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来不及一个个回答他们。这样的场面真是令人感动，就像一家人一样。我赶忙叫我的秘书

“毒药五”（即阮文横）从车上取下从河内带来的礼物，分给大家。大家所以叫他“毒药五”是因为他名叫阿五，又是来自防化兵的干部。这样叫他是为了与同机关的军医“红药五”同志相区别。礼物不是什么宝贵的东西，给男同志的是“首都”牌香烟，女同志是针、线和发卡。礼轻人意重，贵在一片心吧。

八和同志象突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情似的，他拉着我的手问道：“你知道吗，敌伪公开建议你返回西贡呢！真可笑，他们说河内已把你‘管制起来’了，要求河内必须把你还给他们！”“不过是心理战罢了。”“在联合军事委员会工作的裴清洁同志^①来电说，敌人得知你去河内将一去不复返的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他们威胁我们代表团说，如果陈文茶中将不返回西贡，他们将赶走整个代表团。难说他们不会真的这样干，因为敌人从来都是不惜采取任何卑劣的手段的。因此，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也应该有一个准备自卫的方案。这种紧张局势延续了一个多月。大家真替代表团担心。”

“我们要为迫使敌人认真履行巴黎协定而斗争。他们不敢对我们的同志怎样。因为我们在法理、政治和军事上都占有优势。”

战 场 干 部 会

休息了两三天，随后南方局召开会议，传达和组织落实21中全会决议。1973年9月，B2战场军政干部会议在根据地的一片美丽的森林里举行。各省、区、团体及武装力量师、团级的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进行了十分热烈的讨论。同志们结合各地、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以及我们在前一阶段工作中的优缺点，对照理论和决议，分清是非。在形势方面，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拿出来分析。这些

^①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派驻两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原书注

问题仍然是：敌人强大还是我们强大，两种地区还是三种地区，就地巩固还是撤回后方巩固，如何还击敌人等等。不同的是，讨论十分具体、十分详细，涉及各个方面，以便回去后正确执行，避免出现左的或右的偏差。特别是对巴黎协定签订后，我方在敌运工作方面的一些主张，同志们议论较多，各种看法都有。有的认为当前我们必须以政治斗争为主，敌运工作已成为战略问题；有的认为要利用群众中各种各样的对敌工作手段，使敌人扫荡陷于瘫痪，使敌军据点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进攻。有的还认为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应避免使用它，因为，动用军事力量会产生很多麻烦，双方就会失去相互信任，造成紧张局势，我们要敢于做促进民族和睦、消除仇恨的工作等等。这些只根据自己主观的想法和愿望，不考虑敌人的阴谋和行动的片面观点，使下面很容易产生和平主义、右倾和放弃斗争的思想。有的干部还指责下面：“你们打了几十年的仗还不够，还想再打下去吗？‘现在要绿皮红心’，加强敌运工作，把敌人队伍里的人争取过来，成为我们的人。”“……我们还有部队，还有武器，又有美国、阮文绍这些运输大队长，部队后勤供应那些麻烦事就不用操心了。”下面不敢吭气，但心里却在反问：

“同志，难道我们是想继续打仗来满足个人欲望吗？我们希望国家和平，人民不再流血牺牲。但是，敌人扫荡、蚕食，把枪口对着我们，阴谋把我们过去取得的革命成果一笔勾销，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挺起胸膛，举着拳头高呼‘和平万岁’吗？不！我们实在不想看到1954—1959年那种令人痛心的幼稚举动重演。当年许多同志倒在血泊里，手里有枪却不敢射击，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遭到了血腥的镇压，至今想起来心里仍隐隐作痛。”由于怕挨批评，怕违反敌运

政策，美萩省的游击队只好瞒着上级偷袭敌人在我们根据地非法建立的据点。在槟榔的冒盖，面对敌人的蚕食行径，我们的武装力量不能进行还击，只好一再后撤。同志们叹息说：“只能钻到地底下去了”。最后他们不得不主动还击，才使该县的根据地得以恢复。

军政干部会议之后，我们又同军事部门的同志们开会，具体讨论1973—1974年旱季的军事计划，这是巴黎协定签订后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旱季。计划内容是：明确我方态度，为了尊重协定，保卫协定，必须惩罚违反协定的敌人。我们要努力按自己已经声明的立场行事，坚决、主动地惩罚敌人，使敌人在进攻的出发地就遭到惩罚。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强大，在政治、法理、军事方面都要强大；不仅部队要强大，而且各地区各种力量的部署也要占有优势，要按照稳固的战略态势和能够对付各种情况的要求部署力量；必须就地巩固和整顿各种武装力量，要在我方控制区、敌占区、敌我争夺区等三种地区发展革命的形势和力量。各地都必须采取政治说服动员和威逼等手段，清除敌人1973年1月28日以来在各地非法修建的据点。必须保证人民享有各项自由民主权利，保证人民有往来谋生、捣毁战略村、返回家园的自由。必须消灭那些沿途扫荡、抢劫、阻挠人民谋生的伪军力量。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合法的。我们把这一计划告诉了在两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我方代表团，以便他们在会议桌上配合斗争。

协定签订后的形势

巴黎协定签订以来，B2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1973年1月到4月，在所有各军区、各省，敌人使用各种兵力破坏和蚕食我解放区，大肆进行绥靖，把人们关进战略村，到处抓兵，破坏村庄。特别是在西贡附近，敌人用推土机铲平群众的住房和庭院，派士兵和犯人砍伐树木，砍光水椰子树，新建据点，派遣“凤凰”特务监视、逮捕和杀害被他们称之为越共基层组织的爱国者。1973年5月以后，由于南方局、南方司令部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具体指导，我们对敌人进行了坚决还击，从而阻止并逐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非法修建的据点被捣毁，一些敌军被迫投降或逃跑，被瓦解和开小差的士兵与日俱增。敌人的主力部队、保安部队在遭到我沉重打击后，进一步暴露出各种弱点，在各个战场上损失日益惨重。

敌我双方形势越来越清楚地向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我们方面，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看到美国失败了，伪政权被削弱，我们取得了胜利，形势好转，一个个精神振奋，信心十足，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在敌人方面，伪军官兵看到美国真的失败了，产生了厌战情绪，怕战争延续下去，希望和平早日到来。上面敦促行军扫荡，下面就走过场，有时连过场都不走，却向上谎报军情，这种情况在团和营一级均有发生。士兵中不执行命令，开小差的越来越多。伪军对人民群众的控制也比以前放松了。群众纷纷起来斗争，不少人跑到较远的地方去谋生，并逐渐返回原来居住的村庄，回到我们解放区来。与此同时，美伪上层十分顽固和主观，他们制订了一个又一个计划，命令下面执行，其中有一个下达到小区（省）一级的指示提出：

1. 蚕食土地，争取民众，坚决保卫业已控制的地区，维护安宁，不得丢失一乡、一村。（敌人的指标是要控制整个

南方13,000个自然村中的11,000个；并且到1974年2月，甲类村即严密控制的村要达到65%。）

2. 占领和保卫所有战略交通要道。

3. 消灭从各地、特别是从边界过来的对方的武装力量和运输力量。

4. 经济上孤立和包围，军事上破坏和扰乱对方的根据地和解放区。

5. 加强空中侦察、间谍和别动队的活动，掌握情况，查清目标，拟定好计划，等待时机，夺回1972年3月29日以前丢失的地盘。

他们还向各地发出具体指示：

1. 在控制区和各大城市，通过巡逻、伏击、扫荡、加强军警活动等措施，制止人民的奋起，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消灭越共基层组织，严密控制民众，加强心理战，组织民众；巩固政权，使人民生活正常化，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条件。

2. 在巩固区（即争夺区），包括丙、丁类的村庄，要打退、阻止和消灭越共的政治、军事力量。重建和巩固政权，搞好社会安宁，扩大控制区和安全区，可用政治、经济手段收买民众，但以军事措施为主。主要军事力量将逐渐集中用来破坏这类地区。

3. 肃清越共区（即指我解放区和根据地）。集中破坏运输通道，实行经济包围，加强侦察、情报活动，视情况用空军和火炮破坏其仓库和运输线，争取民众，维持流亡政权，制造骚乱。保持军事活动并随时准备占领之。

关于绥靖计划，他们提出：在每个小区、军区以至全国发动一系列的绥靖战役，加强小部队活动，增修大量据点。

用推土机破坏争夺区和解放区的村庄，1973年的指标为12,000公顷。向控制区移民，成立垦荒村，逐步蚕食解放区。1973年计划移民十万人。在隆庆、福绥、林同、建丰、平绥、宁顺、多乐等省建立20个垦荒村。经费为500亿伪币。

敌人在全国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领和保卫领土。巩固军事、政治实力。敌人把重点放在第3、4战术区。1973年3月6日，阮文绍在一次各军区司令和省长会议上说：“我把南方生死存亡的斗争重任放在这两个地区（指第3和第4战术区）各位高级指挥官的肩上。”

因此，阮文绍伪政权不仅无视巴黎协定，而且还利用巴黎协定，利用我方相信和平、稳定、民族和睦的真诚愿望，来争取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加紧进攻和蚕食行动，妄图彻底消灭解放军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如果我们丧失警惕，右倾退缩，那么敌伪的声势和力量将越来越强大，很难预料形势将如何发展。4月底以来，我们作出反应、进行还击以后，敌人的弱点就暴露了，我们阻止和打退了它们的进攻。政治局会议之后，南方局进行了讨论，在对敌斗争方面更坚决了，战场形势的演变对我们越来越有利。

从1月到4月，其它战场丢失的地盘和群众较多，唯独第9军区（南部西区）例外。当时敌人在这里集中了最大的兵力，把它作为进攻、蚕食的重点，特别是位于芹苴、朔庄、金瓯角、迪石四省之间的章善地区。但第9军区有效地保卫了解放区。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当时以武文杰同志为书记的第9军区党委同以黎德英同志为司令员的军区司令部意见一致。他们认为，敌人绝不会履行巴黎协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各种活动照常进行，毫无变化。因此，军区各主力团

仍留驻原地，同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一起，一如既往地坚决进攻，猛烈还击，成营地歼灭敌人，如全歼伪 9 师 16 团 3 营和别动军 86 营。这清楚地表明，情况并不象我们一些同志想像的那样，巴黎协定之后，我们的力量被削弱，敌人的力量反而增强了。

通过这些活动，第 9 军区解放了章善以南，浊水运河西岸长 20 公里的地带以及其它地区。新解放的 11 个乡 152 个村人口达 60 万（不包括从争夺区返回我方控制地区的人数）。与此同时，还拔除敌人非法蚕食后修建起来的所有据点，老据点的敌人后来也惊慌地撤退了。第 9 区人民的勇敢行动和取得的具体成果比其它军区都突出，富有独创精神，受到了政治局的表扬，并把它树为其它战场的学习榜样。但令人感慨的是，这些具体行动并不符合当时的一系列主张。按照这些主张，巴黎协定签订后，应该迅速稳定局势，立即划分敌我控制区，把武装力量撤到后方，予以巩固，不许在军事上制造麻烦，而是以政治斗争、敌运工作为主，通过敌运工作和群众工作，使敌人的军事行动陷于瘫痪，使敌人的据点不能发挥作用，这样就算是向敌人进攻了。这在上面已经谈到。只有第 9 军区武装力量的行动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就当没有巴黎协定，没有任何新的情况，象以前一样行军打仗。这虽然对巴黎协定和新的战略阶段的认识不够全面，但在估计敌人的顽固性和背信弃义的态度方面是正确的。如同履行日内瓦协议时一样，必须坚决保卫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这符合当时实际情况，而且对敌人不抱任何幻想。“幸运”的是，这是一个边远的战场，传达上级主张常常很慢，纠正错误也不及时。这说明实践是无比宝贵的，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实践，都是产生理论、主张、路线的基础。没有实践

基础，任何理论、主张和路线都是错误的。

敌人有一个周密的长期计划：

“1973年2月至8月，极力蚕食和控制越南南方的绝大部分领土。

“1973年9月至1974年2月，极力巩固取得的成果，进行稳固的防御。

“在1974年，至迟在1975年将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即通过组织普选使政权合法化，只剩下一个政权（即阮文绍伪政权），一支军队（即越南共和国军）；战争结束后，越共只能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从事政治斗争的对立党派存在。

“否则将通过大规模战争于1976、1977年彻底消灭越共。”

与这一政治、军事计划相呼应，敌伪在经济方面也于1973年5月20日颁布了1973—1980年的八年长期规划。该计划分为三个时期：

“1973—1974年恢复和重建时期。

1975—1976年发展、巩固时期。

1977—1980年自力自强，减少外援时期。”

敌人的计划和行动正是按照这个规划进行的。到了雨季中期，我们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的变化，结合敌人的上述阴谋，研究了如何执行党的21中全会决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南方局第12号决议。然后制订出B2战场1973—1974年旱季的活动计划，在向南方局汇报并获得同意后，我又对该计划作了最后一次审核。为了使参谋部和各个战场能及时着手实施这个计划，终于在1973年9月下最后决心，并报告中央军委。

当时，湄公河平原被确定为主要战场，敌人把这里作为

绥靖、蚕食、争夺民众和劫掠财物的重点地区。我们必须斩断敌人的罪恶之手，给敌人以坚决的惩罚。必须夺回并牢牢保卫1973年1月28日以前建立的解放区。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各个战场之间必须密切配合行动，不让敌人在其薄弱和失利的地方获得喘息的机会，同时集中兵力，进攻敌人具有优势和战略意义的地方。我们决定加强湄公河平原战场的第8、第9军区的兵力和武器装备，让它们担负现阶段主要战场的任务。这时候，在军事干部、民政干部和党的干部队伍中，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用什么办法来加强湄公河平原战场的力量？

新 问 题

既然把湄公河平原确定为主要战场，我们就应该把最强的武装力量集中到这里，以战胜敌人。这样，在这里集中的主力部队自然也就多了。

有一种意见认为，从当前和长远来看，应该把双方的部队摆在南部东区，按多年来的老办法，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或者选择一个出其不意的方向，意指湄公河平原，集中兵力进行决战。这种意见是想重新部署力量，把南方主力部队调来加强湄公河平原农村。认为解放了物产丰富和人口稠密的湄公河平原，战争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它是早就有了的，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按照这种观点，只有解放农村以后，才能解放城市。它同我党在抗美援朝中的战略路线是背道而驰的。这条路线就是采取进攻战略，在农村、平原、山林和城市三个战略地区都实行进攻。不但以军事力量，还以群众的政治力量发动进攻，经常把进

攻和奋起相结合。因此，城市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在这种进攻战略中，主力部队的打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我们主力部队技术装备的愈益加强，在空旷而河网密布、泥泞的平原地区，集中兵力打大仗将变得更加困难。在那里，敌人凭借工事坚固的据点群，严密控制交通要道，河里有兵舰，完全掌握着制空权，在这种情况下，把大部队调到平原地区，无异于束缚自己的手脚，陷入劣势和被动状态，而敌人则可以成倍地发挥其强大的优势。这是战略上的错误，在战役和战术上都是不利的。

通过实际经验，我们一致认为，在同美伪对峙的条件下，我们在湄公河平原的主力部队最好集中团一级的兵力，配以轻型武器装备。如组建师，则应为轻型师，其指挥和战术不能同山地战场一样。与此同时，我应广泛发展游击队、精锐的特工部队和强大的地方部队，以进行一场神奇、连续、活跃的游击战争。这是一场人民革命战争。它把三种军队灵活地结合起来，可以在任何地区、任何地形和任何气候条件下，以三面夹攻、综合性的战役、军事力量和群众的政治力量相结合，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我们有广大革命群众，有优势，有经验，完全有条件这样做。各个战场的客观条件、任务、目标和能力都不相同，必须采取相应的组织和部署力量的措施，不能照搬，更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办事。

南方指挥部一贯认为，包括西贡在内的南部东区是B2战场中的主要战场，是对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进行战略决战的战场。在那里，我方可以发挥主力部队的巨大作用。那里的地形有利于集中和部署大部队，发挥各种技术装备的威力，那里的条件有利于大部队、大战役准备后勤，提供物资

技术保障。这个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可以威慑敌人，陷敌于被动防御，以闪电般的攻势和暴风雨般的奋起斗争，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粉碎美伪的战争首脑机关，最后在这里打垮敌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湄公河平原战场之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还因为敌我双方都依靠这个人力财力的宝库，建设和发展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以改变力量对比。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有时把它作为主要战场，但只限于战争中的某个时期，如在这个旱季及1974年旱季和雨季，或更早的时候，如1962年和1963年，它并不是决定战争的主要战场。唯其如此，长期以来，我们在B2战场总是根据革命战争进攻战略计划中所赋予的作用和地位来确定战略态势和部署力量，千方百计地不使南部东区的主力遭到削弱，相反必须使它得到大力加强。我还记得，1965—1966年，美国向南方大量派遣军队时，西贡市的一些负责同志问我：美国运来大量军队和各种重型武器，准备局部战争，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战略路线呢？是不是应该把主力部队分散开来，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来战胜敌人呢？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我谈了美国到处充当消防队的被动局面，兵多而不强，我们仍处于进攻态势。我们的主力部队不仅不能分散打游击，而且还要组建更多的师（当时B2战场只有一个师），然后再组建军。完全不存在改变战略路线的问题，完全不存在长期打游击来战胜敌人的问题。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还需经过长期的斗争。到现在，已经过了一段较长的历程。美国滚蛋了。伪军虽气势汹汹，但只是临死前的挣扎。因而，南部东区主力部队的作用极为重要。我们大力巩固了南部东区的主力部队，并且决定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平原

地区的力量：积极大量和迅速地补充兵员，武器弹药、装备，大力发展当地的三种军队；责成南方各主力师加紧组织和训练一些连、营级的技术兵种，下放给军区，把在七山一河仙地区活动的南方主力1师的1团交给第9军区；切实加强计划、活动方式的指导；加强对各战场和各主力部队之间有计划地配合行动的指导，不让敌人随心所欲地集中力量，进攻和破坏湄公河平原地区。

在这个旱季中，B2战场还开展了保卫、巩固和扩大运输通道的工作。该通道从南部东区的南方根据地，经同塔梅根据地直至乌明森林，共分三路：

- 沿越柬边境，过七山、河仙、迪石至乌明森林。
- 从美萩经槟榔、永茶至金瓯角。
- 沿前江和后江的水路。

同时，巩固连接南部东区和大后方的长山559号公路。

获得后勤总局同意和积极帮助后，南方后勤局同各军区后勤部门从旱季一开始就加紧筹办物资，以便在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始终处于主动地位。1973年，总参谋部发给B2战场的武器、装备，接收和运输情况进展顺利。但是，要想及早为1974年主动争取运输和储备好物资，上级还没有分配计划；如果坐待上级决定，就会失掉运输的时机，再遇到意外的障碍，储备计划就可能落空。我5月份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但找不到解决办法。我找了当时的后勤总局主任丁德善同志个别交换意见。他为人直率、热情，对朋友，对同志热情，对共同的工作也热情。他身材高大、敢想敢做、性格开朗、心地好、平易近人，特别活跃。活跃当中带点老百姓的“粗俗”，无论北方和南方的军事干部、和他一起工作的老干部，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直到战

士，谁都了解他，对他有好感。我把问题、自己的担心和还找不到解决办法等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以后，他哈哈笑了起来：

“有什么难的，一位战场上的将军，对这么简单的事情还想不出办法来吗？”我诧异地用试探的目光静静地看着他。

他迟疑片刻之后，不慌不忙地说：“只要让我当一小时的总参谋长，我就立即在向B2战场增运几千吨武器的文件上签字，而且也在给其它军区增运武器的文件上签字。”

我知道他又在开玩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也开玩笑说：“如果我有无限的权力，我就封你当24小时的‘天子’，让你象天方夜谭中的哈桑那样，实现你的一切愿望和娶一个举世无双的宫女做妻子。但是，你也象哈桑那样被送进疯人院和每天挨50皮鞭的话，那我将不负责任。”

我们都愉快地笑了起来。紧接着他给我出主意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下令从1974年分配给B2战场的武器总数中先借给你2,000吨。”

我高兴极了。我们很快就借武器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但他没有忘记强调说：“以后我要在分配额里扣除这个数目，你可要告诉同志们务必保管好，否则不够了再来要，那就一块儿去坐班房！”

下面便剩下运输问题了。我确信负责运输的同志们将会随时承担这一艰苦的工作。事实也正是这样。

这是一个敌我双方互相争夺地盘、争夺群众的旱季。敌人的目标是，使敌人控制区恢复到1972年3月29日^①以前的规模。他们根本不把巴黎协定放在眼里。而我们的目标是把

^① 1972年3月29日夜，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发动空前猛烈的攻势解放大片地区。此后伪军一直妄图重占这些地区，但未得逞。

我方控制区都恢复到1973年1月28日以前的规模。这完全符合巴黎协定的条款。第9军区的重点计划是惩罚蚕食我乌明森林根据地的敌军，夺回迪石省的鹅交、容英以及永隆、茶荣等居民稠密区。这个地区位于前江和后江之间，是个重要的战略地带。第8军区的重点计划是惩罚蚕食同塔梅中心根据地的敌军，夺回位于湄公河平原的大动脉4号战略公路西侧的美蕊省丐舨、丐礼居民稠密区，夺回与第9军区的永隆、茶荣省毗邻的槟榔省的一些地区。在这个旱季中，双方活动的另一个内容是争夺粮食。1973年8月24日，阮文绍在芹苴召开了所谓粮食工作会议。敌人的指标是，这个旱季必须抢到100万吨稻谷。1973年9月29日，敌伪第4战术区司令永仪将军指示湄公河16个省的省长，在1973年底以前必须抢到并上缴40万吨大米（相当于100万吨稻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惩罚敌人与破坏敌人抢粮计划结合起来，保卫人民财产，为我军储备粮食。不仅第8、9军区要执行这一任务，第7军区（南部东区）和第6军区（中部最南端）也要把还击敌人和收割工作结合起来，以便就地储备粮食。

在这个旱季里，南方主力部队也担负着较繁重的任务。除了争取时间大力建设和巩固各兵种，加强战术、技术训练，提高合成兵种的作战能力外，还要抽出力量，帮助地方部队作战。第9和第7两个师被部署在西宁和平阳两省，敌人防守西贡的第二道防线（即中间防线）当面，配合这两个省完成旱季各项任务。这两个师的主要任务是威胁敌人防守西贡的第二道防线和最后一道防线（西贡周围地区），牵制伪第3军的5师、25师、18师和其它别动联队，使其不能抽出力量支援湄公河平原或进攻别的地方，不让敌人形成保卫其首都的坚固防线。

这里，有必要对巴黎协定签订后，敌人按其总的战略意图在西贡地区采取的阴谋和行动再补充几句。1972年以前，敌人在西贡周围建立了三条坚固的防线：城市周围防线、中间防线和外围防线。我方开展的“阮惠”战役，以及1972年旱季在整个南方发动的军事进攻，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并逐段突破了其中间防线，只剩下城市周围防线依然完整无缺。这样，西贡的防线已相当薄弱和不可靠。巴黎协定签订之后，西贡伪政权一面对争夺区和解放区大肆进行扫荡、蚕食，一面巩固和完善他们控制的地区，特别是十分注意巩固他们的首脑中心——首都西贡的坚固防线。敌人连续发动不同规模的扫荡，企图消灭西贡周围地区我方的基层政治组织和游击队。与上述扫荡相配合，敌人用推土机把古芝、霍门和土龙木等地区的居民住房、庭院统统推平。强迫抓来的苦工和逃兵砍伐莱眺、守德等地的树木和平政、芽舫、芹德、芹约等地的水椰子树。敌人还在边和方向增修据点、增设障碍、埋设地雷、挖掘反坦克壕，进一步巩固靠近西贡城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那些控制不了的地区，如西贡周围我方的一些老根据地，包括：宁德的六个乡、沿海附近的林区、安山、莱眺、新美、平里、霍门、被敌人称为香园“铁三角”的边葛以南的三个乡，婆务、三新、平政、以及芹德、芹约、芽舫等，敌人不断出动飞机连续轰炸，或者日夜炮击，企图以毁灭性手段制造无人区，极力消灭我根据地。1973—1974年旱季，敌伪计划在南部东区、特别是西贡周围地区搞掉我方60个点。敌人图谋通过重新占领巴地的2号公路以及新渊以北的土廓地区、油汀、隆原、土龙木地区，西宁的倍利地区以及牛坑、安仁西和古芝地区，恢复其中间防线。敌人出动师以上兵力对隆川、油汀地区（敌人中间防

线北端被我突破后建立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但都被我击败,并成营地消灭伪军,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巩固西贡防线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敌人仍然按计划不断蚕食我解放区,建设他们的防线。

我们的计划不仅是保卫各解放区,狙击和歼灭前来蚕食或扫荡的敌人,而且要破坏他们按照预定战略收缩计划,建立和巩固西贡防御体系的打算,迫使伪3军经常处于担心西贡防线被突破的不稳定和被动的防御状态。不仅如此,还要迫使他们无法从西贡抽调本已为数很少的战略后备力量,去支援其他战场。阮文绍愚蠢的战略方针是:分兵把守,不丢失一乡一村。这样一来,我们就给伪军推行阮文绍的战略方针造成尖锐的矛盾,迫使他们在战略、战术上不断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摆脱这种完全不利的局面。

南方主力部队第5师,直接支援了湄公河平原地区,反击向与柬埔寨接壤的建祥地区蚕食进攻的敌人,巩固和扩大连结南部东区与西宁省西部平原地区的运输通道。他们还以小部分主力和特工部队向广德省布蓬、绥德地区的敌人发动惩罚性打击,保证连结559号长山公路^①的走廊畅通,同时支援了面临敌军蚕食的平顺、平绥地区的第6军区军民。

布蓬是敌军靠近柬埔寨边界的一个据点。驻在该地的敌军经常对附近村寨进行扫荡和破坏,偷袭我运输通道,用炮火昼夜封锁,给我方接收物资的工作造成不少困难。为了惩罚布蓬据点的敌人违反协定的行为,同时也为了揭开1973—1974年旱季战役的序幕,我们出动了429团——一个力

^① 559号公路即通常所说的胡志明小道,是越南北方支援南方战场的主要运输通道。

量雄厚的特工加强团，于1973年11月4日拔除了布蓬据点。随后我们扩大了附近的解放区，直至绥德的三岔路口，保证了我们运输通道的畅通与安全。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敌仍不得不调其第2军的22师同三个保安团，以及正在宁顺、平顺沿海地区进行蚕食的一个装甲团来对付我军，企图切断我方运输通道。我给以坚决还击，歼敌部分有生力量，保卫了解放区，并为我第6军区部队在藩切以西胜利还击敌军创造条件。同样，为了警告敌军，只要他们出动破坏就将遭到惩罚，我们于11月5日至6日使用特工113团的炮火轰击边和机场，击毁一些敌机和机场设施。长期以来，敌机从该机场起飞，对我禄宁、布多、罗果、嘎敦等解放区进行轰炸、扫射，并把我根据地（A战区）中的朗朗机场，作为他们练习投弹的地点。从1973年10月到12月，我们在这一地区击落敌机30架。从1973年11月起，只要敌人飞机轰炸扫射我解放区，我们就进行炮击或者派遣特工部队袭击敌人机场。不仅如此，我们还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烧毁他们的汽油库，不管这些汽油库在哪里。1973年12月2日，我第10团的特工人员对敌人在南方的最大燃料储存地——芽肢油库发动突然袭击，储油罐一个接一个爆炸，烧毁成百万公升汽油，火光冲天，火焰高达百米，映红了西贡市的半壁天空。这是特工10团威震一时的战功。它向敌人表明我们说得到，做得到。他们还是放明白点好。其实这一仗打得并不轻松。芽肢油库位于西贡附近，四周大小河网纵横交错，过去曾多次遭到袭击，敌人防守很严。他们增加了兵力，改变布防，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豢养了许多警犬，还安设了预警雷达等等……。进攻之前，我亲自检查了拟定的计划和各项细节。特工10团政委黎伯约向我汇报说：“特工小组共十几名干部

和战士。他们都曾经潜入油库，实地研究，察看了每个油罐。我们保证有把握打好这一仗。”

特工部队的传统是摸到跟前，打则必胜。特工10团的同志们完全实现了他们的诺言和决心。

旱季开始以后，敌我双方在战场上的活动都十分活跃。各军区之间，地方和主力部队之间配合默契，紧紧拖住和钳制敌人，取得了许多胜利。在湄公河平原，敌人不得不改变其活动重点。从巴黎协定签订到1973年雨季结束，敌人集中其第21师、第9师、一些别动军、保安部队和船只，对我第9军区的后江地区发动蚕食进攻。在我军坚决反击下，敌人不仅未能达到既定目的，反而遭到沉重损失。虽然他们在乌明森林的七山、河仙、双寨等地增设了一些据点，但在其他许多地区，我们却扩大了解放区，敌人妄图蚕食我四个省的计划完全破产。进入旱季之后，他们不得不从芹苴向南部东区的吉来抽调船只，把第9师北调建祥，把一些别动营划归第3军，仅在后江地区留下已经被削弱的第21师和部分别动营以及保安部队。他们将军队集中在我第8军区所属的前江地区，主要是对我同塔梅平原和与柬埔寨毗邻的边境地区发动蚕食进攻，袭击我通往湄公河平原的运输通道，对付我第5师。他们在此集结部队，也是企图守住西贡西南地区，因为这是西贡和湄公河平原之间非常重要的毗邻地区。敌人守住这个地区就可以使西贡免于孤立，使伪政权在社会、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有一个稳固的基地。这明显地体现了美国和阮文绍的意图，就是把第3战术区和第4战术区（原南部地区）紧密地连在一起，置于其整个南方生死攸关的战略态势之中，从各方巩固第3、第4战术区，这样，进可以打垮对方，退可以龟缩防守，保存自己。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是实现

不了的，他们没有勇气。他们推行的是贪婪、盲目的战略计划：任何情况下都要死守，不让一乡一村落入“越共”手中。缺乏实际经验和勇气的胆小鬼，通常情况下都是这样。他们往往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脑子里想入非非，行动上畏缩不前。

协定后的攻势

1973—1974年旱季开始了，B2战场指挥部的全部战略意图可以概括为：紧逼西贡，卡住敌人的脖子，迫敌被动防守其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西贡，使我方可以主动而有效地惩罚他们违反协定的行径；扩大后方和人口稠密地区，打通通道，储备物资；发展形势，积蓄力量，改变各方面的力量对比，使之发生有利于我方的变化。为此，我们在西贡周围和近郊部署了第9师、第7师和特工、别动部队，配合西贡市内的地方部队、游击队、人民群众，对敌人展开斗争，惩罚敌人，围困西贡，使敌人无法自由行动。在建祥地区我们部署了第5师和特工部队，将敌人注意力吸引过来，使他们无法集中力量对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后江地区进行破坏。我们开辟了连结布蓬、绥德与559号公路的通道；连结西宁以西地区与南部东区和湄公河平原的通道以及其它公路，给这一重要战略地区的各个战场输送和储备必要的后勤物资。

我们扩大了后方，使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形成稳固的态势。同时，我们在前方积极发展游击队和地方部队，把群众组织起来。

根据戊申新春进攻西贡和对付敌人的经验，我们研究并确定了发起总进攻和总奋起的计划。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美

伪顽固地破坏巴黎协定，不愿停火，并且对我进攻规模日益扩大，因而战争必将持续和发展下去，只能以一方获胜而结束。在外交谈判中，双方根据力量对比，应相互有所谅解退让。但在战争中犹豫不决和没有准备，就要把事情搞坏。敌人已经准备在1976和1977年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必须做好总进攻和总奋起的准备，争取彻底胜利。1968年，我们根据形势、地形和城内敌人主要目标，提出五个进攻方向并按此部署我各方面的力量。我们运用军事进攻和群众奋起互相配合、内外夹攻的打法。内线有革命群众力量、别动队和特工部队，二线是穿插部队和地方部队，最外围才是主力部队。戊申新春大规模的实战演习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只是限于当时形势和力量对比，没有取得完全胜利。如今，预定攻占的敌人目标变化不大，基本的变化是形势和双方力量的对比。形势预测和战略计划历来必须提早有所准备。这样才能及时展开战略计划中的一些具体工作，而这种展开需要时间，不能等到形势已经明朗化，否则过于仓促，来不及准备，甚至失去战机。1972年，由于缺乏预见性，事先毫无准备，我在广治获胜时，敌人在顺化的兵力几近空虚，而我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当然，除了缺乏预见性，事前毫无准备外，当时还缺乏机智、灵活和没有大胆地利用当时的时机。作为一个战略指挥家，需要深谋远虑，善于事先判断形势，及早预见未来，以自己的工作为下级创造必胜的条件；以自己的能动性，推动和引导形势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一旦出现有利时机，就果断及时地采取行动。

从1973年9月起，南方武装力量参谋部就已会同B2战场战略情报部门，对美伪首脑机关进行了部署，重新检查了我们必须攻占的目标，随时掌握每天的情况，了解敌人的计

划和命令。需要说明的是，在战争期间，B2战场的范围包括广阔的山区、平原和城市，其中就有敌人的首都西贡。它是一个完整的战场，也是敌军最多、具有许多重要战略、战役目标的一个战场。这里的一切变化都影响着全局。因此，上级允许B2战场指挥部组织和指导同自己的任务密切相关的重要战略情报活动，同时，也为上级提供情报。这支情报队伍帮助我们掌握了美、伪的大量计划和阴谋，搞到了敌人有价值的文件原件，因此，我们可以及时判断情况，有效地对付敌人。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堕落者以外，我们的情报人员对革命忠诚、立场坚定，许多同志英勇牺牲了，不少同志屡建战功，还有一些同志成了武装力量的英雄。根据上级批准的南方参谋部组织和部署力量的预定计划，我直接向陈文名同志下达任务，撤回367团，充实西贡的部队。367团是我们的一个特工别动团，长期在柬埔寨的金边战场帮助友军，现在那里已不需要这个团。我们按照目标和方向，把特工别动团从市内调到郊区，作了部署和充实。那时，B2战场整顿并组建了特工兵种指挥部，称为27部队，由邓玉士同志任司令，直属南方指挥部。邓玉士同志魁梧健壮、性格直爽，不顾个人安危，随时准备为捍卫真理而斗争，尤其是在一个存在着不良现象的社会中，这种品德是十分可贵的。他本人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特工干部，沉着冷静，意志坚决，说得少，做得多，一干到底。到1973年11月30日，我检查27部队时，该部队已拥有六千多名经过锻炼和战斗的干部和战士。除机关和基层组织外，他们的直接参战人员已经部署到西贡周围。西贡以北有特工115和119团；西贡以东有驻在隆城的116团和驻在曾察的10团；西贡以西有117团，负责边和地区的有113团，并且正在西贡以南组建另一个团。27部队还直

接掌握曾经屡建战功的特工429团。西贡市内的别动力量编为316团，由阮青松同志指挥，分成许多队，每个队负责一些重要目标。特工部队和别动力量均按一定的方向和目标部署，负责巩固组织，训练战斗技能，侦察掌握自己所要消灭的目标，完善作战方案，根据实际地形和自己担负的任务，训练干部和战士。除此之外，同志们还要深入群众，了解自己活动范围内的人们，建立政治基层组织，做为依靠。1973年12月15日，总司令部特工部队司令部政委道同志在检查B2战场的特工部队情况时说：“B2战场的特工部队已经发展和成长起来，在一些战斗和战役中取得了良好的战果，目前已根据新的战略态势确定了任务，建设和部署自己的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有南方司令部的明确的指导，战略意图抓得早，又有具体的方针和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部队长期以来就有战斗的传统和经验。”他还就B2战场特工部队的组织和训练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1973—1974年旱季中，我们还有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即保卫南方根据地禄宁解放区。长期以来，敌人不顾许多飞机被我防空力量击落的损失，经常出动空军袭击这一地区，使我根据地得不到安宁。伪第3军已制定了计划，只待时机一到，他们的最高指挥部和美国主子一声令下，就出动强大的力量，攻占禄宁。我们掌握了这一情况，也制定了计划，随时准备狙击，保卫根据地。但面临的问题是，动用什么力量，多少部队，如何打法：是防御、反攻还是进攻？小打还是大打？敌人可能在什么时候发动进攻？如要事先部署好力量伺机给敌人以雷霆般的打击，那么，要等多久？会不会使我们有限的力量被动地陷在那里？在战场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十分仔细认真地考虑，才

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中央军委给我们的来电中明确指出，禄宁不仅在军事上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当前形势下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敌人一直阴谋攻占。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不得丢失，需要立即调回一个主力师，制定计划，随时准备反击，歼灭来犯之敌。

为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我们立即召集参谋、政治和后勤干部，研究保卫禄宁的计划。讨论相当热烈。正如中央军委所指出的那样，大家都认识到保卫这一根据地的重要性。这也关系到我们解放军的荣誉和威信。

我们分析了B2战场和整个南方总的形势，研究了敌人的力量，估计了他们的打法；敌人可能动用哪些部队；他们的进攻规模、出击地点及其它各种可能性。我们知道，敌人要攻占禄宁将主要使用第3军，其骨干是伪第5师，再加上第25师和第18师部分兵力，一些别动队、第81伞兵联团以及他们当时的总预备队。肯定他们将以伪第5师的基地莱溪作为出发地点，主要方向是13号公路，必经之地是已经被严重破坏的平隆。但是，第5、25和18师还要防守西贡，修补支离破碎的防线。特别是伪第5师负责防守的西贡北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它的当面就是我们的大部队和解放区，更难自由行动。他们完全知道，攻占禄宁对他们来说并非轻而易举，只用一、两个师的兵力是不够的。在南部东区战场上，双方多年较量的经验表明，就连当年美军中诸如“大红一”第一步兵师、“热带闪电”第25师以及最现代化的第一骑兵师等部队都不免遭到失败。从第1、第2、第4战术区抽调部队吗？很难，而且抽不出多少，因为他们还要实现“不得丢失一乡一村”的战略口号，还要按其贪婪的欲望，蚕

食、霸占整个越南南方。他们哪里还能抽出部队，集中到一起呢？因此，敌人要想攻占禄宁，就必须制定周密的计划，经过仔细的考虑，调动大量的部队，而且必须善于指挥。能否做到这些，就连他们自己也有怀疑。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已下定决心，通过完全主动的计划，迫使敌人陷于西贡的防守，捆住他们的手脚，使其无法任意抽调部队，远离西贡，北上进攻禄宁。这样，我们就用不着抽调部队去防守禄宁，而去进逼西贡。如果敌人敢于冒险进犯解放区，我们随时可以象利剑一样插入他们的心脏。至于禄宁，我们组成了一条战线，包括地方游击队、机关游击队，以及驻在该地的南方防空部队、机械化部队和最近才得到充实、作为骨干力量的第201主力团。这支力量将布下“天罗地网”，不管敌人从哪里进攻，都要将其消灭和阻截在根据地的外围。如果需要，我主力师将从容地集结到指定地点，选择伪军之一部，以雷霆般的打击歼灭他们。这是1967年在西宁以北我军反击美军联络城战役取得的宝贵经验。威斯特摩兰在这次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在后来的戊申新春攻势中又被打得晕头转向，以致不得不遗憾地从一度被誉为“美国最有才干的将领”的军事生涯中销声匿迹。这样一来，我们就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命令，完全符合B2战场当时的情况。我们对敌人施加压力，迫使它不得不防守西贡，并且给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终于粉碎了敌人巩固、完善西贡防线和集中力量攻占禄宁的阴谋。

1974年5月，伪第3军企图进攻安仁西，计划以惹巴据点作为西贡河东岸坚固的桥头堡，同西贡河以西的桥头堡、即在安仁西第15号省级公路上即将建立的一个据点连接起来，然后再连接第7号公路、果内和张邦。这样，他们就构成了西贡第二道防线，与原线相比，虽稍后退，但却在西贡以北

形成一条完整的坚固防线。如果实现了这一计划，第3军将可以抽出力量集中进攻禄宁或其它地方。为实现这一计划，他们在3、4月给第25师增派了一些别动营和装甲支团，沿2号公路从同游进攻中立，以及7号公路上的古芝、张邦和果内。在这些地方建立据点，伐光树木，造成一个开阔地带。他们还出动驻扎在凡耐和惹巴的部队，顺蓬功方向向北进攻，以为策应。我方掌握敌人计划后，坚决予以回击，并采取反蚕食行动，粉碎他们沿7号公路、横跨西贡河东西两岸建立完整防线的图谋。

在西贡河以西，南方指挥部直属主力部队第16独立团，协同西贡军区决胜营、古芝的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猛烈还击伪25师，保卫了西贡河东岸的安仁西解放区。到5月中旬，我驻隆原、边葛的第9师，对几耐之敌给予了应有的惩罚，拔除了该据点，使孤立无援的惹巴据点之敌，惊慌逃窜。我们解放了西贡河以东从惹巴到乾田的一段7号公路，直接威胁边葛。此时第7师配合第9师重创通往新渊的16号公路上的福和基地的敌人，歼灭敌人部分有生力量和装甲部队，迫使他们撤出一些非法建立的据点。因此，敌人计划未能得逞，无法占领安仁西，向西进抵西贡河以西地区。在西贡河以东，我们开辟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地段，进一步迫使敌人远离河岸，使我7号公路以北的隆原根据地与安成根据地连成一片。安成地区包括边葛县7号公路以南的三个乡，是著名的铁三角地区。西贡北大门不但没有关死，反而开得更大了，防线没有连结起来，反被突破。敌人对此作出了疯狂的反应。他们集中了第3军的大部分兵力和整个第3装甲旅，在大批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连续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反扑，但均遭失败。敌人所以能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在一定程

度上是由于在福和及新渊方向的我第7师活动不力，没有足够的力量吸引与分散敌军，减轻对我第9师的压力。但是，我们的解放区保卫住了。就是说，从5月到6月，我们单单一个第9师就有效地同敌第3军几乎全部力量进行了非常激烈、英勇、机智的较量，并且站稳了脚跟，保卫了解放区，重创了敌军，使敌人无法建立西贡的坚固防线，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战略态势。九个月以后，到了1975年春，这个地区进一步扩大，在胡志明战役中成了我方在一个重要方向上对敌人展开进攻的战线。因为与三倍于己之敌持续战斗了近两个月，我第9师也受到一些损失。但是，这一阶段战斗的战略意义以及在政治上对伪军士气和在西贡人民的心理上造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弗兰克·斯内帕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常驻越南的一个专家，负责战略研究分析，起草中央情报局系统的“实地考察”报告，为美国驻西贡使馆和华盛顿制定路线服务。他在描述1974年夏季战局时，曾提到这次作战。他这样写道：“虽然北越军刚开始对西贡以北和东北地区展开试探性进攻，并遭到挫折，但是南越军队的第5师和第18军也伤亡惨重，特别是在‘铁三角’地区。目前他们已精疲力尽，无法再战”^①。当时有些人指责这次作战，认为遭受这样的损失是没有必要的，选择这一作战方向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是没有充分理解这次作战的意义：在最后战略阶段中，破坏了敌人退缩防守西贡的计划；在决定性的时刻，迫使敌人被动防守、束缚手脚、以利我在主要战场上自由行动。在战争中，特别是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不大的情况下，

① 摘自弗兰克·斯内帕所著《恰当的时机》（《DECENT INTERVAL》）。

——原书注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一场坚决的斗争，它需要毅力、机智和勇敢。当然，我们必须有强大的力量。至于等到情况明朗，我方力量已占压倒优势时，也就无需多费唇舌了。因为这是在摸敌人的脉搏，以便在这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场上，从许多实际方面，进一步了解敌人，摸清敌人的力量和潜力，并掌握他们的行动。

对一个战役的不同估计，也反映了对战略时期和对各个战场、各地区作用的不同评价。但是，战场司令员一定要具体地了解敌我双方的实际态势和力量，必须善于想方设法置敌于不利而于我有利的地位，及早正确地认识每一个战略时期，知道采取什么措施及早为决战的胜利做好战场准备。特别是对结束战争具有决定作用的战场，更应该是这样。战略不同于战术，必须到关键时刻才能打开突破口。

1974年6月，在经历了上一个旱季的考验之后，南方指挥部检查回顾了B2战场各方面的情况。在这个旱季中，考验了敌、我双方在战场上的实际力量，考验了双方实施计划的意志和行动效果。这一计划双方早在1973年雨季就已制定，并且都在努力为自己争取胜利。阵阵倾盆大雨预示着B2战场一年一度的雨季已经来临了。凉爽宜人取代了令人疲惫不堪的盛夏炎热。青翠的树林中到处点缀着一串串熟透了的金黄色的小酸果。对于南部东区的战士来说，对这种酸甜可口的野果是十分熟悉的。在生活艰难、鱼肉罕见的环境中，它就成了主力部队的宝贵食品。野菜酸果汤酸甜可口沁人心脾，真是美味无比！在闷热盛夏的晌午负重行军途中休息时，你只要喝上一小杯酸果汁，就会顿时感到心旷神怡，增添了力气，一口气走到目的地。在总结形势的会议上，每个人都品尝了这种令人心神怡爽的酸果汁，但是最令人心神怡

爽的是，当敌人开始走向彻底失败的时候，我们在整个战场的旱季活动中取得了辉煌战果。敌人妄图夺回1972年3月29日以前控制区的疯狂计划遭到彻底破产。这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计划，根本不把对方看在眼里，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们践踏巴黎协定的居心。敌人对人口稠密区的绥靖计划已经失败。敌人控制区不仅没有得到稳定，而且进一步缩小。他们未能按预定计划从群众中抢到足够数量的粮食，也丝毫未能封锁对方的经济。除了在第8军区的同塔梅根据地，他们蚕食了一些地方并建立了大小9个据点外，对于我方的大片根据地，他们既无法攻占，也无法破坏。南部东区和西贡周围的60块“越共”控制区，虽然敌人有时制造一些困难，但均完整无损。与此相反，他们在首都周围各条防线，未能修复，而且其北线（7号公路上的惹巴、边葛）和东线（2号公路上的巴地）又被突破，使得这条防线更加漏洞百出，很不稳定。即使是在阮文绍称之为“对整个南方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第3、第4战术区的战场上，他们也从未得到过主动权。不但如此，他们还陷入被动防御状态，兵力被牵制在各个地方。敌人想蚕食、绥靖人口稠密的沿海平原地区平顺、守顺，却被吸引到广德山区，并遭到损失。敌人想在富饶的后江地区扩大控制区、掠夺稻谷，却被对方调动和钳制在越柬边界的建祥地区。第3军担心西翼暴露，调6个团的兵力攻打瓜姚巴、德惠地区，因此，只好再次放弃2号公路的巴地一带，致使西贡第二道防线被拦腰斩断，我方在2号公路南北两侧的根据地得以连成一片。敌人不仅无法集中兵力攻打我方著名的禄宁，而且还疲于奔命地防守西贡。从那时起，敌伪的每一个军就只有在其他方向都不挨打的情况下，才能向某一个方向集中兵力。他们的战略后备兵力太少，当时只有第

81别动伞兵旅。敌伪各伞兵师和海军陆战队都被陷在广治承天地区。敌总参谋部，更确切地说就是独揽大权的阮文绍，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用来影响某一战术区的形势，只能可怜巴巴地看着接踵而来的失败。这是一项愚蠢战略主张的后果。它未能正确估价双方的强弱，贪婪地企图守住每个村、每个乡和每个据点，不给“越共”一寸土地，四处分散兵力，以至连机动的后备力量都没有了。

敌人的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使得数量超过我三、四倍的敌军逐步被歼，直至最后全部被消灭。

从5月份开始，敌人逐渐看到自己战略后备力量的不足，便决定把第1军的伞兵师调回，做为总预备队，但在实施过程中，只能一个旅一个旅地、慢腾腾地调动。就是这个旱季里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可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战略路线错到什么地步。在整个旱季中，特别是到旱季的后期，敌人第4战术区和湄公河平原的部队，大部分被吸引到美萩和建祥省与柬埔寨毗邻的边界地区，而在后江省，第21师只好分散成营进行活动，但仍无法稳住保安队和民卫队的士气。许多据点弃守，许多村、乡丢失。第4战术区司令不得不主动放弃一些班排级的小据点，加强连级以上比较重要的据点，补充遭到耗损的部队。只有在走投无路和处于即将被消灭的危急时刻，敌人才肯逐个地放弃据点和村寨。从1974年旱季开始，他们在湄公河平原等地就已开始进行这项工作，直到1975年旱季放弃整个西原地区，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在这场战争中，从1973—1974年旱季就已经开始出现美伪失败、我方胜利的趋势，直至后来敌人遭到彻底失败，其原因就是美伪从一开始就在整个南方推行了一整套错误的

防御性战略。他们按照阮文绍的“四不”路线分兵把守，对“越共”寸土不让。

至于作为卖国政权支柱的伪军是什么情况呢？尽管美国大力加强伪军的建设和装备，企图以伪军代替美军，但是伪军的战斗素质和数量依然继续下降。如果说，在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他们到处大规模抓兵，很快增加了主力部队和保安部队的数量，那么从6、7月以后，伪军人数则日趋减少。他们承认，1974年1月至5月，战斗减员和逃兵人数高达十万，平均每月减少二万多人。与此同时，他们能抓来补充兵员的青年，每月只有一万多人。他们的第4军缺员最多，每个营仅有200人左右，有的只有150到180人，补不胜补。武器装备损坏率越来越高。在1,800多架各种类型的飞机中，可供使用的仅1,000架左右。在100多架F5型飞机中，能用的不到一半。他们被迫采取严厉措施，如检查军队兵员，反对吃空额，反对以老弱病残充数；整编总参谋部机关，裁军20%，撤销一些不必要的单位和其它非战斗单位；把人员从民卫队抽调到保安队，从保安队抽调到主力部队；增派军队到处搜捕壮丁，甚至冲进寺院，把和尚也抓去当兵。尽管如此，他们的形势毫无起色，继续恶化。

我们方面，旱季结束时，我们光复了1973年1月28日以前所有的各个解放区，包括巴黎协定签订后敌人大规模蚕食的美荻省4号公路南北两侧地区。不仅如此，我们还进一步解放了20多个乡，约30万人口，主要是湄公河平原地区。这是我们惩罚敌人的结果。只要我们消灭他们非法侵占和设立的一个据点，敌军就仓皇逃窜，放弃4、5个其它据点。我们歼灭敌人违反巴黎协定进行扫荡蚕食的一个营，他们就放弃附近3、4个村庄。显然，我们后退，敌人气焰就嚣张；我们

坚决还击，敌人就丧尽士气，仓皇逃命。在三种地区，有组织的群众力量、游击队和地方部队都得到了发展。在 B2 战场的各个军区中，争夺区已经深入到敌人控制区中。各军区和南方司令部的主力部队得到了加强、锻炼与合理部署，形成了强大的进攻态势，特别是在南部东区和西贡周围地区。在保卫南部东区和西贡周围的根据地和小片游击区的同时，我们在后方的根据地也得到空前的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已经沿柬埔寨边界从广德到福隆、平隆和西宁连成一片。我们禄宁根据地也向前推进，与广阔的隆原、边葛解放区连在一起。也由于我们惩罚敌人，拔除了敌人在贝河边的衙碧据点，迫使西贡河边的宋黎真据点伪军连夜溃逃。伪别动队上述两个据点位于我解放区纵深。他们竭力固守是为了把这里当做向我内地派遣间谍的重要据点，收集情报，派别动队伺机破坏我运输走廊、仓库和机关。这两个据点也是敌人进行大规模行军扫荡，进攻我根据地的战术桥头堡。巴黎协定签订后，因为这两个据点四周都是我们的解放区，敌人的供应和换防都很困难。在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及后来的两方联合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我方根据关于在越南南方实现停火的议定书的第3(B)条，不断要求美伪进行讨论，确定一方在必要时通过另一方控制区的军事运输走廊。但是，美伪一直顽固地置之不理。有一次，出于人道主义，尽管尚无规定，我们还是允许敌伪的直升飞机到宋黎真来接运伤员。但是，在未按巴黎协定规定达成协议前，我们坚决不允许敌人的军用车辆、船只和运输机通过我方控制区，运送粮食、弹药和换防。1975年4月，衙碧的敌军冒险出动部队，前往真城，接运供应物资，当进入我解放区时，立即受到我第7师的惩罚，来犯敌人和据点中的守敌全部被歼。在这次事

件中，敌人知道是咎由自取，只好忍气吞声，默不作声。宋黎真的敌人吸取这一教训，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偷偷地放弃据点，沿着山路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就逃回他们的控制区。事后，敌人玩弄嫁祸于人的手法，宣传我方违反巴黎协定，捣毁宋黎真据点。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我们后方的解放区已经扩大，连成一片。禄宁根据地一直通到“铁三角”地区，离西贡仅30多公里。也是在这个旱季里，我们的各条运输通道，从后方到前方，从长山公路到南部东区根据地，然后从这里通往各个军区，全部畅通无阻。在边远和最困难的地区，如第6军区的中部沿海地区和第9军区的乌明森林地区，新兵和后勤物资都可以得到补充，并有所储备。

1973—1974年旱季过后，B2战场上的敌我形势已经明朗。我们的势力壮大了，敌伪的势力迅速削弱。敌人继续破坏巴黎协定，设法彻底消灭我方，推行了无比顽固和充满幻想的政治路线和战略路线，但由于力量日益衰弱，措施混乱不力，因此陷入了无可挽回的被动局面。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1974年雨季。

从1974年旱季末，形势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一点不仅我们估计到了，而且美方可能也有人已经感觉到了，尽管不很明确。在《最后一架直升飞机》一书的末尾，威尔登·A·布朗写到：

“《纽约时报》记者大卫·斯普勒是在南越的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家，他在南越政权垮台前最后几个月曾经说过，对美国威力存在的幻想使阮文绍陷入了盲目性。斯普勒认为，1974年夏季开始，在整个南越领土上，河内就加强了压力。斯普勒写道，在此危亡时刻，一位美国外交官预言，如果华

盛顿只是一味地继续向西贡提供武器，而不压西贡在政治上与共产党人取得和解，那么华盛顿和西贡必将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失败”。

值得赞扬的是，这位美国外交官看到了美伪不可避免地遭到彻底失败的原因和起点。

第四章 前所未有的一个雨季

B2战场的气候一般分为两季，旱季和雨季，时间大体相等，各六个月。在山区，雨季来得早，雨量大；在平原，雨季来得晚，雨量也小些。每到雨季，上游的河水汇集成巨大的洪流，从高处奔腾而下，淹没了地势平坦和低洼的下游地区，特别是湄公河流域，然后缓慢地注入东海。同塔梅是湄公河平原中一片低洼的盆地，旱季，人们可以徒步往来；但到雨季，水淹之后如茫茫大海，深处可达四、五米，交通工具主要是舟船。在南部东区，山林地区虽然地势较高，但雨水也常泛滥成灾，淹没道路和村庄，红土地面泥泞不堪。这样的气候和土地条件，对大兵团和技术兵种的活动影响很大。因此，一到雨季，敌我双方的大部队均不得不减少活动强度，并利用这一时机为下一个旱季作好准备，届时即可出动精力充沛的军队，发动进攻。多少年来，这在战争中已成了规律。但是，1974年雨季对B2战场来说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雨季，我们决定打破常规，决心努力、紧张地行动起来，创造一个新的时机，把阴沉的雨季变成黎明前的曙光。六月份举行的南方局常委会上，在讨论1974年旱季形势和下一步行动方向时，书记范雄同志简要地总结说：

“通过这个旱季，新因素已经明显出现：我们正在胜利，向前发展；敌人正在衰败，走下坡路。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继续争取更大的胜利，加速敌人的衰亡。今年雨

季，我们有条件、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以往任何一个雨季，甚至旱季都无法比拟的。不管气候多么恶劣，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各方面的活动，形成新的态势和新的力量，在物质和精神上，为各个军区、各个省、各个地方和主力部队作好准备，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和强大的气势进入1974—1975年旱季。1975年，特别是1975年旱季，我们有可能取得重大的胜利，改变形势，创造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机。”

南方局的这一预见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它是从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反映了广大农村数百万同志、同胞和数以万计的游击战士和地方部队、主力部队的活动成果。他们在整个战场上每日每时地同敌人争夺着每一个人和每一寸土地。它是来自对敌我双方的深刻了解。它是由于我们看透了敌人的阴谋、行动、意图和能力，牢牢地掌握了革命的目标和革命的方法，明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的结果。

当时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阮文绍伪政权在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仍一味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的政治路线，否认在南方存在两种地区、两个政权、两种军队、三种政治力量的现状，不承认有第三种力量，不愿与“越共”联合，决心破坏巴黎协定，继续进行战争呢？

为什么他们在军事上顽固地推行一个愚蠢的战略，哪里都要，哪里都占，竭力企图消灭解放武装力量，取消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呢？

我们早就知道，阮文绍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走卒和工具。他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必须服从主子的意愿和指挥棒。因此，我们必须从美国的阴谋和主张中去寻找根源。

威斯特摩兰^①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军人的报告》中也承认：“您（指哈金斯）和其他美国官员到越南去，是为了执行华盛顿已确定的我国政府的政策”。给美国国防部军事委员会和部长办公室的一份题为《南越的垮台》的报告，援引了南越军政领导人的言论。该报告说：“陈文敦说，高文园上将承认南越人的隶属地位；另一位上将赞同地说，南越的各位领导人都已被用来执行美国人的各项计划……”。这些美伪显要在完全失败后亲口吐露真情，比什么都要清楚。

我国人民的抗美战争从开始到现在，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非常复杂的特点。它不仅是一场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也不仅是国内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战争，而且是通过越南战场集中体现世界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较量的战争。远在法国被迫签订日内瓦协议时，美国就开始反对越南，并决心介入印度支那，踢开法国，自己充当国际宪兵的角色。美国的阴谋是占领越南南方，把它作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遏制社会主义影响的扩大，主宰全世界（社会主义各国除外）。美国认为，越南是一个小国，但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和现代化武器，有能力而且必须在这里战胜社会主义阵营，从而避免同苏联和中国的直接对抗。美国领导人以为美在战略上走的这一步棋是高明的，便得意忘形起来，不愿深入研究越南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对法国伙伴的经验不以为然，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反对战争的正义呼声置若罔闻。最后，它越陷越深，就越要进行战争升级；战争越升级，人力、物力的损失就越大，就像一个赌徒

^① 原美国侵越军队总司令。

输红了眼，不顾接二连三的失败，还是拚着性命赌下去。升级升到头，最后还得降。但是不论是升级还是降级，都是美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全球战略，阴谋称霸世界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手段。以核垄断为基础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遭到破产时，世界上三股革命洪流^①正在展开胜利进攻，美国不得不转而采取“灵活反应”战略，以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总体战争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对付民族解放战争中，争取主动，夺取胜利。1961年，美国将这一“法宝”投入越南战争，1964年底、1965年初，特种战争就遭到挫败；1968年，局部战争又遭到破产；处在当时的世界力量对比和条件下，又不允许美国发动使用核武器的总体战争，因此，灵活反应战略也就不灵了。约翰逊狼狈不堪，匆匆忙忙提出“非美化”战略，企图从越南的泥潭中脱身。但是，美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不甘心忍受失败的耻辱，仍然相信美国负有领导世界的天职，同时非常担心一旦失去越南，就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失去一大批其他国家。因此，尼克松上了台，提出所谓“区域联防”的新战略，其实质是企图动员和网罗国际力量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只靠孤零零的美国一家。在越南，他们转而推行战争越南化，而不是战争非美化。有人说，约翰逊想以“战争非美化”从越南脱身，尼克松则想以“战争越南化”继续留在越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实，尼克松并没有像约翰逊那样被打得元气大伤，他仍死死抱住美帝国主义那些不可改变的目标。

^① 越南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体系”、“民族独立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是“在世界上汇合成伟大的革命高潮，从许多方向向帝国主义连续进攻的三股洪流”。

巴黎协定签字前后，美国仍然继续推行战争越南化计划。具体内容就是千方百计地使伪军、伪政权在军事、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强大起来，以战胜解放武装力量，消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长期分割越南，使越南南方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国家。美国的这个目标从未改变，只是改变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用越南人流血代替美国人流血。美国被迫签署的巴黎协定，从内容到文字都不利于美伪，但他们仍然签了字。他们相信，凭借他们奸诈、出尔反尔的手腕，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阴险毒辣、反复无常的外交手段，就能扭转局势。他们把巴黎协定只当作一种措施、在一定战略阶段的一种战术。签字只是为了履行那些对美伪有利的东西，同时歪曲和破坏那些对他们不利的东西，目的还是为了使他们赢得这场战争。在当今世界上美帝国主义真正信奉的是武器和美元的威力。正是他们自己吐露了推行恶毒阴谋的真实情况。1978年，西贡伪军中将军陈文敦写过一本书，名为《越南没有结束的战争》。该书由珀西戴奥出版社出版，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英国伦敦发行。陈文敦写道：“他（指美国驻南越副大使查理斯·怀特豪斯，1972年10月中旬曾参加基辛格的代表团到西贡，解释巴黎协定并说服阮文绍在该协定上签字）对我说：‘这项协定有它好的方面，必须签字。你将会看到，协定仅是一纸空文，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1973年1月初，阮文绍派陈文杜和裴艳率领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了解美国的意图。他们回国后向阮文绍汇报说，美国副国务卿A·列克斯特·约翰逊私下对我（裴艳）说：“你我是多年老友，我跟你讲句心里话，实际上美国从来没有改变在越南的目标”。当时尼克松在给阮文绍的一份绝密电报中说：“……越南共和国的自由、独立，仍

然是美国外交政策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

这就清楚了。尼克松、基辛格的老谋深算就是：用签署巴黎协定的办法，美国撤走军队、换回俘虏，缓和美国国内外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处于分裂、衰弱、丧失信心的美国，并巩固已无法实现其全球战略的美国军事力量，同时在越南争取一两年的缓和时期，以推行恶毒的手段：

一、加强伪军现代化武器、技术装备，使它成为一支强有力的足以消灭解放武装力量的军队。增加援助和投资，发展阮伪经济，使美国认为是越南南方唯一合法政权的阮文绍政权，成为在东南亚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很强大的政权。

二、提供援助重建越南北方，用物质技术为诱饵拉住北方，进行渗透和控制，并以此限制北方对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援，通过北方控制南方的活动，并图谋对北方社会制度实行和平演变。

三、用美国式的世界缓和政策向社会主义阵营施加压力，限制社会主义阵营对越南南、北两方的支援、扼杀我们的战斗。

四、实现上述手段的同时，美国还炫耀武力，即在东南亚保持一支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发挥其威慑作用，恫吓那些胆小的人，同时也可支援西贡傀儡。

依靠这些措施，阮文绍政权逐渐强大起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将日益遭到削弱，阮文绍就有可能消灭对手，独霸南方，把越南南方变成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具有战略地位的附庸国。

按照这一阴谋，美国在签订了巴黎协定后，继续在越南南方推行战争越南化战略。当时，美国从总统到政界各显要

为了鼓励阮文绍，都一再强调，美国永远站在阮文绍一边，将给阮文绍提供各方面的援助，并在必要时随时准备再次干涉越南南方。直至1972年10月基辛格到西贡时，还向阮文绍作出保证：一旦阮文绍遭到进攻并提出要求，美国将使用武装力量，越过17度线进攻越南北方。阮文绍喜出望外，建议从海上登陆，比从17度线进攻更近。阮文绍及其爪牙虽然对自己受美国摆布和漠视的命运感到忧虑，但仍相信并紧紧依附自己的主子，认为万一出点什么事，主子肯定不会自食其言，将会给予保护和扶植。原来担任伪军将领高好痕的助手、后被阮文绍任命为各部协调停战委员会主席的伪军准将黎忠直承认：“美国人总是吹嘘，美国的威力是无敌的……阮文绍绝对相信美国的军事力量，并且认为美国既已卷入越南，就一定会周旋到底”。

由于具有这样的信念，阮文绍集团完全不顾实际情况，继续进行战争，以实现他们的主观愿望和主子的意图。美国阴谋和阮文绍的行动就是这样，不容许我们存在任何幻想，希图他们会严格履行巴黎协定。美国不仅希望占据南方，更加狂妄的是想入侵和控制北方，并紧接着发动了破坏和封锁北方的战争。

巴黎协定签订已经一年半了，越南的实际情况没有按照美国精心的安排发展，也不符合尼克松、基辛格制订的计划。因为还存在着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考虑到或无法理解的。这就是对方在思考和行动中起作用的聪明才智和勇敢精神。如果在1973年我们像相信日内瓦协议两年后进行普选那样，相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巴黎协定也可以得到实施；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敌我力量，在思考和行动中出现左倾、右倾和错误，那么情况就不会像现

在这样。当然，初期难免有些步履蹒跚。但在一场持久的战争中，在一个新战略阶段的初期，三、四个月的不稳定时期还是短暂的。这一短暂的时间不允许敌人轻易取胜。反之，我们的警惕性高，党的指导敏锐、及时，我们的人民和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在革命斗争中已成长起来，因此，今天的形势已是我方得到极大的发展，敌人却处于不可挽回的颓势。敌人恶毒、狡诈的手段已来不及施展。伪军力量不可能进一步增长，正在丧失士气和土崩瓦解。敌人想扩充民事防卫队，组建强大、机动的保安力量，使地方上有充分的力量占领和保卫各个地方。但今天这两支武装数量锐减、开小差日增，据点减少，被迫放弃许多地方。敌人想把正规部队集中起来，使之成为完全机动的部队，用高效能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以减少人员，既能节省预算发展经济，又能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今天不得不急急忙忙地扩充部队、增加编制，结果仍然没有足够的部队固守地方，也没有增加机动部队。敌人想扩大和稳定他们控制的地区，吸引外国投资建设经济，但现在地盘缩小了，局面不稳定，谁敢来投资呢。敌人财政亏损严重，美援却集中用于军费开支。敌人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民主党”，实际上是拉人加入“阮家党”，于是，机会主义分子、政治掮客争先恐后地借此谋求地位、擢升，肆无忌惮地搜刮、欺压人民，这怎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执政党呢？阮文绍伪政权没有像美国谋划的那样在各方面强大起来，相反，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遭到削弱，各方面都已失去控制，正在走下坡路。

美帝国主义遭到失败。为在军事上脱身，转而玩弄诡计，制造一个“像样的傀儡”来代替它控制南方，但这个傀儡连站都没站稳，马上就要倒下去了。这就须要有一股力

量，把它推下深渊，使主子和奴才都无法挽救。这就是时机！

正确地估计这一形势和时机，对于具有代表意义的南方重点战场的战略指导是极其重要的。

列宁说过，革命是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它要求对形势的敏感和在形势变化时采取及时、主动的对策。革命永远是创造。南方局和南方军委对已经发生变化的局势进行了估计和研究，以指导雨季的各项计划和行动，同时事先研究了1975年的计划，特别是1974—1975年旱季计划，并报告中央。

在1974年7月举行的南方局会议上，范雄同志强调指出：“我们提出在1975—1976年、特别要在1974—1975年旱季作出努力，夺取决定性的胜利，这符合党的21中全会决议和南方局12号决议关于在两三年（1974、1975、1976年）内夺取决定性胜利的设想。我们必须完成雨季的任务，并积极作好准备，完成1975年的任务。这需要全党都做出巨大的努力。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是最近的实际情况、局势变化的速度，特别是1974年最近四个月的情况为基础的。南方局将发出指示，要求各区、各省检查12号决议执行情况，雨季要做出努力，并以十分坚决的精神，切实为1975年旱季作好准备。将向中央作出充分的报告，并建议中央在外交斗争、整个南方战场的配合上给予综合的指导。”

雨 季 行 动

根据南方局和南方军委的指示，1974年雨季行动的全部内容：

继续开展反攻和进攻，破坏敌人的绥靖计划，扩大我方控制区，发展群众政治斗争运动，控制各个地区，重点是渭公河平原和城市周围地区。1974年9月召开整个B2战场反绥靖工作总结会议。

加强我方军事、政治力量，造成强大的声势，完成1975年的任务；使每个乡、县和省都壮大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扩大解放区。如果用我方控制的人口数字来说明问题，1960年我解放区和争夺地区的总人数为五百万人，赢得了总崛起的辉煌胜利；1968年我方控制地区的人口近四百万，我们取得了戊申新春总进攻和总起义的胜利；那么，到今年雨季末，我方控制的人口总数至少应达到1968年的水平，才能在1975年旱季采取行动。

集中力量推动城市工作迅速发展。当前，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和各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正日益激化，这在大城市中尤为突出。我有条件使城市斗争这个拳头更加有力。

加强各种武装力量，抓紧建设、训练和战斗。三种部队都应不失时机地迅速、有力地发展起来，以便作为直接的、决定性的力量去完成自己的重要任务。

建设好解放区和根据地，保证运输走廊的通畅。尽管雨季带来困难，敌人设法阻拦，都要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各部队、各个方向、各军区的物资和后勤供应，为旱季夺取重大胜利作好准备。

党组织必须设法作好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动员工作。使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认清美伪的恶毒阴谋，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胜利和形势中出现的新因素，振奋精神，努力前进。面对敌人的恶毒阴谋，必须认识到除了用革命的暴力

反对反革命的暴力之外，别无他途，必须展开强有力的攻势，夺取生存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承担自己的责任，夺取胜利。克服对敌人认识模糊的右倾思想。

各级、各部门必须整顿组织、编制、工作方法，使之适应新形势，做到精干、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有最高的工作效率。

雨季中极其紧张的工作之一是为旱季准备军事力量。各种武装力量不仅要在三种地区参加对敌作战、实现上级提出的雨季各项指标，而且这三种武装力量和各军事机关都要整顿组织、扩充力量、进行训练，按任务的要求提高作战效率，还要完成整个战场的部署。南方司令部的这个部队建设计划已于6月底由南方局批准，并已传达到各军区和各级组织。计划要求动员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无限制地扩充乡、村游击队和县地方部队，可以县有营、乡有连，自己扩大解放区，而不需要省的支援。这是朔庄省美川县和建丰省一些地方的实践经验。这些地方在上一个旱季中，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有效地反击了敌人的蚕食，并通过这种办法扩大了解放区，使许多村、乡联成一片。在这些地方，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奋起，配合游击队和地方部队进攻敌人，消灭敌人，迫使驻扎在本乡的民事防卫队和保安队撤走或投降。

各省都必须进一步动员青年参军，加上分配到的新兵，补充和组建本省强有力的作战营。根据条件，每省可有一到四个营。对那些有条件、有需要的省，可以组建一个精干的团和一两个独立营。在这段时间里，除第6军区和西贡外，7、8、9三个军区都有了一些直属军区的独立团。为了准备使军区司令部掌握本军区全部军事、政治力量，指挥整个地

区的进攻和奋起，减少层次和形成一支有力的主力部队，1974年8月，南方司令部决定把分散的团合并起来，扩编兵种，在每个军区组建一个精干的师，并建立师指挥机关，由一位军区副司令兼任师长。第9军区组建了第4师，含第10、20、30团，由阮廷职同志任师长。第8军区组建了第8师，师长黄文然上校，辖第18、24和320团。第7军区只有第23和第4两个团，组建成不满员的第6师，由邓玉士同志指挥。第6军区由于各方面的困难：远离上级的支援和指挥，缺乏人力物力，运输不便，为适应任务的需要在当地活动的方针，只分别组建了步兵团、特工部队、游击队和武工队。考虑到新形势和即将交给军区的任务，1974年5、6月间，南方司令部下令把186、840、15步兵营和炮兵连、通讯连等合并起来组成812综合团，加速训练，并以平绥、平顺两省作为主要的活动地区。由于没搞清南方司令部的意图，军区对组建该团一事思想不通。南方司令部一面进行解释，一面下令立即组建该团，及时完成任务以免贻误时机。就是这个团，1975年与各地方武装力量一起，配合友邻部队，解放了平绥省、林同省大部地区，解放了宣德全省和宁顺省一部分，在军区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西贡地区，除南方司令部部署在市区、郊区活动的武装部队外，由于条件特殊，也只有营的编制，如：第1、2、3、4决胜营和县地方部队、武装公安部队、武装青年队等，以后才成立嘉定团。到这时为止，南方司令部直接掌握的有第5、7、9师，第201、205、16、271团，27特工部队、316城市别动团，及数量有限的技术兵种。整个B2战场有五个牵引炮营用于各次战役和战斗，其中有缴获敌人的105和155毫米大炮装备的两个炮营，但缺乏弹药；有三个坦克装甲营，但车辆不够，其中还有缴获敌人

的M41和M113装甲运兵车；至于工兵、通讯兵更是短缺，工兵只有一个舟桥营，器材短缺，一个工程营、两个战斗工兵营、三个修路工兵营；此外，还有两个无线电通讯营和一个有线通讯营。长期以来，我们经常向总参的同志们和总参各兵种司令部呼吁：在像B2战场这样辽阔的重点战场上，我们的力量太少。我们还多次要求增加器材装备和武器弹药。哪个指挥员不是希望自己手中掌握充分的战斗力量和后备力量，以便最好地完成任任务呢。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在总参工作的同志，批评B2战场有地方主义、局部观点，要求自己的力量要超过B1、B3、B4等战场。我们听得多了。当然不是直接听到的，而是听别人说到这些有倾向性的看法，以至每次谈到我们的军事力量时，我们常常笑着说，听听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的吧：“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你应该自我安慰，正是无赖者制造了不公。”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良将帅才不一定要手握重兵方能取胜。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根据需要向上级提出建议，要求增加兵力。我们决定在B2战场组建军的建制，把9师和7师合并，加上现有的兵种，并建议总司令部再给我们一个师和旱季初期在战场上的坦克、炮兵部队，以便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战场上建成一个强大的军。总部同意这一作法，在1974年7月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南方司令部正式宣布组建一个军，即后来的第4军，由黄琴同志任军长、黄世善同志任政委。此外，为便于指挥，把271、205团组建成不满员的第3师，由杜光兴同志任师长。3师与5师、16团、201团、27特工部队和316别动团一样，都直属南方司令部，以使用在需要的地方。

在B2战场成立军和各军区建立师，是根据形势需要和南

方局、南方军委下一步活动方针的要求，在主力部队建设方面作出的积极准备。它受到人民群众和各部门、各级组织的热烈欢迎、关心和积极支持。它鼓舞B2战场军民振奋起来，夺取重大胜利。它也标志着B2战场力量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不仅主力部队，而且省、县地方部队，乡、村游击队也在发展壮大。这一时期，不仅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而且基层党的力量和群众的政治力量也有所发展，即使我方力量长期薄弱的地方，也得到了壮大。例如处于前江、后江之间狭长地带的隆川省新市县，1973年1月28日以前，虽然这里的群众很好，富有悠久的革命传统，但我们只有两个党支部，有组织的群众也很少。1974年旱季结束时，在全县13个乡中，11个乡已有了8个党支部，建立了上百个秘密游击组织，特别是在15个敌人民事防卫队和联队中建立了79个基层组织。在全县各个地方，我们的干部都可以往来活动和动员群众进行斗争。又如位于4号公路东侧，前江、米市运河和万古河之间的美菽省米市县。其地形给我方干部的活动造成了许多障碍。全县20个乡，已有18个乡建立了党支部和群众组织。当时，我方军、政人员共4,366人，而敌人的保安队、民卫队和民事防卫队只有3,318人。在一个我方力量较弱的县分中，我方已占优势。不仅如此，一些伪乡政权和伪军士兵家属还捐献了上万元的抗战基金。根据1974年8月底的综合统计，B2战场范围内的解放区和争夺区中，初级和高级的革命组织中已拥有340万人，略低于1968年，雨季中我仍可努力发展。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南方局经常与各地方直接联系，并发出1至8号指示，对各区、各省关怀和指导的结果。上述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尽速打开局面，加强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南方局和南方军委给各区、省提出在旱季

中发展地方军事政治实力、反击敌人、扩大解放区的各项指标均已完成或超额完成。南方局坚信，给整个B2战场提出的雨季指标也会大大超额完成。参加7月军事会议的全体干部都下定决心超额完成上级提出的各项指标。同志们还提出一个新情况，就是各地人民群众都已认识到敌人衰落和我方胜利的趋势，这和党的决议所指出的情况是相吻合的。这就证明群众跟上了党的领导，换句话说，党和群众步调是一致的。战争时期与平时一样，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点，革命就有了坚无不摧的威力，就能克服那些认为难以逾越的困难。

在7月的军事会议上，我们还传达、贯彻了中央军委1974年4月的决议。这项决议已由政治局批准，根据形势的最新发展，对党的21中全会决议作了补充。决议明确地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基本阴谋仍然是实现‘尼克松主义’，在越南南方强制推行新殖民主义，把南方变成一个单独的、亲美的国家，从主要使用美军直接参战，转向使用得到美国在军事顾问、经济和财政方面给予有效援助的伪军和伪政权。”

“为实现上述意图，美国的一贯主张就是：签订恢复和平协定的同时，帮助西贡伪政权继续进行战争。”

决议认为：“我们坚决反击和进攻，敌人就将陷入慌乱、被动。他们在9区被击退，在8区受阻，在5区虽然蚕食了少数地方，但也被制止。我已消灭相当数量的敌有生力量，保卫了湄公河平原、西贡周围地区的小片解放区，保卫了辽阔的解放区和根据地，保持了在战略上威胁敌人的态势”。

决议对各战场的指导意见是：“全力争取时间增强力量、增加物资，集中指导，保证平原地区、特别是湄公河平原取得有利于我的明显的转变。”

“5区应正确地估计形势，妥善解决干部思想，活动方式，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密切配合，西原地区和平原地区密切配合等问题，把斗争运动基本上恢复到1972年的水平，并加以扩展，保卫并逐步完整西原、南部西区和平原各省的根据地。”

“南部东区，保住西贡周围的小片解放区，使它成为日益严密地包围和威胁西贡的稳固前沿阵地，巩固、扩大连接西贡周围地区与广大根据地、解放区的走廊地带。”

“广治、承天地区，巩固在敌我交界地区的稳定态势，深入平原，建立政治基础和游击力量基础，打破敌人的控制，进而以政治、军事、敌运三路夹攻，把斗争推向前进，重新造成三种地区，打破敌占区、解放区界线分明的形势，给敌人造成经常性威胁，以牵制敌伞兵师和陆战师，给南方其他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必须保卫和努力建设稳固、强大的解放区”。

会议还详尽地传达了南方局对形势的估计和看法，以及南方局和南方军委关于雨季计划和1974—1975年旱季夺取伟大胜利的设想。我们的干部长期辗转于战场，生活在基层，经历过各种艰难险阻。他们对形势的认识和南方局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变成了执行党的决议的集体力量，并化为每个党员、每个群众的力量。

军事会议以后，范雄同志以南方局书记、南方军委书记和南方司令部政委的名义，和我们一起同每个军区的领导干部对工作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特别同西贡市武装力量的干部们讨论、明确了建设和部署秘密的、公开的、军事的、政治的力量以及活动方式，尤其是在市区和郊区开展武装活动的形式问题。范雄同志亲自解决了该市干部对深入郊区部署特

工部队和在这些地区开展军事活动认识上的一些问题。因为许多干部错误地认为，现在西贡郊区党组织和群众组织较弱，不应部署特工部队和地方部队，既怕暴露，又怕敌人扫荡，破坏稳定，使基层组织建设不起来。尤其是怕特工或地方部队在这里进攻敌人，可能把当地的基层组织毁光。不可能设想当地有武装力量，敌人来了又不允许打。因此他们说：“怎样才能又打仗，又使基层组织不受损失呢？”这个问题搅得同志们不知所措。一些地方已把武装力量撤了出来或者停止了战斗。范雄同志强调指出：“我党的路线是在山区、平原和城市三个战略地区同时进攻敌人，用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展开进攻。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结合群众的力量来安排、部署军事力量。各地区的差别只在于组织力量的方法，部署哪一种部队。我们要向敌人展开三路进攻，这样就需要研究如何以及在哪里展开三路夹攻，才能积小胜为大胜。肯定我们不是长期埋伏，更不是取消战斗。在战争中不能寄希望于有了稳定局面才组织力量，而且在这种虚假的稳定局面中组建的力量质量也不好。在当前的战略阶段，我们必须进一步严密地包围封锁西贡，各地区必须准备互相配合，夺取旱季胜利，不可贻误。干部思想通了，对问题认识正确了，斗争勇敢了，地方党委同上级派去的和当地的军事指挥部门密切地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正确的方法。要放开胆量，敢想、敢干……”

敢想、敢干，不可忽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就是在雨季中给B2战场运送、安排、积蓄粮食和弹药。我们的战士发扬南部抗战的传统“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不畏艰难、辛劳，默默无闻的工作，为同志们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却几乎忘掉了自己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后勤战士！在霪雨绵绵、

泥泞不堪的整个雨季，上万名后勤战士和数十万人民，从后方到前方，从沼泽、海洋、同塔梅河网、乌明森林、湄公河平原到7区、6区的山林，直到西贡的郊区和内城，夜以继日、沐雨栉风地工作着。也许B2战场后勤部门最能说明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各方面天才的结合：军队的后勤工作和全国后方的工作相结合，接收上级的供给与就地采购、生产相结合，专门的后勤工作与人民后勤工作相结合，军队力量和群众力量相结合，战士与民工、正规部队与游击队、大规模与小规模、公开与秘密相结合，人背肩扛夜晚偷越敌占区与机械车辆、船只公开通过陆路、水路运输、进入城市相结合，把现代化运输和土办法运输（牛车、自行车、非机动船、肩扛背驮等）相结合；把运输和消灭敌人保卫自己相结合。就是在南方后勤局指挥员的构成中，为保证高效率的工作，也要有必要的配合。后勤局政委陶山西中将，嘉定省人，曾在西贡巴山工厂当过工人，早年参加革命，三十年代加入印支共产党。抗法战争中，他是嘉定省军事指挥部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中，到后勤部门工作前，他是南方炮兵司令。因此，他懂得军事，对各个地方包括西贡和南部东区都很熟悉。他忠实、诚恳、热爱同志、为他们尽心尽力，懂得应该怎样进行补给才能保证部队的胜利。南方后勤局长裴逢同志是河内郊区人，曾在总后勤局作参谋工作，具有熟练的业务知识。副局长武发同志抗法战争时曾任隆州前省省委书记，曾多年在湄公河平原和柬埔寨从事革命活动，为就地取得物资补给建立了汗马功劳。对后勤局下属干部也进行了相应的配备，把才能与品德、熟悉工作与了解战场、善于寻找物资与了解人民心理结合起来。提出一项伟大的工作的同时，必须组织和遴选相应的人员，才能保证取得成功。说不尽的各种结合，

构成了B2战场后勤部门的综合威力，在整个战争的始终，不论在何时何地，都给各次战斗、战役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证。即使在1966年B2战场、尤其是边和以北的A战区，粮食弹药最短缺的时候，南方司令部仍然在那里保留了第81后勤团。这个后勤团由武文麟同志（现为第7军区后勤局局长，大校）负责。因此，当时第9师在该地作战时，仍在粮食弹药方面得到保障，而不须长途负重。1966年秋，我在出差途中顺便去看望了81团。武文麟同志和其它同志向我坚决保证：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他们都要“钉”在这里。在这里工作的同志不仅受到敌人炸弹、化学毒剂的攻击，黄胆性疟疾也是可怕的敌人。因此，抗法战争时同志们常说：“马河入贝江，英雄把命丧”（马河流入贝江的地方以水毒闻名，在抗法战争中，许多战士因患疟疾死在这里）。

这里所说的“神速”就是胸有成竹，不论何时何地，一旦需要，招之即来。要想这样，必须在战略上有准确、及时的预见性，有一套事先准备好的、精干的组织机构。它办法多、效率高，由智勇双全的人组成。“临时抱佛脚”事到临头才急得团团转，也就没有什么“神速”可言了，就什么也来不及了。美伪有许多各种类型的运输机和直升飞机，但逃命都来不及，哪里还能在紧急时按照需要运送人员和物资呢？B2战场的后勤系统有一种“做窝”的办法，即把千百吨粮食和武器弹药，预先储存在各个游击区和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在需要时前往活动的地区。把炸药、弹药储存到市郊，储存在敌人的机场、港口和仓库附近，储存到市区内，储存到像西贡中心那样一些重要的目标附近，供我们的特工别动队按照上级规定的计划使用。没有一套精密巧妙的组织系统，没有符合要求、能够胜任工作的干部，没有革命群众，

这样的工作是无法完成的。为了作好1974—1975年旱季的准备，雨季中，后勤系统向各个军区，包括西贡，运送了三千多吨武器弹药，给各个单位供应了战斗和日常储备所需的各类弹药和粮食，在旱季将要发生战斗的各个战场，主要是南部东区，储备了近三万吨物资，其中有近八千吨弹药和一千五百吨油料。还值得一提的是，B2战场后勤系统只要求上级提供一些当地无法解决的物资，尽力就地解决可以解决的物资。根据1973年全年和1974年雨季的统计，B2战场后勤部门自筹的物资占战场需求的73%。这就是说需请中央供给的只占27%。后勤部门严格按照南方司令部的命令，在粮食、药品和医疗器材方面，保证了4至6个月的储备，油料保证3至6个月的储备，并在武器弹药方面强制性地保持一年的储备。在一个地域偏僻、战斗极其激烈的重点战场，能够做到这一点，确是一项意义非凡的战功。我见到过那些在战场上忘我工作的后勤战士们。他们纯朴、乐观，将一切艰难险阻都置之度外，默默无闻地工作着。1975年初，我经过边和以北A战区的同奈河达莱渡口时，与一位驾驶弹药车的战士攀谈起来。他身材魁梧、动作敏捷，正俯身摸弄着已经磨平了的轮胎，听到我的说话声，他立刻立正说：“报告首长，我叫范文緬，河北人，1973年来到这个战场。”驾驶牵引渡船汽艇的是一位瘦小结实的中年人。他说：“我是金甌人，全南方奋起的那一年参的军，名叫小黑，开船技术是来这儿以后学的，在家时只会划木筏送老婆去赶集。”“啊，你已经结婚了。有孩子没有？”“有一个三岁的男孩，民卫队扫荡时被打死了，后来我就参了军，决心报国雪恨。”我心中无限感慨和同情。我问范文緬：“小緬同志，你呢？”“我还没有成家，革命成功后，我就志愿留在这一地区了。”

“噢，看上哪位姑娘没有？”“没有，现在我把自己都交给这辆车了。”记得1968年，我们夜渡西贡河，渡口在一片竹林中。当时竹林虽被破坏得稀稀疏疏，但有些地方还能隐蔽。在那里，我碰到了一群年青的姑娘，她们正把一箱箱沉重的弹药从船上卸下来，堆放到岸边的地下仓库中去。我认出了小沈和小莲。她们是劳动模范，曾在后勤局参加过南方根据地的庆功大会。这些姑娘大部分是西贡市附近地区的人，参军后，来到西贡—嘉定地区后勤部门工作。她们见到首长格外高兴，围拢过来，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叔叔，咱们什么时候解放西贡、新泰一村和婆点？”另一个插进来说：

“你就知道问你们村，还有新协、霍门呢？叔叔，过年以后我们就能回家了吧？”现在不知道小沈、小莲，还有小缅和小黑谁还活着，谁已不在人间！不知有多少后勤战士已经倒在这块土地上。我们B2战场的第一位后勤主任阮文容同志，他身经两次抗战、头发斑白，原是西贡工人，也是在执行任务时牺牲的。在这场战争中，后方与前线是无法分开的。后勤战士经常须要冲上前线，为顺利战斗要当好先行；为打扫战场，又要愉快地撤在最后。

1974年8月和9月，南方参谋部根据南方局指出的方向，在南方司令部指导下，按照在一两年内夺取决定性胜利的估计，制定了1974到1975年的旱季活动计划。10月初，南方局讨论并通过了这一计划。在会议上，南方局的每一位同志都清晰、具体地分析了战场情况和总的形势，一致决心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在1975到1976年内完成民族、民主革命。1975年是关键的一年，1976年要胜利地结束战争。求得一致的看法也并非易事。其间不知经过多少次的比较和斟酌，也不知经过多少次反复分析。每个人都明确地摆出了伪军和伪政权

在各个地区的衰落情况。城市中也出现了群众性的政治斗争运动，反对贪婪无能的阮文绍政权，这对于敌军士气产生不小的影响。大家指出，我们的势力正在壮大，各个战场都在均衡地发展。我们的农村游击队也能消灭、拔除敌人的据点。但是，我们还担心某些薄弱的方面：游击队和地方部队近来虽然发展较快，但与要求相比，数量还少，主力部队还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歼灭战；群众运动较前壮大了，但还未强大到足以形成一次推翻伪政权的奋起。我们的三支战略打击力量：主力部队、农村和城市力量尚不平衡。城市力量还较薄弱……虽然美国遭到了失败，被迫从越南撤军，其国内政局混乱，财政、经济萧条，但还必须采取巧妙的办法，阻止美国的干涉，保证我们迅速赢得彻底胜利。所有这些担心都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事实，而且人们都认识到，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保证在上述时间内获得成功。

在探讨、确定我们目前正处于革命和战争的什么阶段时，大家意见高度一致，并一致同意阮文灵同志的意见。他说：“阮文绍政权正严重地衰败，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的矛盾正在激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日益加强进攻。我们必须进一步连续地加强攻势，不让他们得到喘息的机会。现在，我们有条件逐步击退敌人，步步取胜，直到获得完全胜利。伪政权不可能熬过1975到1976年的旱季。”最后范雄同志做了结论。他说：“敌人不是某个方面、某个地区，而是敌伪中央正陷入全面恐慌。他们就像一辆冲下陡坡的车，日益迅速地走向崩溃，也不排除发生突变的可能。我们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弱点，但是，我们有能力克服，并且正在克服。就在这个雨季中，我们正在赢得巨大的胜利。我们完全有条件

为即将到来的旱季作好准备。可以肯定，我们能够在1976年完成民族、民主革命。1976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时机。但是，1975年必须真正成为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努力争取胜利，才能为决定性的1976年创造条件。说是1975年，实际上取决于1974—1975年旱季。必须牢牢地掌握南方局和南方军委讨论过的旱季计划精神，必须把旱季计划的意义和内容传达下去，要认识到这个旱季计划是从第6军区到第9军区、从主力部队到地方部队，从农村、山区到城市的整体战役计划，必须配合得非常协调。这次比以往搞得都好，我们制订了配合的计划，并在军事部门和各级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进行了周密讨论和准备。我们决心夺取巨大的胜利。因此，在这个旱季中，南方局和南方军委的指挥领导必须加强，各区和各省也是这样。在领导和指挥过程中，必须加强同级党委和军事部门之间的联系。

我们在圆满地实现这个旱季计划的同时，如果形势发展对我有利，也要准备大发展。我们必须在1975年就不失时机地奋力争取最大的胜利。”

也是在南方局的这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的问题。伪军和伪政权的崩溃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早，特别是在西贡当地出现军事、政治突变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由B2战场单独向敌人首脑机关的巢穴发动最后总攻，结束战争，而不能贻误战机。我向南方局报告说，为了利用这一时机，我们将尽力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和游击队的建设，并在各地加强革命群众力量，但是，就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来说，B2战场的主力部队还是十分薄弱的，步兵和技术兵种都不够。我提请中央立即给B2战场增派3至4个师，那么我们就能保证赢得最后战斗的胜利。考虑到形势可

能出现的变化，考虑到我们的战略路线和力量的部署和使用，考虑到B2战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个阶段给我们增派3至4个师是完全合理的。我简略地叙述了向西贡进攻的各个方向的情况，说明了配备这样一支主力部队的必要性。经过讨论，南方局的同志们一致同意，并决定立即向中央提出这一要求。但是，为了使这几个师能及时赶到战场，我们拟请中央采取逐步推移的办法调动部队，即先把西原地区的几个师调到B2战场，再把驻广治承天地区的部队调到西原，直到各个战场的部队部署就绪为止。这样做我们就会缩短各部队的行军时间。

南方局和南方军委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呈报了计划，并建议政治局与各个战场的代表在一起举行一次会议，讨论研究这一重要阶段的整个南方的统一计划。

南方局通过的B2战场1974—1975年旱季计划，实际上是B2战场准备进一步发动总进攻和总奋起的计划，是在这个重点战场上创造条件，进而夺取胜利，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因此，它必须以整个B2战场总进攻和总奋起计划的预想为基础。实际上，从准备和进行戊申新春总进攻、总奋起直到现在，我们对这拟议中的计划一直在进行酝酿。我们的军事干部们在这个战场上打了几十年仗，先同法国人打，后又同美国人打，对这里的每一处地形地物、村舍、河流几乎都了若指掌。我们也非常了解自己的敌人，和他们每个时期的部署以及防御和反应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牢牢地掌握了我们党领导这场战争的路线：我们是用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打击敌人。军事和政治并举，必然导致总进攻和总起义，夺取彻底胜利。基于对这一领导路线的一致认识和信念，我们始终深信，到一定的时候，肯定要要进行总进攻和总起义。因

此，1963年党的9中全会决议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路线之后，我们身处伪政权首都西贡—嘉定所在地的战场，经常考虑的是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总进攻和总起义？1964年，B2战场指挥部已提出进攻西贡的五个方向，为了组织部署力量，指导戊申新春总进攻和总起义，又把西贡划分成五个分区。从那时起，就确定了城内外的目标，并相应地部署了各种类型的力量，一旦打响就里应外合，同时行动。戊申新春已经有了无比宝贵的实际经验。但是，直到现在每天战争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发展，不断丰富人们的思想，使经验更加成熟。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在西贡和整个B2战场进行的第二次总进攻和总奋起。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我们不难勾划出结束西贡和整个B2战场战斗计划的轮廓，使之成为1975年旱季计划的基础。

这不是像通常的正规战那样，从某条战线对敌军发动总反攻的计划。不是单纯地用军事力量，用强大的主力军团去消灭和追击敌人，从西原或广治进入承天、广南和岬港，打进西贡，并把敌人一直赶到金瓯角、昆仑岛和富国岛。实际上，想这样做也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存在着敌人逐步龟缩到某一地区，依靠美国的海空优势反扑过来的危险。“戈文”方案就曾打算进行战略撤退，收缩到湄公河平原。戈文是美国的一名颇具才华的将领，1972年到过西贡。这一年正是美伪被打得七零八落，从广治到南部东区都遭到惨败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想出一个逐步收缩、逐步退却的战略方案，即如果遭到失败，最后必须守住美菽、永隆、芹苴等地。他认为：“湄公河平原的人力充沛，是西贡不可缺少的生命源泉，是‘首都心脏’的脉搏。湄公河平原正是巩固力量、支援西贡的好地方。在那里增强防守力量，出现最坏的

情况时，反击对方。”大概他记起了以前伪军从美蕪驰援西贡吴庭艳的经验。他还考虑到湄公河平原靠近大海，直通昆仑、土珠、富国诸岛，地势十分有利，便于美国从海上卷土重来。殖民主义者的看法真是异曲同工。1946年，法国海外部长孟戴斯给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达尚礼的指示强调说：“……南圻是我们在印度支那全部政策的真正支撑点。我们必须^在南圻取得成功，并要尽速取得成功，因为法国将来能否站住脚，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在这里的成败。”达尚礼还认为：“……在法兰西共同体中，南圻是整个印度支那联邦的关键。如果法国的权力能在这里得到巩固，那么印度支那联邦留在法兰西共同体中将成为现实……”“……千万不能忘记南圻的重要性。这一地区长时期中将是印度支那联邦大厦的基石，也是我们施加影响的基础”。当时，阮文绍曾极力反对这一方案，认为这是愚蠢的、是向“越共”投降。因为当时阮文绍认为，依靠美国的大力支撑还能站得住。但是在被打得丢盔卸甲的时候，这个方案就成了最好的方案。西方报纸曾评论说：“有南部平原将近一千万人口、又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土地，阮文绍还不能成为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堂堂正正的总统吗？”

为了给这场战争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战略，我们早在戈文之前就考虑了这一切，包括戈文没有想到的方案。

从一开始，我党就主张制定一项在高度发展的人民革命战争中发动神奇的总进攻、总起义的战略计划。我们用多种方式的军事力量同各种地区、各种规模的群众奋起结合起来进攻敌人。敌人在空中、海上及内河占有绝对优势，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占有绝对优势；无论什么地形，他们都能用直升飞机迅速机动作战，并且具有充足的、毁灭性的火力。而

我们的力量所在是到处都存在的革命力量。不管敌人走到哪里，驻扎在什么地方，都会遭到打击，遭到军事力量和群众政治力量的袭击，其中既有大部队，又有小而精的部队，既有看得见的也有无形的。我们的主力也是完全机动作战的部队，但只在一定的地区与地方紧密配合，没有那种脱离地方、在整个战场进行活动的主力。我们的优越性在于地方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各地又都得到中央严密的统一领导。1968年戊申新春攻势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中央一声令下，一昼夜之间，敌人的上百个城市、上千个村庄和目标都遭到猛烈进攻，使敌军无法脱身、无处躲藏，不仅当地的敌人晕头转向，连美国也惊慌失措。我们就是如此之神速。这种速度在广阔的空间和很短的时间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它体现在战斗行动和战役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个战略阶段和结束一场战争的方式上。不能简单地认为神速进攻就是以极为机动的主力兵团实行长途奔袭，这样考虑就是不理解实际情况。

1974年整个雨季，南方局和南方军委严格遵照这一战略观点，密切注视各地情况并督促各地迅速发展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开创局面，依靠自己的力量扩大解放区。到1974年10月，南方局就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在整个B2战场，要乡解放乡、县解放县、省解放省”。这一重要的行动口号来源于进攻与奋起相结合的战略观点和战场上长期的实践，适时地提出来，就形成了惊人的强大力量。B2战场制订的1974—1975年旱季计划就考虑到B2战场本身要在西贡实施总进攻和总奋起。各军区和各省都要解决自己战场上的问题，而不能等待上级的支援，但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在进攻目标和时间上按照周密的整体计划协同作战。整个B2战场总进攻和总奋起计划的初步设想是建立在这样一些重要考

虑上的：

总 进 攻 要 素

首先要保证不能分兵追击敌人，不要让敌人像戈文策划的那样，进行战略退却，收缩到任何地方，如西贡、湄公河平原，甚至东海和暹罗湾各岛屿。我们考虑，如果敌人向西贡收缩，我们就要阻止敌人，不让他们建立稳固的防线，并逐步打破敌人可能龟缩到西贡周围的态势。至于敌人向湄公河平原或海岛收缩，则最有效的办法是当地的军事政治力量进行及时、猛烈的进攻和奋起，在战略上把平原地区分割成许多片，逐个地区地消灭敌人，而不让他们龟缩到任何地区固守。

第二是：必须在战役和战斗中分割、包围、孤立敌军，消灭它们，不让它们集中起来互有依靠、互相支援；使它们首尾不能相顾。B2战场的敌军数量相当大，包括敌人两个多战术区，首都特区的军队和总预备队。必须保证做到不论敌人在哪里，都同时受到攻击，使其兵力分散，由强变弱。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掌握两条腿走路、三面夹攻的办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出敌不意、及时、连续地在各地打击敌人。

第三是：必须尽力限制敌之所长，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在整个战争中，美伪主要依靠强大的空军，取得制空权，从空中进行强大的火力支援，用运输机和直升飞机保障机动，其次才是海军、内河作战部队、机械化部队和炮兵。没有空军的有力支援，伪军将很快地丧失士气，很容易就瓦解或投降。B2战场有边和、新山一及芹苴的路德三个大飞机

场，作为敌人最后的支撑点。此外，它们还依靠美国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要制定计划并事先安置好特种力量，最大限度地控制这三个机场，同时要有保卫我们领空的防空力量。

第四个要素在于进攻和解放敌人首脑机关所在地的战斗。西贡是敌人力量雄厚和防守得最坚固的地方，是政治、文化、贸易中心，有通向祖国各地的许多陆路交通线。最重要的是通向中部的1号公路和铁路，连接人口众多、素有粮仓之称的湄公河平原，即伪军事力量还比较雄厚的第4战术区的4号公路。还有15号公路和经过头顿港通向外海的龙头河，这是美军进行救援，或伪军逃跑投奔主子的必经之路。西贡是指挥战争的神经中枢，具备和各地区、各单位，甚至和美国第七舰队进行联系的通讯条件。要解放西贡，首先要把西贡孤立起来，切断它同周围的联系，使敌人得不到支援，没有收拢、逃跑的余地，只能乱成一团，土崩瓦解。

第五个要素是，攻打西贡必须迅猛、果断，几乎在同一时间占领各个重要目标。这样才能保证速战速决，使敌人来不及重新布防、巩固力量，凭借市内复杂的工事进行破坏，使城市变成废墟，给进攻带来困难。另一个问题是不能让那些政治掮客赢得时间，拼凑班底、兴风作浪，阻挡革命的胜利。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疾风暴雨式的外线多路进攻同市内遍及各处的奋起密切地结合起来。我们的部队绝不能逐条地去攻打街巷，占领一幢幢的房屋，去逐个地消灭敌人目标。强大的主力部队从城外分多路进攻，特工和精锐部队攻打市内目标，奋起的群众占领街道、控制政权机关，保卫所有的工厂……。必须使敌军完全丧失斗志，全部瓦解。我们正和同胞们在一起进行一场革命战争。党已向我们指出，必须掌握总进攻和总奋起的战略，必须同时进攻、奋起，里应

外合，这就叫神速。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南方局、西贡一嘉定市委进行了研究，并把精神贯彻到主要街道和基层组织的支部，所有的党团员、领导骨干、有组织的群众，以及青年、妇女和大中学生中去。武装青年、武装公安、特工别动队等武装力量，都分配了从市内到城郊的攻取目标。他们受过锻炼，具有光荣的传统。从外线进攻的主力兵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斗的成败，因此必须增强力量，周详准备，即使在一次主力部队诸兵种协同作战中也要有各种武装力量、准武装力量协同配合，军事力量和群众政治力量之间的配合。

计划预定主力兵团从五个方向进攻西贡。这是根据城里必须同时迅速占领的最重要的目标，根据这些目标的性质和分布及其与城外的联系决定的。同时也是根据各个目标和城市周围的地形、地物、敌人的防御布局和我方出击地点的条件决定的。在五个方向中，西北和北面是最有利的。因为这两个方向地形好，干燥、平坦、开阔，便于机械化部队、主力部队发挥各种技术装备的作用。进攻时要越过安河桥、迪茶河、莱眺等沼泽地，但这些沼泽地狭窄，容易通过。发动攻击的一线阵地，要通过战斗使其更臻完善，但它位于我们广阔的后方根据地的边缘，便于机动和部署部队，便于后方支援，同后方和战役指挥部的联系也很方便。由于这是我们的根据地边沿，我们的主力部队又经常出没，敌人十分注意这两个方向，部署了两个较强的师，但在一线和纵深兵力分散，而且由于我们早就进行了破坏，已不能构成一条用坚固的工事、据点连接起来的防线了。这两个方向的部队要占领的重要目标不在市中心，进攻的道路也不复杂。

东面只占地利不占人和。我们有组织的群众力量较弱。

这个方向进攻的纵深比其它方向都大，因为要占领几个又大又难啃的目标如：边和机场、边和市，特别是伪第3军军部。该军部担负着指挥西贡的主要防御力量的任务。进攻时还要越过两条大河，一条是同奈河，一条是西贡河，虽然道路还好，但是万一敌人破坏了所有的桥梁，部队就很难准时到达目的地。这里发动攻击的一线阵地远离后方根据地，运输粮食、弹药遇到很多障碍。因为目前这些地区仍在敌人控制之下，必须尽早进行战斗，建立部队的直接后方，才能开辟运输线，储备后勤物资。

西、南两个方向最为复杂、困难。通往一线阵地和攻取目标经过的路线都是低洼、泥泞地带，还被许多纵横交错的河网所分割。尤其是南线，部队徒步行军不能离开公路一步，机械化部队和大炮就更困难了，连部队饮水也得随身携带。如果能把大炮拉上前线，就得一边打敌人以开辟道路，一边组织浮桥、轮渡，越过万古河网地带。后方补给又远，又因为没有道路而十分困难。如果没有多年在这里活动、熟悉地方和了解敌人情况的干部和部队，就根本不可能克服这么多困难，构成有意义的进攻方向。一旦克服了障碍，从这个方向展开进攻，对敌人来说就成了意想不到的、十分厉害的拳头，就能保证整个战役步调一致地获得成功。

为赢得胡志明战役的胜利，东、西两个方向还承担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进攻伪首都的中心战斗打响前，必须彻底完成对西贡的包围，即切断连接西贡和湄公河平原的4号公路，切断通往中部的1号公路和铁路，以及通向外海的15号公路和龙头河。

为了保证按照战役计划从五个方向一起向西贡发动进攻，并同时占领最重要的目标，而每个方向上的条件和特点

又有这么大的差别，这就要求事先作好周密的准备，一些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在好几个月以前就着手进行。

要为西、南两个方向准备力量。如上所述，这两个方向都需要熟悉地形、惯于在沼泽泥泞河渠交错地区进行活动的部队，……尤其是在南线，不能使用车辆和牵引炮，必须用便携式炮。必须是一些善于在地形复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作战的单位，自己背负武器粮食，只能得到小口径炮火的掩护。在这里只能使用组织精干的团一级的部队，便于灵活地分散和集中，利用当地器材、甚至不用任何器材就能渡河。而且必须是一些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的部队，他们要善于和游击队、地方部队密切配合，善于动员人民参加战斗和支援部队。西线可以使用车辆和火炮，包括重型车辆和大炮，但必须能够在复杂地形熟练地调动车辆和大炮，夜间秘密地抢渡，并要善于巧妙地伪装……这两个方向都要求有一条经过细致准备的长途行军路线，选择好集结地点和攻击出发地。这些都是十分困难的，有时还和敌人处于交错状态。这两个方向的后勤储备问题，包括运输、建立仓库、军医站和转运伤员等都非常艰苦。

根据B2战场总进攻和总奋起的这个计划，参谋部制定了B2战场1974—1975年旱季计划，从1974年12月开始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4年12月初到1975年2月初；

第二阶段从1975年3月初到5月底。

旱季计划

旱季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粉碎敌人在湄公河平原的绥

靖计划，扩大解放区，争取更多的人民参加革命，扩大和完善各个后方根据地和连接各个战场的通道，特别是南部东区主要根据地和西贡的东西两翼；成建制地消灭伪军的营和战团，解放郡、县，条件许可就解放省会；继续加强我们的实力和声势，促使伪政权迅速崩溃，并且随时作好准备，创造和把握时机去夺取胜利。进攻敌人的各个方向和目标，扩大解放区，都必须符合上述B2战场总进攻和总奋起计划。能做到这一点并达到所提出的指标，也就为夺取决定性的胜利积极创造了一切条件。

我们在湄公河平原选择进攻敌人的头号重点地区是永隆、茶荣、槟榔等省。永隆和茶荣两省位于前江和后江之间，湄公河平原的中心。这里有4号公路和芒施河这两条水、陆战略要道。扩大解放区、争取到这里的人民群众，就为切断4号公路，控制芒施河，牢牢地封锁芹苴和美顺两个渡口创造了条件，这样就把整个湄公河平原分成了三片，把敌人的第4战术区分割成许多互相孤立的地段。这是对美伪幻想的战略性打击。它们打算在别处遭到惨败后，龟缩到这里，再伺机反攻。槟榔省是一个地形优越、紧靠鹅贡、芹德、芹约的一个省。如果我们在这里取胜，既可支援永隆、茶荣两个战场，又能为从南线进攻西贡建立一个很好的桥头堡。为保证从南线向西贡进攻，南方司令部预定开辟两条进军路线，一条是从隆定、美萩、经过米市、新柱、新安，然后到芹德、芹约、芽舫。另一条是从槟榔经过鹅贡，然后再到芹德、芹约、芽舫，攻入第7、8两郡……这两条进军路线都要经过我们力量较薄弱的一些地区，那里布满了敌人的碉堡，地形复杂，而且远离我们的根据地。因此，如果不提早几个月进行活动创造条件，并且出动一些熟悉情况的部

队，那就很难完成计划。

此外，第九区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要向芹苴方向扩大乌明解放区，准备控制路德机场，进攻伪4军指挥所“西都”。第3区的第二个重点是扩大同塔梅解放区逼近4号公路，随时准备在美萩地区切断4号公路，歼灭伪第7、第9两师，使其不能支援西贡。南方司令部还命令第8军区，准备好几个团，参加从南线解放西贡的战役，因为只有第8区的部队加上军区的积极准备，才有条件组织好这次出敌不意和强大的攻势。南方司令部还打算从茶荣调第9军区的两个团参加南线的进攻。

南方司令部和第6、第7军区的主力部队必须扩大和完善各个根据地，为从北面、西北、东面和西南各个方向进攻西贡作好准备，日益孤立、包围和进逼西贡。旱季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解放从同帅到广德的14号公路，从北面向西原方向扩大南方司令部所在的根据地，并使其与西贡以东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从这个方向发动进攻开辟道路和储存技术装备创造条件。要想解放14号公路，实现上述意图，必须拿下主要目标同帅，此举一旦成功，福隆省会完全陷于孤立，我们只要把敌人包围在那里，它们就无所作为了。如果条件具备，我们就一举解放福隆全省，使我们后方根据地变得更加完整，同时还能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造成对我十分有利的影响。第6和第7军区的部队还担负着解放怀德和性灵县的任务，为从东线攻打伪3军指挥所、然后进攻西贡的部队开辟集结地和储存粮食、弹药的地区。之后，这些部队还要同上面派来的部队配合作战，切断1号、20号和15号公路。

南方司令部的主力部队还要扩大西宁市西部的运输走廊，解放德惠郡的边求、拐婆以及德和郡北部地区，建立从

西面封锁西贡的桥头堡和部队发起进攻的前沿阵地。必须消灭黑婆山据点。它是控制西贡整个北部和西北部的制高点，是监视我根据地行动的观察哨，是伪3军同其所属部队进行通讯联络的中转站。必须通过解放平隆、真城、油汀控制西贡省26号公路，进一步向西贡方向扩大我方根据地，在西北一线和整个北线建立部队集结区和发动进攻的前沿阵地。

整个B2战场的1974—1975年旱季计划的实质是，继续打垮敌人，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创造时机，夺取决定性的胜利；是作好切实的准备，也可以说是开始着手战场的总进攻和总奋起的工作，为向敌人最后的巢穴发起进攻创造条件。

B2战场的军民怀着对这一重要战略阶段的十分明确的认识，怀着对胜利的信心，怀着高度的决心和兴奋的心情，开始了旱季的活动。南方司令部直接和每个军区、每个单位研究工作，审批各地计划并检查了各方面的准备情况。从来没有一次作战像这次这样，在南方局的直接指导下，从军事到政治，从进攻到奋起力量，都作了十分周到和细致的准备。整个1974年雨季，我们都在积极热情、秘密紧张地工作。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雨季。

为动员迎接盼望已久的旱季，1974年11月，南方军委和南方司令部向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全体指战员发出了动员令。命令说：

“我们全党、全军、全民的巨大决心是，在1975年坚决夺取全面的巨大胜利，造成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方的变化，为进而夺取彻底胜利打下稳固的基础。

“对于整个1975年来说，1974—1975年旱季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你们生活在南圻起义的故乡，祖国铜墙铁壁的神圣土地上，这里曾举行过戊申年新春总进攻和总奋起，并建立了无数辉煌的战功。同志们，让我们发扬英雄的气概，以显赫的战功，坚决把1974—1975年的旱季载入史册。

“让我们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冲向前去，消灭敌人，夺取胜利……”

10月底，南方局接到政治局的电报，指定范雄同志和我去河内同南方各个战场的代表一起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1月13日，代表团启程。也就在这几天，整个B2战场的部队相继踏上开往集结地点的征途，按计划投入旱季的战斗。在我离开期间，南方司令部副司令员黎德英同志代行我的职务。我向他交待说，除了给部里例行报告情况以外，要经常把整个战场上的一切情况变化电告我。收到捷报，我会很高兴，但我将更加密切注视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障碍。黎德英同志还提醒我：“你尽量向中央说明情况，要求给我们战场增加兵力，第4军仍然没有配备齐，战斗力太弱，在几个军中是最差的。但它又是主要战场上的主力部队，真不好理解。”我表示将努力完成任务。不论是要走的还是留下来的同志，对胜利都充满了信心。

我们再一次沿着祖国雄伟的长山，沿着559号公路——胡志明小道前进。但这次路上比较顺利，也不那么辛苦，因为这次从禄宁到河内，我们都乘机动船和汽车。经过柬埔寨东部、穿过下寮，到9号公路，经过甘露、东河、穿过原四联区，回到河内。“胡志明小道”今天已不再是“小道”了，成了纵横交错，能通行运输卡车的公路网，同时还有湄公河、车公河作为补充……。迎风摇曳的电话线，盘蜒在溪旁、山

腰的输油管道点缀着沿路的景色。附近的加油站、机械修理厂、停车场、559司令部都在紧张地工作。从一个山丘到另一个山丘，炮兵、防空导弹阵地伪装得十分巧妙，炮身和弹头傲然直指天空。这和1959年5月开辟胡志明小道及六十年代初期相比，已经迥然不同。那时由我担任领导，我让武本同志和一些“骨干”摸索着开辟道路，去时，一步一步地试探，回来时，不留下一个脚印，就这样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同志们还不断提醒和嘱咐：“要小心、注意保密，要稳扎稳打。”

武本少将是三十年代的党员，故乡在广义省美莱，美国在那里犯下了天地难容的罪行。高度的革命觉悟和对故乡的热爱，使他具有钢铁般的决心，同他魁梧的外表一样坚强。在那披荆斩棘的日子里，不知遇到过多少艰难困苦。那时还没有什么“小道”，而且也不允许留下“小道”的痕迹。所有沉重的负担都压在战士的背上、肩上和穿着抗战鞋的双脚上。今天谁走“胡志明小道”，心中都充满了对光辉未来的信心，都会看到这条生死攸关的道路，如同手持越南竹的扶董天王^①那样，神奇地成长壮大，而越南竹子气宇轩昂地挺立在它的两旁。它已经战胜并将永远战胜一切反动势力，战胜所有的炸弹、化学毒剂、电子设备以及今后所有的一切。

① 越南历史上传说的一位民族英雄。

第五章 新阶段是这样开始的

回到河内，趁政治局会议召开前的几天空隙，我向总参谋部汇报了B2战场的情况，并听取了总形势和其它战场情况的介绍。我打听了为B2战场增加部队、武器装备的可能性。我十分担心的是怎样使战场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一路上和到达河内以后，始终萦绕我脑际的一个想法是，当前的时机相当有利，只要增加一些部队，B2战场肯定可以赢得巨大的胜利，从而对整个南方的战争进程产生不小的影响。总参谋部负责作战的黎玉贤同志告诉我：我们的武器弹药储备不多，尤其缺乏重型进攻性武器和机械化装备。因此，上级指示，配备和使用武器弹药，必须有十分严格的规定。要夺取敌人的武器去打击敌人。关于增派部队问题，他只讲了即将给各战场补充的军队数量。从大力加强省、县力量的考虑出发，B2战场必须把补充人数的40%拨给湄公河平原。与此同时，要迅速发展民兵游击队，使当地部队有足够的力量打击敌人，使军区主力部队集中起来，有更大的机动能力。

关于1975年的计划，他告诉我，总参谋部准备把湄公河平原作为主要战场，集中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绥靖计划，为革命争取更多的人力、物力，使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有利于我方的变化。南部东区主要开辟连结各战场的通道，把西贡包围得更紧。主力部队只在西原南部使用，以扩大德立段的战略通道，使它畅通无阻，并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将

为1976年积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歼灭战，进而举行总进攻和总起义，争取彻底胜利。

三 阶 段

1975年将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4年12月到1975年2月，这一阶段仅B2战场开始活动，因为它已有现成的计划；

第二阶段从3月到6月，是整个南方开展活动的阶段；

第三阶段从8月开始，是小规模活动阶段，为1976年作准备。

我听了总参谋部的这个计划，心中十分焦虑不安，因为B2战场计划的精神和内容同总参谋部的计划不一致。我们南方军委和南方局认为，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力量正在发展，正在夺取更大的胜利；敌人正在走下坡路，伪政权正在衰败。不能让敌人挽回败局，也不能让美国赢得时间扶植傀儡。因此，1975年旱季一开始，整个南方就必须猛烈地打击敌人，为战争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创造新时机。根据上述精神制定的B2战场旱季计划已上报中央，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就整个南方的配合问题制定一个指导性的计划。现在第一阶段只有B2战场进行活动，肯定会使胜利受到限制，敌人较容易对付我们。总参谋部1975年计划只是小打，破坏敌人的绥靖计划，开辟通道，对西贡施加压力，准备到1976年再大打。我想，机不可失，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有力的行动，就会坐失良机，形势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后来，黎德寿同志单独和我们商谈工作时，对我们说：“形势已经明朗，力量对比和发展趋势都很清楚，不可能再

逆转了。需要有1975至1976两年的战略决心。1976年很重要，必须尽量防止敌人在1976年作大规模的战略收缩。

“我们的物质储备很少，尤其是武器弹药。国内外形势也很复杂，我们很难增加更多的战略储备。因此必须限制1975年的战斗规模，保存力量，到1976年大打，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对1976年要有明确的战略决心，才能确定1975年指导计划和活动的方向。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无限期地延长战争。”

因为不是讨论，所以我只简短地陈述了我的意见。我很同意这样的看法，敌人遭到惨败，就会竭力进行战略收缩，为预防这一点，需要采取许多措施，并要尽早动手。不应该提出限制1975年的战斗，为1976年保存力量。相反，应该在1975年大打，才能在1976年胜利地结束战争。时机正在到来，必须抓住时机，创造机会，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南方局已经讨论并且取得一致看法，我们将向中央军委和政治局作详细汇报。

我研究了B2战场给我们发来的电报。通过黎德英同志的电报，我才知道B2战场执行文进勇同志和黎笋同志的电报指示，已经调整了主力部队的行动计划，即不打同帅，不用大的主力部队，不用大炮和坦克，只进行小打。这样，B2战场的第6、7、8、9军区和西贡—嘉定军区仍然按照我在家时所制定的计划活动，作了一点小的调整，就是因为不大打，不打同帅，所以南方司令部的主力部队转去攻打14号公路北端的布登或布那。此外，总参谋部决定调B2战场的第7师和特工429团北上，准备在旱季第二阶段（1975年3月）攻打嘉义，从正面配合总部组织和指挥的德立（西原南部）战役。我更加不安了。B2战场旱季第一阶段计划是整个南方战场全

盘考虑的一个组成部份，不仅平原和山区、地方和主力之间要密切配合，而且要为旱季第二阶段和1975年全年积极作好准备。象这样调整计划和调动力量，将使B2战场的计划失去平衡，敌人将作出强烈反应，尤其对平原地区。这是为什么呢？如上所述，B2战场1974—1975年旱季作战计划是在分析、估计敌我之间总形势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实现这一阶段战略意图的重要一步。要想按我们的设想在B2战场各个方向赢得胜利，计划里要有紧紧牵制敌人的措施，不让它们自由地把部队调往它们要作出反应的地方，使它们顾此失彼，分散兵力。我们B2战场有两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即曾在南部东区打击美伪屡建战功的9师和7师。尤其是9师，它是南方第一个主力师，经历过从平野、保邦、油汀战役、戊申新春大捷、禄宁战役直到现在的漫长历程。敌人经常注意这两个师的行动，从而判断我们的意图和行动计划。在旱季第一阶段，我们只动用了第7师的一部分和其它的主力团，第7师的其余部队仍在土龙木省的新渊、富教按兵不动。第9师驻守在边葛的隆原，没有战斗任务，只进行佯动，以牵制防守西贡中间防线和西贡外围的伪第3军，不让它调往其它地方，尤其不让它对湄公河平原作出反应。根据敌人的判断，这个旱季我们将解放西宁省，以西宁市作为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首都。我们采取佯动措施是为了让敌人以为它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使它们集中力量防守该地。与此同时，我们用第7师的一个团加上一个坦克连、两个重炮连，出敌不意地攻占同帅，271和201团则和地方部队一起解放属敌第3军管辖的14号公路。我们把第7师的另一个团部署在福永到同帅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上伏击敌人，并制定了随时准备打垮敌人反扑、包括对空作战的计划。同帅这个点是整个福隆省，也是

这段14号公路的关键，因为它是把福隆省和伪第3军控制的整个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咽喉要地和门户，是生死攸关的通道。失去同帅，福隆省其它地方和14号公路就陷于孤立，对这个粮食、食品匮乏的穷山区提供补给就很困难了。我们解放14号公路的目的是开辟东部通道，运输储存在A区和20号公路东面根据地的武器弹药、粮食，为从东线攻入西贡的部队作好准备。而这条通道必须经过同帅或靠近同帅的北部地区。不解放同帅，通道就会像过去一样受到限制，也就是说计划的目标没有达到。我们占领了同帅，敌军将被围困在福隆，为我们在必要时解放全省创造了条件。这样，同帅虽然只是一个点，一个郡，一个比较坚固的军事支区，但这个点是B2战场旱季整体计划中的一环，对敌人来说将是出其不意的第一仗，对我们的武装部队来说，将是莫大的鼓舞。现在，如果不打同帅，不通东部通道，却把第7师调离战场，很明显B2战场的计划将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因而我非常担心。我急忙向范雄同志和潘文当同志明确地谈了我的想法。那时，潘文当同志正在河内，他也参加了B2战场代表团，因此我们代表团就有了三个人。我们建议同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一起开个会，让我们阐明意见，维持原来的计划，不要把第7师调往西原。这次会议在12月3日举行。我尽力从战略、战役和战斗等各个方面列举理由来阐明B2战场的旱季计划，也许说服力不是很强，但从B2战场的本身利益和全局的整体利益出发，我讲得很明确、很恳切。有的同志提出质问说，打同帅，如果敌人用一个师进行反击怎么办？这会迫使我们调第7、第9两个师去打援，那么，旱季一开始，我们的主力就被牵制住了。我详细阐述了整个战场上的敌我态势，制定计划时对敌人的全面判断，保证胜利、保证我们主动的各项

措施，同时我肯定地说，即使敌人作出反应，最多也只能抽出一个团去同帅。（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我们打同帅时，敌人派不出任何一支部队去解救，甚至当我们攻打福隆省会时，敌人也只派出81旅的200多名伞兵别动队。）我之所以敢如此肯定，并且又与实际相符，是因为我们在B2战场已牢牢掌握敌情和充分了解地形，知道敌人要经过哪条路到同帅和福隆，了解敌军的战斗力和空运能力，我们狙击和消灭敌人的措施也是明确的。我相信我们把敌人牵制在西贡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一个战场的军事指挥员在向上级汇报情况时，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必须准确、清楚和直截了当。

我要求不把第7师调往西原。我们认为在目前战略阶段中，应该从其它战场增调部队到南部东区，直逼西贡，而不是相反，把部队调开，远离西贡。这完全不是闹地方主义、局部利益，而是从1975年战略阶段的利益出发的。如果总参谋部的计划确有需要，我同意把特工429团调到嘉义，也就够了。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同意不再调第7师，只调429团。我喜出望外，并暗暗地感激他们对下级意见的注意。至于打同帅的问题，没有落实。同志们提出不少看法：

动用主力部队要主动，不要让敌人牵着走，消耗和牵制我们的力量。

在这个阶段，我们作战主要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为了一城一地，因此不应打同帅。

1975年的形势不怎么紧张，应该从容不迫，何必要打同帅呢？

1975年总的战略决心是攻打湄公河平原、嘉义，开辟通道、攻取广治、承天和岘港

必须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的力量，才能使力量对比有利于

我，才能改变形势。

范雄同志表示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说：“这不仅是一个同帅的问题，而是整个B2战场计划的问题。如果计划改变，恐怕要影响平原地区，影响到总的目标。我们应该牢记，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用军事和政治力量两手去打击敌人，我们要把进攻和奋起、奋起和进攻结合在一起，进而发动总进攻和总奋起。因此，必须根据许多条件，必须采取多种方式扭转形势，不一定只有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才能使形势转变。比如，我们掌握了几百万群众，并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也是一个决定因素。敌人还有众多的军事力量，并不意味着它是强大的。首先我们要对目前战场形势有一个统一的想法和估计，认清我们正处在什么阶段，然后才能谈到应该如何行动……”

这次会议以后，范雄、潘文当同志和我对形势、对目前战略阶段的估计、对总计划和B2战场的计划等问题，在我们临行前南方局讨论的基础上，又多次进一步交换看法，为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作准备。

我想，在战争中，为了使形势发生变化，需要发动一、两次战斗或战役，以消灭敌军大量有生力量。这在两军对垒的一般性战争来说，即使不是唯一的条件，也是完全正确的做法。但在今天反对美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的路线不是针对一场常规战而制定的。我们党相信人民自己站起来决定自己命运的强大力量，主张进行一场和群众武装起义相结合的革命战争。我们必须把军事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我们用军事力量、政治力量以及兵运工作来打击敌人。我们必须同时进行进攻和奋起，以达到总进攻和总起义。我们这场战争的性质既是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反侵略战

争，又是反对国内军阀、买办的内战。因此，具有革命觉悟的人民力量是一支可观的强大力量，是有意义的战略平衡力量。我们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纲领是号召书、是旗帜，能集合群众冲向前去，建设自由独立和温饱幸福的新生活。这是强大的力量，是胜利的重要因素。而不仅仅只有转变形势的作用。战略上是这样，在战役和战术上也不同于一般的战争。与美伪作战的几十年中，我们经常探索思考，用鲜血为代价进行试验，不断改进作战方式，使之达到最高作战效果，减少牺牲，减少粮食、弹药的损耗……。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长期打下去，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绝不采用敌人的打法，而是迫使敌人按照我们的打法来打。我们不是单纯地和敌人比物质技术，比军事力量，而是和敌人在意志决心、聪明智慧、勇敢、灵活、坚持性等方面进行较量，在力量和气势方面进行较量。我国人民的爱国心和对自由、幸福的渴求必将战胜美伪的奴役、剥削野心。因此，如果只按照老一套方法去思考，只按照过去的想法去理解，按步就班地走老路，就肯定不符合新的情况，不符合一场新的战争，因为它不是过去的旧式战争的重演。如果我们南方局和B2战场司令部认为，1974年旱季以后整个南方战场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我们胜利了，并不断前进，敌人失败了，正在走下坡路，从而主张必须连续进攻，并且在从未有过的雨季中做好一切工作，为1974—1975年旱季和1975年全年制定出全面计划，争取决定性的胜利，那就绝对不会认为只有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形势才会发生转变。显然，这里所说的形势转变取决于许多因素：武装和政治、军事力量和人民力量、物质和精神、国内和国外以及敌人方面和我们方面的力量和态势，到某一时刻量变将引起质

变。战争的指导者要敏感地抓住这一关键时刻，洞察质变的发生，而不是在那里坐等或者要竭力发动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并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我们才认为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时机已经成熟。1975年必须发动强大的攻势，大好时机将会接踵而至，我们要把握时机去夺取胜利。摸准实际情况的脉搏，提出符合实际的、及时的行动主张。这是领导和指导战争与革命的科学和艺术。把1976年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时机是正确的，但只有在我们善于并且必须在1975年全年和在此之前就去创造时机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时机不会自然地出现，因此我们不能守株待兔。时机的到来要有客观条件，但主要依靠主观去创造。

一天晚饭后，我正在走廊上边散步边思考问题，突然电话铃响了。范雄同志约我当天晚上一起到黎笋同志家里去看望他。我很高兴，立即表示同意，并约定时间到范雄同志家，和他一起去。从南方出来到现在，工作繁忙，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我还没有机会见到黎笋同志。晚上七点半，范雄同志和我到了黎笋同志的家。黎笋同志来到门外，笑容满面地迎接我们，拉着我们的手走进了客厅。他看上去很健康、动作敏捷并且很高兴。还没等我们向他问好，他已经问我们，到北方后气候变化，对健康有无影响。然后，他逐个问到南方局、南方军委的同志们以及他所认识的区里、省里的一些同志。这只是谈话的开始，接着他就谈到使大家都伤脑筋的事。这也是他会见干部时的特点，他不停地讲，讲得很多，象要进行详细的解释，让干部们能清楚、深刻地理解，牢牢地记住他说的话。有时在会上，某个干部刚站起来

说了一句话，谈到他所关心的事，他就立刻接过去，常常一讲就是五、六分钟，然后再让那位干部继续谈下去。他说：

“形势很好，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胜利是因为我们强大。我们的强大来自政治、军事、农村、城市和人民群众，也来自我们的作战方法，主力、游击队、特工、妇女等等都有各自的作战方式。这些因素必须综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战略、力量和革命方法的综合。美国打我们是出自全球战略的考虑，打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也应运用全球战略。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必须使用全越南以及全世界的综合力量。我们必须使用最高的综合革命方法，进攻和奋起相结合，奋起配合进攻，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互相配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在三种地区作战，实现三路夹攻。这是科学。有了正确的路线，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

“对于这一阶段的军事问题，必须思考、思考、再思考，要把问题想透。1975年我们怎样取胜？1975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会有哪些变化？这里还包括下面这些问题：你们能消灭军事支区吗？能守住迪拜吗？南部东区怎样部署力量？这一阶段对西贡的包围与两年前有什么不同？部署正确，胜利就有了60—70%的把握。这一阶段怎么打法？怎样处理消灭敌人和掌握主动权，掌握主动权和消灭敌人的关系？是彻底消灭敌人还是全部瓦解敌人？”

他一面说一面解释，并提出一连串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也许他是故意提出问题，启发和诱导干部们去思考，让他们自己得出正确的答案。但是，通过谈话，我注意到他很关心固守迪拜和粉碎敌人在西贡进行密集防御的问题。他十分关心我们在西贡和包围西贡的兵力部署，形成稳固的进攻态

势。部署正确就有了60—70%的胜利把握。是的，我对这句话是颇有体会的。从开始组织和部署部队、形成稳固的战略态势，就要运用智慧、谋略，并要大胆和细心，然后才能谈到克敌制胜。中国战国时期孙子兵法也很重视布置阵势、安排队伍。这部兵法认为：“军队的将领只有善于部署部队，最大地发挥自己部属威力的时候，才能达到军事艺术的高峰；要善于根据情况的不同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善于利用时机，分割敌人，分散它们的力量，使之由强变弱，由多变少。”^①在当今革命和科学的时代，有了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作为一个将领，不仅要善于最合理地安排手中的力量，而且还要会创造力量，组织多种力量，运用多种打法，要善于把各种军事力量和群众的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内外力量结合起来，不但会配置前线作战部队，还要善于安排力量在敌后、甚至在敌人心脏打击敌人。今天，革命军事科学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范雄同志谈到在这个旱季中，我们将取得许多胜利的前景。他刚一停顿，我就问黎笋同志：“最近，你去电报不让打同帅，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总参谋部向我报告说，旱季一开始，你们就出动主力部队参战，先打同帅，接着还要打一系列的大仗。这样做不合适。无论怎样打，都要保持持久的耐力，在当前形势下，手中必须经常掌握一支精力充沛的部队，一旦时机到来，你才有条件去夺取胜利。”我又向他陈述了我们的想法和使用力量的办法。我说，旱季初期，我们手里仍有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就是9师和其他一些团。范雄同志插话说：“我们仔细盘算过了，打同帅不

^① 《空军学院杂志》1980年7、8月号。——原书注

需要很大的兵力，我们有把握取胜。”黎笋同志说：“如果真是这样，就打吧，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啦。”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清，连忙又问一句：“这么说，你同意按我们预定计划解决同帅，打通东面的通道了？”他说：“但一定要有把握，而且不动用大部队。”听了这句话，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真想立即回去发电报，及时指导战局。当晚，我即草拟了电报，让范雄同志和潘文当同志阅签，发给南方局和南方司令部，告诉他们准确地实施既定计划，以主力部队攻打同帅，揭开旱季攻势的战幕。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为落实中央指示，B2战场司令部已经调整计划，不打同帅，只用小部队攻打14号公路上的属于布登、布那地区的一些小据点。现在不能再恢复原来的计划了。12月6日黎德英同志来电报告说：“收到黎笋同志电报的当天，我们召开了军委会议，调整计划，改变了战斗部署，把坦克、130毫米炮调回根据地，并向部队做了思想工作……，因此，14号公路方向12日才能打响。而整个B2战场则于12月6日晚、7日晨即将打响。现在，如恢复原计划，要重新调整部队、调动坦克并向部队作解释……。按南方局常委指示，立即实施调整后的计划，不得延缓进攻日期。我们已按12月5日给总参、范雄和陈文茶同志的电报行动”。

在这之前，我离开战场以后，11月16日，黎德英同志已代表B2战场司令部电告总参：“10月24日文进勇同志来电悉，先报上总参急需了解的一些情况。

……旱季初期的胜利将为整个旱季及1975年全年赢得巨大胜利创造更好的条件，如到第二阶段才发动猛攻，则1975年的胜利将受到限制。为此，建议总参批准我们的计划……一切情况将有人（指范雄同志和我）直接详细汇报”。

11月18日陈南忠同志又电告：

“……继文进勇同志传达武元甲同志意见的484号电报后，现又接黎笋同志491号来电。我们交换意见后清楚地看到：我们没有领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B2战场的意图和总计划是同整个南方战场相联系的。为执行上级指示，现将计划调整如下：

1、南方主力部队：

第一阶段，主力部队的作战旨在消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牵制和阻止敌人向平原、西贡市郊集中，帮助地方保护粮食、解救人民群众，同时继续加强训练，实行休整，到第二阶段即可按中央关于配合整个战场的要求大力开展活动……。同时，继续为活动高峰的第二阶段作准备，如准备战场、训练部队，根据上级精神，不用坦克、重炮，仅使用85毫米以下的小口径炮进行打点演习。

以上为第一阶段计划的一些调整措施，下阶段计划待梁文儒同志返回和陈文茶同志报告后，根据总参进一步指示，再作补充。

但考虑到陈文茶同志可能去得稍晚或梁文儒同志不及赶回，请总参给予进一步指示，以便及时部署”。

电报中谈到的等待梁文儒同志回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据梁文儒同志回忆说：

“1974年11月，我离开河内108医院，准备去岑山海滨疗养。黎玉贤同志来见我，问起我的健康情况，并说总参需要一个有水平、可靠的人将命令带到B2战场，并报告有关1975年计划的一些情况。让我估计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可以回去。我很高兴能立即返回战场参加战斗，因此我说，我保证我的身体能够担当这一重要的任务。黎玉贤同志表示同

意，并告诉我，明天晚上去见黎仲迅副总参谋长。我如约前往。黎仲迅同志对我说：‘需要你立即返回B2战场，带去中央军委关于1975年计划的指示和意图。范雄和陈文茶同志快要从南方回来了。因为有你回去传达上级的决心，就发电报告诉他们不必再来了。1975年的计划是，不主张大打，要保存武器弹药，保存力量，抓好训练，等待1976年的时机……’。黎仲迅同志和黎玉贤同志具体谈了一些意见，让我牢牢记住，好回去传达。他们还告诉我，第二天上午去见总参谋长文进勇同志，接受任务和指示。

第二天上午，我去当时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在河内城里的办公地点‘龙宫’，见文进勇同志。他问了问我的健康状况，并问我明确了自己的任务没有？我说，黎仲迅和黎玉贤同志已具体传达了。我已经明确了。他让我复述一遍，看我是否理解。我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主要内容是：‘我立即回去，把总参指示带回B2战场，范雄和陈文茶同志就不必再回北方了。’

1975年不大打，只是抓紧粉碎敌人在湄公河平原的绥靖活动。在南部东区，主力部队不要大打。B2战场原定打同帅、福隆，但是总参谋部没有批准，只同意小打，拔除14号公路上的一些小据点。今年小打是为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经总参谋部批准，不能动用坦克、大炮。’

文进勇同志说：‘你这样理解就对了！必须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今年只在平原打，粉碎绥靖计划。弹药，尤其是大口径炮还很缺。不应该大打，否则，一旦时机来临就没有力量打了。你必须懂得你们参谋干部有责任向司令员提出意见，而不是只有司令员承担责任。这样，你就贯彻了上级的意见。但是，我将根据这个内容起草一份电报，请黎笋同志

签署，先发到南方去’。

我把黎笋同志签发的这份电报稿（即前面说到的黎德英同志发给总参谋部电报中提到的491号电报）带到南方，并把它交给黎德英同志和黎文想同志”。^①

但是范雄同志和我没有收到电报，因此，按预定日期出发，而且幸好在路上也没有遇到梁文儒同志。如果遇见他，我们就会在走留问题上有所犹豫。早在10月，我们就曾建议政治局同整个南方战场的同志们一起开个会。现在即使见到梁文儒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的这些意见，告诉我们不要回北方，大概我们也会要求回河内，以便直接汇报南方局和南方军委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对形势作出的看法和估计，并谈一谈为实现1975至1976年两年计划，确定的1975年的活动方针。下级向上级正确、忠实、及时地报告情况，勇敢和负责地反映意见是无比重要的，同时上级也要采取各种措施搜集下级意见，倾听各方舆论，严肃、客观地进行分析 and 观察，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才能保证取得成功。这是党中央政治局真正民主集中的一贯的工作方法。我们感到有责任回北方正确反映情况。

为了让留下的同志们安心指导这一阶段的活动，范雄同志和我一起签发了给南方局和南方军委常委的电报，其中一段是：

“同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一些同志初步交换意见后，对总形势的认识、估计，对今后的方向主张的看法很一致。但涉及具体情况还有许多问题须要继续讨论，尤其是我们的旱季计划……”

^① 黎德英同志是南方司令部副司令。黎文想同志是南方司令部副政委。——原书注

我们将建议南方主力部队仍保持原计划……”

当我知道B2战场已按调整后的计划开始执行后，我去电指出：

“……布登、布那战斗结束后，尽力消灭同帅之敌。这个点虽不大，但对战役、战略都有好处。可用7师打同帅……”。

1974年12月20日黎德英同志电告：

“……在14号公路上，我已完全解放靠近同帅的11号桥到布登外围建德支区边缘的整段地区……在布登、永善和布那，我缴获大炮4门、炮弹7,000发、各种枪3,000多支、俘虏300多人，将继续追击敌人……。”

1974年12月27日电告：

“……为在条件具备时，不失掉夺取重大胜利的战役时机，我们已经准备好一个坦克连作为后备力量。但26日消灭同帅据点，未出动坦克。”

紧接着，我们收到福隆战场司令员黄琴同志的来电。

“南方司令部前指电告南方司令部并报总参谋部：

12月16日5时35分进攻同帅支区。8时30分我完全控制同帅支区。

黄琴”

这样，B2战场范围内的14号公路已完全解放。我们后方的根据地和通道已经扩大。尽管我们的进攻计划变来变去，部队调来调去，不得已而放慢步子，逐步地从小到大地打，但是敌军仍然没有能力作出反应，调动不了任何一支步兵来支援，丢掉了三个军事支区：布登、同帅和以前丢失的布多。布多是由福隆省地方部队一个营消灭的。敌人只能用空军轰炸、扫射，但毫无效果。福隆残敌惊慌失措。面对这样

有利的形势，我们请黎笋同志和中央军委的同志们批准我们按原定计划，一旦条件有利即一举解放福隆省。我表示我们部队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并肯定福隆省一旦遭到打击，敌人没有能力增派更多的部队。我也谈了解放福隆省在战役、战略方面的意义。同志们斟酌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高兴极了。但为了保证胜利，我要求黎笋同志批准我们动用两个坦克连和一个130毫米炮连。我保证将从北方给予指导，一定成功。他同意了。福隆省是一个山区省，地势险要。省会北面和东面有许多高山，又有水深流急的贝河环绕。西面和南面地势较平坦，但紧靠城南又有这个地区最高的婆拉山，海拔735米，山洞很多，巨石嶙峋，绿树丛生。很久以来，敌人就在山顶上设置了一个无线电通讯中转站和一个用电子光学仪器装备的观察所，可以控制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必要时，可用一个团，凭借复杂的地形，以这个山为制高点，稳固地防守福隆省省会。由于婆拉山和福隆省的地势险要，过去法国殖民者曾利用婆拉山区作为整治爱国政治活动家的集中营。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曾在这里监禁多年，与社会隔绝。由于疟疾横行，他们疾病缠身，生活十分痛苦，其中包括一些女同志，如二朔、三点、阮氏榴、阮氏定等大姐，还有安江省的二贝姐、后江省的二宁姐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婆拉山西五公里处便是相当繁华的福平县城，它位于一条公路的十字路口，可通往布多、同帅、福隆省省会和14号公路上的柳德丁十字路口。这里还有一个相当好的二级机场，是该省的空军基地，既供福隆省使用，又是伪空军在整个山区活动的根据地。

对于这样一个山区省的天然地形和敌人的布防情况，想要用我们有限的力量进攻解放福隆省，最好一开始就坚决占

领同帅，孤立省里其余的敌军。必须拿下婆拉制高点的通讯站、观察所以及十字路口和福平机场。只有这样，才能插入省会，消灭凭借这里的高山、河流、湖泊、险要的地形、复杂的建筑物进行布防的敌军。

我们电示B2战场司令部发展同帅的胜利，迅速占领婆拉山和福平机场，解放福隆全省。我们特别没有忘记电告他们，可动用一个坦克连和一个130毫米炮连。电报由我自己拟稿并签发，请总参谋部代转。但是，当天下午，我正坐在地图前，研究福隆省的敌军布防，设想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可能作出怎样的反应时，黎玉贤同志来了。他拿出我写的电报，并且说电报没有发，因为我的电报里说可以动用坦克和大炮，而领导同志都嘱咐不能动用。我有些生气，因为怕像上次电报一样又误了事（即电告按预定设想实现旱季计划的电报）。为了表示我的不满，我对黎玉贤同志说：“作为战场上的司令员，难道我无权发电报指挥我的部队吗？难道我的电报还要受审查，还要强迫我违心地修改吗？至于使用重型武器问题，我已请示过了，我负完全责任。我要求你把电报发出去，否则，我的电报延误，失去时机，你要负责。”

这样，解放福隆省的问题才算妥善解决。上下都已一致。后来在总结时，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认为解放福隆省应该按照剥笋式的，由外及里，相继从布登、布那、同帅、福平、婆拉，然后到省会，先打小的、后打大的。这和另一种打法，即用强大的力量插入敌人的心脏，然后再中心开花打出来，是截然不同的。这样说得好听，但这只是不符合实际的推论。这样得出的经验教训也是毫无意义的。军事是一门科学，不能根据脱离实际毫无根据的演绎来理解。如果说到

进攻一个省会，那么上百个省会就有上百种打法，每个省会都有不同的打法，并不是只有这两种办法。选择哪一种打法，完全不是由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主观臆想而定，而必须根据一系列具体的、重要的因素：该省会所处地理位置，在敌人的防御系统中所占的战役、战略地位；解放那个省会时，应攻打哪些关键的目标，目标分布情况和实际地形，防御工事和防守力量；省会的地形、地物，敌军固守地点，援兵驻地和救援方式以及我军各方面的规模和力量，展开部队的前沿阵地、附近的道路等等。只简单地这样说说就足以看到，要选择一种打法必须根据空间和时间的具体情况，根据敌我情况，不可能坐在那里想出一种现成的打法，拿来套在一个省会上，修修补补就行了。指挥员的才干就在于紧紧掌握实际，正确分析敌我、地形和每个重要目标，创造时机或利用时机，下定决心，创造性地将战斗引向胜利。这还没有谈到发展变化的问题，意想不到的因素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必须进行处理。经常是实际战斗结束时和开始下决心制定的计划完全是两回事。有时计划很好，但由于参战部队的直接指挥者处理错了某个复杂的情况变化，或者正确处理了某个不利的情况，这场战斗的结果就大不相同。总结必须找出客观的历史事实，进行正确的分析才能获得有益的教训。

这样，在政治局会议召开以前，我们B2战场的代表争取汇报和讨论了按照实际情况制定的B2战场旱季计划，并得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批准。他们同意我们攻打同师、福隆。12月22日范雄同志电告南方局常委，其中，有以下一些内容：

“……1，梁文儒同志带回中央意见时，我们已出发，

但还没有到达河内。今天，经过讨论认为，南方局拟定和从1974年上半年会议后就进行准备的1975年计划是十分正确的。同志们应督促和密切注意指导该计划的实施，尤其是在这一旱季。我们和这里的同志们对旱季第一阶段的初步结果感到很满意。你们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仔细观察并及时、合理地进行调整。但是正如我们所料，1975年全部计划基本可行。如果完成了1975年计划，尤其是这个旱季的计划，对这关键的一年将是很有意义的。在旱季第二阶段，我们将和各战场配合作战，这对很好地完成我们的旱季计划是最有利的，不要作什么大的改变……”。

12月29日范雄同志和我共同签发了一份给南方军委和南方局常委的电报：

“……1，旱季初期我们战场的情况是，各地方和各单位都在努力争取胜利，虽然还有一些地方发展不平衡，但战绩相当好。我们很高兴并且相信，如果各级组织紧紧掌握形势，不主观自满，随时准备克服困难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很有希望达到或超过计划指标。这样，我们就具备了按照战略意图继续发展下去的稳固基础。这里的同志们很高兴，并正在努力指导各方面工作更好地进行……

…… 2，……

……由于决心在今年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下一步创造条件，因此同志们调整了支援的计划。上级同意按我们的要求，在1975年向我们提供二万七千吨物资，而不是像上次通报的一万一千吨。我们正在讨论、督促运送这些物资。因此，你们应该研究怎样真正合理和节约地使用这些物资，并注意给各区进行补给，指导他们更好地使用，同时要十分注意节约……”

又一场争论

在政治局会议召开前，我有时间和条件见到一些在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的老同事。虽然由于工作关系，他们每天都注视着战局，经常了解有关我的消息，但见面寒暄却是少有的机会。我们说完了首都的事又转到战场的事，当然，谈话总是离不开工作。少数负责干部告诉我关于总参谋部攻打德立、开辟通道的计划：总参将把B3战场和直属总参的三个主力师投进这一地区，并有一个坦克营和一个130毫米炮兵营支援。肯定即将打通战略通道，对B2战场的支援将会更加方便和迅速。B3战场的同志和武陵同志正去战场研究，并进行各方面的准备。我问：德立只是14号公路上的孤立支区和一些小的据点，怎么需要三个师和那么多坦克和大炮呢？他们回答说：不是只消灭德立和这里的一些小据点，而是要把敌人吸引过来，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很可能是大量的有生力量。我们在打通通道的同时，主动选择战场，吸引大量敌人予以消灭。

我对他们说，据我所知，当地地形险恶，只有一条14号公路穿行于树木浓密的高山峻岭之中，敌人怎么会那么傻跑到那里去让我们消灭呢！倒是敌人可能主要用空军扫射和轰炸我们的部队。况且，现在敌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军队须要部署到比遥远、偏僻的德立更重要的目标去。虽然，就战略通道来说，我们需要德立，但它对敌人在整个南方的战略防御计划并没有更多的触动。如果我们能把这样强大的力量调到那里去，为什么不直接攻取邦美蜀，而去攻打德立呢？进攻解放邦美蜀，我们就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具有战役和战略意义

的目标，将震撼整个西原，而我们的通道自然就得到巩固和扩大。攻打邦美蜀，动用那些部队，力量是足够的，因为，敌人在那里有许多疏于防守之处，只把它当作师、团一级的后方基地。虽是一个大省，地形有利，但防守弱，兵力少，尤其是敌人想不到我们能够把大部队调到那里去攻打邦美蜀，而且这样做同目前的战略阶段完全吻合：开展大规模的进攻，消灭敌人，解放大片地区，创造更好的机会。现在已经不是仅仅打通通道的时候了。

同志们反驳说：

这事还得商量，如果已经到了大打、开展西原战役的时候，就不只是用这点力量了。总参谋部正在拟定计划。我们将集中具有压倒优势的大部队，一开始就直插昆嵩，消灭敌人，并解放这个省。接着，我们就进攻在波莱古的伪2军指挥所。我们将消灭伪22和23两个师以及在这里的全部伪军，解放整个西原。一开始就攻打昆嵩，我们具有各种顺利条件。它靠近我们广阔的解放区根据地，交通方便，559司令部的仓库系统是现成的，能充分地战役服务，而且具备集中大部队的许多有利条件，很容易使用各种技术兵种。

我不同意。我笑了，开玩笑地说：“你们真是少爷兵，总是想依靠充足的兵源和武器打仗，和我们这些在遥远、困难的战场上作战的穷当兵的大不一样，我们一边眼巴巴地望着你们，一边计算着每一颗子弹。怪不得黎玉贤同志前几天在总参谋部汇报时说：1972年整个南方消耗了二十二万发重型炮弹，仅广治战场就干掉十五万。依我看，打昆嵩和波莱古是打最硬的敌人。他们早已做好防守的准备。长期以来，敌人一直判断我们会先打昆嵩，因此把部队和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到那里。虽然我们有条件集中大部队并作好各方面的准

备，但是敌人已经有所提防，我们进攻将不会是轻而易举的。至于攻打邦美蜀，对敌人来说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一击，是冷不防地攻打敌人的后方。他们将迅速被击溃，而我们却不需要动用很多力量。后方一旦被占领，前方防守的敌军将惊慌动摇。邦美蜀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有规模巨大的“和平”机场，有通向宁和、芽庄的21号战略公路，背靠嘉义、大叻。失掉邦美蜀，西原的整个伪2军就只能依靠穿过险峻山岭、易被切断的19号公路和唯一的波莱古机场得到补给和支援。其它如5号和7号公路都是山路，桥多又不坚固，难于保证畅通，尤其是机动车辆更没有保证。还有，如果我方封锁，这是肯定的，那么几十万人和大量技术装备就面临绝境，无法援救。我说了一个比喻，打邦美蜀对西原各省来说就像挖了大树的树根，树干和枝枝叶叶就都倒下了。只有这样打，才是战役、战略上的一手绝招，一定能赢得胜利，并且要取得大胜。

我把全部谈话告诉了范雄同志和潘文当同志，并且同他们作了详细讨论。我认为，这在现阶段战争中是具有战略性质的重大决策，不能不考虑。他们也一致认为不应该打德立，而应立即攻打邦美蜀。我们建议范雄同志设法和政治局的同志们交换意见。

千万人注视的会议

1974年12月18日，有南方各战场代表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联席会议在B2战场捷报频传的日子里召开了。当时，整个B2战场已进入旱季第一阶段，并取得了许多胜利。在湄公河平原，敌人的绥靖计划接二连三地遭到挫败。

我们解放了许多乡、村，扩大了茶荣省的小勤、茶古、求盖、沿海和槟榔省的冒盖和容珍等农村根据地，解放了后江地区的兴隆军事支区和前江地区的宣仁郡。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平原地区攻打并占领军事支区和郡。我们全歼了增援兴隆的伪21师1个营，重创另外3个营。我们逐步控制了金瓯角的翁独河、该头、七赫，芹苴的射努运河，朔庄省的古镐河和美秀县地区，建祥的万古西河一线……，在南部东区，我们解放了同帅北面的一段14号公路，拿下了洛吾制高点到鉴山地区，解放了一些乡，围困孤立了平绥省的怀德、性灵县城，包围了黑婆山的制高点，并消灭了西宁省敌人的一些据点。在西贡外围，西贡市武装力量和特工部队一起抓紧消灭敌人，拔除据点，消灭古芝、霍门、鹅邑、平政、南守德、隆城、仁泽等地区中敌人控制的小片地区并袭击和控制边和机场。B2战场开展旱季攻势仅半个月，消灭敌人、解放地区、人民起来掌握自己命运都已取得很大成绩，预示着我们辉煌的胜利即将到来，伪政权的崩溃就在眼前。那些再好不过的报告和理论也比不上这些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更能说明问题。

会议集中讨论政治局在雨季就提出来的1975、1976两年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计划。我们南方局和南方军委也曾在例会上讨论、检查1974年上半年的情况。最高领导的伟大预见同具有代表性战场的干部们考虑完全一致。理论和实际完全吻合。但是具体的演变进程、实施的步骤和措施还要反复讨论才能取得完全一致。这是必然的。如果大家都很容易地统一意见，或者没有什么大的分歧，这只能说明在智慧和思考方面出现了可悲的贫困。

会议一开始，B2战场和五联区的代表汇报了敌我态

势，各自战场的实际情况，下一步的活动方向和可能性以及一些反映和要求。我们B2战场简要汇报了从21中全会决议到旱季和1974年雨季的形势发展情况，在平原和第6、7区以及在西贡的具体成绩；清楚地汇报了我们在7号公路到边葛地区开展活动和解放迪拜，以打破当前西贡伪军巩固防线和今后收缩防线，是出于什么考虑；报告了迄今为止加强政治、军事力量的情况，特别是在西贡郊区和市区安排和部署力量，形成对敌伪首都的紧密包围的情况；汇报了不久前南方局对形势的分析和估计以及出现的新问题。我们正在壮大和发展，敌人正在衰落和走下坡路。我们还谈到了1975年，特别是1975年旱季B2战场的计划和方向，必须在整个南方展开猛烈进攻夺取巨大的胜利，从而在1976年胜利结束战争。最后，我们没有忘记提出南方局一致通过的给B2战场补充武器和物资以及增派部队的建议，旱季开始时先增加一个师，充实第4军编制。我们建议应该有一个协调整个南方战场行动的计划，总部应确定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部队，一旦机会到来，在主要战场上就可以及时地夺取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汇报说，因为包括西贡在内的南部东区战场是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和结束战争的战场，因此战略预备队肯定要用在那里，现在就必须把这支部队部署在西原，一旦需要，能及时行动。我们强调指出，1975年活动计划是建立在1974年成果的基础上的，是以形势发展对我十分有利为依据的，总精神应该是继续迅速扩大战果，把敌人置于危困的境地。不能停下来，坐失良机。

各战场汇报以后，黎玉贤同志代表总参谋部作了关于1975年活动计划设想的报告。计划的依据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敌人正被动防御，尽力保住现有的地盘，他们力量削

弱、士气消沉；我们正在胜利，但还存在一些缺点和弱点。计划对各战场在解放地域和争取民众、消灭和瓦解敌人并使其得不到补充、消灭敌人物质技术储备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标。计划还就年内我方部队建设、扩大通道、各战线物资储备和后勤工作作出了安排。1975年必须很好地完成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保证1976年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取得总进攻、总奋起的胜利。

他具体讲述了目前中央和各个战场掌握的我方军事力量，各地现有技术装备和弹药及其储备量，以及两年内分配给各个战场的武器装备的设想。关于重型炮弹的分配数量，他说：1975年将使用现存数量的10%强，1976年将使用45%，余存45%弱。

这样，充分了解了战场情况，有了总参谋部和各战场的两年设想和1975年的具体计划，会议开始进行讨论。会议充满豪情和兴奋的气氛。不知道别人怎样想，我可真是激动得难以形容。这个会议将决定结束祖国30年的战争。有哪一个民族象越南民族这样，在漫长、艰苦的斗争道路上，整整30年，被迫拿起武器，承受着残酷的牺牲和破坏。在我们这场反对美帝、争取解放和统一祖国的战争中，很多场合是祖孙三代一起上战场，甚至就在一个队伍上。还有很多时候，在敌人的扫荡中，全家或包括许多家庭的一个集体一起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在这个国家里，到现在为止，从黄连山、高谅到金瓯角、富国岛、昆仑岛，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失去一个以上的亲人。成千上万人的牺牲，数不尽的苦难都是为着这一天，决定灿烂辉煌未来的一天。责任是多么重大啊！会上的每项考虑、每句发言都是很有份量的，都是四千年历史和无数痛苦孕育出来的结果。越南人民千万双眼睛注视着这

次会议，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和五洲四海的朋友们期待着这次会议。同志们都热烈发言，有的人多次发表意见。

一切都围绕着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估计。我们大打，敌伪将怎样对付？美国将如何行动？美国还敢再来干涉或施展什么阴谋手段吗？我们的革命措施怎样才是最正确的？两年的步骤应怎样安排才又及时又稳妥？1975年应该怎样办？1976年呢？激烈战争中的两年可是不短啊，但是极端困苦的30多年已经到了最后两年，又觉得这两年来得太快了，胜利在望了。黎笋同志在为会议作总结时说：“准备干两年，时间虽然很短，但有时也觉得很长。”范文同同志说：“什么时候敌伪垮台呢？不一定要到1976年。可能很快，而且不是一步一步地垮下去。”武元甲同志象其他许多同志一样强调指出：“下决心在1975—1976两年中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是正确的。但是计划应该有所准备，可能提早到1975年，也可能拖到1977年。这样才主动、才稳妥”。

范文同同志来回地踱着步，思考一阵，又停下来发表意见。他的脸色红润、说话刚健有力。他说：“估计敌我情况必须肯定一些问题，不要用过时的老框框去思考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新阶段。按照巴黎协定规定，美国把军队撤走了。它认为这是经历多次失败之后，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取得的一个胜利。今天，美国再次派兵进行干涉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派海空军支援，也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败。”接着，他大笑着说：“说句笑话，可也符合事实，给美国人摆上糖果，他们也不会来了”。大家都高兴地笑了。他接着又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南方革命的高潮。军事上、政治上都有新东西。军事暴力达到最高水平，同时又有政治暴力。8区、9区都这样报告，这很好。形势的发展将是

很快的。”长征同志站了起来，戴着眼镜，看看手里早已准备好的一叠稿子，郑重其事地发表意见。他常常这样，一贯谨慎，几乎无懈可击。他写的文章，字斟句酌，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任何时候他发言都有开始部分、主要段落、结束语，十分齐全。我没有记录，只记下了这几点：“敌人受到三种压力：我们的军事进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财政经济困难。因此，敌人很快遭到削弱。敌军解决不了守住土地、控制民众同机动作战之间的矛盾。但是，今天敌军所以还能站得住，是因为还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还有人力补充，美国还提供巨大的援助，还能保住重要的战略交通线。我们的各个方面都在强大起来，在战场上赢得了主动权。1974年，我们完成了计划，如果再拿下福隆，就更雄辩地证明了我们已强大多了。敌人有收缩防守的趋势，我们难于阻止它们向大城市龟缩。我们很难打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大量敌人，也很难打进十分复杂的大城市。美国人还会回来吗？实际上他们还有25,000名披着文职人员外衣的军事顾问。如果面临危急，他们是会干涉的。但用步兵干涉，是有困难的；即使用空军和海军进行干涉，也须费一番斟酌，而且是有限度的。我们要创造条件进行战略决战，当然也不限于只进行一次战略决战……。”

那时，B2战场天天捷报频传。最令人兴奋的是来自茶荣的消息。茶荣是一个平原省，也是旱季初期的主要方向，我们消灭了很多敌人，拔掉许多据点，解放了不少的乡和老百姓。参加会议的人，尤其是B2战场的代表当然十分高兴。战场的实践对估计形势提供了许多依据，好象遥远战场上的战士和人民也直接参加了会上的讨论。黎德寿同志发言时也援引了我在前面谈到的情况，他说：“湄公河平原12月已拔

掉了500多个据点，才一个月就完成了旱季六个月计划的70%……。”在南部东区，东线我们已占领性灵全县及平绥省怀德县的一些乡。在西宁，我们包围了黑婆山的据点并全歼伪25师49团的一个营。在福隆省，我们已占领福平机场和军事支区、婆拉山，并正在进攻福隆省省会。会上每个人都在等待福隆这一仗的结果。有一天，正在开会，总参谋部作战局的一位同志拿来一份从战场发来的电报。他念道：“敌81空降别动旅增援福隆市。敌固守，我暂撤出休整，研究后再打”。我愣住了，不能相信。我大概就坐在黎笋同志的对面。听完电报，他直盯着我，好象在问这是为什么。前不久，当获准攻打福隆并动用少量大炮和坦克时，我曾向黎笋同志肯定地说，我们一定打胜这一仗，敌人不可能增援。现在，如果拿不下福隆省会，我的其它一切估计就很难令人相信是正确的了，而且还将证明，我南部东区主力部队的作战水平还很差。战场上的实际结果既是衡量干部水平、领导和指挥能力，也是衡量武装部队战斗效果的最正确的标准。但是我仍在想，事情不会这样，我仍然相信B2战场部队和干部的能力，仍然坚信福隆将得到解放。

我的信心是有根据的。我和B2战场主力部队的各个单位，从十多年前开始组建营、团时起，就生活在一起。我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经过一个又一个时期，直到今天，和同志们在一起为照顾好每一个干部、战士，日夜操持训练和战斗作出了微薄的贡献。我和同志们一起几乎参加了B2战场所有重要的战役。我了解他们就象了解我自己，相信他们就象相信我自己。我十分惋惜在这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攻打福隆省省会的战斗中没能和同志们一起分担艰辛。但我时刻想到，不论有没有我，他们照样是坚强的决战决胜的主力部

队。

至于指挥干部，有什么样的部队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他们都身经百战，大部分是经过两次抗战锻炼成长起来的。我曾交给他们十分繁重的任务，向他们发出极其严厉的命令，曾和他们一起度过艰难危险的时刻，也在一起欢庆过辉煌的胜利。我依靠他们来思考和行动。任何一个下级干部的牺牲，就象我自己的一部分机体和灵魂受到了损伤。直到我闭上眼睛、结束生命的时刻，我也不会忘记一些同志的形象：陈庭枢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位沉着、坚强的指挥员，1969年他任西贡军区司令员时英勇牺牲了。还有师长阮世传同志，他无比勇敢，1968年戊申新春时，他进入敌伪的首都，在城郊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阮文晓同志（二晓），新安人，是一位曾参加过1940年南圻起义的坚强的老游击战士的儿子，他蔑视一切艰苦危难，1968年把自己的指挥所设在靠近婆拐的1号公路上，指挥部队从西面打进新山一机场。1969年担任第8军区副司令员时英勇牺牲。还有无数这样的同志。至于现在，直接指挥福隆战役的是黄琴同志。B2战场刚成立第1师时，他就担任该师师长，现在任军长。经过漫长的战斗岁月，他和自己的部队一起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一切最困难的任务。还有正在南方司令部代替我的黎德英同志，在抗法、抗美时期曾多次担任我的参谋长。1973年他任第9军区司令员，曾坚决反击敌人，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战场上的其他同志也都是久经考验的坚强干部。我了解他们的能力和弱点，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我的信念。

我知道，第一次攻打并完全解放一个省，进攻一个地形复杂、有坚固防御工事的省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战斗十分激烈，要反复争夺，但最后，同志们将赢得胜利。想到

这里，我冷静地向与会的同志们说，我们占领了福平和婆拉山，敌人就不能长时间地守住这个省会，并且可以肯定，敌人不可能把更多的军队调来。我仍坚信我们的部队将在一两天之内消灭福隆省的敌人。紧接着，我就发电报询问战斗进展情况，并告诉他们必须增派兵力果断地拿下省会。第二天，我们收到了B2战场司令部的电报说，根本不存在撤出部队的问题，这是前线一名干部报告的错误情况，同时，正增派独立16团和9师的第2团，去消灭省会的敌军。我放心了。就在黎笋同志给会议作总结报告的前一天，我们收到B2战场的电报称：“……1975年1月6日下午，我军拔除了敌人利用刚增援的250名空降别动队在5日恢复起来的支撑点……，我们主张继续追击，全歼残敌，固守省会和福隆省。如敌反扑，就逐团、逐师地消灭敌人，空降和陆路增援的敌军也不放过，为我向敌各薄弱环节实施进攻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B2战场参谋部的电报说：“……1月3日拂晓，开始全面进攻福隆军事小区和省会，1月6日15时30分我已消灭并俘虏全部敌军，完全解放福隆省……”我轻快地舒了一口气，卸下了几天来压在我心头上的焦虑和沉重的负担。

正在开会的时候传来了解放福隆市的消息。大家都十分高兴，站起来不仅和B2战场的代表们握手，并且互相握手庆祝胜利。这表明，这一胜利不仅对B2战场，而且对其它战场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军作战能力的提高和敌军战斗力的进一步衰弱，标志着我军达到新的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没有谁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大家的形容、举止比语言表达得更充分，看上去很一致。几分钟过去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黎笋同志说：“在南方这是第一次

完全解放一个省。这个省又靠近西贡，还扩大了我们在南部东区重要的根据地。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力量、也说明了敌伪尤其是美国的反应如何。”大家都同意和赞赏他的讲话。所有参加攻打福隆省的7、3、9师、特工部队、地方部队、福隆省的游击队和人民，特别是已经在那里倒下去的同志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立下的战功的价值。他们是否知道，正是他们和参加旱季第一阶段攻势的湄公河平原的战士和同胞们，而不是我们B2战场代表团，最具体、最清楚地向最高革命领导机关和决定一切革命胜利的党中央政治局，汇报了这场战争在当前战略阶段战场上的敌我实际情况。我发电回去祝贺这一胜利，但难于尽述会议的情况和我自己激动的心情。

那么，我们的敌人是如何看待福隆事件的呢？美国出版的《南越的垮台》这本书写道：“下述详细报道试图尽力说明，1975年1月6日福隆省会的失守，是这条‘坚固的防线’崩溃的开始。许多人认为，该市的失守标志着南越开始瓦解……”

伪方认为该省会的失守是一严重事件：“共党为了考验越南共和国军队的决心，尤其为试探美国政府的反应，果真选择了一个易于得手的目标。福隆的失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越南战争史上，整个省落入共党手里，这还是头一遭……”

至于福隆刚失陷的时候，西贡的美国人和伪政权想了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伪军将领们的心理状态又如何呢？我们人民军队出版社1980年发行的杨好着撰写的《悲惨的一页》这样说：

“……事后，伪军后勤总局参谋长范伯华大校在谈到福

隆失利的后果时说：‘……福隆激战的那些日子，尤其是福隆失守的时候，也是（伪军）总参谋部全体军官最紧张的日子。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感到惶恐不安，沉浸在忧郁和恐惧的气氛中，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这种忧虑不是因为激战就发生在西贡的大门口，也不是因为福隆的失守以及六、七千军队的覆灭和瓦解，主要在于福隆失败说明共和国军队的实力。一个点受到打击就已无力应付。如果很多地方都遭到沉重打击，那将会怎么样呢？六年来实行“越南化”战略的效果如何，福隆事件已经作了相当清楚的说明。以往，共和国军队渡过许多难关，全靠美国的救援。它充分供应一切装备，补充耗损，给予强大的火力支援，甚至补充足够的生力军。现在，面临惨痛的失败，丢掉了整个省份，尽管阮文绍多次求见马丁，要求美国干预，但美国仍然置若罔闻。越南共和国外交部还正式发出照会，接着阮友劝将军同斯密特（美国驻南越武官处的头目）直接通话，通统无济于事。这种紧迫的形势使我们极为惊慌和悲观。可以说，福隆是双方的一次较量，其结果太明显了……’”

会议继续进行。黎清毅同志还保持他往常的习惯，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地发言。他不管旁人有什么反应，只顾把自己的意见讲完。他分析了形势，在谈到计划时强调：向B2战场增派部队是对的，而且越快越好；必须有总的战略预备力量和每个重要战场的后备力量。但是，如果把作为总预备队的一个军放在遥远的北方，那怎么能及时开往主要战场。黎德寿同志则强调：必须充分注意使三个拳头互相配合。必须在1975年狠狠地打，取得重大胜利，才能为1976年创造更好的条件。文进勇同志说，想马上展开兵力已经来不及了。有许多事情要准备：建设和补充部队，进行作战训练，还有

后勤物资、道路等等。向B2战场增援兵力，也须等打下西原以后才能进行。抽不出其他师了。316师要在1975年5月才能抵达南部东区。听到这里，黎笋同志看着我们说：“我们按我们的办法打，就是要把政治、军事、战略合成三个拳头，否则就不能取胜。既然大家都有困难，那么好吧，为了不打乱攻打西原的计划，推迟两三个月，也只好这样啦。”我没有吭气，但心里暗暗在想，我们又得照老百姓常说的“看菜下箸”的办法去打，就是有多大兵力就使多大劲。但是，一定要取得重大的胜利才行。

会议总结

1975年1月8日，黎笋同志对会议做了总结。我只记下了大意：“会议有五联区、南部地区的同志们参加，大家精神振奋，认识高度一致，并且决心完成政治局提出的在1975到1976两年内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经过反复考虑和讨论，现在对战场的指挥也更加一致了。

“1959到1960年，群众运动声势浩大，但是军事力量没有什么发展。

“在打美国的时候，军事力量强大了，但是敌人用各种野蛮的办法把群众压了下去。

“现在，我们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强大起来了，所以才形成了综合力量。

“因此，应该更好地掌握革命战争和群众革命运动的规律。二者不可分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当前，我们在争取人民群众和夺取控制权方面保持着主动。我们已经造成了从广治—承天到南部地区直至湄公河

平原连在一起的战略态势。我们已经有了强大和机动的主力部队。我们已经在包括9区、8区在内的平原地区形成了拳头，并且正在发展。我们已经在西贡周围建立了压倒优势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战略部署。城市开始有了群众运动。这一切都证明，我们是强大的。基于这种优势，我们决心在两年内解决问题。

“由于我们的进攻及伪政权自身的原因，它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走下坡路……”

“美国的情况如何呢？它遭到了惨败，全球战略的失败。由于介入越南，美国力量削弱了，处境很危险。如果美国卷土重来，将会落得两手空空，失去一切。即使如此，我们还得提防。美国可能有限度地使用海空军力量。如果我们不狠狠地打，不迅速地打，把战争拖延下去，那么美国将会在某种程度上介入，挽救伪政权免遭彻底失败。

“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无论美国怎样介入，我们还是决心打，决心解放南方，统一祖国。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愿被奴役，不愿亡国。我们需要自由、独立和统一。

“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方法是：进攻和奋起，奋起和进攻，三路夹攻，三种战略区，消灭敌人掌握主动，掌握主动消灭敌人，进而发起总进攻，总起义。

“1975年怎么办？”

“要在南部平原取得重大胜利，同南部东区的主力相配合，造成从南部东区到湄公河平原的连环态势。扩大农村地盘，解放更多的人民。包围和进逼西贡，消灭守卫西贡的伪军主力，对西贡施加更大的压力。想方设法使每个地方强大起来，完成任务，以便有足够的力量利用时机。必须在西原狠狠地打，但是，有条件就要打邦美蜀。在五联区，注意平

定、岷港地区，在广治—承天地区，则要注意顺化一带。

“必须消灭郡、分区，再消灭省会小区。要逐个吃掉伪军的主力团和主力师。

“1975年做到了这些，1976年的任务就清楚了，所以1976年的胜利是1975年奋斗的结果。

“我们还有困难，但困难再大也坚决克服它，完成任务。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为了东南亚和世界和平，我们必须争取彻底胜利。我们要对我国人民负责，还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

会议总结时，黎笋同志对打邦美蜀的事没有最后下结论。我理解，他可能是让中央军委去下这个决心。此前，我对黎笋同志谈过，福隆地形复杂，敌人已经注意防备，为解放福隆，B2战场出动了两个师，还有当地的地方武装配合。这两个师不满员，是由各个团拼凑起来的，力量不强，大炮和坦克支援也很少，打的时候又断断续续，旷日持久，失去了突发性。可是打邦美蜀，我们三个师，又有坦克大炮，必定稳操胜券。开完了会，我极为兴奋，信心十足。只是等待和希望了解中央军委是不是下了打邦美蜀的决心，以便据此判定B2战场旱季第二阶段的计划。因为打不打邦美蜀，对整个南方战场的影晌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打邦美蜀，将大大加速战争进程。因此，B2战场必须作出相应的计划，否则将坐失良机。我决定在动身返回战场之前设法了解这个问题。

1月15日，我们的代表团又见了黎笋同志，听取他的最后指示。这次，他谈得十分具体，如作战方法，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破坏敌人的后勤储备，我们在西贡地区的力量部署，要有强大的别动队和特工部队等。他还是强调综合力量、综合战略。他还谈到主力应该如何形成拳头，平原地区

应该怎样形成拳头。谈得更多的是城市问题。他说，城市要十分重视群众运动，要形成高潮。突击力量是妇女、青年、学生和工会。在西贡，政治领导必须十分敏锐，因为政治变化十分迅速，每时每刻都在变，必须象列宁那样，既坚决又巧妙。

他说，夺取政权是困难的，保卫政权还要难上百倍。因此，现在就必须马上考虑组织问题。必须有决心，有信心在1975年取得重大胜利。

1月20日，我们还见了黎德寿同志，请他再嘱咐几句。他说：“领导和指导方面的一条经验，从来都是知己知彼。”他告诉我，已经决心打邦美蜀了。他说：“我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已经传达了政治局关于打邦美蜀的决心。只是执行命令的问题，不再讨论了。”

文进勇大将在《春季大捷》一书中也写道：会议刚开始，黎德寿同志突然推门进来，坐下同我们开会。后来我们知道，政治局感到作战计划中打邦美蜀的意图不明确，还不完全放心，所以派黎德寿同志来向我们解释，一定要打邦美蜀。黎德寿同志激动地说：必须明确地提出解放邦美蜀的问题。我们在西原有近五个师而不能打邦美蜀，这算怎么回事？

我们对中央下这一决心感到很高兴。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考虑和设想整个南方战场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B2战场包括平原地区、南部东区和西贡地区的活动计划，如何与之相配合。一定要跑步前进，不能慢条斯理。我想起了黎笋同志在战争紧张的时刻说过的一句难以忘怀的话：要边跑边整队，不能整好了队再跑。

1975年1月24日，我们怀着高兴和激动的心情起程重返B2战场。我脑子里一直不断地考虑打哪些目标，如何使用力

量。十分繁重的任务在等待着我們。必須急速赶回去。

战 场 初 胜

整个 B2 战场在 1974—1975 年旱季第一阶段的活动战绩辉煌，胜利巨大，超额完成了所有指标。过去我担心，由于敌人集中力量对付 B2 战场，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活动可能遇到很多困难，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显然，敌人已经十分狼狈和被动，大大地被削弱了。敌人调集了第 2、第 4 军区的空军，来对付我们的第 3 军区。仅福隆和平绥一带，有时敌人一天就出动 100 多架次战斗机或 160 架直升飞机，但对战局无济于事。在地面部队方面，敌人从昆嵩调第 4 别动联团至隆平，后来又从育德调第 8 别动联团去替换，从岬港先后调第 4 和第 2 伞兵旅到黄花探基地，把第 4 海军陆战旅从广治—承天地区调往海啸基地。但这些都不是为了反攻，而是为了加强他们在首都西贡以北和东北方向的防御力量。仅在 1974 年 12 月到 1975 年 2 月这个阶段中，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我们完全解放了 1 个省、4 个县、72 个乡、489 个村，基本解放另外的 52 个乡。解放人口 584,800 人；歼灭敌伪 22 个营，重创 25 个营，拔除据点 1,548 个，其中包括 1 个小区，8 个支区，3 个要区，88 个分支区；击毁飞机 108 架，舰艇 110 艘，各种军车 494 辆，歼敌 56,315 名，缴获各种武器 12,122 件，电台 786 部，军车 118 辆，飞机两架。

尽管这些数字是很有意义的，但它还不能完全说明 B2 战场 1974—1975 年旱季第一阶段胜利的全部意义。这个胜利不仅仅是这个阶段的成果，也是继 1974 年旱季和雨季胜利的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1974 年旱季结束时，南方局和南方军

委看到了敌我战场形势的变化，早就预料到这一胜利，从而通过1974年雨季和这个旱季初期的活动，推动形势向前发展。从去年旱季到这个旱季，B2战场军民知己知彼，努力进攻，奋起斗争，越战越强；力量愈强，气势愈壮。与此同时，敌伪从1974年旱季就已经开始衰落，以后，不断地遭到打击，衰败得更严重，局势无可挽回。实践证明，南方局对形势的判断和估计是正确的，因而提出了正确的主张。

在几十年战争中，一个省（福隆）获得完全解放，还是第一次。而该省是敌伪第3军区的大门。第3军区是敌伪数一数二的强大军区，负有保卫美伪战争神经中枢的任务。这一事件发生的时候，敌人掌握着号称一百多万军队，实际上也确有近百万兵力，而且有强大的美式武器装备。这是一支由美国建立、训练和指挥的，用来实现战争越南化战略的军队。然而，却抽调不出任何一支主力部队作出反应，保卫通向西贡的大门。连美国也只好坐视辛辛苦苦豢养了几十年的伪政权濒临灭亡的危险。福隆解放无异于已将利剑架在西贡的脖子上。而西贡伪政权酷似一个吝啬鬼，宁死也不肯丢掉一寸土地。有多少军队都派到穷乡僻壤去四处布防，其结果是，挨打者只能坐以待毙，无法抽出援军。没办法只好演一出为福隆“全国举哀三日”的闹剧！这正是为祸国殃民的阮文绍伪政权举哀。福隆事件，是旧制度走向灭亡的开端。

在这个旱季的第一阶段，另一个使美伪心惊胆战的突出事件，是我军民在湄公河平原的进攻和奋起，表明一乡、一郡、一省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是现实的，这是一个正确的主张。仅两个多月，我们在平原地区消灭敌人15个营，使34,400名敌人丧失战斗力，捣毁168个据点，其中包括2个郡支区，2个要区，11个基地，65个分支区。我们依靠三种武

装力量的进攻和人民群众的奋起，完全解放了51个乡，414个村，基本上解放了另外49个乡，人口达48,900人。特别是茶荣、永隆地区，获得了重大胜利，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那里是第9军区的头号重点地区，是湄公河平原的腹地。如果美国将军戈文密切注视战争形势，肯定会省悟到，他那个在湄公河平原实行战略龟缩的方案，未及实施就已经破产了。

在西贡及其郊区，敌人非常注意巩固防御，镇压人民的奋起斗争，越失败，越是调军队来保卫其生命线。即便如此，在这个阶段中，那里的革命运动仍然蓬勃发展，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这段时间内，西贡市郊3个乡、37个村，17,000人获得彻底解放，另外4个乡获得基本解放。敌人被迫龟缩在据点里。许多地方，敌人晚上不敢在据点里过夜，对自己的工事和武器失去了信心。伪政权的控制遭到削弱，老百姓往来谋生也较自由，甚至城里的人可以到郊区同革命力量取得联系，接受革命任务。这同戊申年春的形势十分相似。这里，我们没有主力部队，没有坦克、大炮，只有特工部队、别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但是，这些精锐的小股部队发挥了作用，因为他们善于同渴望自由和平、奋起斗争、站起来当家做主的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旱季里，我们还解放了平绥省的性灵、怀德地区，作为今后切断1号公路的跳板和从东面向边和与西贡发动进攻的出发地。同时，我们还控制了万古西河沿岸相当广阔的一片地区，为我军在必要时切断4号公路，包围西贡，把它同平原地区分隔开创造了条件。

我们也开始有效地控制边和机场，敌人无法应付。特别是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贡以北方向，我们占领了重要的

遥测中心和电讯中转站，堵住了敌人的耳目。这也是敌人的两个炮兵阵地，两个突出的高地婆拉山和黑婆山。

1974—1975年旱季第一阶段的胜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敌人，了解他们的力量和活动能力有多大；同时也有助于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实际能力，应采取的革命措施，了解我们经过一万多个硝烟弥漫的日日夜夜，在长征道路的最后阶段，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方。

第六章 千载难逢的时机： 春季总进攻和总奋起

一个民族懂得如何起来拿起武器，为把自己从奴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那么这个民族也懂得应该如何最有利地结束战争。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不怕牺牲，坚决战斗，同时又签订了巴黎协定，希望在民族和睦与和解的气氛中结束战争，让美国体面地结束它的干涉。但是，我们的敌人却不这样想。它们一心想实现一个恶毒的阴谋，使战争逐步“沉寂”下去，确保它们取得彻底胜利。但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美国估计到了我们的战斗力和勇敢精神，但不完全了解越南人的聪明才智，总以为可以蒙骗我们。如果协定的法理不足以制止战争，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革命暴力。我国人民渴望和平，但渴望的是同民族自由独立联系在一起的，不违背人类良知的真正的和平。出于对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高度的责任心，党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在1975和1976年两年内完成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而统一祖国。为贯彻这一决议，政治局下了具体决心：攻打邦美蜀，解放西原，为结束长达30年激烈战争的最后阶段创造有利时机。

巴黎协定签订整整两年了。然而，在整个战场上，哪里都没有停止过枪声。越南人还在流血。由于我们执行协定，美国人及其仆从们都平安地回国了。美国还在继续推行“战

争越南化”，而不是“越南和平化”的战略。“两年”，在数字上有其巧合的一面。日内瓦协议规定两年后进行统一国家的普选，但是协议墨迹未干，美国—吴庭艳集团就撕毁了协议。两年过去了，整个南方从来没有停止过吴庭艳军队的枪声，他们在“诉共”、“灭共”的各个战役中杀害爱国者。但是，那两年与这两年有一点是根本不同的。这就是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我们的部队全部集结到了北方，南方只有独一无二的吴庭艳军队，他们可以随便杀戮手无寸铁的人们。巴黎协定签订后，我们的军队原地不动，在山林、平原和城市，同阮文绍的军队交错在一起。敌人无法随意违反协定而不受惩罚。他们每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都逃不脱我们人民和解放武装力量警觉的眼睛。1973—1974年整个旱季和1974年雨季，接着又是1974—1975年旱季，发生了一起又一起违反协定的事件，敌人都遭到了惩罚。当前，敌我态势和力量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比敌人强大得多。福隆省的解放，恰似一个桔红色的鲜明标记，双方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看清楚了就应该着手做些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是，当时，实际上还有充裕的时间来严格履行协定，结束战争。我们的两个外交代表团都还在“坚守岗位”，一个在繁华的巴黎，一个在西方记者称之为“社会主义在首都西贡的租界”——新山一。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福隆的枪声早已停息，该轮到邦美蜀打响枪声的时候了。一切都晚了，车辆开足马力沿陡坡冲下去，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我把邦美蜀之战比喻为：车子已经发动起来了。至于这场战斗的效果，也可以喻为点燃了“伪军伪政权这个爆竹的引线”，即将把它们炸得粉碎。奇怪的是，它们虽已病入膏肓，却还非常主观和顽固。

得悉政治局下了攻打邦美蜀的命令之后，我就坚信这次战役将获得辉煌胜利。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我投入这次战役的部队都占有数倍于当地之敌的优势。况且，我们是从背后对未作防范的敌人进行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那里的伪军大都是敌师、团的留守单位。敌人把兵力和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波莱古和昆嵩的正面方向。敌人作这样的防御部署，是由于猜测我主攻方向是在昆嵩。长期以来，敌人就持有这种观点，而且一直坚持到丢掉邦美蜀。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敌人丢掉了邦美蜀无异于树被砍断了根，整个西原再也守不住了。阮文绍不肯下令放弃波莱古和昆嵩两省，企图调兵守住沿海各省。然而，不用多久，上述两省也将丢失。后来，当西原失守，沿海各省相继丢失并遭到彻底失败的时候，美国急忙掩饰曾使美国遭到削弱和乱作一团的越南和印支战争惨败的主要原因，把责任推到阮文绍头上，指责他未经请示美国，擅自放弃西原。一些西方记者随声附和美国的这种宣传论调。甚至我们的一些干部也认为这是真的，因为他们没有看清进攻邦美蜀在战役和战略上的意义。美伪遭到惨重失败，在于它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残暴的侵略战争，其目的是非正义的、反动和违背人类良知的；在战略路线上则体现为被动防御、控制和监视老百姓，到处设点防守。当它醒悟过来，企图把力量收缩到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重要战略地区，收缩到原南部地区固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方早已料到这一着，不让美伪按其意愿进行收缩。在同一时间内，我方军民一致奋起，分割敌人，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百万伪军全部土崩瓦解。

我在上面已经谈过，黎笋同志启发性地向我提出过一个有关战略方面的问题：“彻底消灭还是全部瓦解敌军。”彻

底消灭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敌军最后一个士兵、最后一个单位；而是进行一次或连续几次打击，务求消灭敌人的主力，使敌人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取得彻底胜利。全部瓦解，即采取雷霆般的打击，使敌军迅速衰落，丧失抗拒或者反击的意志和能力，尽管还拥有许多军队和武器装备，仍会导致彻底瓦解，彻底失败。这种打击不一定要消灭敌军的主力集团，而是消灭某一部分敌军，占领某些战略要地，造成决定性的局势，使敌人彻底丧失战斗精神和意志，陷于混乱，在我连续进攻和奋起斗争中，逐步地进而彻底地被瓦解。在不同的战役和战略阶段中，采取不同的主张和方法，可以说，这是指挥战争的艺术。这种艺术具体体现在，一定时期内战场的划分，综合力量的部署与使用，各种力量、各地方的协同作战。这是形成和高度发挥全国综合力量，并同时代力量相结合的艺术。这是我党在革命战争和武装起义中领导和指导总进攻和总起义的艺术。了解这个秘诀后，就不会对美国 and 伪政权的失败感到偶然或惊奇了。我们部署好稳妥的战略态势，决定了敌人的命运，并且使他们逐步走向早已挖好的坟墓。这完全不是由于阮文绍在西原战役或在此前后的任何战役中，一时作出的错误决定造成的。美国和阮文绍一起挑起战争，一样的主观、顽固，政治上和战略上犯同样的错误，共同掉进失败的深渊，无法互相推诿责任。至于我们方面，我党在革命目标、革命战略路线和斗争方法，在如何结束战争等方面的英明和正确，使我们民族走上了彻底胜利的光荣道路。

当我想到邦美蜀战役、西原战役，想到西原战役后整个南方局势的演变，特别是B2战场可能发生的演变的时候，心里既兴奋，又很焦急。我知道，局势将会发展得很快，将

对战场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时机是极为宝贵的，要求采取大胆和及时的行动。可是，时间太少了，我们从河内返回根据地之后，仅仅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要传达政治局的决议和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以遵照总司令部的命令，配合整个南方的行动，在“N”日及时打响。

我在2月2日回到家，3日就召集南方司令部的参谋、后勤、政治等部门以及第4军军部开会，了解各军区敌我情况，重新检查B2战场旱季第二阶段计划，为南方局和南方军委的各种会议作准备。幸而B2战场旱季计划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在2月13至16日召开的南方局会议上，讨论和提出了需要解决的许多具体问题。在通过整个B2战场旱季第二阶段计划时，南方局的同志们都对围困和进攻西贡的南线力量表示担心。大家强调要及时加强我在米市、鹅贡和隆安以南的活动，因为在那些地区，我们的革命运动还没有很大的发展，尚不能保证我们的武装力量进逼西贡的第4、7、8郡。我们还担心在战场上的武装力量，尤其这时主要战场上的主力部队还太弱。我们要求中央增派的部队未能及时南下，战略预备队摆得太远。除军事计划外，会议强调必须马上制定群众奋起斗争的计划，保证能够利用人民和武装部队的综合力量，在每个乡，每个县，每个省，特别是湄公河平原的第8区和第9区，对从事党、政、军、青、妇、农会和兵运工作的同志都实行统一指挥。这真是一个总进攻和总起义的计划，要保证每个乡、每个县和每个省都自己起来解放自己。会议还具体讨论了市和市镇解放以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问题。从福隆市刚解放时出现的必须解决的事情，如保卫安全和管理人民生活，保证生活和生产的正常活动，镇压特务和破坏分子等问题中总结经验，及时对各地进行指

导。最后，会议讨论了传达贯彻政治局决议的保密措施。任何阶段，保守军事机密、国家机密，都是胜利的保证。不详细讨论保密措施，事情未办就泄露出去，刚有初步意见，就已人人皆知，这是不可饶恕的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个困难问题。各级和各部门要透彻了解自己的任务，进行动员，精神振奋地努力争取最大胜利，圆满地完成计划，而不被敌人觉察，作好应付的准备。范雄同志作了明确的结论：要实干，要少说或不说。反对信口开河，未做先说，做一分吹十分的夸夸其谈的作风。必须坚决做到：

不议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

不议论1975—1976年两年计划；

不议论总进攻、总起义；

不议论新决议。当作只有21中全会决议，因为直到那时，敌人只了解到有这个决议。应该严密、及时地布置好每一步工作。

根据这次南方局会议的精神和内容，我们在2月底举行了南方军委会议，全面展开军事工作。

第二阶段旱季攻势

根据总司令部总的规定，从3月初开始进入旱季第二阶段。在这之前，B2战场的敌军有了一些变化。美伪最感痛心的是，他们投进了多少力量和金钱的绥靖活动，如今遭到了沉重的失败。特别是在人口稠密和富饶的湄公河平原，他们曾企图把那里作为最后的支撑点。1月，敌人在建祥边境地区、米市—美菽、体富、茶荣、泰平—金瓯、迪石至河仙等地区极力进行反扑和突围，但一无所获，并遭到失

败。在平原地区，敌人被迫转而准备对付我军新攻势。敌人估计我将在旧历年前后（约2月10日）发动这场攻势。在南部东区，敌人打算集中兵力，发动“271”战役，力图夺回福隆市，由于到处挨打，无法调集足够的兵力，计划落空。接着，敌人又力求夺回黑婆山。对敌人来说，黑婆山不仅对整个南部东区、西贡的防御，而且对保卫金边（朗诺政权）和整个柬埔寨，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1月20至26日，驻有伪总参谋部代表的伪第3军，出动西宁小区和伪25师的兵力，在炮兵（平均每天6,000发炮弹）和飞机（每天84架次）的强大掩护下，向黑婆山地区发动猛烈攻击。敌人出动29架直升飞机，多次进行空降，企图拼命夺回山头据点，遭我坚决反击，损失大批有生力量，许多战斗机和直升飞机被击落。最后，敌人只得承认失败，退守西宁。

攻占黑婆山要地并在敌人猛烈反击下坚守住阵地，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是我一支精悍的小部队立下的显赫战功。这支部队就是南方参谋部直属第47侦察营，配有429团的两个特工连，一个高射机枪分队和一个迫击炮分队，总共只有300多名指战员。南方司令部清楚地认识到这次战斗的意义，指定南方司令部副参谋长陈文名同志直接指导，二处处长山碧同志和政治指导员九禄同志审阅作战方案，二处副处长黄龙同志和侦察处长海同志亲自指挥战斗。12月3日夜，我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西南面是主攻方向，由苏同志和升同志任尖刀班正副班长，率5名战士直插据点中心，消灭敌人许多有生力量。敌人得到战斗机和直升飞机的支援进行反扑，保住了阵地。尖刀班全体同志英勇牺牲。经上级指正，部队改变打法，步步包围进逼，切断敌人一切支援，不让任何直升飞机降落。守敌处境危急，12月底被迫弃逃，几乎被

我全歼和生俘。这是一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重要据点，可以遥测广大地区，又是越、柬两个战场的电讯中继站。因此，伪总参谋部和第3军都不惜进行一场恶战，决心把它夺回去。但是，我们这支小小的侦察、特工部队战胜了大于自己数十倍的合成兵种部队。这是气势和力量的胜利，是聪明和机智，勇敢精神和战斗艺术的胜利，是意志和决心的胜利，是为民族、为国家的大义而忍受艰难困苦和忘我牺牲精神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这次战斗就是我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缩影：以少胜多，以小胜大，以正压邪，才智和仁义战胜了愚蠢和强暴。更有意义的是，这次战斗发生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打掉了敌人观测、通讯中心，使敌人耳目闭塞，便于我做好准备，向敌人的最后巢穴发动进攻。

那时候，我情报部门获悉，敌人已了解我方1975年旱季高潮时期，即从乙卯年新春到1975年6月的主要意图是：破坏敌人以湄公河平原为重点的绥靖活动，消灭和削弱伪军，迫使阮文绍辞职，实现政治解决，成立联合政府。或者可能发起总攻，攻占广治、昆嵩、西宁、隆庆、建祥、章善等一系列城市。2月18日，伪国防部在总统府作了关于当前军事形势和展望的报告：

在第1军区，共军将向靠近山区的县城发动进攻，使对方弃守，以影响平原地区，炮击岷港机场，进占顺化市。

在第2军区，共军将长期拦截封锁第1、19、14、21号公路，孤立和进攻昆嵩、波莱古两省。

在第3军区，共军将攻占西宁市，切断第1、4、20和15号公路，迫使对方弃守真城、富教、知心，孤立西贡。

敌人的结论是：共军将在1975年3月发动春夏攻势，旨在1975年内实现他们关键性的计划，即有力地破坏对方绥靖

计划，争夺地盘和民众，消耗对方的军事潜力。重点是第2军区，其它军区策应。目前，“共党”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

敌人在各个战场加强了防御，派遣侦探四出打听和了解我方部队情况，并紧张地恢复最近遭到重创和被歼灭的建制。敌人连续向各级发出警报，说我将在阴历年发起进攻，接着通报将在2月14日开始，后来又说是2月20日等等。他们特别注意南部西区的章善、南部中区的建祥、南部东区的西宁、厚义和隆庆等方向。第25师大部向西宁市集中。第18师全部调往西贡以东的春禄周围。出动伞兵和别动队加紧搜索西贡城北郊区。

2月底、3月初，敌军大体已经知道，我肯定要发起旱季进攻高潮，并制定了防御计划，随时准备应付。但是，敌人还搞不清进攻的规模和方式，不知道打响的时间，错误地估计了我主攻方向。当时，敌官兵士气低落，惊恐万状，精神极度紧张，不相信能够抵挡住我方攻势。伪军、伪政权内部乱作一团，阮文绍、陈善谦互相倾轧，阮高其野心勃勃，伺机政变，独揽大权。美国只好千方百计扶持阮文绍，避免出现危险的政治动乱。驻西贡的美国大使马丁和中央情报局头子鲍尔格担心害怕，紧张地进行活动，及时制止了阮高其，劝住了陈善谦，镇压了反对派，保护了阮文绍。他们还在美国袒护阮文绍政权，不惜同美国公众舆论和美国国会相对立。

西贡的群众斗争运动也日益高涨，如要求赈济灾民，反对解雇工人，难民要求配给大米等；妇女争取生存权利的运动也蓬勃发展；新闻界反对封闭五家对立派报纸，逮捕几十名记者；还爆发了一些游行示威，绝食斗争，要求释放政治

犯，要求阮文绍辞职、成立一个能够履行巴黎协定的政府。

敌人丢掉福隆省和黑婆山据点以后，西宁省受到威胁。还有许多谣言说，我将解放西宁省，把西宁市作为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首都。结果，该市局面一片混乱。部分居民害怕在战争中被打死，就逃到革命力量控制的农村地区，甚至逃到西贡去避难。伪军据点附近的居民躲得远远的，以免遭殃。高台教的首领知道伪军已无力保护他们，而且有的教堂已遭破坏，因此，发表“中立”声明，要求伪政权把伪军，包括民卫队撤离“圣地”。长期以来，伪军曾利用这些“圣地”进攻解放军。

在安江，和好教也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进行自卫，并在阮文绍倒台时，利用这支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1975年1月30日，阮文绍下令解散和好教的保安总团，不允许“军中有军”。因此，在沙沥、建丰、隆川等地，和好教武装力量与阮文绍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阮文绍的血腥镇压造成了大量伤亡，包括一些头头在内的和好教保安总团成百人被捕。

进入1974—1975年旱季第二阶段，在整个南方，特别是在B2战场，阮文绍伪政权在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面临着极为混乱的局势。

根据南方局通过的旱季第二阶段计划，南方司令部向第4军、各师和各军区下达了任务，并批准了它们的计划。八方同志，即第8军区司令黎国产少将十分高兴、信心十足地接受了任务。第8军区的任务是，发动军事进攻和群众奋起斗争，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本军区所辖各省，并圆满地完成南方局交给的任务，以保证整个战场的胜利，即用自己的部队控制、切断4号战略公路，从西南方向包围伪首都，并参

加从南面向西贡发起的最后攻击，主要目标是伪警察总署。黎国产同志向南方司令部表示：

第8军区军民能参加直捣美伪最后巢穴西贡的历史性战役感到非常光荣。经过多少年战争，才盼到这光荣的时刻。我代表第8军区武装力量，保证很好完成上级批准的计划，争取最大的胜利，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第9军区虽然离得很远，往来十分困难，但三海同志，即军区司令范玉兴少将也亲自到南方司令部接受命令。他不顾危险、公开行军，但工作做得很周密、及时。他表示，将选派军区最强的第一团，切断4号公路和芒施河，并随时待命同第8军区其它部队一起从南面进入西贡。目前，该团正配合省地方部队第3团和当地军民解放战略要地永平—茶荣地区。关于对路德机场的控制，他表示，虽然有困难，但保证努力完成任务，为共同的胜利作出一份贡献。与此同时，六唱同志，即第6军区司令阮仲川大校对解放本军区范围内的平绥省到夷灵、大叻和沿海各省这样繁重的任务感到十分担心。因为该军区在各方面都有许多困难，有组织的群众力量还不够强大；在武装力量方面，则地方部队还小，游击队不多，主力部队仅有一个812团。在这样重大的任务面前，慎重衡量自己的力量，是一个具有实战经验的干部高度责任心的表现。我代表南方司令部分析了整个战场的总形势，并且指出，这个战略阶段的各种有利因素，将给军区完成任务增加巨大的力量。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军区的军民，812主力团，将以自己的战功作出应有的贡献，将同其它战场一样，获得巨大胜利。他放心了，保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我觉察到他还有不少顾虑。尽管如此，我知道他会完成任务的。因为他相信领导，相信在这个重要阶段里整个战场的

共同努力。

第7军区由军区司令黎文玉大校和副司令兼6师师长邓玉士同志前来司令部接受任务。他们谈到不满员的师所存在的弱点，要求南方司令部尽快补充兵员和装备，并保证克服一切困难，按计划完成任务。该军区最重要的任务是配合第6军区的812团迅速消灭平绥省性灵、武得地区的敌人，为第4军进攻春禄、边和、西贡创造有利条件；切断1号公路春禄至叶林段，把西贡同南部中区沿海地带隔开，切断西贡至头顿的15号公路，并配合第4军进攻。

直到这时，第4军只有第7和第9两个师，其他兵种力量还很弱。原先，根据B2战场的要求，总参谋部拟从西原调968师，加强第4军。后来，改调316师。但都不行。最后决定调驻在第4军区的、新组建的341师急行军南下。2月11日，我电请总司令部速调该师。电报说：“请速派珍（即341师师长）部早日南下。务于3月初有半个师抵此。”我们事先抽调了一些熟悉战场和久经战斗锻炼的干部，等该师一到，就立即派进去加强力量，并加紧进行战术训练（该师实战经验不多）。我们还准备了一个技术侦察组，配有干练的战士和必要的轻便装备，交给师参谋部指挥。总的来说，第4军的步兵和其他兵种仍不满员。可是，根据南方司令部指示，该军的作战计划却是兵分两路，一路攻打平隆、平阳、西宁，另一路进攻20号公路、隆庆、边和。每一路都由该军的一个师，同第7军区部队和各省地方部队配合行动。军司令部的同志谈了他们的愿望和意见，就是把全军集中成一路，以加强战斗力，实施歼灭性打击，震撼整个战场。对此，我们南方司令部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复考虑和斟酌。成立军级单位，主要目的是集中使用兵力，形成打歼灭战的力量，既可

获得更大的胜利，又可使部队锻炼成长。我们完全理解该军领导的担心和考虑。但遗憾的是，我们正处在战场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的时期。邦美蜀之役势必在整个南方引起强烈震动，迫使敌人在包括首都西贡在内的南部东区战场迅速转入死守的态势。在那里，敌人将尽最大努力作出迅速和强烈的反应，以保自己安危。要想战胜敌人，不仅要善于集中强大兵力，主要还应采取分散敌人兵力，迷惑敌人的措施和手段，使敌人无法判断我方意图，以便我能出其不意，战而胜之。我组成军级建制已经晚了。向上级要的增援部队，直到现在还没到达，无法按照战略战役态势在各个方向部署足够的兵力，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包括军事、政治方面的突变。这样，我们就必须懂得如何最有利地部署和使用手中现有的力量，及时地争取最大的胜利。B2战场肩负着重大责任，就是要保证进攻西贡的最后决定性的战役如期打响和取得成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为展开各方面的力量及早创造一切有利条件，紧逼和围困西贡，从各个方向开辟前进基地，随时报告一切情况，当出现有利时机或接到命令时能够立即行动。如果说，我们在1974年雨季就要预见到在西贡发动进攻和奋起斗争，作为制定旱季计划的基础，那么，现在更应该为这场进攻和奋起随时做好准备。尽管军级建制还不够，但它拥有一些久经沙场、善战的师，拥有经验丰富的干部。这是南方司令部手中的骨干力量，如何使用，必须慎重考虑，必须真正合乎战役和战略需要，适应当前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个关头，我如在南部东区战场上的某一方向集中兵力，敌人也将向那里集中兵力，与我进行激烈争夺。我必须灵活主动，不能陷入敌我双方胶着僵持局面。我要想有效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进攻敌人拼命固守的关键地

区，诱敌聚歼。所以，南方司令部决心把该军分为两路，以扩大西贡北线、西北线和东线的前进基地，在对我十分有利的地点，出其不意地进攻和消灭敌人，而不致触及敌人要害地区，同时，又可展开兵力；一旦急需即可发动攻势。我兵力虽小，却变成了强大的力量，不断取得胜利。

B2战场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消灭边求、拐婆一带的敌人，扩大西宁西部解放区，开辟前进基地，以便从西线进攻西贡，并从西南方向包抄西贡，切断西贡与湄公河平原的联系。因此，南方司令部在这里动用了第5师和第3师。后来，为了保证困难很大但十分重要的西线胜利，南方司令部决定成立232兵团（相当于军）以统一指挥两个师、当地武装力量及配属兵种。阮明洲同志被任命为该兵团司令。他勤劳勇敢，重情义，从抗法战争开始就在中部南区指挥主力部队；他经验丰富，在旱季第一阶段直接指挥平绥省的战斗，并曾在南方司令部参谋部门工作多年。政委是陈文朴少将，副司令为阮文严少将。

对西贡市内的特工队和别动队，为了实行严密的分区统一领导，南方司令部决定成立各翼指挥部。西贡北翼由阮清颂同志和战斗英雄阮文增同志指挥；西南翼由阮文梅和阮文哈同志指挥；东翼由宋曰杨和黎伯约同志指挥。

按总司令部规定，“N”日，即1975年3月9日夜、10日凌晨，是1974—1975年旱季第二阶段战斗打响的日子，实际上也就是整个南方发起总进攻和总起义的日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整个B2战场同其它战场相配合，从第6军区的山林到湄公河平原、城市、郊区；从主力军到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一致奋起杀敌。整个B2战场同时奋起和进攻！除第9军区的后江地区、第8军区的槟榔省等极少数地区开始

时遇到困难，进攻速度缓慢，战果有限以外，其它战场都进展顺利，实现了预定计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西贡市区，市武装部队和特工部队按照绝对秘密、出其不意，保证胜利而不妨碍整个战场的作战方法，被批准于3月8日夜、9日凌晨打响。在我特工和别动部队即将部署力量，展开活动的各地区，逐个拔除了敌人一系列据点。这时期，敌民事防卫队一方面由于遭到我军进攻，士气殆尽；另一方面在人民的感召下，大量瓦解，使敌人对西贡近郊的控制更加削弱。突出的胜利是敌人在新山一机场和西贡北线重点防守地区、霍门、8号公路和迪茶河一带的一些据点，也被消灭了。在平政，驻新宿的伪86别动营指挥部受到重创。在守德，敌西科纳化学物品仓库被破坏，损失约40%，永标油库起火。3月20日，决胜营在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配合下，在古芝地区1号公路，击毁了有武装护送的51辆运送弹药的车队，并消灭或重创前来救援的4个连……。

在湄公河平原，第9军区的第4师，同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一起，解放了乌门运河、示队，逼进泰莱、射努运河，拔除并迫敌弃守许多据点，解放了一些乡。在永茶，第1、3两团同当地部队密切配合，包围体富要区，扫除永春公路沿线据点，消灭敌援军两个营，迫使该要区的敌人逃窜；攻打丐容、丐温等支区，使其受到损失；不时切断4号公路并基本上控制了芒施河。在隆安，从3月9日开始，省地方部队第1营就消灭了边沥县的一个保安营。3月11日，第8军区第8师全歼六叉路口据点之敌。这是美萩省同塔梅边缘丐舩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敌出动伪7师第10团竭力反扑，于3月14日夺回该据点，被我歼灭两个营。在我再次攻占该据点时，又歼灭了第三个营。丐舩和丐礼两县其它许多据点之守敌亦被消

灭或逃窜。与此同时，第3师和第5师从3月11日至14日消灭了边求、木排、安盛、茶高的敌人，全部解放了上述地区，至3月20日，攻克德惠县的拐婆，按计划打开了从西宁西部直下同塔梅的通道，控制了横贯西宁和隆安两省的万古东河西岸广大地区。这就是以前美国十分害怕的著名的鸚鵡嘴地区，认为它是“越共”从西面威胁西贡可怕的跳板，曾多次派兵扫荡破坏，有时进行密集轰炸和布雷，力图使这个地区变成死亡地带。尤其是1970年，美伪军队越过该地区深入柬埔寨，开始了把越南战争扩大为印支战争的时期。如今，这一仗全部消灭了鸚鵡嘴地区的敌人。该地区扩大到东接万古东河，南近万古西河，成为比以前稳固得多的前进基地。就在1974年旱季初，拐婆刚遭到威胁，伪第3军就火速出动6个特遣战团，进行了一个时期的扫荡和戒备。现在，伪军已势尽力竭，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我军比以前更加危险地从西面逼近西贡。

这样，进入旱季第二阶段还不到1个月，湄公河平原军民就取得了很大战果，继续有效地粉碎敌人的绥靖活动，蓬勃地开展争取人民、争取当家作主权利的斗争。在南部东区，3月11日，第16团在西贡河西岸拔除翁雄河据点，12日，第9师攻占知心支区，到13日，全部解放西贡河东岸的袖汀和西岸的边柴地区。3月17日，求启据点被拔除，我控制了纵贯西宁省平原的26号公路的一段地区。这样，西贡河两岸的广大地区得到了解放，为从西北方向进攻西贡准备了前进基地。敌人出动骑兵3旅及第25师之一部对翁雄河2号路进行反扑。这是我消灭敌人第3军重要的装甲部队的好机会，但由于准备工作和作战失误，我只重创敌军，迫敌退守保屯以南。这期间，西宁省武装力量也配合得很好，他们直

通22号公路，不时在一些地段切断交通，迫使伪25师竭力守卫公路，保证西宁免于孤立。东线，从3月15至18日，第7军区第6师进一步解放了春禄至巴地一段，彻底解放了怀德至嘉勒的3号路。3月20日，占领翁屯、吉溪三岔路口。3月28日，控制了1号公路吉溪到叶林长50公里的路段，切断了中部沿海地区通向边和、西贡的交通动脉。第6军区的812团拿下了武得，彻底解放了平绥省怀德、性灵两县的广大地区，为第4军后来进攻春禄和边和建立了很好的前进基地。接着，该团按计划急速赶到通向大叻的20号公路，同第7师配合作战。3月15日，第7师发动进攻，18日拿下定管县城。这是一个背靠高山峻岭，俯控重要的20号公路的坚固据点。打下定管以后，7师攻占多威要区，并同地方武装力量一起扫清残敌，扩大对20号公路的控制。3月28日，7师采取机械化行军，并在行进中对林同市发起闪电式进攻，仅两小时就解放了该市。至此，从西贡西面的同塔梅，穿过西宁西部和北部，福隆、边和北部的A战区，直到濒临东海的平绥、巴地，我们的一些重要根据地已得到扩大并连结在一起，成为完整和稳固的一片。实际上已从西、北和东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对西贡的包围。在第7师一部的支援下，812团充分利用时机，进占夷灵。从而使整个林同省获得解放。这是这一时期南部东区战场上的巨大胜利，大大加强了我在西贡以东和以北方向的态势和力量，挫败了敌人收缩防御的企图。

在《恰当的时机》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结局”里，作者弗兰克·斯内帕写道：“第二天，共军在该区（伪第2战术区）南部开辟了一个新战场，并向同西贡相距3小时汽车路程的林同市进发，未遭到任何抵抗（应该说是抵抗被迅速粉碎）。此时，阮文绍及其将领们还在争论和考虑能不能在西

宁至芽庄建立一条西贡北部防线的问题。夜幕降临前，鲍尔格（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贡头子）亲自去总统府对阮文绍及其将领们说，他们的计划遭到了迎头痛击。因为这条防线的支柱林同省，已经落入北越军队手中。”

敌人丢掉林同省，丢掉20号公路，使大叻市和整个宣德省孤立无援。连结大叻和沿海城市藩朗的11号公路，成了唯一的通道，但它山高坡陡，盘旋曲折，十分危险，救不了大叻市。解放大叻是B2战场的任务，但B2战场的部队少，又必须紧逼西贡，无法去解放宣德省。当时，整个西原已经解放。在那里，我力量雄厚，可以非常顺利和及时地挥师南下，占领大叻，直达南部东区。因此，我打电报给当时正在西原战场指挥作战的文进勇同志，内容是：请他派兵解放大叻，我部须向西贡方向挺进，无法前往该地。他复电同意。但是敌军由于惊慌失措，又受我地方武装力量威胁，已经逃离大叻。4月4日，812团一部和当地部队进占大叻，并继续追击敌人，解放11号公路，直逼成山机场。拥有重要城市大叻的宣德省完全解放。

在西贡北面，油汀解放后，平隆省安禄市被我紧紧包围。从旱季第二阶段开始，我方就从南方司令部各机关抽调力量，同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配合，威胁和进攻敌人。3月23日，敌军逃往13号公路以南的真城县。这时，中央增援的341师已部分抵达。我即派该师的一个团并第9师之一部追击敌人，进攻真城。3月31日夜，敌遭重创后，残部逃离真城。平隆全省解放。我主要根据地已扩大成完整的一片，逼近西贡。伪军第5师的据点莱溪、富利，25师的据点同游，已经变成西贡北面和西北面的前哨。然而，直到这时，敌人仍然由于害怕西宁成为临时革命政府的首都，而盲目地死守

这座遥远和孤立的都市。

由于积极配合西原主要战场，充分利用邦美蜀等战役造成的影响，B2战场在3月份获得了重大胜利。在强大的总进攻和总奋起斗争中，整个南方的行动协调一致，结果就使得伪军伪政权迅速衰败和崩溃。在河内，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整个形势和每个战场具体形势的发展，向各地及时通报情况，对各路的活动及时给予指导和纠正。可以说，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指导并实际统一指挥了每个战场，指挥了所有各路部队的行动。

3月11日，我军基本上攻克邦美蜀。黎笋同志从总指挥部得到这个胜利消息后指出：“以前我们准备用两年，现在解放了福隆、邦美蜀，我们是不是可以快一些，这不就是总进攻和总奋起的开端吗？”这种对于形势的敏感，往往是及时采取行动的关键。胜利捷报本身就是一个重大鼓舞，中央又随时都在推动各战场奋力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武元甲同志3月12日打电报给西原的文进勇同志，其中有这样一段：

“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估计，如敌大量有生力量被歼，邦美蜀及多处县城失守，19号公路被切断，则西原残敌将龟缩在波莱古，也可能作战略退却，放弃西原。鉴此，政治局及中央军委指示应立即包围波莱古，破坏敌陆空运输，应作好在这两种情况下歼灭敌人的准备”^①。显然，我方早已正确地预料到敌人的行动。直到3月15日，阮文绍面临困境，才在金兰湾召集将领开会，决定放弃西原。3月15日，他们在困难和混乱中刚刚秘密地实行这个计划，16日，河内就已发出通报称，伪第2军前指和美国领事已从波莱古转移到芽庄。

^① 摘自文进勇同志著作《春季大捷》第104—105页。——原书注

18日至24日，撤退中的敌军已被全部消灭或瓦解。西原获得解放。

B2战场在其它战场及时传来的捷报鼓舞下，精神振奋，加速了配合整个南方战场的行动。广治—承天地区军民又发动强大攻势和奋起斗争，3月19日解放了广治。伪第1军区之敌受到震惊，惶恐不安，企图逃离顺化。但总司令部已在3月18日令广治—承天军区切断顺化以南的1号公路，不许伪1师撤回岷港。伪军陷入一片混乱。剩下的唯一生路，就是从顺安港口逃走。然而，到了3月25日被我第2军和广治—承天军区武装力量消灭在顺安。故都顺化第二次获得解放（第一次是在1968年戊申新春），并永远得到解放。岷港也是一样。3月18日总司令部已命令第五联区务必紧急行动、果断地发动进攻，切断岷港以南的1号公路，围歼敌人，使敌军不能收缩到岷港并向南逃窜。面临有利形势，第5军区第2师和地方武装执行上级命令，坚决进攻消灭敌人，解放了三歧、旬养、朱莱。广义军民以进攻和奋起相结合，也全部解放本省。这样，岷港以南广大地区和1号公路都获得解放。岷港之敌已从陆上被我包围，3月29日，被我第2军和第5军区部队消灭和瓦解。其景象之悲惨，不亚于西原和顺化。所有这些消息，我们都能及时得到。只有一个例外，这在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伪军最能干的一个将军为了逃命，跳进东海泅水爬到船上。在前面已引述的书中，弗兰克·斯内帕写道：

“3月29日晨，南越军队中以最善于指挥著称的吴光长将军为了离开岷港，不得不在险恶的海浪中挣扎。他泅水相当吃力，游到等候他的一艘越南共和国巡逻艇旁时，一个副官只好帮他上船。此后整整两天，他呆在船上，眼看着自己一度

引为自豪的这支军队的残兵们，正在南方第二大城市纵火抢掠。今后，可能会有一两位同僚指责他，把不敢留下来同自己的指挥权共存亡的懦夫罪名加在他头上。滞留在岷港的二百万难民中，肯定有十万人是第1、2、3师和著名的海军陆战师中开小差的士兵，他们就像掉进笼子的老鼠，为了给自己和家眷谋条生路，从背叛、偷盗到自相残杀，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对形势敏锐的分析，正确、及时的判断，灵活的指导，坚决、天才的指挥，破坏了美伪全部战略和战役计划。敌人企图撤退，保存实力，以便收缩到第3和第4军区——一个可以搜刮到足够的人力物力并可得到美国支援的战场，但是无法实现。他们的各条通道已被切断，在战役和战略上被分割包围。我们采取了斩草除根的办法，所以无论在西原、顺化、岷港，还是再往南，敌人都成了瓮中之鳖。我们组织和部署力量的方法是：在所有战场上，每个地区的机动兵力同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相结合，这种人民革命战争是十分厉害的。敌人到处挨打，被我及时、迅速包围起来，无路可逃，无处躲藏。在遍及各地的总进攻和总奋起斗争中，综合运用武装力量和人民的政治力量，就能所向披靡，就可以打垮手中还有上百万军队和足够装备，背后又有主子撑腰的敌人。

当北面情况这样发展的时候，政治局和中共军委也及时向我们B2战场通报情况，给予具体指导，推动我们向敌人大胆进攻，决不让敌人收缩和固守任何地方。我们严格执行命令，并按当时战场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进行战斗，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美国中央情报局专家认为：“南部的第3军也在继续走下坡路。虽不那么突出，但后果是一样的：丢

失地盘，失去战术上的灵活性”。大约在3月20日，守卫西宁及其西北地区的越南共和国军队的两个师被拖住了，不能动弹。政府军的一些指挥官想把它们撤回或者从湄公河平原增派一个师去充作机动预备力量。但是，阮文绍对这两个办法都不同意。他认为，放弃西宁，将使其他地区的军队和老百姓丧失信心；从湄公河平原抽调部队，则意味着把广大地区丢给敌人，因为越南共和国军在湄公河平原的3个师都已极度分散。

“如果这是一盘棋的话，那么阮文绍已经输了。在所有战线上，阮文绍被将了军”（见前已引述的弗兰克·斯内帕的著作）。

决战开始

整个南方的形势变化极为迅速，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料，为各战场争取最大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南方军委和南方局的同志工作很紧张，日夜密切注视各区，各路部队的情况。胜利消息纷纷传来，指示电报不断发出。可是，还感到我们慢了。武装力量还不足以充分利用这种局势。范雄同志向政治局发了几个电报，要求火速增派兵力。3月23日，我收到文进勇同志的TK81号电报，通报了总的形势，简要地告知西原解放以后，我军攻势是沿着19号、7号和2₁号公路向前发展，消灭敌22师，解放平定、富安、随后解放庆和、延庆。电报说：“目前，尚无部队调往你处。部队南调之时，最后决战时机即已成熟。因此，须事先作好战场准备”。电报的末尾，他要我先考虑最后一仗，再去他那里见黎德寿同志，一起研究。

看完电报，我心里不大高兴。一是还得不到增援兵力，二是了解到西原的各师正向东部沿海方向发展。我认为，这同1975年1月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不一样。我还记得，那时黎笋同志已经做了结论：解放西原以后，部队迅速向南推进。他一面说，一面伸开手掌，在地图上，做了一个从西原直扫西贡的手势。当时，这令人激动的形象，使我难以忘怀，因为这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想，如果整个第3军立即向南部东区挺进，那么，我们可以更早、更合时宜地打进西贡，南部中区的敌军来不及收缩回来。况且，沿海已有第2军和第5军区的部队，足以消灭敌人。但第二天，我接到黎德寿同志3月23日给范雄同志的71号电报抄件：

“已调珍兄（指341师）南下。此系干部（即师）中有能力之佼佼者。近期可望再调去能力相当的干部约3名（即3个师）。助手若干（即南调各师之配属兵种）尚不计在内。上述干部将立即从我处直接调去。望作好准备，以期抵达后即能使用”。

我高兴极了，但还是担心路程远，部队赶不及。

1975年3月25日，政治局举行会议，下决心在雨季（5月开始）来临前解放南方，解放西贡。

3月29日，黎笋同志打电报给范雄同志（KT928号电），其中一段说：

“在我军连续取得重大胜利，敌人遭到意外的沉重失败的情况下，美伪在军事、政治、士气上正面临迅速崩溃的危机。

“我们很赞同你们的意见，当前应十分及时、坚决和大胆地采取行动。实际上，西贡的战役已经开始。

“在大力促进早日实现既定战略决心的同时，我要强调

当务之急应大胆投入兵力，立即实现战略分割和包围，从美萩—新安切断西贡与西部地区的联系。”

3月30日，武元甲同志也来电称：

“我们已电告俊兄（指文进勇——译注）及早派兵南下，尽量争取时间。新式技术兵种部队正在南下途中，以加强B2战场。我已准备好一个军尽早开往B3战场，作为后备力量。”

南方局和南方军委接到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指示电后，开会讨论了落实计划的问题。会上作出了TWC15号决议，对形势的估计是：“南方革命战争不仅已经进入飞跃发展时期，而且向敌人巢穴发动总攻击，进行总起义的战略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我国军民为完成南方民族民主人民革命，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后战略决战已经开始。”

关于任务，决议写道：“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动员全党、全军、全民，最高度地集中一切精神和物质力量，高度发挥三面夹攻、三种军队、三种地区的综合力量，发动总进攻和总奋起，以坚决、迅速、大胆的进攻和决心争取彻底胜利的气势，迅速彻底打垮伪军和伪政权，把一切政权夺回到人民手中，解放自己的乡、自己的县、自己的省和整个南方。”决议督促各级组织：“务必争取时间，当前，时间就是力量……，”“从1975年4月初开始，必须充分利用每小时、每天和每个月……。”

在这次南方局会议上，我们对B2战场可能发生的具体情况作了详细讨论。如果我们各个战场取得更多的胜利，那么西贡就可能不战自乱。对此，我们不能没有待机而动的计划。黎笋同志给南方局的电报明确指出，形势将迅速发展，应加紧打击敌人，进一步逼进西贡。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

就可能使西贡发生变化。目前，时间就是力量。经过对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指示的详细研究和对形势的仔细分析，我们南方军委和司令部制定了一个以自己现有力量进攻西贡的计划。该计划已经南方局同意，并报告了中央。对于分五路进攻市区，必须歼灭的敌军单位，必须攻占的目标等，都想到了，问题是如何部署使用力量。对于市内的各个目标和西贡市内发起进攻的特工、别动部队，都已部署就绪或交待了任务。现在是如何部署外线进攻部队的问题。

我们的计划是，东线由第4军负责，包括第7师、341师和6师；西北线有第9师、第16团、271B团；西线有232兵团，包括第5师和第3师；南线有第8军区的88团和24团。至于北线，则交给嘉定团，如果有北方增援的兵力，将加强这一线；如没有，则代之以较强的特工、别动部队。上述各线部队已分派部署完毕，我们正严密注视形势发展，以确定发动这场进攻的最好时机。眼下应更多地消灭西贡守敌，切断4号公路、龙头河，控制各个机场，尤其是边和机场。必须更严密地包围西贡，不使敌人在最后时刻收缩在一起，特别要分割伪3军和4军，把敌军分散在各个地方并拖住它。南方局同意南方军委的意见，立即进攻春禄，消灭伪3军中实力较强的18师和骑兵旅，逼近边和。命232兵团准备占领木化和唯一的通道12号公路，以便向南调运第5师和技术装备，切断4号公路，配合第8军区的第8师歼灭伪7师和9师。实现了这一步，我将在整个战场获得巨大胜利，伪军和伪政权将发生动摇，引起混乱，就不可能在西贡组织有效的防御。如伪政权内部或美伪之间发生政治军事变化，我就立即抓住时机，以军事进攻和群众奋起相结合，内外夹攻，主要针对五个最重要的目标：新山一机场、伪总参谋部、首都特区司令部、

警察总署和独立宫，解放整个B2地区。

3月31日，我同南方参谋部作战参谋阮文明中校及其他一些同志前往第7军区指挥所，向军区和第4军下达任务。行前，我电告有关干部于4月1日午夜前到齐。三月天气，阳光明媚，穿过A区的是一条土路，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我们的嘎斯车伪装得很巧妙，在一片片树林中疾驰。正当仲春时节，枝头上长出了嫩叶，春花遍地争妍。道路两旁，紫色的野花、黄色的梅花，同绿色的叶子掩映相衬。这也是战斗正酣的时节，西贡周围到处都响着延续不息的炸弹声和枪炮声。真是既美丽又壮观的景色，感人至深。想起从前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现在胜利的春天，我心情十分激动。越南到底还是越南哪。我赶忙在日记本上写道：

行军道上梅花开，
铁骑围城春风来。
古今依然我山河，
阮惠玉欣展雄才。

汽车日夜兼程。军区指挥所设在永安地区的同奈河畔。这里的森林也遭到炸弹炮弹和化学毒剂的摧残，只因大树很多，所以还残留着一簇簇浓荫。我抵达的时候，夜已经深了。这个地方是敌人难以想到的，暂时还相当安全。但是，实婆角和瓢树方向的大炮仍不断地在附近日夜轰鸣，时密时稀。来开会的同志们已经到齐。五渚，即区委书记阮如意同志，身材瘦小，但意志坚强。1944—1945年，曾同我一起被法国当局抓进卡迪纳警察所，一起被关进西贡大监狱。他见了我高兴地说：“形势真是振奋人心。我急着想早点回西贡看看，探望新定的穷村子。那里是咱俩一起设地下机关，一起被法国密探围捕的地方，经过美伪这个时期，不知有什么

变化……”区常委六忠、军区政委杨巨浸、军区司令黎文玉、副司令兼6师师长邓玉士等同志，个个喜形于色，神情激奋。第4军的同志，包括军长黄琴、副军长裴吉雨，341师即现1师师长珍同志等，下午就已经到了。夜深了，我们还坐在一起说个没完，忘了睡觉，忘了疲劳。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开会了。我讲了总形势和南方每个战场的形势，政治局和南方局的分析和看法，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具体指示。我还谈了经南方局批准的南方军委进攻西贡计划的要点，使大家掌握总的任务。最后，宣布南方司令部关于进攻春禄、消灭伪18师和骑3旅的决定，并下达了任务。

我们详细讨论了具体作战计划，发生有利和不利变化的可能性和必要的措施。同志们都说，现在敌人已经注意防守，打起来一定很激烈。如果我们在拿下定管以后，马上打春禄，而不北上打林同，一定会打个漂亮仗。我为先解放林同的决定进行了解释。我说：

我们如果只控制20号公路定管至方林这一段，那么从眼前和长远来看，从第4军到后方A区的通道是不稳固的。现在弹药已经困难，再打大仗，通道更需有保障。我控制了20号公路，不仅有了一条向前威慑边和、西贡的干道，并且从南面给大叻造成不小的困难。如果不立即扩大战果，敌人可能拼死反扑，卷土重来，在西贡地区和整个南部东区实现稳固的战略收缩。

春禄是西贡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据点，我同意这样的看法：敌人比以前加强了防守。但并不是说敌人以前疏于戒备，因为他在2月份就把整个18师和骑3旅调到这个方向来了。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打春禄看作是打敌人的要害，需

预计到敌人将竭力固守，大力增援，会有一场恶战。大家对战术和技术、增加炮弹供应及坦克的技术保障设备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会议进行中，我们收到了解放归仁、绥和的消息。这更促使大家纷纷请战争取立功。原定4月10日以后打响，使各方面作好更周密的准备。但是，形势发展太快了，大家一致同意把“N”日改为4月9日。

我还争取时间同区委和军区司令部的同志们讨论了隆庆、巴地、头顿、边和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及其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返回南方指挥部之前，我命令75部队（即南方炮兵司令部）在贝河和同奈河汇合处的孝廉立即构筑130毫米远程大炮的永久性阵地，有效地控制边和机场，支援第4军的进攻。长期以来，一直由113特工队用火箭炮和迫击炮袭击边和机场。现在条件好了，可以增设130炮阵地，看来这个机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南方75炮兵部队同边和机场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1964年12月，75部队只有57毫米无后座力炮和各种迫击炮，就同特工部队配合，第一次炮击边和机场，一串串炮弹击毁了许多美国飞机，包括刚从美国运到的20多架B57轰炸机。那次战斗是由炮兵指挥梁文儒同志、特工队长二茄同志，即陈公安大校负责的。美国空军头一回遭到痛击，使当时的美国驻西贡大使泰勒慌忙赶到机场，懊丧地望着那些断颈折腰的美国“神鹰”，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成了一堆堆废铁。十二年过去了，经历了无比酷烈战争成长的历程，是多么宝贵的十二年啊。在这个历程中，炮兵干部经受了锻炼，部队在发展，弟兄众多，欢快热闹，上级给配备了更多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十分有效地使用了缴获的大炮，既有无后座力炮、106.7毫米大炮，也有105，155毫米榴弹

炮。现在，已经有了威力强大的130毫米大炮，射程远，命中率高，它们在B2战场的历次战役中都立了战功。目前，在这决定性阶段中，它将承担使敌人的一个大机场陷于瘫痪的任务。75部队的负责人从最初的梁文儒同志，到陶山西、裴吉雨同志，以及后来的山肖、阮八同志，苏同志、来同志等战功卓著，都值得引以自豪。他们在建设部队，创造性地使用自己缴获的大炮，逐步壮大自己；或采取一切办法，在任何情况下进行协同作战或单独作战，攻坚战或野战，打机场空军或内河舰艇等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事情办完以后，我立即返回南方指挥部。当路过位于我A区根据地中心的朗朗机场时，我目睹了伪空军进行所谓投弹训练留下的罪恶痕迹。自巴黎协定签订以来，敌人连续不断地破坏这个机场。但是，跑道仍然完好无损，必要时，可供我小型飞机使用，这也说明了伪空军的无能。刚离开机场，汽车正涉过马沱河，来了两架敌机在上空盘旋。敌人发现了我们正在渡河的小小的车队。汽车很快地冲了过去，拐进树林。我躲在河边一个现成的掩体里，看着敌机向四周俯冲投弹。霎时间，我高射机枪清脆地响了起来，火网紧紧缠住敌机。一架敌机受伤冒烟，头也不回地溜走了。车队又安全地上了路。

回到家，已是4月4日凌晨1时。我得知文进勇同志一行头天下午已到达这里，住宿和办公地点都安排好了。我太高兴了，这么一来，总参谋长和总司令部整个前指（代号为A75团）已亲临前线。对这场直捣美伪最后巢穴的战略决战来说，真太及时了。像往常一样，不管什么时间，我一回来，我的秘书就送来了从战场、各单位和中央发来的急件、急电。我立即注意到黎笋同志4月1日的一份长电：

“3月31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军委关于三周来，特别是近期来我总进攻进展情况的报告。

“一、一致认为：继9联区和南部东区大捷，解放福隆省及西原战场取得巨大胜利后，我战略总进攻实际已经开始，并于短期内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

“二、我国革命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蓬勃地向前发展。为此，政治局决定进一步抓紧战略时机，以神速、大胆、突然、必胜为指导思想，下定决心在最短时间内，最好在4月份，发动总攻击、总奋起，不要迟延。目前，必胜和突然因素主要是争取时间，在敌人陷入慌乱衰败境地时，向敌发起进攻，各路大军更应时刻集中力量于主要目标。……”

“三、为及时实现按上述意向制定的战略方针，须立即制定以南部东区战场现有兵力采取大胆行动的计划。

“……中央军委主张把第3军及技术装备自B3战场迅速南调，并下令把总预备队的一个军调往南方。

“……为争取时间，不要坐等增援部队全部会齐，也应避免不合理的调动，以免延误行动时间。”

武元甲同志签署中央军委的一份长电中说：

“……当前，突然主要指的是时间。既应火速调动兵力，也须利用现有兵力及时行动，不要等兵力会齐后再行动。正是基于这一看法，政治局断定从现在起，西贡战略决战已经开始。

“……东线，以现有各师（不宜往返调动兵力浪费时间），并予必要补充，特别是技术装备，先歼伪18师，攻占春禄，尽速逼近边和机场……”

“最好以地方部队包围木化，该地南方主力和第8军区主力均立即集中南下，切断边沥、新安、美荻间的4号公

路……”

我躺在床上，脑子不停地思考着。30年来，有多少辗转难眠的长夜，但哪一个晚上都不一样。我默默地估算着西贡城内、外守敌和这次战役中我各路部队的兵力。我闭起眼睛，进军西贡路上的一条条道路、河流和田野，干涸的高地、低洼的沼泽都仿佛映现在我的眼前。打春禄，已经一致赞成。至于放弃木化，折向4号公路，技术装备如何运输？再设想一下我进攻时敌人将作何反应。西贡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复杂的大城市，是敌人的最后巢穴。敌人被围困得走投无路，势必顽抗到失去最后一线生机，才会投降或崩溃。西贡也是我们可爱的城市，众多的人民需要我们去保护，街道、建筑物、社会财富不能让敌人破坏。包括西贡在内的南部东区，大部分地势平坦干燥，辽阔宽广，公路交织，不同于孤立于高山的西原或狭长的中部沿海地区，易于分割，易于使敌人混乱和瓦解。在敌人正处于衰败的形势下，B2战场以自己现有力量，同群众奋起相配合，可以取得胜利，解放西贡，但还没有力量确保迅猛地结束战斗，确保西贡完好无损。

当我紧张思考，遇到难题而未找到答案时，常想到胡伯伯。我不觉默诵了胡伯伯的一首汉文诗《学弈棋》中的一段：

“眼光应大心应细，
坚决时时要进攻。
错路双车也没用，
逢时一卒可成功。”

对呀，我自勉道，我们力量少，但时机已到，逢时则一个卒子也能成功，应该乘敌人混乱之际不断地进攻。我独自

一人高兴地笑了，不觉合上了眼。一觉醒来，天刚刚亮，我马上去见文进勇同志。他也起床了。我们高兴地互相拥抱。

我问：

“你第一次到南部来，觉得怎么样？”

“说不尽的激动和高兴。”他回答说。

话题转到各战场的胜利，并谈了下一步的工作方法问题。

从他那里出来，我去看望了前指的同志们，同他们一一握手。黎玉贤、黎光武同志曾担任过南方司令部副参谋长，早就认识了。总司令部的炮兵司令尹岁同志是第二次来这里。还有各兵种司令、参谋、作战干部等许多同志第一次来B2战场。他乡遇故知，感到格外高兴。这一来，时机有了，队伍加强了，当主力部队全部集中的时候，显然已经胜利在握。真是千载难逢。

当天，我们立即安排南方司令部各机关和总司令部前指在一起工作。我交待B2战场参谋、政治、后勤各机关向前指的同志全面和具体地汇报战场情况，特别是西贡地区的情况，包括敌人重要目标的外形和作用，敌人防御力量和部署，各地区的地形地貌，以及我在西贡市内外的大、小兵力，南部和西贡人的心理、生活方式和活动能力，已制定的计划和当前态势等等。汇报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

4月7日下午，从河内直接前来B2战场的政治局代表黎德寿同志抵达位于禄宁以西的南方司令部驻地。后来这里成了解放西贡战役的主要指挥部。4月9日上午的会议上，南方局、南方军委和B2战场司令部的同志，南方各机关主要干部和总司令部前指的同志都到齐了，黎德寿同志传达了政治局

的最新决议。决议系统地分析和估计了21中全会以来整个战场的形势，每个战场的突出变化，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并决心在雨季开始前解放南方。黎德寿同志说：“形势变化极为迅速，时机无比有利，因此，我们的1975—1976年两年计划可以、并且必须在几个月内完成。政治局指示：‘当前，时间就是力量。必须神速、大胆、突然和必胜地行动起来’”。

接着，会议就工作方法和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作出了决定。

南方局、南方军委和司令部仍然负责原来的任务，即指导和指挥整个B2战场的总进攻和总奋起，特别是具体指导西贡群众的奋起斗争。

进攻西贡的战役，后来，政治局根据共同的愿望，命名为“胡志明战役”，由文进勇同志任司令。南方司令部仍负责自己的B2战场，有两三位同志参加解放西贡战役指挥部，如范雄同志任政委，我和黎德英同志任副司令。

南方司令部各机关，如参谋、政治、后勤等，要承担两种职责：第一，仍协助南方司令部指挥整个B2战场；第二，同前指的干部和机构合在一起，成为胡志明战役指挥部的工作机关。南方参谋部要事先挑选熟悉情况和地形，熟悉地方，并在B2战场指挥主力部队多年，有战斗经验的同志，直接帮助初来乍到就要参加战役的总司令部的各军。这些部队处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队伍刚刚到达，有时还没到齐，就得马上拉开队伍投入战斗。总后勤局主任丁德善同志是和文进勇同志一起来的。他直接来到南方后勤局，和同志们打成一片，为保障战役各方面的技术物资供应一起操劳。

南方局副书记阮文灵同志专门负责群众的奋起斗争，尤其是西贡市的奋起斗争工作。南方局常委武文杰同志则指导

接管西贡各单位和负责市军事管制的计划和组织工作。黎德寿同志以政治局代表身分，过问南方局和战役指挥部的一切工作。

著名的禄宁森林，现在更具有历史意义了。这里，整日整夜都热闹繁忙。在残存的树木和巧妙的伪装网下，干部、战士、机器脚踏车，在一座座房子和帐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夜幕下，经过细心遮盖的灯光照亮了一张张笑脸，一幅幅隐藏着无数机密的地图，一台台各式新旧机械设备……这一切，都给这座南方指挥所和战役指挥部所在的神圣的森林，增添了既玄妙又现代、既紧张又严肃的色彩。架在树上的一根根电话线，朝各个方向伸展。天上是四通八达的看不见的无线电密码信号。南方通讯部队负责人阮春陶同志，对长期缺乏机器设备，缺乏各种电缆和电线的状况常常唉声叹气，但他一向为自己手下的干部战士感到自豪。他们在B2战场的历次战役中，一贯勇敢地、千方百计地保证南方司令部对所属军区和部队的指挥畅通无阻。目前，在工作量增加一、两倍的情况下，得到总司令部通讯部门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帮助，使他十分满意和高兴。

会议根据政治局决议和指示，同样认为形势还在迅速发展。应该预见到在一定的時候，敌人的最后巢穴西贡，可能发生突变。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掌握主动，我们必须作好计划，在时机到来时，不等总司令部的各军赶到，就以现有力量立即采取行动。如不发生突变，则将等我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对敌军具有压倒优势时，给予迅雷不及掩耳和有胜利把握的打击，消灭敌人持久的顽抗，避免一切损失和破坏，使我国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确保安全。我们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以B2战场现有力量进攻西贡的方案，为会议一致通过。该

方案已经南方局批准，现正付诸实施。

在B2战场按照上述计划开始对敌军实施战略分割和包围西贡的同时，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果断地把可能集结的全部力量，集中到即将展开最后战略决战的西贡战场。各部队指战员遵照上级的紧急命令，怀着火热的激情，大踏步地向南挺进，以便赶上“民族解放的盛会”。来自红河平原、第4军区的各军各师，乘坐机动车辆，日夜兼程地行进在长山公路上。第5军区和总部的主力部队以及五联区军民从各仓库搜集起来支援前线的技术军械和弹药沿着中部海岸向南调运。他们在中央军委委派的黎仲迅、黎光和、黄明章、南龙等同志的指挥下，一面歼灭敌人，一面急行军，增援东线进逼西贡。在他们的后面是从河内、西北、越北和社会主义北方各省调来的增援部队。他们时刻准备着为越南民族攀登辉煌的顶峰前赴后继。与此同时，B2战场各省，特别是在湄公河平原，青年们踊跃参军，加入游击队，组成新的部队，把力量聚集起来和同胞们一起参加进攻和奋起斗争，解放自己的家乡。在西贡，一个团扩编成嘉定1和嘉定2两个团，在第8区和第9区各省如槟榔、茶荣、芹直，几乎每县都有了营的建制，有的省有五、六个营。成千上万的青年补充到军区的主力部队。人民群众斗志昂扬。全国都在进军，全国都在战斗，全国都在奋起！这是何等雄伟壮观的场面！啊，这就是我们神圣的祖国，英雄的民族！

这时，敌人由于遭到惨败而惊慌失措。伪第1、第2军基本上被消灭或击溃。但是敌人仍很顽固，慌忙纠集力量，重新部署防守第3和第4战术区。阮文绍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丢了这头保那头”的新战略，也就是按照戈文提出的计划，放弃第1、第2军防区中尚未失守的地方，撤回部队保卫第

3和第4军区的地盘。过去阮文绍曾把这个计划骂得一无是处，今天，他却把它看成是拯救其摇摇欲坠宝座的救命稻草抓住不放了。可悲的是，已经太晚了！至于美国人，事到如今仍很主观。其代表人物就是美国驻西贡大使马丁。“尽管有一些完全相反的消息，马丁在答复（美国）参院质询时却说，南越部队有秩序地撤离西原。而当美国国务院越南司副司长对他的乐观表示不以为然时，马丁许诺说，一年之内他将邀请副司长夫妇到邦美蜀游览观光。马丁还对自己的下属弗朗西斯表现出一付不耐烦的样子。在看完了弗朗西斯从岷港发来的语气悲观的电报以后，他竟狠心地评论说：肯定是弗朗西斯的甲状腺又在折磨他了！马丁如此自信，不是不了解事实。他经常不厌其烦地告诫在华盛顿持悲观态度的人们说，他认为丧失了南越北半部只不过是减轻了负担。因为从经济上看，从那儿得不到多少好处，而只能是徒然耗费政府的财源。剩下来的这一部份则富足得多，集中在一起，就可以更有效地保卫它。”^①就连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分析家们也持以下观点：“虽然承认丢失第1和第2军区的大部份是无可挽回的了，他们仍然认为在国内其他地方的政府军还足够强大，至少也可以守住西贡以北的防线，直到5月雨季开始。在那之后，北越的进攻必将由于气候的原因遇到困难，而政府方面则赢得了时间，重新休整和集合力量，并且可能在一个较强的态势上重开谈判。”^②

3月25日上午，福特总统、基辛格、马丁和陆军参谋长、原驻印度支那美军总司令韦安德等在白宫举行高级会议，讨论越南战场局势和研究对策。会议面对一些相互矛盾的情报

①② 引自《恰当的时机》。——原书注

束手无策，不得不派遣韦安德将军去西贡，亲自对当地形势作出判断，并为阮文绍进行有效的反抗出谋划策。

28日，韦安德和马丁率领一个重要代表团一起抵达西贡，并立即开始工作。“一踏上西贡的土地，韦安德就将其全部精力集中在几个基本目标上。除了对形势进行调查外，他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建立一项新的拯救越南人的战略上。这项计划的关键是改变阮文绍政权本身的结构：‘丢了这头保那头’。按照这个观点，阮文绍本来希望在西贡外围建立起一道西起西宁，东至芽庄的防线。现在在共党已深入第2军区南部的形势下，显然要作几点调整补充。韦安德有倾向性地提议建立一道以春禄为中心基地，西起西宁东至藩朗的新防线。由于阮文绍提不出什么方案，就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① 韦安德向阮文绍强调：“一定要守住春禄，丢掉春禄就是丢掉西贡！”

“这样，为了实施新的防御计划，第一步，阮文绍委派阮文全将军（第3军指挥）驻守藩朗，阮文全将军又指派其老朋友阮永宜（原第4军区指挥，1972年秋因贪污罪被解职）率机械化师之一部在那里建立了野战行营。他还在第3军区东部部署了一个装甲旅和几个别动队，以加强驻在重镇春禄的南越军队的一个师。”^②

虽然作了周密的部署，表面看来似乎想坚守到底，然而阮文绍和美国人的内心深处都不相信能守得住。

证据是，4月2日和3日，阮文绍就把他从我国人民身上

① 摘自弗兰克·斯内帕所著《恰当的时机》一书第三部分“崩溃”。

——原书注

② 摘自弗兰克·斯内帕所著《恰当的时机》一书。——原书注

搜刮到的珍贵财产偷偷运往台湾和加拿大，以备他不得不逃往国外后，能过上帝王般的生活。美国也正在为撤离越南后的报复计划预作准备。“韦安德的代表团抵达以后，约翰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贡组织的头目）已获准挑选一些‘留下来的人’，并在曼谷成立越南难民组织，把它作为向越南派遣间谍从事长期潜伏活动的跳板。从一般概念上来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许多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同东欧的一些流亡组织就是这么办的。”^①

按照新的防御计划，除了西贡西北古芝的伪第25师、西贡以北莱溪的第5师、以及在西贡以东的第18师、第3骑兵旅、两个海军陆战旅和一个伞兵旅之外，他们紧急补充重建了第22师，部署在西贡以西的隆安，以便同驻守在湄公河平原的第7、9、21师互相呼应。在西贡郊区，他们还驻有一个伞兵旅、三个别动队联团和一些保安联团。他们把市区划分为三个联区，由遍布西贡各郡、坊的野战警察和民事防卫队防守。

为了让韦安德的代表团此行更有意义，别有风趣，4月1日我们解放了归仁、绥和。4月3日占领了金兰、芽庄；从北面进逼西贡，占领了13号公路上的真城。4月4日解放大叻市。另一个突出事件是，韦安德的代表团4月4日上午飞返美国向白宫汇报完成任务，4月8日晨阮文绍的独立宫遭到飞机轰炸。这是空军中尉阮成忠驾驶的F-5E飞机。他从边和机场起飞，将两枚炸弹准确地投中了伪总统府，预告了傀儡政权垮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阮成忠是一位爱国青年，是槟榔省一个同志的儿子，是组织上派到伪军空军中工作的。

^① 摘自弗兰克·斯内帕所著《恰当的时机》一书。——原书注

这时候，我们十分需要阮成忠训练和指导我们的飞行员使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各种飞机和炸弹，作好必要的准备。阮成忠完成了长期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光荣任务，已凯旋归来。福隆省的福平机场已作好准备，指挥伪军最新式的F-5E飞机安全着陆。阮成忠立了功，得到了应得的奖励。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斗争的年代里，成千上万的解放军战士活跃在祖国各地，阮成忠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第七章 决定性的战略决战：具有历史意义的胡志明战役

四月初以来，西贡政治舞台活动紧张炽热，人民要求阮文绍下台，按照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要求实现和平。韦安德和马丁则想保住阮文绍，避免出现政治动乱，把政府扩大为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多种成分政府，以便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妄图挽救“越南共和国”的彻底失败。尽管明知毫无意义，南越的所谓“参议院”还是作出决议，要求更换领导以“拯救国家”！陈善谦讨好美国，唯美国之命是从。阮高其则拉拢高文园、驻春禄的伪18师师长黎明岛和其他一些人准备发动政变。众所周知，西贡的一切，从军事计划到屠杀越南人的“凤凰计划”，从对内对外政策直至走狗之间的争斗，都是由美国主子决定的。因此，阮高其必须征得美国的同意，但中央情报局在西贡的头子鲍尔格严禁他搞政变。这么一来，草包英雄阮高其将军只好呆在新山一机场的私人寓所，伺机逃跑。当然，阮文绍因为有美国人撑腰，还稳稳地坐在宝座上。他认为陈善谦是阮高其的同伙，连忙解除了他的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而把自己的爪牙阮伯勤抬出来主持所谓改组后的政府：“民族战斗团结政府”，同时任命陈文敦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的末日已经临近，然而这些权迷心窍的家伙仍然死保住自己的高官荣位，而那些投机分子则拼命逢迎拍马，或互相

倾轧，向上爬，但是他们嘴上却恬不知耻地高喊什么“国家”、“民族”。

此时马丁已经看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进行谈判。这样，幸许能挽回局势，争取时间把滞留在西贡的上万名美国人和他们的得力走狗解救出来。

在美国大使马丁、中央情报局驻西贡的头子鲍尔格同一些外交家、政治家，绞尽脑汁设法寻求这样一次热切期待的谈判时，在戴维营的双边联合军事委员会我方代表团突然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不时有西贡的人物来要求同我们接触，探询军事形势、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和进行对话的可能与条件，以期避免对西贡的直接进攻。道理也很容易理解。在西贡这个每天都担惊害怕的“首都”里，只有我们代表团镇定自信，成了真正的主人，比任何人都明了实际的军事局势，明确了解革命政府的态度。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和代表团一直保持着联系，并根据政治局的统一指挥，迅速地答复了代表团发来的电报，引导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同外交气氛和战场变化相协调。

美军大鹏行动

也就在这些日子里，白宫极度焦虑不安，“在韦安德去西贡的几天里，白宫对印度支那的危险局势不敢发表任何直接的评论。但是到了4月3日，当西贡周围发生激战时，福特总统就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向报界发表声明，对阮文绍急急忙忙从西原撤退表示不满，还说正在考虑撤出在越南的六千名美国人。谈到这个最微妙的问题时，他按自己对战争权限法的理解，明确地说他有权使用武力协助美国人撤离世

界上任何一个发生战事的地区。”

“福特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非偶然。因为除了西贡周围的紧张局势外，当局还要对付即将降临在柬埔寨的灾难。在过去的几天中，金边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白宫最后决定将驻在那里的美军全部撤走。”^①

4月12日，美国驻金边大使迪安卷起美国国旗，乘上飞机，在马丁之前就溜走了。早在4月初，柬埔寨伪政权的头目朗诺已假借出访之名，逃往美国。4月17日，英雄的高棉人民革命力量解放了柬埔寨全部国土。这是长期以来唇齿相依的两个战场间一场绝妙的协同作战！它体现了印度支那三国互为依存和不断壮大的战略态势。它象雄伟的长山和湄公河，坚如磐石，不可动摇。

美国人实施“大鹏撤退行动”，乘直升飞机逃离金边的同时，在西贡的撤退速度也日益加快。“到4月7日，在新山一机场起降的美国运输机数量骤增，每天约有一打C141运输机来来往往，数量较少的C130飞机则夜间降落接运物资。

从一开始，在克拉克空军基地与越南之间进行穿梭飞行的运输机，主要是为撤退美国武官处人员及其家属服务的。

使馆不太重要的人员则乘商业飞机离开这里，以加速撤退。4月7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同泛美航空公司联系，要求该公司增加到西贡的航班。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要为去印度支那的班机增加保险费，所以泛美航空公司的官员没有同意增加班次，但同意专为西贡的大撤退，在他们的747飞机上增加一些座位。”^②

^{①②} 引自弗兰克·斯内帕的《恰当的时机》。

在华盛顿，当局的头面人物正在为向阮文绍提供七亿二千二百万美元紧急援助一事争论不休。他们把这笔援款当作一付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国务卿基辛格一派想提供最大限额的援助，而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一派则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南越已经失陷了。

对西贡战略包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按既定计划实施对西贡的战略包围。“N”日即4月9日，切断西贡以西4号公路、进攻对西贡和第3战术区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头号关键据点春禄的战斗打响了。

西线，原计划预定用232兵团攻占木化市，然后沿12号公路，以一个合成兵种部队进占自丐礼至新协一段的4号公路，会同第8军区第8师消灭伪第7、第9师。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南方司令部担心我方力量不足，如果敌人集中力量固守，则会被较长时间地阻滞在木化，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改变计划。第5师在牵制柬埔寨边界敌人的同时，即携带火炮，急速穿越沼泽河网地带，到新安一边沥地区切断4号公路。4月9日，第5师进攻守承镇和新安市未果，因伪第7师、22师早有防备，在坚固的工事里进行殊死抵抗，而我5师只有步兵，支援火力也太弱。232兵团指挥部命令该师转而歼灭反扑之敌，扫清4号公路以北碉堡系统，开辟控制4号公路的前哨阵地，并在必要时封锁该路。后来的几天，第5师重创了伪7师的一个步兵团和一个装甲团，攻下了大小80个碉堡，解放了4号公路北侧、万古西河及波波运河沿岸的大片地区，直接威胁4号公路。第8军区的部队随时可以控制美萩省新协到丐

般的4号公路，第9军区部队进攻了永隆省丐温到巴岗的4号公路。

东线，4月9日夜和10日凌晨，第4军的7师和1师（原341师）以及第7军区不满员的第6师进攻隆庆省省会春禄。部队勇猛的进攻，在许多地方突破了春禄的防线，迅速向市中心发展。4月10日7时40分，我们把红旗插上了省长官邸的屋顶，并占领了诸如警察局、美国顾问生活区、中央情报局机关驻地、别动队驻地和火车站等重要地点。还守在军事小区的敌人赶忙调集伪18师的两个团以及保安团、别动团和装甲团的残部死守和连续反击。就在10日，敌人用直升飞机将一个伞兵旅空降在春禄市郊，紧急支援伪18师，为他们打气。至4月15日，他们已向该地增调了两个海军陆战旅、一个别动联团，第5师的一个团，8个炮兵营和2个装甲坦克团。在战斗的头几天，他们已经在这里使用了主力的50%，炮兵的60%，第3军的几乎全部装甲车和相当于一个总预备队的伞兵和海军陆战队。他们还使用空军的密集炮火直接支援他们的陆军和装甲部队进行反击，同时对被我攻占的地方进行轰炸，并袭击我部队运输队和后方。他们使用了两种最有威力的炸弹：气浪弹和窒息弹，这两种炸弹是用来摧毁森林开辟直升飞机起降场和进行大规模杀伤的。这两种武器美军已在越南使用多年，当他们根据巴黎协定的规定撤回国前，悄悄地给伪空军留下了包括上述炸弹在内的各种武器。这是自1973年以来伪军飞机第一次使用这种炸弹。可以说，伪军为了守住春禄，使用了一切手段和可能集中的全部力量。也许他们对他们的主子韦安德在制定最后防御计划时强调的“丢掉春禄，就是丢掉西贡”这句话感到十分害怕。伪军不仅竭尽全力死守春禄这个最后战略防御线上的中心要地，而且还期望

着在这艰难的时刻，能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取得重大的胜利。在此期间，伪方和国外的报界大肆吹嘘伪军的战斗力已经得到恢复，伪军还不至于发生什么大变化，还有足够的力量保住政权等等。美国合众国际社4月12日认为已胜券在握，急急忙忙地说，伪军选择春禄“作为检验南越军队战斗能力的试验场”。这也许有些道理，春禄之战的结局将决定伪军、伪政权的命运。此刻阮文绍十分需要能有这么一次胜利，来唤起美国的信任并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大力帮助他重建伪军，稳住军官和士兵的情绪，而主要的是保住摇摇欲坠的阮文绍政权。美国则希望伪政权能支撑一段时间，以便在可能举行的谈判中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南方指挥部，我们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9日、10日收到的电报令人振奋。各路部队进展顺利，攻克了许多目标。但10日晚以后，局势变得紧张起来。敌人虽遭重创，但仍在疯狂反扑。敌人的飞机对它们弃守的目标进行毁灭性的袭击。军里已经在叫嚷缺乏各种弹药，尤其是第1师、第6师。由于在20号公路连续作战，第7师减员较多。接着又有报告说我方正被迫陆续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有的地方已数度易手。第1师由于缺乏打硬仗的经验，伤亡人数高于其它单位。形势是严峻的。

范雄、文进勇和黎德寿等同志看到敌方正集中更多的部队，而我方受阻，不能迅速地占领目标，甚至被打退，他们都很担心。残酷的战斗使我们的部队伤亡过重，在这样的时刻是很不利的。因此，他们建议可以让部队撤离城区，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消灭郊区的敌人。我提议让我到第一线去，实地掌握具体情况并和同志们研究战胜敌人的办法。他们都同意了。

就这样，4月11日下午我直奔第4军指挥部。我们的车在达莱渡口过了同奈河，并在方林插上20号公路。军指挥部设在拉芽河边。九年抗法战争中的拉芽大捷曾使这个地名载入史册。那次战役是由黄文艺和裴吉雨两位同志指挥的。如今裴吉雨同志是第4军的副军长。当我在拉芽河边见到裴吉雨同志时，我高兴地鼓励他说，加把劲，再来一个拉芽大捷。实际上，我坚信是能够做到的。

我们听取有关战局进展的详细报告之后，又到几个方向进行了实地观察，分析了敌人空军和炮兵的活动，重新估量了敌军的情况，并确切地掌握了我方的实力。4月13日，我们进行讨论，作出了新的决定。这回部队得到了加强：刚从北方调来了95B团，一个坦克连，一些火炮和高射炮；同时紧急补充了兵员和弹药，因此战斗力较强。目前敌人正在拼命反击，力图夺回丢失的阵地，妄想全部收回春禄市。敌人炮火异常密集，空军活动频繁。

军参谋长黄义庆同志简要地分析了形势以后建议：放弃隆庆，我全部力量迂回围歼壮奔守敌，尔后一举攻占边和。

军长黄琴有不同意见：认为应该先消灭油惹和市山三岔路口的伪52团，然后攻占春禄，打边和须同各路部队协同作战。

许多同志赞成黄琴同志的意见，只在力量的使用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听取了所有的意见后，作了几点分析和明确的结论：

春禄是敌人防御线上异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他们集中了大量部队固守。目前敌人的力量同我们相比是占优势的。我们已不再握有出奇制胜的因素，因此，继续进攻春禄对我不利。

我们有可能夺取直到宿征的20号公路，因为从宿征到油葱三岔路口（20号公路和1号公路交会处）一段的敌军较弱。我们要充分利用20号公路这一有利形势和油葱周围地区敌人的这一防御上的薄弱环节。

如果我们占领了油葱三岔路口并立即守住（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此处敌人较弱并已遭到突袭），那么春禄自然就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关键据点的作用，因为它已暴露在防线以外，边和将随之面临威胁。

一旦我方占据油葱，春禄守敌被切断了同后方的联系和遭到包围孤立，将会狼狈不堪，出现一片混乱。第3军会因为大量部队被卡在防线以外，防线内力量空虚而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可能采取两种对策：一是集中力量从春禄和壮奔两个方向进攻油葱；二是逃离春禄撤往巴地、边和。为此，我们对春禄守敌不可疏忽大意，必须严加封锁，并在他们还击或慌忙逃窜时予以歼灭。

根据以上分析，决定：

首先以一个师的兵力消灭驻守油葱和该地制高点市山的敌52团，而后解放并据守油葱三岔路口一带，这一位置对我们和对敌人同样重要。同时，阻击并歼灭从壮奔出来反扑之敌。

军的主力主要在春禄和油葱三岔路口之间牵制并逐步消灭驻守春禄之敌，以支持油葱据点。

派一支部队在2号公路设伏，随时准备封锁该路，消灭从这条唯一出路逃往巴地的敌军。

合理部署防空力量，提高对空作战效果，同时由孝廉炮兵阵地和113团一起，有效地控制边和机场。敌人的飞机就是在这里装上杀伤力强大的炸弹，起飞轰炸我方的。

同志们都一致赞同这一作战方案，并按照军部的具体部署紧张地落实各项准备工作。

我即会同军部和第7军区共同研究解决春禄战斗后的作战方向问题：即统一命令下达后，从东线进攻西贡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还没有考虑到正沿中部海岸南下由黎仲迅同志指挥的部队。我们仍按仅以B2战场本身的力量进攻西贡的计划考虑问题。

我作了详尽的分析：边和市既有边和机场，又有伪第3军指挥部，建筑物多，且工事复杂。敌人将在这里竭力反抗和阻止我们向西贡挺进。如春禄失守，边和就成了这一方向上最重要的据点。我们攻打这里，就是攻打敌人阻击线上最难啃的地方，于我不利，且进展缓慢。敌人较弱和出敌不意的方向是隆平仓库两侧至与边和公路会合处的15号公路，沿宽阔的西贡——边和公路可迅速攻占主要目标独立宫。我沿此方向进攻，以坦克为先导的我机械化部队将迅速挺进。一俟我在仁泽设立了130毫米大炮阵地，将得到有力的支援，那时派一支部队拖住边和守敌，待以后再消灭他们。

大家一致同意以上的分析。接着，我和同志们讨论了计划并决定：7军区的第6师熟悉当地情况，配备火炮和坦克，秘密行军，出其不意地解放15号公路的一段，越过环绕仁泽盆地的19号省级公路，迅速解放仁泽，并在该地设置130毫米大炮阵地。该阵地在向西贡发起总攻击以前，以炮火控制新山一机场，各路部队攻入西贡市区后，就停止向市内射击，转而有力地支援东线部队。与此相配合，派特工10团封锁龙头河，切断一切往来，并派一支部队渡过同奈河，配合地方部队解放西贡第9郡。

第1师负责牵制和歼灭边和守敌，确保军的右翼。

军的主力第7师以95B团为后备力量，绕过边和到15号公路，然后沿边和至西贡的公路直接攻入西贡，占领该军的主要目标独立宫。

军部的同志们都赞成这一方案，大家精神振奋，深信必胜。第7军区司令黎文玉同志和副司令兼6师师长邓玉士同志积极承担了任务：消灭第52团，占领并扼守油葱三岔路口，而后占领仁泽，设置重要的130毫米炮阵地，控制新山一机场，并支援全军进攻西贡。

我们怀着必胜的信念分手了。当同志们各自为这场意义重大的战役紧张工作的时候，我和有关同志急忙返回驻地。这时，大量伪军正开进春禄，妄图打出一个“闻名世界”的春禄大捷，但他们万没料到就要变成“瓮中之鳖”了。

四月中旬的那几天，我们大家都以焦急的心情密切注视着参加胡志明战役的第3军、第1军和各兵种部队的进军情况。一个个干部工作团被派往各线指导工作。各单位的行军路线、出发日期都不相同。第1军从红河边出发。第3军有的师从西原来，有的师从沿海进入第11号公路，经大叻再沿20号公路过来。第2军和5军区的第3师则沿着海岸一面作战，一面前进。有的部队到了，弹药还没运到。有的坦克开到目的地，汽油用完了，炮弹只剩一、二发，需要补充整顿。参谋部门和后勤部门的干部埋头苦干，每个人都不分昼夜，以数倍于平日的效率工作着。大家精神振奋，力量倍增，工作进展迅速、有条不紊。

除了沿着海岸进军的部队外，各军都派出由军长率领的干部先遣团先期到达战役指挥部接受任务。他们要事先研究部队集结地点和发起攻击的前沿阵地，以及要消灭的敌人，了解部队的进军路线、地形和夺取的主要目标；然后再安排

各个部队、各兵种和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协同作战，等等……由童文贡同志指挥的南方司令部的参谋和黎玉贤同志指挥的总参前指，就作战计划的一切细节交换了意见，详尽地回答了各先遣团提出的所有问题。陈文名同志负责组织各军、各路部队同特工、别动队之间的配合，给深入穿插的各军、各师配备特工别动队干部和队伍，负责指引进攻路线和进攻目标。大家全力以赴，为了夺取胜利，把自己所有的才智贡献出来。

由于形势的需要，各军已陆续进入阵地，有黎德寿同志参加的南方局和战役指挥部决定，应该等到各军全部到齐，我方力量占有绝对优势，才向美伪的最后巢穴发动必胜、迅猛的进攻，把城市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政治局同意了这一决定。

我们以南方局批准和文进勇、黎德寿同志审阅的B2战场司令部制定的依靠本身力量进攻西贡的计划为依据，对本次战役计划作了进一步调整。在作这种调整时，我们还考虑到以下因素：各路部队已部署完毕，须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调动浪费时间；B2战场部队熟悉战场情况，应由他们承担地形复杂、困难较多的作战任务；经长途行军调来的部队应摆在就近的方向，使他们有时间部署部队。调整后的计划对各部队作了如下分工：

西北方向，由第3军承担，从古芝、边葛出发，进攻伪25师，主要沿1号公路推进，攻占主要目标新山一机场。原先预定由第9师、16团和271B团负责攻打这一方向，现改派他们去加强232兵团。

232兵团仍按原计划在西线作战，以10号公路为主，攻占目标是首都特区。271B团转移到南线进攻。

南线还是88团和24团，现增调271B团来加强。该线由第8军区负责。军区指定三胜即武文盛少将为指挥部司令，四申即黄文敏少将为副司令，第8区区委常委九品同志任政委。还从隆安调来省武装部队指挥四炤同志任一路部队的副指挥。这一线的主要公路是通往芹约的5号公路，主要攻击目标是伪警察总署。

南方司令部副司令兼战役指挥部副指挥黎德英同志和南方司令部副政委黎文想同志被指派统一指挥西、南两线部队。

北线由第1军负责，进攻伪第5师，并沿13号公路攻占伪军总参谋部，其中嘉定团负责这方向的外围。

东线原来只有第4军，现在增加了不满员的第2军和第5军区的第3师。战役指挥部副指挥黎仲迅直接指挥这两个军并具体指挥该线作战。

这样，所有五个方向上的步兵及其他兵种都大大加强了，只有工兵缺乏兵员和装备，特别是舟桥设备。东、西、南线由于部队多、情况复杂，加强了指挥。

战役前指设在真城西南、边葛以北的万丹，南方参谋部为第3军准备的驻地后面。

4月18日，政治局代表黎德寿同志和战役指挥部一起，最后一次审查了战役的决策。在座的人对正确贯彻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提出的“神速、勇敢、突然、必胜”的决策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仅以主力相比，在数量上我占有三倍于敌的优势，质量上则胜敌数倍。我们一方面要部署部队，消灭外圍守敌，同时又要派遣强大的力量迅猛穿插，攻取城内主要目标。要把外线迅猛的进攻同城内的进攻和奋起紧密结合起来，使敌人来不及还手，来不及破坏。部队同奋起的群众革

命力量相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全城的一切目标和街区。这就是神速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决策规定五个方向的部队要密切协同作战，必须在同一时刻攻占各自的主要目标，但以独立宫为最后的中心目标。不论哪路部队攻占自己的主要目标后，都应立即向独立宫挺进。如我方部队尚未占领，即去攻占，并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屋顶；若已占领，则马上返回自己的防区。

“N”日，即进攻西贡的日期主要取决于第3军和第1军的大部份是否已到达指定地点。在07号电报中，黎笋同志曾指示说：“我已同武元甲同志商量过，认为仍需几天的准备，一俟第3军和第1军（包括步兵和技术兵种）到达预定地点，即可开始总攻，不要马上动手。”根据这一指示，我们一方面每日每时地注视着各军所属各部队的进军情况，尤其是行军路程最远的第1军；另一方面，我们派出一批批参谋、后勤干部到部队集结地点，帮助各军统计实力，整顿组织，补充弹药和其它后勤物资。南方司令部的工兵部队要在新渊西北的葫芦渡，为第1军抢渡贝河准备好漫水桥，并保证第3军渡过已塌陷的衙碧桥和西贡河。人再快也赶不上时间。总的形势在催促我们，上级也在催促我们。4月22日，黎笋同志来电指示：

“向西贡发动进攻的军事和政治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必须争取时间，从各个方向及时、毫不迟缓地向敌人发起进攻。稍有迟缓，在政治、军事上都是不利的。目前，及时采取行动是夺取彻底胜利最可靠的保证。

“你们立即指示各路部队马上行动，在行动中要注意把军事进攻和群众奋起相结合，注意各个方向的协同作战及进攻和奋起之间的配合。

“把握重大时机，我们必将赢得彻底胜利！”

这一时机就是春禄的全部敌军已被消灭、击溃或逃跑，阮文绍被迫辞去了伪总统职务。

4月13日夜和14日凌晨，按照第4军的新决定，第6师全歼了伪18师52团的一个营和一个装甲支团，解放了油惹三岔路口。第二天占领了20号公路上最后几个据点：市山、宿征和俭新，全歼52团。接着，6师就在这一重要地区布置兵力，坚守阵地，并消灭了从壮奔出来连续进行反扑的敌人。第4军7师和1师也陆续消灭了驻在春禄的48团、伞兵旅和装甲旅。

由于不能夺回油惹三岔路口，又完全丢掉了20号公路，边和便成了没有多少部队防守的前沿阵地。4月18日，伪第3军不得不用直升飞机从春禄调一些部队到边和一壮奔来加强新的防线。4月20日，春禄残敌弃城逃走，沿2号公路经巴地到边和。由于巴地军事指挥部下属部队封锁2号公路疏于防范，未能从一开始就进行堵截，我们仅消灭了一部分逃窜之敌。

弗兰克·斯内帕在书中写道：

“21日凌晨，政府在春禄的最后防线崩溃了。越南共和国军第18师残存的四个营及该师师长岛将军乘直升飞机逃离了已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

伪总统易人

21日中午，阮文绍把原总理陈善谦和副总统陈文香召到自己的办公室，沮丧地告诉他们，他要辞职。阮文绍说：“因为军事形势已象他所描述的‘绝望了’（陈善谦和陈文

香都同意这一说法)，他再继续留任已毫无意义，而只能妨碍寻求一项解决办法。”①

当天傍晚，阮文绍宣布辞职，并把权力移交给副总统陈文香。“患风湿病、视力极差、71岁的陈文香在就职典礼上许诺要坚守岗位，直到‘士兵全部阵亡或国土沦丧’。”

美国大使馆的越南通们对这一强硬的声明报以嘲笑。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为了堵住阮高共和右派的嘴，不让他们插手……”②

“几个月之后，他（阮文绍）对在台湾的一个朋友说：‘是的，我选择的时间是正确的。我一直坚持着，直到这个病人无可挽救为止。在为自己的国家所作的贡献方面，相信没有谁能够超过我。’”③

真是十足的伪总统的口气和逻辑。

在第3军和第1军抵达以前，我们抓紧协调从南线进攻西贡的第8军区各部队。如上所述，这个方向最艰苦，特别是地形十分复杂，距我方根据地又远，徒步行军要经过敌人长期控制的地区。为了到达西贡外围，有些地段须夜间秘密行军，有的地段须拔除敌人的碉堡，歼灭反击的敌人。路线长，又穿越许多居民稠密区，而且有的地方伪军家属很多，革命基本群众很少，群众觉悟也低。路上又要作战又要行军。既要善于动员群众，又要会做兵运工作。稍有疏忽就可能使部队调动失灵，更不用说参加对西贡的进攻了。如果估算时间不准确，或部署战斗不是十拿九稳，都可能使计划破

①②③ 摘自弗兰克·斯内帕的《恰当的时机》。——原书注

产，赶不上进攻的日期。而如果行动过早，又会暴露总的意图，危及整个战役。

经过周密斟酌之后，4月上旬我们就下令让军区派出这一路的部队了。军区早在2月份就接受了任务，在组织、指挥、兵员和计划方面都作好了准备，但仍严守机密，直至接到上级命令。

日记摘抄

我征得了该部队司令武文盛少将的作战助理兼秘书陈咸宁同志的同意，将陈的日记抄录了几段。

几页简短的日记，尽管描绘得并不充分，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生动地了解胡志明战役中一支较小的部队是如何组织进攻和付诸实施的。说它小，是因为在南面这个方向上我们被迫使用小于其它方向的兵力：主要是三个团和两个装备轻武器的步兵营，没有隆隆前进的坦克、装甲车，也没有大口径火炮和高射炮。说上述部队是该线的主要兵力，是因为投入这次战役的还有许多其它单位和组织，也包括不参加战斗，又为胜利提供了巨大支援的人民群众。这个方向的部队为了开辟进军道路，拔除了敌人45个据点，解放12个乡，消灭了西贡外围守敌，插入城市中心，按预定时间占领了五个主要目标中的一个，同各路部队通力协作，以神奇的速度打垮了敌军。这一路部队攻取和占领的主要目标是伪警察首脑机关。它是城市的最后防御力量，也是防范和扑灭人民奋起的武装力量。而人民奋起是总进攻和总奋起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咸宁同志的日记写道：

1975年4月6日

23时30分，大家都已经睡了，不知为什么我翻来复去总睡不着。屋外有手电照进来。我坐起来，打开灯。机要处的通讯员来了。这时已是深夜12时。

“什么电报这么急？”

“ZN电。”通讯员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打开信封，抽出电报，很快地看了一遍。代号真多。电报末尾是七鸿（即范雄）、四阮（即陈文茶）的签字。仅这些就足以使人懂得这封电报的重要了。

我把灯移到角落里，免得灯光照到外面去。我译出了代号。

“又有大变动了。”

我打着手电走到二发同志（作战处长）睡觉的地方，轻轻地将他摇醒。

“电报命令我们改变任务。”

这句话使他猛然坐起，钻出蚊帐。他将电报来回看了几遍，急忙拿上手电走进指挥部。这时是凌晨1时。

1975年4月9日

又要离开可爱的“7·20”区（属美荻省的丐舫、丐礼两县，位于4号公路与湄公河之间），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但不知为什么这次却感到这样难舍难分。几个星期以前离开过一次，没几天就回来了。今日一别，何时返回？不得而知！盛菜籽的袋子已留给三乐同志。

我乘坐小汽艇穿过美隆据点。敌军一个营两天前才从这里逃走。半红半蓝的解放阵线旗帜迎风飘扬，真美极了。河水静静地流着，似乎它不屑理睬躺在据点角落的那个雇佣兵

的尸体。

到二贵时太阳还没有落山。由于游击队包围了蒲胶警察所，敌人盲目地打炮。4号公路上的敌人步兵还没有撤走，公路不通。21时，与省军事指挥部接上联系，安排通过公路。已离“7·20”区很远了。午夜12时，吃住问题算得到了解决。

1975年4月10日

新会，这块坚强的土地是美菽省武装力量不可侵犯的根据地。今天指挥部只有八同志在家，通知来指挥部的两个营的指挥员已在那里。我们左等右等，只见到2团的参谋长。

15时动身去三协，见到3团（88团）的同志们。他们已准备就绪。

19时又穿越4号公路。右边是忠良三岔路口，左边是边佐桥。在人民群众协助下，队伍安全地通过了公路。

路过保定地区时，遇到个熟人，由于队伍要继续前进，来不及和他搭话。他们的任务是在那里扎下来进行活动。我们从一座座房子前面走过时，家家户户悄然无声。可以肯定，屋里的母亲和姐妹们是无法安然入睡的。我们的脚步尽管很轻，也会振动她们的心弦。她们会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思念亲人。

由于事先没有联系好，队伍到良和时，无人接应。半夜过后，只好躺在合欢树下过夜。

1975年4月11日

清晨起来，赶到双平，见到了所有的人。

电告J10（第8军区指挥部）转232兵团，南线指挥部已抵达安全地带。黄昏时分指挥部越过翁文公路，直奔根龙（米市）。在这里要找块平坦的地方铺上塑料雨布睡觉实在困难。但这没什么，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

1975年4月12日

根龙。一天过去了，2团、4团（即24团）行军情况还没掌握，3团驻地位置及活动情况也不清楚。焦急地等待着。

向南方司令部、232兵团和第8军区指挥部报告南线的决心：

坚决打通道路前进，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集结地点。

1975年4月13日

2团、4团的干部们到了。但3团和四申同志所在位置仍不清楚。美萩省的两个营在米市运河一带很活跃，敌人竭力抵抗。敌人被牵制在那里，保障了我们的安全。

今夜，5师那边打响了。友邻部队参战，给我们创造了有利条件。

督促3团，力争在4月14日夜间向新柱发起攻击。

1975年4月14日

由于事先没联系好，4团的干部组到迪沉时无人接应，过不了21号公路，只好返回根龙。

2团接到返回的命令，部队的任务变了。谁来代替2团参加南线部队呢？

279营攻克了翁拜据点，扩展了通路。

4团全团都到齐了。

二发他们到了。南线指挥机关到今天才集中起来。至此，我们已有了两个团和三个营的兵力。而10营、14营和另外一个团（哪个团？）何时能到尚不清楚。

1975年4月15日

今天离开根龙。17点到外面整理队伍，安排行军时间。

一离开根龙，道路泥泞令人难以想象。部队在齐腰深的泥水中，顺着一丛丛水椰子树走到迪沉。越过21号公路已快深夜12点了。没有船过不了万古西河，只好野外宿营等待。顺美的警察所就在附近，再远一点是清永东。河对面是营市。我们的胆量也真够大的。十五年没回营市了，今天才能走近它，真让人思念不已。母亲早已长眠地下，哥哥在抗法时期倒下了，弟弟前年牺牲，全家只剩下我和年迈的父亲。不，我们整个民族都在。

1975年4月16日

日宁。凌晨4时才过河，到宿营地休息时，太阳已经升起。人人一身泥巴。部队来来往往，看起来仍是一片太平景象。

1975年4月22日

指挥所仍设在新福。阮文绍已经辞职。

指挥部给3团和4团的ZN72号电报指示，一面要加强进攻，一面要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3团在芹约进展顺利（攻克四个据点）；4团在芹德也拿下四个据点。

后勤供应困难已一个星期了。向前方输送的物资少得可怜。南线指挥部一天内连发五封有关后勤工作的急电。

指挥所通过3团同四炤同志（隆安省武装部队指挥、南路部队副指挥）取得了联系。

1975年4月23日

万迪伽（新福）。指挥部给4团的任务是：

“为完成主要任务，你团向福厚、隆尚（芹约，与平政毗邻）方向发展。”

后勤供应非常困难。得悉第8军区指挥部也遇到困难，但为保障胜利，建议第8军区指挥部（三桃同志指挥）派五治或三施来代替三景（没完成任务），同时建议它将情况报告南线指挥部。

4团一天之内解放隆刚（芹德），正围攻敌42团2营。

四申同志去232兵团。

向南方司令部、232兵团和第8军区指挥部报告情况。

1975年4月24日

各部队的攻击暂时停止，巩固战果，向南方司令部、232兵团及第8军区司令部报告各团、营的位置。

给南线指挥部的补充兵员尚未到达。建议三桃同志（第8军区指挥部指挥）催一下。

建议四炤同志和3团派一名芹约的干部来接指挥所。

指挥部询问四炤同志与芽舫和平政的县委、县大队联络上没有。

根据南方司令部的命令，三胜同志前往232兵团接受任务。电告隆安在4号公路（平德）联系。18点过日枣河，泥泞难行，蚊虫扑面。

走近4号公路，稻子已收割，田地干涸，感到很惬意。

等到22点，情况发生变化，没能和隆安取得联系，不得不折回指挥所。

1975年4月25日

隆山。稻子收割完毕，田地干涸。

接到232兵团ZN111号关于胡志明战役将在“N”日开始的来电。日夜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指示3团在目前形势下要把作战和瓦解敌军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指挥部同意4团4营留下，3团开赴隆尚。

电告四焯同志和四度同志（3团）在美市地区迎接指挥所。隆安1营炸断迪桃桥。

1975年4月26日

隆山。今日电报号码从01号开始。ZN01号电报是发给232兵团的，第二次重申“N”日（给232兵团ZN44号电的复电）。

向南方司令部、232兵团和第8军区司令部报告，赶去开会有困难，要求232兵团用电报下达任务。四申同志也未能赴会。

接到六南同志（232兵团）给南线下达任务的ZN45号电。南线指挥部决心完成任务。

同芽波、芹约尚未取得联系。

指挥部通知271B团团团长枫同志，因为时间紧迫，应当组织连续行军。

提醒五宜同志派隆安1营守卫桃市据点一公里范围地区，以保证指挥所的转移。

18时，指挥所离开隆山向芹约进发。行军是在群众掩护

下进行的。大部分群众留在原地未动。

22时，到达福林（芹约）。

23时，南线指挥部举行会议，讨论3团完成任务情况，分析了优缺点。3团团团长四红同志和政委五思同志参加了会议。

看法：完成了任务，为进军打开一条道路，准备迅速，战斗行动快。

希望：对部队进行群众观点的教育：为人民打仗，保护人民，解放人民，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为群众修建防空洞。更加注意兵运、敌运工作。

1975年4月27日

福林。

建议232兵团和南方司令部批准与特工117团进行联系。

7时30分，南线指挥部开会研究进攻计划及组织部署。

接232兵团的ZN53号电告：

232兵团已指示五浪同志（西贡市武装力量指挥）让平政和芽舫同南线联系。

429团的一个营（九云同志指挥）在二天堂桥一带。

9时20分，南线指挥部向4团团团长三栓、政委二汶下达任务：

胡志明战役解放西贡市。

主要目标是国家警察司令部。

时间：4月27日夜，先头部队进到平登。

4月28日夜，全团到平登。

4月29日夜，发动进攻，占领目标。

南线指挥部指挥所位于密桥南。救护所靠近指挥所。

自4月27日到发起进攻之前，4团衔枚疾走。隆安1营为该团预备队。

3团的进攻目标是归德、兴隆、枫德和平登。

口令：

问：胡志明。

答：万岁。

标志：手执解放阵线旗，左臂戴红袖章。

1975年4月28日

271B团到了哪里，指挥部还不清楚。说起来，一个刚下到平原地区的团这样行动也确实困难。指挥部一面发电同它联络，一面发电请第8军区指挥部通报该团情况。

向第8军区指挥部和232兵团发电，报告物资所剩甚少，要求支援。

派人同九云同志联系。

夜里，指挥所同各单位一起由福林—顺城出发，渡过饭馆河，向兴隆前进。整夜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构筑好工事，东方已发白。

1975年4月29日

兴隆。

人民群众一早起来，发现一夜工夫，到处都是解放军，别提多高兴了。一位老妈妈从地里挖出一面不知埋藏了多久的金星旗，旗子还是崭新的。

给四阮、六南、八方等同志发去ZN15号电报，报告南线指挥所，3团、4团和10营已于4月28日夜到达兴隆。当夜，4团将占领第8郡（Y字桥）；3团占领5号公路。南线指挥部

把隆安的两个营都用上了。

指挥部电示271B团：“完成任务的时刻到了，宜火速进军”。

给四阮、六南、八方同志发去ZN16号电，准备用3团的一个营进攻兴隆军事分支区。

指挥部开会研究进攻计划。四昭同志介绍了5号公路以东的地形和平政、芽波地区敌我态势。

迪盖一带，十分荒凉，既无敌人，也没有我们的部队，地面泥泞，寸步难行。

4团的部署有一点更动，整个4团在4月29日夜间越过5号公路东段。该团一个营由迪盖进到Y字桥，其余两个营将沿5号公路挺进至二天堂桥，然后拐向范世显渡口，再进到Y字桥。3团任务不变。

向四阮、六南、八方同志发出ZN18号电，告已解放兴隆，已收到731号电，并呈报进攻计划。

19时，指挥所向多福转移，各团均按计划前进。

21时到多福。各单位构筑工事，群众起初不让挖，可能怕动了风水。经过解释，挖工事一方面是为了部队打仗，同时也是让乡亲们躲炮弹。敌人知道我们部队来了，会扔炸弹，打炮的。不修好工事怎么能让部队和群众免遭危险呢！最后同胞们不仅同意挖，许多人还送来树干搭顶棚，送糯米团给战士吃。

半夜过后，工事才挖好。可是所有工事都灌满了水，有几个刚挖好就塌了。

1975年4月30日

多福。清晨起来已听得见5号公路上汽车行驶的声音。

指挥所离公路仅500米。

解放广播电台播送临时革命政府通告和西贡战线指挥部通告，听了很受鼓舞。

指挥部电示3团和4团录下两个通告，并要求电告任务执行结果。

8时发ZN23号电给四阮、六南、八方同志，报告3团、4团已按时进入阵地，战斗已经打响。

10时，4团报告已经过了Y字桥。之后又报告，10时30分正在进攻主要目标国家警察司令部。

10时过后，多福三角据点之敌投降。整个指挥所移向5号公路。

群众用客车、货车将整个指挥机关从多福送到Y字桥头，这时是11时30分。

12时，在4团攻占国家警察司令部一个半小时之后，南线指挥部迁入国家警察司令部。

最后一封ZN24号电，向四阮、六南、八方同志报告，已接管西贡市警察局和国家警察司令部。

渡河卫桥战

在胡志明战役最后的准备阶段，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是工兵保障进攻市区各部队的渡河问题。那时我们正设法使23₂兵团渡过万古东河，到达发起攻击的阵地上。232兵团得到了加强，增加了步兵、大炮和高射炮，其中包括130毫米口径炮；一个坦克装甲团，其中三分之一为T54型坦克。各种车、炮近800辆（门）。然而南方指挥部一向只有半套大型舟桥（苏联的TPP型）。已向中央申请增加半套，尚未运

到。其它各路部队都缺少工兵。经过参谋们查证，总司令部为西贡战线增加了以下工兵力量：

工程兵279团已到指定地点。

559司令部的筑路574团已到南方，将交给后勤局使用。

249舟桥团有四个连及四分之一套TPP型大型舟桥，预定4月20日左右到达，然而却未见到。

我们计划不管哪个舟桥部队到达，都立即给232兵团。如果桥梁不遭敌人破坏，232兵团很可能是最早和唯一过河的一支部队。第1军要渡过贝河，此时正值枯水季节，南方司令部的工兵已在葫芦渡为该军准备好漫水桥。眼下，232兵团只好利用现有力量，设法就地解决渡河工具，渡过万古东河。

因此，当时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敌人顽抗，迅速撤进市区，并将通往西贡的主要道路上的桥梁加以破坏，那我们怎么办？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预见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知道，西贡周围有无数的大河小渠，河水深且泥沙很多，河床及两岸都有很深的淤泥，上岸以后有时还要经过一片泥泞的田地。敌人有足够的炸药和技术破坏桥梁，他们临死之前还会施展毒辣的阴谋。这对我们配备有重武器的合成兵种展开进攻会造成很大障碍。从哪个方向进攻的部队至少都要通过四、五座桥。假如桥梁被破坏，车、炮受阻于西贡外围，我们也可以逐步解决。但是，敌人就有了时间构筑工事，设置障碍物，组织防御。而我们内线别动队的进攻则将孤立无援，人民不能奋起，我军不得不在各个战线上奋战，夺取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哪里还谈得上突然、神速呢？城市也不能完整地保留下来。

当时我军不具备其它现代化军队所具有的能力，不可能

在大部队发动进攻之前先派空降部队或用直升飞机着陆，突然攻占每一座桥梁。要在同一时刻由不同方向攻占并守住几十座桥确实是不容易的。

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打法：利用特工部队和别动队消灭敌人，占领并坚守前进道路上的重要桥梁。

我们共有六个团的特工部队和几十个别动队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由郊区进入西贡市内。它们都是经过多年抗美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屡建显赫战功的精锐部队。它们当中许多单位曾荣获“英雄”称号。第3军另有它自己的一个特工团。因此，我们有足够力量完成保卫桥梁的任务，阻止敌人破坏，保证各路部队顺利地向各个目标直接发动进攻。

这样，特工别动部队的任务须加以调整。原先南方司令部交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攻打指定的目标，除五个主要目标外，还要配合进城的大部队攻占另外一些重要目标，形成内线进攻与外线进攻相结合。现在他们的主要任务变为占领并守卫一些重要桥梁，直到大部队通过。虽然不少别动队和一些特工部队仍须攻占内线目标，但战斗力强的单位则须承担新任务。改变主要任务时间过于紧迫，在四、五天之中要边行军，边调查研究，边制定作战计划。再者，其困难在于攻下目标之后还得扼守，对付敌军反扑。这种战术，特工部队是很少用的，眼前也没有时间再进行训练。出于对特工别动部队的才能和传统的信任，相信战士们高昂的战斗意志及勇敢精神，我们于4月25日决定改变任务。所有桥梁必须占领并坚守到向西贡市内发起总攻击的“N”日“G”时。迟了，将给进攻部队和整个战役的胜利造成困难；过早行动，又十分危险。为此，特工部队要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不是防御性的，而且不能配备强攻重武器。这样就难于长时间地

坚守，更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取一个目标。再说，敌军有可能在我大部队抵达之前进行猛烈反扑，乘机炸毁桥梁。计算在什么时间攻占和坚守桥梁，需要与各军行动相协调。胡志明战役指挥部将特工部队行动时间交由各路指挥部决定。

桥梁最多的是东路。除同奈河上的同奈公路桥、迎桥，西贡河的新港公路桥、平利桥外，还有一些桥梁，如迪折桥等，桥虽小但也很重要。其它方向的桥不太大，然而却很多，如遭破坏，也将使我军遇到不少困难。

232兵团在战斗打响之前渡过万古东河，但遇到了许多困难。正因为战斗还没打响，需要对敌保密，必须在夜间渡河，并要在夜间占领位于敌占区的美幸，以此作为我军发起进攻的阵地。美幸靠近9号、10号公路（隆安省德和县）的三岔路口。要渡过的万古东河一段位于安宁乡境内，在苞斋（即伪厚义省省会谦幸）西北十多公里处。渡河地点已准备好，一旦需要就实行强渡，直插协和市，然后奔10号公路。这段万古东河两岸遍地泥泞，找块干地相当困难。河西是我们第一批解放的“鸚鵡嘴”地区，是同塔梅的一部分。这里主要是沼泽地带，只有一些高地居住着为数不多的老百姓。柴草奇缺。在战争年代，包括抗法和抗美战争，我们的部队来到这里，乡亲们送来了大米，特别是鱼很多，但对烧柴问题，却毫无办法。柴禾真宝贵呀！只好每人背一捆柴备用。万古东河两岸是敌人控制区，其中也花插着一些我们游击队的根据地。安宁乡是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戊申年，我军第9师曾驻在这里，以便在第二阶段进攻和崛起时进军西贡。这里的地形相当有利，与10号公路相连，过了苞村就是

美幸乡。美幸是1945年抗法时期“霍门—巴点—德和联郡解放军”的第一个根据地，又是抗美援朝时期南方解放军英雄阮氏美幸的家乡。我军渡过万古东河，从我方控制区的沼泽地带，走向敌人控制的地势较高的地区后，可以立即展开队形发起进攻。从后方通向渡口的道路泥泞难行，不采取措施，机械化部队就难以通过。232兵团的干部同地方干部一起动员群众砍了上千捆树枝，分散藏在许多地方。前面已经说过，这里树木柴草稀少，必须事先在很大范围内动员群众，才能足够和及时地得到解决。结果，一切都很圆满，特别是敌人对此毫无察觉。

南方司令部工兵主任武明哲同志被指定担任232兵团的工兵主任，他说：“渡河前夕，下了一场倾盆大雨。这是雨季以来范围最大的一场雨。路上满是烂泥浊水。部队开到河边的那天夜里，坐在河岸上，自五涯同志以下，包括参谋们、工兵、炮兵、坦克兵都是焦急万分。各种车辆的马达声响彻了几十公里长的地段，第一辆车已到渡口，最后一辆车还停在越柬边界地区的出发地点。在夜色中，乡亲们纷纷从村子里涌到公路上，扛着一捆捆树枝铺在路上。一辆辆战车，一门门大炮，尤其是T54坦克、130毫米大炮驶过后，烂泥更多，路面更滑，只好再垫上树枝，炮车继续前进。”真是：

“十分容易，没有群众也枉然。

万般困难，群众支援事竟成。”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战术，也适用于战略；不仅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和平建设时期。

路上已如此困难，渡河就更艰难了。若是有足够的现代化舟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南方司令部工兵处副处长裴友贻

同志那天负责安排部队渡河。他告诉我们：“所有车、炮都可以由大渡船运过河去。这种渡船中间是驾驶舱，两边是自造的浮筒。在我几十年的工兵生涯中，从未象232兵团强渡万古东河那天那样让人心焦如焚。那天，五涯同志来到河边，到现场视察。一辆坦克徐徐开上渡船，渡船下沉到哪里，我的心也就跟到哪里。太幸运了，正如预先计算好的那样，渡船下沉到规定的吃水线就稳住了。倘若坦克和渡船一块沉下去，我的心脏就立即停止跳动了。

“舟桥在规定的时间内用车运到离渡口五公里处，放进小河渠，用篙把一个个舟桥撑到渡口，迅速安装成临时渡船。既要保守秘密，又要紧张工作，要求每个战士有高超的操作技术，干部能熟练地指挥。当然还要解决动力问题。河宽风大，工兵的‘海鸥’牌汽艇马力不够，渡船容易被冲走。230后勤团支援我们几条50马力的汽艇，才保证了安全。”

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渡河已如此费力，在战斗中需要从不同方向渡河多次，就更难解决了。各军、各旅和坦克、大炮能迅速通过每座桥梁，在市中心胜利会师，不能不想到特工部队的功劳。同样，无论哪个部队、哪个兵种建立的每一项战功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这样那样的贡献！

决胜前的花絮

在进攻西贡的计划中，我们南方军委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的是，处于敌军包围中、驻在戴维营的我军事代表团干部战士的安全问题。伪军曾多次采取粗暴手段，威胁他们的生命。癸丑年春节，他们刚到西贡的日子里，当时我也在那里，敌人就曾用装甲车包围、威胁，用武装直升飞机在屋顶

上空盘旋恐吓，只是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过春节时升起了金星红旗。戴维营四周都是伪军据点，有12个岗楼用机枪对着我们代表团驻地。此外，敌人还施展了许多卑劣下流的手段。那么，我军发动进攻，伪军能让我们的同志得到安宁吗？这是难以相信的。敌人看到代表团人员有限，多数又是干部，为了报复，他们很可能采取卑鄙的手段，突袭代表团，杀害我们的人。我们有责任保证他们的安全。

3月底，我请三陈同志和裴成洁同志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决定，在我军向西贡发起总攻之前，派一支熟悉新山一机场周围情况的精良的特工部队进去，将他们全部接回解放区。我们对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特工队也选好了。我将此事交给上述二同志负责组织实施。

行动计划紧张地付诸实施。我代表团的同志们已接到通报，准备配合行动。在整个实施过程中，我们始终在思考可能发生的问题，一直放心不下。因为，代表团成员主要是干部，战士极少，武器也很少，尽管特工部队骁勇善战，终究是一支很小的进攻力量，担负不起保卫的任务。新山一机场四周敌军数量多，装备好，有飞机、装甲车掩护。这次突围是在于我不利、敌我力量悬殊的战场上进行的，容易造成不应有的伤亡。因此，最后我们放弃了原来的方案。我们决定等各军基本到齐，立即开始外线迅猛进攻，同时发动内线奋起，这样，肯定战斗不会拖长。在戴维营的同志们如准备充分，有可能在自卫中取胜，直到西贡全部解放。

我们立即与戴维营的我代表团负责人联系，传达南方军委的意见，即在进攻西贡的整个战斗过程中，代表团要有个自卫的计划。这个就地坚持战斗的计划要依靠自己挖的非常秘密的地道系统。该系统应是坚固的，能承受敌军炮火和我

方130毫米火炮的轰击。一切要紧张地进行，整个代表团组成一个有严格指挥的战斗集体。

当时负责代表团政治工作的吴文霜上校说：“得悉派特工部队来接我们回解放区的消息时，全体干部战士非常激动。在全军中，我们虽然是很小的一部分，但看到党时刻都在关怀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正当我们各路大军从外围向市内发动猛攻的时候，我们作为一支现成的内线队伍，为什么不参加战斗，反而要撤走呢？难道我们不能把自己看成是当地的特工部队吗？我们决定发电报要求留下，战斗到最后。因此，当接到留下参加战斗的命令时，从干部到战士都十分兴奋。同志们争先恐后，通宵达旦挖掘地道。为了保守秘密，我们就夜里干，白天休息，轻轻地挖，避免发出大的响声。挖出的土一部分秘密地藏在地板下面，一部分装进铁皮柜子，倒放在地道顶盖上，这样地道更坚固了。一周多的时间，我们就挖好了一条长几百米的地道，地道里有隐蔽所、战壕，把黄英俊团长的住处和包括后勤部门在内的各单位都连接起来，也通到留下的北方军事代表团驻地，地道还有开会及安置伤员的地方。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正是在这个地道里，同我方进行最后谈判的西贡伪政权的几个代表也和我们一块儿躲过炮弹。他们一直受到安全保护，直至西贡解放。”

在胡志明战役中，我们在戴维营的军事代表团对这一历史性的胜利也付出了流血牺牲，做出了贡献。牺牲了一名大尉工程师和一名上士，还有五、六位同志负伤，其中包括一名中校。

1975年4月26日，一队小汽车送文进勇同志和我同机关

一起南下：前指开始工作。

两天以后，黎德寿同志和范雄同志也来到前指，集体对一些重大问题迅速作出决定。

此时，形势已完全明朗了。

西贡完全被我围困。

西线。从4月26日起，232兵团5师开始对敌22师发动进攻，先后歼灭各团，完全控制从新安至象桥的4号公路。16团攻占了平田桥和安洛桥。特工115和117两个团占领了富林。再往西，4号公路在丐礼县的田希、二贵、二平地区又被切断一大段。这是由包括荣获解放军英雄称号“北村”营在内的美荻省武装力量，在黎光功同志率领下，于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占领的。也是在4月26日，第8军区的8师完全切断了4号公路忠良三岔路口到靠近新安的一段。第9军区部队也全部控制了丐温——巴岗一段公路。这条纵贯湄公河平原唯一的战略要道完全被斩断了。

东线。4月26日，第2军发起了对清水装甲训练基地的进攻，并且猛攻隆城军事支区，4月27日占领巴地市，15号公路被全部切断。4月26日夜，特工116团开始攻打同奈公路桥。自4月26日起，特工10团在从福庆至同箏河岔之间，向龙头河中的敌舰艇发动猛攻，并于第二天击沉一艘，河道完全被堵塞了。

边和机场从4月15日起受到来自孝廉阵地130毫米大炮的轰击，许多飞机被击毁，机场一片混乱。到4月18日，敌人不得不将F5飞机和A-37飞机分别转移到新山一机场和芹苴路德机场。4月23日，边和机场与边和美国领事馆同时关闭。最后，敌人只剩路德和新山一两个机场了。新山一机场不仅遭到西面特工117团的122毫米火箭的攻击，而且也受到

北面特工部队不时从葛春发出的炮击，敌人已相当困难。到4月28日晚，我第2军在仁泽的130毫米大炮开始炮击。同一天，越南空军也进行了独特的进攻，在阮诚忠同志率领下，使用刚缴获敌人的五架A-37飞机轰炸敌机场。至此，敌人再也不能使用新山一机场了。从4月28日起，路德机场已在9军区炮火的严密控制下，但由于是敌占区，我有困难。因此，直至4月30日，敌人虽仍可使用该机场，但作用有限。

面对这种局势，美国和伪政权都感到绝望了。

“生活在禁宫中的阮文绍也开始看到不可避免的结局和他本人难以逃脱的命运。18日凌晨，共产党一个特工队攻打位于西贡西郊的富林雷达站。战事已经发展到了西贡的大门口。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第3军区司令阮文全将军从他在边和的指挥所飞回西贡向阮文绍报告说，战争实际上已经失败，军队已乱，在数量上也处于绝对劣势。想再坚守三、两天都没有希望了。”^①

马丁大使是个最不讲实际的人，典型的主观主义者，到这时他也已看到，失败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了。他极力劝阮文绍撤退，幻想玩弄别的政治阴谋，兴许可以阻止我军进攻。从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到另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丁真是一个靠幻想过日子的人。

“20日上午，马丁为了同样的目的，先会晤了法国大使梅里龙，然后驱车前往总统府会见阮文绍。他说：‘我已经说过，我的结论是，几乎全部将领，尽管他们还能继续战斗，但都认为防守是没有希望的，除非停火谈判。但是，他们认为，只有总统辞职或者采取可以使谈判立即开始的步

^① 引自弗兰克·斯内帕所著《恰当的时机》。——原书注

骤，谈判才能举行’”。^①

4月21日，阮文绍辞职。不知是否是马丁的功劳。

4月28日，陈文香，这个力尽智穷，自以为交了“天运”，妄图扭转乾坤，仅仅当了一周的伪总统，突然惊醒，也可能是被迫醒悟，将总统“宝座”让给杨文明。而杨文明呢，或许秉性比较实在，相信马丁和梅里龙的巫术。他过去长期被他们撇到一边，而今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却自告奋勇地出来担当无条件投降的角色。

也是在这一天，边和伪3军指挥部完全溃败，逃到了鹅邑。第二天，他们的司令官阮文全将军随总参谋长高文园一起逃往美国。西贡伪政权的军事指挥系统已是群龙无首。

我军方面。我们迅速向西贡战线的全体指战员传达了1975年4月28日22时下达动员令的电报：“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向全体指战员、党员、团员致以决胜的敬礼！你们要奋勇前进，夺取以伟大的胡伯伯名字命名的历史性战役的彻底胜利！”

① 引自弗兰克·斯内柏所著《恰当的时机》。——原书注

第八章 旧制度的末日：胡志明 战役完全胜利

行动指针“N”“G”

前面谈到过的“N”日“G”时，系指1975年4月29日零时整。各路部队要在上述规定时间从五个方向同时向西贡市区发起进攻，彻底消灭守敌，直插五个最重要的目标。所有的别动队、特工部队要在上述规定时间从隐蔽地方奋起，在内线进攻敌人，占领指定目标，同外线攻城部队取得联系。党的干部、政治工作干部也要在上述规定时间带领爱国同胞奋起，消灭恶棍，捣毁伪政权，动员伪军放下武器投降，把政权夺回到人民手里，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将压迫、剥削、不平等、奴役扫除干净。

“N”日“G”时是胡志明战役指挥部给整个西贡战线规定的行动时间，据此制定各项工作和行动计划。不管你是远还是近，困难还是容易，遇到障碍或是进展顺利，先行动或是后行动，早行动或是晚行动，到这一时刻都得做好一切准备，处于猛虎扑食之势。各种力量从那时起，就一齐最迅速、最勇猛地扑向自己的进攻目标，把它完整地拿下来，然后到市中心伪总统府会师。

“N”日“G”时也是给整个B2战场规定的时间。南方指挥部向各军区、各省、各单位和尚有敌人盘踞的地区通知了这个时间，以便届时一致奋起进攻，消灭和打垮敌军，夺

取政权，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乡解放乡，县解放县，省解放省。

有几个“G”时能使几百万颗心激动不已，既担心又高兴地等待。有哪个“G”时能让人们在硝烟弥漫的数十年间一直盼望它的到来。有哪个“N”日是经过成百万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历经数十年英勇战斗才赢得的。

在胡志明战役指挥所，每个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我忽然感到自己心情异常舒畅轻松。到这时，已经没有可担忧的事情了。检查结果，各路部队一切顺利，准备就绪。远一些的军区和单位也都准确无误地对好了时间——“N”日“G”时。各项命令已经发出，而且都有了收到无误的回复。还有什么事情呢？那么，就象除夕之夜等听鞭炮声那样等着打响吧。这种轻松的时刻是短暂而无限宝贵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将前段时间的辛苦劳累排除干净，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紧张工作换一换新鲜空气。

宛如除夕之夜的鞭炮声，从各个方向传来大炮的轰鸣。

西北方向，我第3军攻克了伪25师的同游基地，活捉敌师长李松波。3军派特工团攻占并守卫1号公路上的棉花桥和15号公路上的商桥。接着，3军分两路向市内挺进，1号公路为主，15号公路为辅。但过商桥时，桥塌了，两辆坦克掉了下去。沿15号公路前进的部队只好转向1号公路进攻霍门。西宁市武装配合堵截敌25师，不许他们由西宁撤往西贡，与此同时，带领群众逐步解放本省。古芝县地方武装也配合主力攻打同游并占领军事支区。古芝人民在七大娘阮氏玲带领下，先后占领了伪警察支局和伪县政府，并把这两个机关完好无损地交给县武装部队。阮氏玲大娘是个76岁的老党员，3个儿子为国捐躯了。正是这位大娘在敌人还没有破

消灭的情况下，亲手将红旗插上警察支局的屋顶。在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仇恨目光的威逼下，在赤手空拳奋起斗争的人民力量面前，敌人吓得纷纷弃枪逃跑。

29日，第3军当面，特工14营已占领新市桥和竹馆广播电台，伪警察支局和霍门光中训练学校。敌人土崩瓦解，四散奔逃。嘉定1团解放了新泰一和春泰尚两个乡，占领了参良桥。嘉定团4营配合特工115团解放了新泰协乡，打开了新山一机场北面两道大门，等待大部队抵达时突然发起进攻。4月30日拂晓，第3军由霍门向主要目标进攻，击退敌人多次反扑，于当日14时占领整个机场。

北面。第1军攻克新渊镇，包围富利基地，并直插菜眺，准备向市内进攻。在我1、3军夹击下，敌5师全部被包围，孤立无援，无路可逃。我地方部队配合大部队进攻，敌人立即举起白旗投降。4月30日晨，我第1军越过平福桥向主要目标——总参谋部进军时，平阳军事小区挂起了白旗。特工115团已于4月29日晨占领平福桥，敌人进行反扑，又将该桥夺回。指挥所获悉敌人要用炸药炸桥，当即电令特工115团：“必须坚决占领和守住平福桥……立即剪断桥上炸药的引线……”4月30日凌晨，115团再次占领并坚守该桥，直到第1军通过。在第1军当面，4月28日夜，特工80营同别动队一起进攻鹅邑的敌古螺炮兵阵地，至4月30日晨才攻克。上午9时20分，这个营占领了“扶董”装甲车基地。敌总参谋部4月30日晨已无人指挥，伪军士气殆尽，有的已经逃走。但在总参谋部出入口，伪第81伞兵别动队仍在顽抗。4月30日8时30分，由七永同志指挥Z28别动队攻打1号门未果，立即转攻3号门。这里有几辆敌人丢弃的坦克，车上敌人已跑光。Z28别动队赶忙用敌人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跳上一

辆吉普车向电子计算机中心冲去。那里的负责人胡大校将这一机构完整地交给了别动队。IBM系统及管理伪军全部人事档案和装备的磁带都完好无损。当时是上午10时整。别动队又上车冲到伪总参谋部主楼。伪军都已跑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个下士向别动队移交了一串钥匙及全部文件和财产，一切都完整无缺。这个伪军下士就是南方司令部长期安插在伪总参谋部的情报人员三明同志（现为第7军区参谋部上尉）。10时30分，伪总参谋部院子正中的旗杆和主要建筑物顶上升起了解放阵线的旗帜。4月30日12时整，黎文永同志（现在是西宁市武装部队中校副参谋长，武装力量英雄），迎接第1军进入伪总参谋部，把它移交给友军。在这一路，人民群众奋起与别动队相配合，特别是在安富东乡，捣毁伪政权和乡警察所，立即建立起新政权。4月30日9时30分，在当地党支部领导下，人民占领了鹅邑镇的第2坊。此前，4月29日下午，郡干部纯同志已领导人民占领富润郡第12坊办公楼，升上解放阵线旗帜。

西线。4月29日晨，232兵团已占领厚义市和德和军事支区，使左翼得到保障。其中一支部队歼敌22师，占领新安市、边沥镇和平田桥，随后沿4号公路攻入西贡，保证了右翼的进攻。232兵团的主力勇猛穿插，9师由美幸、永禄直攻七贤交叉路口，于4月30日10时30分攻克了主要目标——伪首都特区。在七贤交叉路口，敌人拚死顽抗，还动用A37飞机轰炸我军，使我们受到一定损失。

特工429团和117团配合西线部队在29日和30日已占领一些关键性的目标，如富林雷达站、新造要区、永禄五叉路口、富寿通讯中心、鸿婆桥和二天堂桥。

霍门地区、巴点地区各乡的人民，特别是富寿和乡的人

民已经奋起，动员敌军放下武器投降，推翻了伪政权，升起了解放阵线的旗帜。许多乡建立起革命政权。第11郡党的干部阿云和六黄领导群众在4月30日上午9时夺取了第8坊的政权，接着又在9时15分，在我军抵达该地以前占领了郡公所。

在南线，如前所述，我军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也按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并迅速占领了主要目标——伪警察总署。这里的档案、文件、资料还原封不动地摊在桌子上。

东线。第4军沿1号公路直捣边和机场、边和市和伪第3军司令部指挥所。由于伪18师、装甲3旅和海军陆战队的残余力量极力阻拦并接连反扑，各路部队进展缓慢。4月30日清晨，穿插部队包括7师和预备队52旅，其先头部队已抵达迎桥，但发现桥梁不够坚固，怕坦克无法通过，只好转向边和公路，尾随第2军进逼西贡，攻占伪国防部、海军基地和广播电台。

平盛郡的人民群众在三柳同志的动员和指挥下，于4月30日9时30分占领第13坊的办公楼。

第2军一路占领巴地、头顿（由第5军区的3师执行）；另一路进攻隆城，经仁泽，把130毫米大炮阵地设在该地，并准备派出一部分兵力越过同奈河，配合特工别动队进入第9郡。进攻西贡的主攻先头部队是203坦克旅，进抵奔河时，桥已被炸毁。4月29日全天，203坦克旅无法过河，直到半夜方通过奔河桥，在边和到西贡的公路上长驱直入。203坦克旅路上同我守桥部队遭遇。担任攻占、守卫同奈桥任务的116团扩展战果，顺势占领了隆平仓库附近部分地区（解放了安和乡和隆兴乡）。116团即在该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到了后半夜，203坦克旅一面前进，一面猛烈射击。坚

守阵地的特工部队以为是敌军进攻，就用B40、B41火箭筒进行还击。幸好没有击中。在炮火的闪光中，战士们看见了插在坦克上的解放阵线的旗帜（当时是4月30日凌晨3时），连忙发出口令：“胡志明？”

回答是：“5月19”。（坦克部队的战士们记错了，回答的仍然是第5军区的口令。）

“胡志明？”第二次问道。

“万岁！”这次回答对了。射击停止了，战士们欢呼雀跃，互相挥旗致意。

在这条公路上有3座最重要的桥梁，即同奈桥、迪折桥和新港桥。

4月26日夜，特工116团已攻下同奈桥。27日敌人反扑并重新夺回该桥。28日夜特工116团又攻占了东岸的桥头，然后向桥的西头发起进攻，并就地组织防御。4月29日下午，从隆城至西贡的15号公路上传来了许多车辆疾驶的声音。侦察员报告说共有15辆敌军车，前面是5辆坦克和装甲车，后面的车坐满了人。其中有士兵、妇女和小孩。公路两侧还有步兵。敌军团指挥所的美国PRC-25型步话机传出了一段简短而匆忙的对话：

“你们车队过桥以后，立即用5吨炸药把桥炸毁。”

“后续部队怎么办？”

“不走这条路了。这是指挥部的命令。越共就在你们后面尾随。马上炸桥！”

我们的部队仍严密地隐藏在埋伏的阵地中，敌车队毫无察觉，继续前进到距桥1公里处（木渡丁字路口）。我军B40、B41火箭筒和其他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敌车队前面5辆车被击毁。一部分敌军纷纷下车，越过隆平仓库的铁丝网，

徒步逃窜。后面的车辆当即调头向边和方向驶去。

特工116团乘胜扩大战果，进占了隆平仓库附近另一部分地区（西南偏西方向）。直到战争结束，同奈桥始终完好无损。

迪折桥的战斗也十分激烈。Z23别动队和特工81营，由队长阮黄恩、副队长陈金青、指导员阮文思指挥，接受了攻占并守卫这座桥梁的任务。4月27日凌晨3时打响，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同志们完全控制了这座桥，切断了桥下的全部电线。27日敌步兵配合水面船只进行猛烈反扑，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坚强的Z23别动队已有20名同志牺牲，部队被迫暂时撤至距公路500米远的长满水椰子树和其它野树的小河叉处。为了完成守桥任务，4月28日夜，Z23别动队再次组织反攻，但未能奏效。直到4月29日夜，动员了部队的全部力量才再次攻克迪折桥，并一直坚守到4月30日上午9时30分我坦克部队通过该桥。

4月28日夜，守德第4营向新港桥发动进攻，由于敌兵力过强，且离西贡太近，未能夺取该桥。

第2军的203坦克旅抵达同奈公路桥时，步兵离此尚远，未能赶到。旅长才同志在这里会见了东翼特工别动部队总指挥、战斗英雄宋曰洋同志（现任同奈省武装部队副指挥、上校）和116特工别动团团团长武晋士同志（现任胡志明市公安警察304团团团长兼政委、中校），并向他们传达了军部的命令：必须在当天迅速攻占独立宫。但步兵没能及时到达，敌人具体防守情况不清楚，道路不熟，只知道地图上的位置。

宋曰洋同志果断地说：“等步兵来就误事了。我们还有一个善战的特工团。我原来是在西贡潜伏多年的情报员，很熟悉道路。敌人的驻地我都很清楚，也知道独立宫在哪里。

你尽管下决心进攻吧！”

武晋士同志也补充说：“我们团原来就在西贡附近作战，刚刚到这里接受任务。许多指战员熟悉地形，我们团具有同步兵一样的作战能力，还有进攻消灭敌人驻地和后方基地的经验。你就大胆地组织进攻吧。”

才同志想了想，表示同意。

安排坦克的队形和集合特工团花费了一些时间。

除留下两个连守桥外，116团的全体指战员乘上203坦克旅的坦克，进行协同作战，气宇轩昂地去攻占伪政权的总统府。

宋曰洋同志和才同志、政治部主任明同志一起乘坐旅长的指挥车。这辆车是车队的第六辆车。116团团长方晋士同志坐在第三辆车上；19营1连代理连长范维都同志乘坐第二辆车。4月30日凌晨6时整，车队从同奈桥出发。

我军穿过守德大溪时，驻守在伪军官联合训练中心的敌人接连不断地炮击我车队。我一辆坦克被击中，乘员牺牲。3门37高炮被击毁。宋曰洋同志作向导，才同志下令坦克兵分两路前进。一路从田野上直插向前，另一路向小市场方向迂回，迅即消灭位于增仁富乡的敌军官训练中心的炮兵阵地。

坦克车队驶过迪折桥，思清同志汇报了该地敌情和桥梁情况。车队进抵新港桥附近时，突然从公路两侧的房屋中向我军射出密集的炮火。一辆坦克被打坏，一位同志牺牲，特工部队立即跳下车来投入战斗，经过搜索，活捉了许多还穿着伪装服、全副武装的敌人。接着，两架A37飞机盘旋了一阵俯冲下来，投下两批炸弹后飞走了。我军安然无恙，继续前进。

坦克车队冲过新港桥，人民群众拥上道路两侧，越靠近西贡，人越多。他们挥舞着旗帜、热烈鼓掌欢迎解放军。外国记者们不断地拍电影、照像，直到我军进入市区。车队抵达市艾桥时，与3辆敌M113运兵车遭遇，我军开炮射击，一辆敌车被击中起火，另两辆车上的敌兵弃车而逃。

11时10分，走在最前面的那辆T54坦克冲开了独立宫的大铁门，向院内正中的旗杆驶去。其余坦克分别驶向左右两侧停了下来。116团的战士们纷纷跳下车来，包围独立宫，搜捕伪警卫和工作人员，要他们集中坐在屋前的草地上。一小队坦克兵由裴光慎同志率领，另一队特工部队中的范维都、范辉艺两同志高举大旗，冲上伪总统府前面的高层阳台，站在那里久久地挥动着大旗，然后把旗帜升上旗杆。这时正好是11时30分。

特工队员们又冲向下面各层，搜查各个房间，抵达楼下进入右侧一个大厅时，拉开幔幃，看见伪内阁的全体成员都坐在政府会议室的椭圆形会议桌旁。范维都同志端起自动步枪大声说：“你们被包围了，把枪交出来。投降吧！”

谁也不动，谁也不吱声。

范维都命令持枪站在门口的范辉艺同志：“你在这里警戒，谁也不许走出这个大厅！”说完，范维都跑出大厅去找自己的指挥员。正在这时，政委松同志、203旅旅长才同志、政治部主任明同志和特工别动队东翼总指挥宋日洋同志走到门口。范维都带领这些领导同志走了进去。

大厅里的人哗地一下站了起来。伪总统杨文明站在桌子的另一头，他说：“我们正在等你们来办理移交手续！”

松同志坚定地说：“你们还有什么可移交的。你们只有无条件投降。请你到广播电台发表声明：要求无条件投

降。”

在前线指挥所，我们专心致志、时刻注视着各个方向、各路部队的进展情况。大桌子上摊着西贡和附近地区的地图。参谋人员随时根据各路部队的报告，用红铅笔标出我军的进军路线。大家注视着图上我军行进的地点和攻克的目标。突然，一名干部兴高采烈地拿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桌上，录音机里传出了杨文明在广播电台要求无条件投降和命令伪军放下武器投降的声音。大家围了过来，静静地听着。

大家跳跃、欢呼。黎德寿、范雄、文进勇等同志非常激动，和大家拥抱，和每个人紧紧地握手。在我们一生中很少遇到这样幸福、高兴得说不出话、催人泪下的时刻。我不觉感到心情豁然开朗，犹如放下了千斤重担。战争即将结束。一场漫长、残酷的战争啊，不知多少同志、同胞牺牲了，他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欢乐。正是他们的牺牲，为我们迎来了今天。

金色阳光洒西贡

4月30日，西贡沐浴着灿烂的金色阳光。大街小巷到处悬挂的半红半蓝的解放阵线旗帜和金星红旗，在微风中飘扬。全城的人拥上街头，扯下伪政权的旗帜，挂上自己的旗帜，召唤伪军士兵放下武器投降，解散伪政权，建立革命政权。全城动员起来，维持秩序，为革命、为自己保卫好工厂和生产基地。多少年来才有了今天。回想1945年8月25日也象今天一样，迈开了革命的步伐。人们悲喜交加，看着胡伯伯的队伍，看着解放军战士，看着巨型坦克和大炮。凯旋的

队伍里有我们的孩子和兄弟吗？坐在坦克、炮车上驰向四城的有我们的叔伯、姐妹吗？街道上一群群的人围着解放军亲切交谈。啊，他们和从前的伪军士兵完全不同。他们是那么淳朴、英俊，那么年青、可爱。

西贡行动起来了。事实上在几天前就行动起来了。人们曾用欢呼庆贺来迎接历史上罕见的这种日子。1789年1月31日，也就是己酉年大年初一，京都升龙的人民充满自豪和信心，走上街头庆贺、迎接民族英雄阮惠乘胜挥军解放首都。诗人吴玉游记述了那一年取得胜利时的热烈情景：

“云消雾散天放晴，
全城老幼笑盈盈。”

今天，在西贡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战斗的城市，也同样充满热烈的气氛，而且比那次更热烈，充满奋起的豪情。每个人都为显赫的战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保卫了自己可爱的城市，使之完好无损，保卫了人民的幸福康乐。

4月30日11时30分的前后，西贡市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种变化就在于，在此之前子弹横飞，家家户户焦虑不安，人人都行动起来。而在此之后，到处旗帜飘扬，一派节日气氛。街上人们熙熙攘攘、秩序井然。水电照常供应，正常的生活一刻也没有间断。有哪一场战争能如此顺利地在一个350万人口的城市中结束？也许这就是历史上罕见的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党的领导的智慧：军事进攻和群众奋起相结合，群众奋起和军事进攻相结合，外线进攻和内线作战相结合。其他的作法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形势，也不会取得胜利。实践的结果是一清二楚的。

在守德的市自来水厂，以阮文梦同志为首的起义委员会

发动群众，用自己的威慑力量赶走了敌人，在我军向西贡进发途中，经过该厂前几个小时就占领了工厂。敌人在工厂及其周围驻扎了一个海军陆战营、一个高炮营和一个保安连，到4月28日又向该地增派了约40辆坦克和装甲车。敌人还给工厂民事防卫队发了30支枪，但这些枪大部分都掌握在我方有组织的群众手里。以成都同志为代表的守德郡工会向阮文梦同志交待任务：把工人组织起来，想尽一切办法，把工厂完整地保护好。

4月30日，当听到我军坦克从边和驶来时，阮文梦同志就领导着工人群众放出使敌人心惊胆战的消息，并亲自爬上屋顶升起事先准备好的一面大旗。伪军慌了手脚，以为解放军已开进工厂，马上就溃散了，有的甚至丢弃车辆，徒步逃走。阮文梦同志组织了武装护卫队和工厂管理委员会，继续保持正常生产，毫不间断地向城市供水。

守德发电厂由Z23别动队攻占。在占领迪折桥以后，Z23别动队接到命令攻占河仙水泥厂、仓库、塞科工厂（现在的第四工程联合企业）和发电厂，并安排保卫工厂安全和组织工人继续工作。实际上西贡市只有4月30日停电两个小时。每天晚上，各家各户、公共场所和街道上到处灯火通明。

几乎所有工厂的工人，从纺织厂、食品厂到机械厂都参加了保卫工厂、保护机器设备的斗争，直到军管会正式接管。在所有的办公地点，从中央机关到市级机关，公职人员都完整地保存了文件档案、资料和办公用具，准备随时移交给革命政权。

这场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转折，真是完美极了。没有发生任何一起卑劣的报复，没有发生严重的破坏和混乱。只有真

正的革命、真正的人民战争，全民服从党的大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的胡志明市人民建立了辉煌的战功，值得称颂和赞扬。

我们高兴地向全体指战员、党员、团员和西贡市人民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发来的嘉奖电：

“政治局热烈嘉奖西贡—嘉定军民，嘉奖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自卫队各单位的全体指战员、党员和团员。你们进行了无比英勇的战斗，树立了辉煌战功，消灭、瓦解了大量敌军，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解放了胡志明市，把以胡伯伯名字命名的历史性战役引向彻底胜利。

全体同志要高度发扬决胜精神，和同胞们一起继续进攻、继续奋起，完全解放祖国亲爱的南方。

政治局”

解放浪潮遍地花

在西贡和南部东区展开进攻和奋起的同时，在湄公河平原各省和富国岛、昆仑岛等遥远的岛屿上，人民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军民十分紧密地配合进攻、奋起，消灭敌军，一个又一个省先后得到解放。1974年10月，南方局发出乡解放乡、县解放县、省解放省的指示以后，革命运动就已经开始了准备和动员。各省干部和人民群众都热烈地响应这一正确的主张。成千上万的青年参加了各种武装战斗组织。上十万的群众参加了运送弹药、转运伤员的民工队伍。各群众团体在各级地方党委直接领导下，动员自己的力量，作好准备，参加共同奋起。湄公河平原的革命传统清楚地表现在历次革命运动中，从1945年八月革命，经过抗法战争到1960年的

“共同奋起”以及整个的抗美援朝时期。今天，千百万颗铭记党给自己带来土地和温饱生活恩情的心灵，正期待着解放自己的故乡。

最早得到解放的省是今天划入九龙省、属于第9军区的茶荣省。这个省曾被南部西区命名为“1974—1975年旱季两个月战斗先进省”，曾荣获临时革命政府授予的一级铜墙勋章。

4月28日下午3时，省综合战役指挥部颁布命令，从省会到各县的武装力量都纷纷出动。4月29日夜全省打响。

到4月30日7时，省会保安队驻地、炮兵阵地、飞机场都已解放。省城内外3万多越裔、高棉裔同胞并肩走上街头，夺取伪军的枪械，解放村、乡、坊、街道的伪政权。各县共有18万群众奋起夺取政权。这时，只剩下伪省长府。由阿拾（阮晋才）和二治指挥的省武装力量，包括地方部队、特工和武装公安，同敌人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战斗。我们有50位同志在伪省长府的围墙外牺牲了。坚强的指挥员二治也在这里倒了下去。4月30日8时，战斗仍然十分激烈，伪省长府被团团围困。这时春龙庙的住持神赛自愿进去说服这个顽固的上校省长，给他指出一条出路，向同胞们赎罪。10时30分，全部伪军放下武器投降。11时，伪省府升起了革命的旗帜。茶荣省会得到解放，时间比西贡还早一些。

茶荣省另一个奋起的典型是乾隆县的美溪伪警察所。同胞们赤手空拳包围并冲进该所。一名伪警察中尉拉响一颗手雷，炸死了4名群众，炸伤了另外12个人。立刻有上百人冲进去占领伪警察所，活捉全部伪军，把那个伪警察中尉当众处死。

4月30日晚8时，茶荣省最后一个县沿海县获得解放。

前江省是湄公河平原具有重要意义的省份，距西贡不远。如果敌人有力量，就可以把它当作从湄公河平原支援西贡的跳板。前江省包括原来的美荊省和鹅贡省。在这里，敌人集中了伪7师和9师的几乎全部兵力，拥有强大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他们极力固守生死攸关的4号公路，但是，如前所述，4月26日起4号公路多处已被我军占领，敌人被分割成数片。这里的战略交通线还有贯通全省的米市运河，是从金瓯到西贡的一条内河航线，长期以来就是极其重要的运粮通道。前江省同胞参加过无数次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从法国军队开始踏上越南国土到反抗暹罗军入侵，只有阮福映在迪恩引狼入室。该省有一部分属于著名的同塔梅平原，从三、四十年代起直到今天，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仅仅今年4月份，就有4万人参加民工队运送武器。从4月15日起，有4千人出动破坏道路和在米市运河上设置障碍；上万人走上街头参加进攻和奋起，解放自己的家乡。

这个省最早夺取政权的是米市县。地方部队配合武装公安部队和别动队消灭了敌军，于4月30日中午1时30分解放了县城。接着，部队发动群众奋起捣毁伪政权，进而解放全县。

在鹅贡省，情况发展稍有不同。省会位于敌人控制的纵深地区，省人民武装力量人数不多，驻扎在较远的西部地区。西贡伪中央政权和伪军投降的消息传来，人民群众纷纷涌入鹅贡省会，用话筒或扩音器喊话，号召敌军放下武器，返回家乡谋生。伪军家属冲进据点，拉走自己的子弟，要他们丢下一切东西，回到亲人身边。当地党政干部巧妙地率领乡亲们解散伪政权，拆毁岗楼，收集起枪支弹药。敌人的省政权机构都垮台了。4月30日下午1时，人民完全控制了这座

省城。省里的客车、卡车一起出动，来到永友接自己的部队去接管城市。4月30日下午2时30分，鹅贡省全部解放。

鹅贡省具有用共同奋起的威力打击敌人的传统。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前，地方部队仅一个连配合民兵和群众，每天夜晚可以拿下三、四十个岗楼，到停火生效时，几乎只剩下省会还在敌人控制之下。这类的事情还很多，如1960年总奋起之后，捣毁、夷平吴庭艳的战略村；1974年，许多地方人民起来当家作主，现在又自己解放故乡的省份。

在省会美萩市，劳动青年团市委的一个别动队依靠革命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在各坊奋起，迫使敌民事防卫队和警察交出枪支，号召伪军放下武器投降。4月30日下午4时，一面巨大的解放阵线的旗帜在阮庭焰中学的旗杆上高高升起。第一、二、四、五、六坊先得到解放。但足球场附近兵营中的敌人仍然没有动静。同志们分乘六辆吉普车，插着革命的旗帜，开到河边，用扩音器召唤敌军投降。车子驶过章阳渡口时遭到敌人的猛烈射击。一辆车被击中，陈文沉同志牺牲。其他同志一面用手枪和手榴弹还击，一面继续前进，旋即占领该桥，与槟榔取得联系。4月30日夜12时，第8军区的8师1团才开到该地，与在旧市场进行顽抗的伪装甲6团展开战斗，并全歼该团。5月1日晨5时，美萩市完全解放。

4月30日清晨，许多群众拥上4号公路。在省人民武装力量歼灭敌军、占领彭门桥的同时，平富地区的群众威逼伪军士兵，缴获了6辆完好的M113装甲运兵车，并占领了设有两门155毫米和4门105毫米大炮的属然炮兵阵地。省人民武装力量用缴获的6辆M113装甲车解放了丐礼镇。该地的伪7师12团完全溃散。

敌人在美萩省平德还有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原来是美

步兵9师的基地。美军撤走后，就把这个基地交给伪军。美国在这里投下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运来大量的机械设备，强占大片的肥沃良田，夷平人民的房屋庭院，在湄公河岸边修起这个军事基地。他们侵吞当地老百姓的财产，杀死无辜的、善良的百姓，把良田沃野变成了战场，变成了军事基地。美国的粗俗武夫、威斯特摩兰将军不仅不认为自己是战犯，而且还趾高气扬地吹嘘这个军事基地：“……（美国）海军修建营和陆军工程兵还是修成了一个沙子堆成的小岛，这个岛子在干旱季节里是地球上尘土最多的地方，……先把稻田挖掉，开成一个供巡江艇停泊的人工湖，同时用水力挖泥船把泥沙从河底挖上来，填进640英亩水汪汪的稻田。我亲自为基地选了一个象征美国和南越通力协作的名字——同心。”^①

不仅如此，这位将军还供认，他对我国人民使用过化学武器。他说：“……落叶剂也在那些越共控制的偏僻地区使用过，让敌人生产不了稻米。尽管如此，但后来由于政府控制区的扩大，同越共控制区又缺乏一条明晰的界线，因此也就不常采用这一做法了。落叶剂的使用可能造成某种生态上的损害，但损害究竟有多大，又能持续多久，则尚待考察。……”

就在这个同心基地，4月30日晨，伪7师司令部和附近各军事小区举行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死守”问题。他们以为坚固的工事、美式复杂的铁丝网就可以挽救他们。中午，他们命令丐礼和周城以北的各团全部撤至该地，并派装甲部队去4号公路接应。但在撤军的路上，一批士兵开了小差。撤

^① 引自威斯特摩兰回忆录《一个军人的报告》。——原书注

到基地时，官兵不战自乱，又逃散了一批。从4号公路到2号公路，一路上，同胞们一见到还扛着枪的伪军就说：“你活腻了，不愿意过几天和平日子吗？事到如今，还背着刀枪干什么？！”或者说：“西贡都完了，你们还不知道吗？天哪，‘同心’基地有多大力量能抗得住解放军？算啦，回家过日子去吧！”士兵们撤到基地以后，同胞们也跟着进了基地。士兵们又陆续逃亡。晚上7、8点钟，游击队混进了基地。到了深夜12时，省解放武装力量、区里的部队也已开进基地。敌军全部官兵，有的溃散，有的被生俘。5月1日零时，“同心”基地完全解放。

湄公河平原各省纷纷开展进攻、奋起的情况大致与上述各地相同，4月29日、30日和5月1日进展最快。虽然西贡已在4月30日中午无条件投降，伪军第4战术区司令部和伪第4军司令部也于当晚投降，但各省的伪军和伪政权头目们仍然顽抗、“固守”，等待美国最后的支援。然而，面对我武装力量和革命群众急风暴雨般的进攻和奋起，有的敌人被消灭，有的则投降、溃散了。到4月30日和5月1日，几乎各省都已完全解放。

在胡志明战役指挥部，我们早已组织好包括步兵、坦克、炮兵、高炮部队在内的一支强大的部队，准备开往湄公河平原，给第8、第9两军区军民助一臂之力，迅速消灭敢于顽抗的敌军。我们清醒地知道：西贡伪军和伪政权的首脑机关被粉碎，美国人被迫爬上屋顶“腾云架雾”地逃走，这对解放整个越南南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绝不能简单地认为，西贡解放了，其他地方也会立即随之解放，我们就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坐享其成了。

直到末日来临，阮文绍还在和手下的心腹们讨论：“如

南部东区和西贡失守，就不惜一切代价把越南南方的其余力量收缩到湄公河平原，固守这一地区……严守南部各岛屿。”

“……芹苴将作为越南共和国的首都。”……

实际上，西贡投降了，伪军还准备固守同心和芹苴，就是芹苴投降了，其他一些地方的伪军还想固守下去。如果我们事先不采取措施，粉碎敌人龟缩在湄公河平原的阴谋，没有一项运用政治、军事相结合的威力发动同时进攻和奋起的综合革命战略，可以肯定，形势的演变要复杂得多。湄公河平原军民早已认识到自己起来解放家乡的历史使命，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对最后几次战斗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湄公河平原各省在党的英明领导下，配合西贡战线的战斗，一起发动进攻和奋起，有的省比西贡解放还早，有的地方与西贡同时解放。在伪中央政权无条件投降以后，上百万军民利用这一宝贵的时机，更加勇猛地冲锋向前，仅在4月30日和5月1日两天内，就几乎全部解放了湄公河三角洲各省。

我们在南部东区早已准备好的各兵种合成部队用不着再出动了。第8、第9两军区都给南方司令部发来电报说：“我们自己的力量已经够了。”实际上，湄公河平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歼灭敌人，解放自己的。

第9军区以自己的力量消灭了伪第4战术区的首脑机关，解放了“西都”，而且还完成了切断芒施河、切断4号战略公路和控制芹苴大型机场的任务，及时地配合了胡志明战役。

4月25日，第9军区收到南方司令部4月24日ZN 693号电报。电报说：“4月28日起，你军区务必按预定计划在多处重要地段破坏和切断4号公路。同时，使用特工部队以大、小不同的规模连续向茶努机场实施进攻，同时进行炮击，控

制机场跑道、指挥塔，勿使敌机起降。4月29日夜、30日凌晨，你军区倾全力攻占并守住整个茶努机场，并视条件攻取芹苴市。”

4月28日，军区遵照南方司令部的命令，开始对机场进行炮击和连续进攻。4月30日上午杨文明宣布投降时，军区主力20团立即发动攻势，并于当天下午2时占领茶努机场。敌人全部投降，其中包括步兵21师司令部、空军4师司令部。我军缴获各种飞机113架。

与此同时，芹苴市的政治干部领导群众奋起，占领了市中心各坊，其中有第一郡的安居坊、安业坊、安和坊，第二郡的安会坊、安盛坊和第三郡的平易邑、隆泉乡等，我方的敌工组织配合人民群众于下午2时占领了广播电台，并于下午3时开始播出革命的声音，召唤伪军士兵投降。

4月30日下午3时，第9军区武装力量紧缩包围圈，对伪4军指挥所发动猛攻。敌人无路可逃，伪第4战术区司令阮科南将军在绝望中被迫投降，几小时后自杀了，结束了充当爪牙的可耻的一生。4月30日夜，我军全部控制芹苴市。

接着，第9军区司令部派出主力101团，乘坐刚从敌人手中缴获的24辆M113装甲运兵车和一些卡车，直奔隆川、朱笃方向，解放湄公河平原最后几个地方。但是单靠军队的强大力量是解决不了该地区复杂形势的。在这里，进攻和奋起相结合，军事力量与群众政治力量相结合，体现得更加明显。这清楚地表明了党的意愿和民心的统一，清楚地体现了革命正义的力量。

这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很晚才解放。早在4月25日，前江东岸的清平县就已得到解放。接着，前江以东的敌人全被肃清。他们本来打算退守鸿御据点，但在我军强大压力

下，他们于5月1日上午8时被迫投降。

解放“圣地”

在朱笃市，4月30日晚，驻守军事小区之敌接到命令退守“和好教圣地”。敌人撤退前放火焚烧金库和档案库，当地群众及时扑灭了烈火，为革命抢救出了11箱纸币和必要的文件、档案。

所谓“和好教圣地”是设在和好村供奉和好教主的地方。和好村是和好教创始人黄富数的家乡，位于连接前江、后江的一条小河——万饶河边。长期以来，伪政权依靠和好教头目中的一些坏人，利用一些道徒为其谋利，反对革命。在覆灭前夕，他们还图谋利用信奉和好教的同胞，控制这一地区上百万的信徒，依靠“圣地”进行长期固守。敌人存有这样的梦想，是因为无法理解这些大多数就是劳动农民的教徒，他们热爱祖国、反对压迫。敌人无法理解和好教的渊源和“教主”黄富数的本意。1946年到1947年，儒雅、清秀的黄富数曾把我视为挚友，倾听、相信我讲述的革命道理，并多次向我吐露他的心思。在抗法战争中，我是同塔梅地区第8军区司令员。黄富数在根据地和我在一起呆过一段时间。他曾经同我谈心：“我是个爱国者。我不能忍受让法国鬼子侵占我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是，怎样进行反抗呢？我日夜苦苦思索。倘若我早些找到你们，就知道该走什么路了。”他停了停，笑着对我说：“现在也不晚哪。”接着又说：“我想了个办法，趁着人民还很迷信，创立一个教派来召集人民，以遮掩法国鬼子和密探的耳目。我们的群众多了，就有了强大的力量，那时再行动起来，复兴我们的国家。”

他又停顿了一下，然后边思忖边说道：“现在，你们说的很有道理，我相信。只有全国、几千万越南人同心同德才能成功。使他们懂得祖国遭难，匹夫有责，本来就富有爱国心的我国人民，一定会万众一心，与法国鬼子战斗。……当然，不能让我们的人民永远迷信下去……”遗憾的是，此后他疏远了我们，又被坏人控制、利用，拉他远离了已经找到的道路。后来他去世了，坏分子以他的名义利用了他的信徒。但是正义必胜，这是真理。

就这样，伪军残部从各地纷纷撤到“圣地”，聚集有一万多人，并建立了阵地。

我军解放靠近柬埔寨边界的新州以后，省地方部队1营和2营与县武装力量一起分两路开往“圣地”，一路沿前江东岸进军，另一路沿后江东岸前进。2营前进到安隆的创运河准备渡河去西岛时，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由于缺乏渡河工具，同胞们为部队动员了一些船只。另外，同胞们还让一些老人和士兵家属走在前面，把船直接划进敌军阵地，召唤他们投降。阵地上敌军溃散，纷纷逃窜，我军安全地过了河。2营进抵安富，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两路部队取得了联系，并向敌军主要聚集地点进攻。这已是5月2日下午2时。当部队正在布置进攻时，经常在该区活动、负责动员教徒的省委委员阿香前来报告说：“敌人已经乱了。你们应该在今天下午发动进攻。”说完她就去动员群众配合部队压制敌人，并动员伪军士兵投降。阿香见了和好教头目之一梁仲祥，说服了他。梁仲祥向解放军投诚。我军开进“圣地”，一万多名伪军缴械投降。5月2日下午5时，我军全部控制了该地区。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一些顽固分子逃走以后，又同一股

人数更多、装备更好的残军合在一起。他们龟缩到新市郡一座名叫西安古寺的庙里，自称是和好教军队。

解决这个敌军据点之前，我军已经解放了濒临后江、有许多新建筑的美丽的隆川市。在这里奋起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教职员和学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4月30日中午，广大教职员和学生占领了学校，惩办了多年来随意压迫、抓捕他们的恶棍。然后，依靠当地的基层组织占领了电讯台、金库、炮兵阵地。珍藏已久的革命旗帜在各地迎风招展。他们又动员群众做了许多新旗。他们立即用刚缴获的一些枪支武装起来，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情况十分复杂，当听到西贡电台播出杨文明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讲话时，一批坏分子、反动机会主义分子利用我军未及时赶到的机会，立即发动政变，掌握了政权，称之为“和好教夺取政权”。当时隆川市有两支力量奋起：人民奋起和所谓“和好教奋起”。这些家伙有充足的武器，进行报复性的抢劫。人民的武装力量较弱，又尚未与外面的我军取得联系。但由于师生们掌握着电讯台，一面呼叫芹苴给予紧急支援，一面选派市内素有威望的人直接去见夺权的头头，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干这种蠢事！你们只有一小撮人，肯定打不过解放军。现在各地，包括西贡都已欢天喜地安定下来。你们这样做，只能使隆川人民继续流血。全国即将完全安定下来，难道你们还忍心制造更多的仇恨吗？芹苴的坦克快开到了。群众已经潮水般地走上街头迎接解放军。你们出去看一看，就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了……。”

“他们离这里还有多远？”

“还有六、七公里就到了。”

于是，这些家伙下令解散，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大部

分人混进老百姓里，也有一些逃走，投奔了驻守西安古寺的敌军。

5月2日9时，隆川完全解放。

再说西安古寺。敌军早有预谋，如果各地被我攻占解放，他们就聚集起来，逃到“和好教圣地”和西安古寺。万一“圣地”失守，他们就把西安古寺作为最后的立足点。聚集在这里的约有1万4千名全副武装的伪军。此外，还有无数满载武器装备、粮食等物品的船只停泊在河道上。古庙里外拥挤不堪，陆上、河上都挤满了。他们匆匆忙忙地部署“死守”。

当时庙里的住持都是年高、道深的宗师，他们不同意这样胡作非为。老人们说：“重建和平的日子已经到了。这正是教主生前盼望并教谕本道四方信徒努力实现的太平愿望。因此，继续制造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惨状是违反教主心愿的。”信奉和好教的同胞们一致表示支持。这些残兵败将到这里以后制造的抢劫、奸淫、杀戮的灾难，比伪政权的压迫、镇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群众在附近地区的革命干部带领下，起来推翻伪政权，解散民事防卫队，收缴武器，挂上革命旗帜和“政权属于人民”的标语；同时动员敌军放下武器，返回家园谋生，不要白白送死。还流传这样的消息：解放军正从沙沥、隆川，从芹苴步行或乘坦克和军舰向这里开过来。敌军头目极度恐慌。实际上他们也无法指挥已经瘫痪、厌倦、毫无士气的军队了。于是，谁有办法，谁就逃走，人民群众也积极协助，帮他们逃出去。不久，这支杂牌军就像肥皂泡那样消失了。

1975年5月6日，解放阵线的旗帜映红了西安古寺，在整个地区迎着清新的微风高高飘扬。越南南方 B2 战场的最后

一片土地得到解放。

打开海岛牢房

大陆上展开进攻和奋起的同时，海岛上也展开了奋起和进攻。南方最大、最重要的两个岛屿是昆仑岛和富国岛。美伪自恃其海、空军力量强大，把这两个岛视为他们最安全的地方。他们把这两个岛变成了大监狱。上万的爱国志士被监禁在这里，遭受酷刑，许多人牺牲了。多少年来，资源丰富、山清水秀、海风飒飒的海岛变成了充满愤恨和仇怨的地方，人们期待有朝一日打开牢房、砸碎镣铐。

昆仑岛也和富国岛一样，到1975年3、4月份，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大陆不断传来。在关押政治犯的监牢里，同志们藏有一台小型收音机，经常收到我军不断胜利、一个又一个地方获得解放的消息。后来，看守监狱的伪军官兵的议论也成了消息来源，增加了大家的信心。伪军官兵们说：“解放军把福隆省都占了”；“西原失守啦”；“林同省也丢了”；“他们太厉害了，炮打得又准又远，一发炮弹就能毁掉一幢楼，……他们的坦克开到哪里，哪里就碾碎了，美国坦克都顶不住，……听说用的全是俄国武器……说不定他们的潜水艇已经来了……”。

4月30日，在昆仑岛关押政治犯的七号监狱里，一些同志凑在一起听到河内广播电台说，……西贡解放了……伪总统杨文明已经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马上传遍整个监狱。接着，大家碰头商量，判断分析情况，讨论行动的办法。突然，牢门大开，几个伪军官探头进来，平日凶神恶煞的神气不见了，低三下四地说：“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占领西贡了

吧？真是，你们还呆在里面干什么？”同志们立即决定，冲开牢门，拥出门外，把早已秘密准备好的解放阵线旗帜和金星红旗升上旗杆，悬挂在监狱的大门前。他们奔向一号监狱，打开大门，然后一座座监狱的大门都打开了。人们站起来了，旗帜在飘舞。全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

4月30日下午4时左右，昆仑岛全部解放。

解放委员会建立起来了，暂时管理岛上事务，等待与大陆取得联系。

此时，被派去解放该岛的我海军船队正在东海上疾驶。

富国岛距大陆较近，面积较大，居民也多。许多年前，地方党组织就建立了抗战根据地，领导群众不断进行抗敌斗争，有将近一个连的武装力量，曾在1975年春季积极活动，配合进攻敌人。在扬东，我军曾炮击和进攻过敌人的许多据点和警察所，迫使敌人撤出一个据点，并消灭了一个警察所。这里主要囚禁着在各战场不幸被俘的我军干部和战士。这些同志曾多次回击残暴的敌人，一批一批地越狱进入森林，组织成武装战斗队，并和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有的同志曾伐木造船，渡海返回大陆，领取指示、给养和装备。有一次，南方司令部曾安排一些越狱的干部回到根据地，听取了监狱情况的详尽报告，提出了活动方针，创造条件让他们重返富国岛指导工作，作为与上级进行联络的桥梁。敌人一向轻视当地的斗争运动，可能他们认为规模小，力量弱，只要加以孤立，进行镇压就行了。因此，他们仍把这里当作最后的安全地区。4月20日，当西贡受到严重威胁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立即把驻西贡的全部人员、家属和代号为“7号”、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秘密广播电台撤往富国岛。这个电台包

括用高棉语和越语广播的5套广播节目，其中包括“爱国神剑”和“越南慈母”。该台原设在红十字路（今宜静苏维埃路）7号，因而冠以“7号”的代号。这些电台十分反动，按照中央情报局编排的内容和形式活动，动摇爱国者的信心，是基辛格一系列恶毒阴谋的一部分，企图在越南南方获取彻底胜利，使越南南方永远成为美国的新型殖民地。正是基辛格在巴黎协定刚刚签订后下令建立起这几个电台的。这再次说明基辛格—尼克松在缔结和平协定时的虚伪面目，也说明美伪集团破坏巴黎协定是必然的。

但是，刚转移到富国岛的这些电台和一千多人，到4月底就不得不登上美国军舰撤往关岛。

4月30日中午，监狱里的人、狱外的武装力量，配合当地力量和人民奋起，拿下岗楼、打开监牢、击溃伪军，夺取岛上的政权。革命政权从4月30日下午5时开始管理岛上事务。

接着，伪海军一些舰只、和好教的一些反动分子窜来，企图盘踞该岛。但这个岛早已被我解放，于是，敌人继续逃窜，有一些伪军舰只又回来投降。

这样，连远离大陆的岛屿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进攻和奋起，并在1975年4月30日下午，自己解放了自己。

整个B2战场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B2战场的军民坚信并严格地遵从党的领导，发扬革命斗争传统，坚持进攻和奋起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山区到平原、海岛，从农村到城市，甚至在伪政权的首都西贡，分兵三路进攻。B2战场的军民始终保持忠贞的情意，斗争在先，胜利在后，但它作为祖国的铜墙铁壁，将永远引以为自豪。

尾声 进西贡实行军管

重回西贡忆当年

我又一次遇到了突然的事件。

5月1日，我正在胡志明战役前线指挥部紧张地工作：掌握湄公河平原如火如荼地开展进攻和奋起的情况，准备各路增援部队，安排和部署西贡和南部东区的军事力量，继续指挥追歼成连、成营地分散在西贡周围密林和沼泽地区的残敌。

黎德寿和范雄同志向我传达：“黎笋同志来电话，政治局决定你担任西贡——嘉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马上走吧，别耽误了。”

4月初以来，在政治局、南方局和黎德寿同志的指导下，一切事情都筹划好了，制定了西贡市军管会和各单位、各部门接管委员会详细的工作计划；组织起各个领导班子，指定了人选；也确定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和接管委员会主任（当时并不是我）。政治局已经同意并从河内中央各部门派来了许多干部，加强力量以便展开工作，显然工作量是很大的。当各路部队从不同的方向进攻西贡时，军管和接管的各机构已紧随部队进城。现在他们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也就是说，从4月初开始，作战部队和奋起力量完成部署的同时，管理和接管城市的队伍也已及时部署就绪。在制订进攻和奋起计划的同时，也作好了接管和军管的计划。这项工作

尚未完成，另一项工作又接踵而至。我们决心夺取全胜，而且坚信一定胜利，因此所有的事都已事先考虑好了。

每当我遇到突然的事件时，我从不去想这是我工作中遇到的第几次意外了，反而告诫自己这决不是最后一次。还会有更多的突然事件，包括美好的或者倒霉的。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只要工作需要，我们还有一口气，还在继续工作，就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就是到了干不了的时候，到了“眼发花、头变白、腰已弯、禄应辞”，年老体衰的时候（这是正常的），还会碰到突然的事情，直到我们化为泥土，才万事皆休。

我们乘上嘎斯车离开了指挥所，穿过油汀的橡胶林，渡过西贡河，到边柴，经过长榜然后沿1号公路向西贡方向前进，路上又经过古芝、新富中、霍门和婆拐。葱郁的果园，翠绿的竹丛，鲜红的扶桑，美丽的田野村庄，多么熟悉和亲切啊！仿佛就像昨天还在这里生活过似的。路上无论是遇到的人群，还是站在门前、庭院里的人们，他们都笑容满面向我们招手。一双双明亮的眼睛，一张张亲切的面孔，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我心潮起伏，真想停下来，去看望每个家庭，热烈地亲吻每一个人。我愿把今天见到的一切，从一望无际的肥沃田野到蔚蓝辽阔的晴空，都尽收眼底、铭记在心坎上。不需去问这是什么村、什么寨，也不需去问那是什么坊、什么街区，更无需去问您是姓阮，还是姓黎。人，都是我们的亲人；村庄，都是我们的村庄；一切都是我们的！三十年啦，敌人分割我们的祖国，人民生离死别，咫尺相距如隔重洋，亲人也变得陌生。如今，天是我们的天，地是我们的地，自由了，独立了。乡亲们，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可曾意识到这一切？

每每回想起当时的心情，我都暗暗地称赞诗人春耀在《我愿走遍整个南方》中写下的很好的诗句：

“凤凰展翅迎接胜利，
我仿佛效屈原飞过山林。
茫茫苍穹虹霓飞舞，
祖国南北充满欢笑。
我愿走遍千家万户，
走遍每个村庄每座藩篱，
我愿向每位母亲鞠躬顶礼，
用山河的声音高呼‘万岁’。”^①

我无意中发现今天我去西贡走的路几乎就是1945年9月我离开西贡去参加抗战走的那条路。当时，我经过鹅邑、婆拐，在霍门、巴点辗转了一段时间，再继续向安仁西、古芝、德和、美幸前进。不得不把我们亲爱的西贡市留给法国人、英国人去占领。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我们的革命政权还处在幼年时期。我们手里只有一些竹枪和缴获的火铳和日本造步枪。离开西贡前，我曾身佩短枪、手持竹棍，在蓬桥、婆炤到富润一带战斗。无数勇敢的青年和满腔热血的老年人，在熟悉的“兄弟们啊，冲上前去……”的歌声中并肩前进。我永远不能忘记当时西贡的名教授范绍老先生的形象。他也和别人一样头戴草帽、手持竹枪，和我们青年人一起奋不顾身，冲向敌人。多少同志、多少同胞倒下了，永远安息在西贡这块土地上。而我们呢，我们空着双手出发了。但最宝贵的是我们有一颗赤诚的心，坚信党，坚信未来是光明的。我们暂时告别了亲爱的城市，互相叮咛着，走，是为

^① 摘自河内新作品出版社《1945—1975越南诗集》第85页。——原书注

了回来。我们立下誓言，要在解放我们的城市、同胞的光辉的日子里回来。这一天是不会太远的。但是，实际和理想终究不是一回事，一万多天过去了，还不算远吗？时间流逝，经历了多少日日夜夜，送走了多少个旱季、雨季，总还可以计算。但是，我们走了多少路，谁也记不清。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从这个村到那个乡，无论是在西贡周围，还是南部东区各省，从沼泽到山林，西区、中区各省，以及整个同塔梅平原的河网地带，我们都一直生活在父老乡亲的亲切关怀之中。我们走过数不清的村庄，遇到过无数老妈妈和兄弟姐妹。当年十来岁的小响导，如果还活着，肯定已经成家立业，儿孙满堂了。如果要我数出这些村庄和乡亲们的名字，这就是“越南”村庄和村民，“五大妈”、“八大妈”、“二伯”、“七叔”把我们这些“老三”、“老四”当成自己的亲人。个人的事业隶属整体的事业。你能够取得成功，是人民帮助的结果。吃水不忘挖井人。你进城以后，决不要忘记沼泽和山林。你依靠人民完成了任务，今天当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人民。你依靠朋友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千万不要忘记他们。越南的道德是有情有义、始终如一。我们要心明眼亮，这是人一生中最可宝贵的。

我们含辛茹苦走遍了祖国大地，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今天终于回来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身子倒还是好好的。多少次炸弹都对我很客气，也许不去想它，它倒躲着我。这也算是幸运吧！阮荐不是说过吗：“干戈未息幸身全。”他在《乱后到昆山感作》诗中写道：

“一别家山恰十年，
归来松菊半萧然。
林泉有约那堪负，

尘土低头只自怜。
乡里才过如梦到，
干戈未息幸身全。
何时结屋云峰下，
汲涧烹茶枕石眠。

征战之中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安然无恙。多少同志、朋友和兄弟安息在祖国的某一块土地上。他们倒下了，让我们今天回来，代表那年秋天离开这里的人告诉同胞们：“我们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乡亲们，你们有的亲人一去不复返了，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你们就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儿女，让我们一起建设日夜向往的新生活吧！”

我还记得每当遭到外国侵略时，越南农村出现的壮烈情景。那一年，各阶层的青年男女，有工人，有知识分子……，他们义愤填膺，壮志凌云，成群结队地奔赴南部中区（法国鬼子尚未到达那里），请求中央发给武器，组织武装力量，返回家乡杀敌卫国。另一些人留下，在原地组织起来，夺取敌人的枪支武装自己，在城市周围阻击敌人，我和弟弟阮越洲就参加了这支队伍。当时听说日本投降时曾把武器埋藏起来，多少个夜晚，我和五卑（即胡氏卑上校，现已退休），就领着几个小青年，偷偷钻进巴点的原日本兵营，挖开枯井找出日本枪支，武装自己打击法国鬼子。我和嘉定省委一起开会，作出成立武装力量的决议，把霍门、德和、巴点各郡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霍门、巴点、德和联郡解放军”，并确定以美幸村为根据地。当地人民亲切地把我们称做“自己的部队”，用以区别那些不打敌人却经常滋扰百姓的队伍。从此，同志们就在乡亲们的掩护下连续战斗，逐渐发展成12、14、15各支队，以后又成为第7、第8两军区

……力量日益壮大。部队曾集结北上，后又返回南方抗美。今天，我们回来的时候，大炮、坦克代替了竹枪和火铳。我们占有压倒优势，比敌人强大好几倍，打败了比昔日法国殖民者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头子。

这就是革命，这就是正义。

听胡伯伯的话，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领导，有赤诚的心田、钢铁的意志，我们就有移山填海的威力，就能做到一切。

离开西贡的那天，我忧心忡忡，回首遥望朋友和同胞，心如刀绞。今天我回到西贡，看到大街小巷胜利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眉开眼笑，我感到无比欣慰。我们的汽车从霍门驶入市区，一路上到处是伪军步兵、伞兵丢弃的军装、鞋袜。人行道上更是五花八门，背包、钢盔、子弹带一片狼藉。西贡的几十万伪军是引狼入室的伪政权所豢养的，是以杀人为职业的雇佣军。如今被打得丧魂落魄，溃散逃窜，在街道上留下了一幅残败的惨状。一切不合情理、违背人心、非正义的东西，尽管能得逞一时，但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们的命运就是这样。

我们的汽车在公路上飞驰，不觉进入了宽阔的统一路（即现在的“四·三〇”路），直抵独立宫。先期抵达的同志们已在那里设立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办公机关。我同大家见了面。不过在开始工作之前还是先让我把西贡好好看一看，以慰思念之情。我走在刚刚解放，刚获得自由的都市里，从这条街到那条街，看到我们笑逐颜开的人民，他们善意地看着我们这些刚刚进城的解放军，看着我这个“鬃毛衰”的解放军战士。哪还有比这更高兴的呢！人们也许以为我老家就是西贡，历尽沧桑前来寻找失散的亲人。还真有人

同情地这样问我。今天和1973年的情况截然不同了，那时我是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住在新山一机场的戴维营。那时，我一上街就有伪军宪兵“前呼后拥”，那是为了不让我自由行动，不让我和群众接触。伪宪兵的汽车在前面鸣笛开道，要路上的行人、车辆让路，到了交叉路口不管红灯绿灯都不停车，害怕同胞们看见解放军。

我先到边艾河边。经转桥到芽龙码头，这是早年胡伯伯出国上船的地方。胡伯伯走时，回首深情地眺望亲爱的城市和几千年来祖先们悉心经营的故土家园。离开处于水深火热、深陷桎梏的同胞，伯伯的心里一定十分难过。他老人家强忍着仇恨，胸怀大志，从这里出发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伯伯走过的路，也就是给我们指出的这条路。我们在这条路上前进，并将在伯伯真理光辉的照耀下，在他老人家无比深情的关怀下，坚持不懈，永远勇敢向前！今天我们沿着胡伯伯的足迹到达了目的地。

“……伯伯象朝霞一样，
把我们充满荆棘的道路照亮……”

“……交给我们高山巨川，
交给我们千年利剑……”^①

我想起了1948年在越北第一次见到伯伯的情景。1945年9月23日南部抗战爆发以后，这是第一个包括军事、政治、阵线干部的南部代表团，由我担任团长，从同塔梅出发到越北，向胡伯伯和党中央汇报南部战场各方面的情况。所走的路大部分都要通过敌占区，虽然一路上都得到了十分周到的

^① 摘自诗人秋奔的诗《献上我们的心供奉伯伯》，河内新作品出版社《1945—1975年越南诗集》第30—31页。——原书注

照顾和协助，我们仍然需要组成一个装备很强的战斗单位，以便随时可以自卫，必要时还要打通道路前进。我们在长山东麓徒步前进，跋山涉水，还在金兰和芽庄等地渡过大海，整整半年没有休息。法国鬼子严密地监视着我们的行动，在藩朗山区、莫隘、庆和等地进行堵截、伏击，最后又在河内以西的云亭进行空降，企图将我代表团一网打尽，但都失败了。胡伯伯和党中央派人到很远的地方来接我们。我们一到越北山区，就急着立刻要见胡伯伯，以满足多年的夙愿。我们见到胡伯伯的时候，每个人都非常激动。他老人家就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父亲。他就是祖国的象征，民族的形象。他老人家有着宽宽的前额、飘拂的胡须、明亮的眼睛，是那样的慈祥。身体显得有些单薄，但举止从容不迫。即使不了解他伟大的思想，崇高的品德，只要一见到他也会充满无限的信任、热爱，感到无比的亲切。他的才智征服了天下，他的品德汇聚了贤才。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代里，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出现这样一位千百万人信仰、崇敬的人物，是多么可贵呀！代表团回南方那天，胡伯伯、党中央和政府为我们设宴送行。当着众人，胡伯伯把我叫到身边，递给我一把精制的宝剑，用激动人心的亲切语调对我说：“我交给你这口宝剑，把它带给南部同胞，用它去杀敌人。你告诉同胞们，伯伯的心、党的心永远和同胞们在一起。为了祖国，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胜利！”

胡伯伯的讲话永远回荡在我们的心中，回荡在南方同胞的心中。

1963年我又返回南方抗美。那一次我被任命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总指挥。启程前夕，胡伯伯叫我去他家里吃饭。伯伯拿出一盒古巴雪茄烟给我，对我说：“我只有这点

礼物，还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送给我的。你带回南方去送给那里的干部。他们吸烟时就会想到我对南方的殷切期望，其中也有古巴兄弟的一份心意。好好干吧，让我有机会到南方去看望同胞们。”

我永远不会忘记老人家的叮嘱。今天祖国已彻底解放，老人家却已永远安息了。我既不是文学家，也不是诗人，无法描述自己的心情。只好借诗人秋奔的诗《献上我们的心供奉伯伯》部分地表达我的感情：

“我愿化作一支利箭，
在祖国的铜墙上空呼啸。
越南啊，龙的后裔，
四千年鲜血浇花，花更红。
献上我们的心供奉伯伯，
花圈上缀着无数的战功。”^①

离开芽龙码头，我走遍了西贡，然后去堤岸。我们在顺桥路下了车，悼念1968年戊申正月初二被敌人在这里杀害的黎氏京同志和阮文矫同志。黎氏京同志是西贡市委委员、市委妇女工作部长，也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我是抗法战争时期，在艰苦、英雄的南部东区认识她的，抗美时期在南部东区根据地的密林中又和她见过面，她自愿到西贡城里动员组织姐妹们参加反对敌人、保卫妇女权利的斗争。阮文矫同志也是市委委员、市工运部副部长。不幸，他们相继被捕，被关押在志和监狱。在戊申新春总进攻和总起义的第一阶段，敌人用车把黎氏京和阮文矫两同志送

^① 摘自河内新作品出版社出版的《1945—1975越南诗集》第32页。

——原书注

到这里枪杀了。敌人对于进行政治斗争、手无寸铁、不幸被捕的人采取这种卑劣手段，实在令人难以想像。他们还有许多更野蛮的行为，如伪军将领阮玉鸾在西贡街头开枪打死双手被捆绑着的俘虏。伪军把被抓到的人剁成碎块、身首异处，拖走了事。对这些失去人性的越奸们暂且不提，我们要质问越奸的主子美国人：你们既然大声疾呼保卫人权，上述这些行为又算什么呢？今天，我们是战胜者，我们是怎样对待上百万的伪军将校和士兵的呢？何况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战犯。我们没有进行报复，没有象他们叫喊的进行血腥镇压。谁文明？谁懂得尊重人的尊严？

我去了明奉路及其周围地区。那是戊申年新春攻势第二阶段激烈战斗过的地方。当我成团兵力进占该地之后，敌人用武装直升飞机配合装甲车和炮兵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二黄同志就牺牲在这里。二黄同志是“吉隆滩”营的营长，1963年初成功地指挥了有名的北村战役，第一次有效地反击了敌直升飞机运输战术和装甲车运兵战术。戊申年，他作为隆安省的部队总指挥打到这里，英勇地牺牲在这个地方。勇敢的战士、有才华的作家阮诗同志（即阮玉晋同志）也是在1968年总进攻和总起义的第二阶段，在明奉路为国捐躯的。阮诗同志抗法战争时在南部东区参加革命。当时他一面持枪杀敌，一面写出第一批战士喜爱的短篇小说。抗美援朝时期，他经常战斗在前线，把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同解放军战士的生活、战火纷飞的前线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代表了我国民族轰轰烈烈的战争年代里越南作家们的品质和心灵。

在西贡—嘉定市的每条街道上，几乎到处都记载了男女特工战士、别动队战士和武装青年的辉煌战功。他们不仅参加过戊申新春进攻伪总统府、美国大使馆、广播电台、伪

总参谋部和Y字桥等著名的战斗，而且在抗法、抗美援朝中，都在西贡城内打过多次数颇有影响的胜仗。除了武装的战士以外，还有社会各阶层的许多爱国志士、政治干部、文化战士，在西贡——嘉定市内以各种方式，进行抗击侵略强盗和卖国贼的斗争。各种大小战功是说不尽的，为了今天的彻底胜利，牺牲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的无名战士也是难以数计的。

就是这些人创造了历史，他们的鲜血使得太平洋西岸这块S字型的土地和山河更加辉煌和稳固，写下了越南英雄灿烂的历史篇章。当我们能够站起来昂首仰望祖国大地上绚丽的阳光时，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永远铭记他们的恩情，感激那些把自己的子弟贡献给今天春季大捷的父母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决心建设光明、可靠的将来。没有过去也就不会有将来。

独立宫前誓言

回到了独立宫，我遵照政治局的指示，宣布释放从西贡解放那天起就被关押在独立宫一个大厅里的伪政权全体重要人物。我只会见了伪总统杨文明、副总统阮文玄和伪总理武文牡等头面人物。我向他们解释了革命政策的政策是光明正大、宽宏大量。“以大义胜凶残，以至仁易强暴”。我强调指出，他们以前做过的那些事就算过去了，主要是看今后的态度和行动。我希望他们能够正确认识我们民族的伟大胜利，以自己也是一个越南人而感到自豪。

他们好像有所触动，杨文明说：“……作为已经独立的越南的公民，我感到高兴。……”阮文玄说：“作为一个越

南公民，我为我们民族所取得的成功和光荣胜利而感到自豪。当然，回顾过去，我是有罪的……”武文牡也好像有所醒悟的样子。他说：“1975年4月30日是革命成功的日子，也是使我认识错误的日子。我能作为独立、统一的越南公民，感到荣幸和骄傲。”

我们相信他们的表态。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那就看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了。革命的政策是说了算数的。

根据党仁义的政策和阮荐说的：“承天意、莫屠戮，开活路、放生灵”的民族传统，胡伯伯以他无比的仁爱之心谈到误入歧途的人时说：“无论如何，这些人爱国之心总不会完全泯灭，还象未燃尽的火炭，要帮助他们把火燃烧起来。”

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通告并开始让所有的伪军将校、军官、士兵和各级伪政权公职人员前来登记报到，组织他们学习革命的路线，对祖国和民族应有的态度，对独立和自由的认识等。这些都是为了把那些对祖国、对人民犯有罪行、错误的人变成实现民族大团结和建设祖国的好公民。

为了得到光荣的今天，我们已经流了不少血，我们的血再也不能白流了。我们是英雄的民族，同时也是文明的民族。我们懂得尊重人的尊严。我们希望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使人人都成为朋友，整个社会上都是好人。我们同某些人相反，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无论如何会发生严重的流血报复。我们没有像过去的美伪集团那样，当对方人员落入自己手中的时候，就对他们进行野蛮的虐待和难以想象的肉刑拷问。他们把人当作牲畜，随意杀戮，对被抓到的人进行肉体 and 精神的摧残。我们有权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谁讲文明？谁懂得尊重人的尊严？

1975年5月7日，西贡——嘉定市人民集会，庆祝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5月6日夜，全城沸腾，整个西贡彻夜不眠。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准备，各团体、各郡也都在准备，每个人都热切地盼望着阳光明媚的明天。有时天地也和人一样，深深地记下时代的痕迹。117年了，祖国山河才有今天。400年了，边艾河上的这座城市才有这样伟大的时刻。虽然刚开始实行军事管制，但这是全国和西贡同胞的鲜血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这是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天刚麻麻亮，来自城区、市郊各郡、县的人流带着欢呼革命胜利、欢呼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的标语、口号，来到独立宫广场。西贡真正迎来了重大的节日，一个多世纪以来取得彻底胜利的节日。这是整个民族的自豪。全城内外人们欣喜若狂，他们成了美丽祖国的真正主人。独立宫广场是昔日军警林立，不让老百姓靠近的地方，今天欢呼的人群源源不断地走进来，秩序井然。经历了殖民主义压迫的黑暗年代的白发老人，今天也让孩子们搀扶着来到这里，亲眼看一看祖国独立、人民自由这最宝贵、最神圣的景象。孩子们在尽情地嬉戏欢笑，再也用不着担惊受怕。但人数最多的还是男女青年。他们对今天伟大胜利感到最骄傲，对光辉的未来认识最深刻。他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手持鲜艳的花束，一队队地走进广场，好像随时准备跟上父兄前进的步伐，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事业中，谱写雄伟的历史篇章。

我代表军事管制委员会发表了演说，号召各阶层人民用一切办法维持秩序，建设幸福、温饱的生活。我强调指出：

“……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凉山到金瓯角的越南河山第一次扫清了外国侵略军的影子……”

“全国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真正的自由……”

“从此，我们的民族将与天地共存，不断发展……”

“没有任何一种反动势力能够阻挡我们民族前进的步伐，为自己建设千秋万代温饱、幸福的生活……”

“只有美帝国主义是战败者……”

“全体越南人民是战胜者……”

“任何具有越南血统的人，都有权为全民族的胜利而感到自豪……”。

“每一个忧国忧民的越南人不能不对祖国、故乡的广阔前景而感到欢欣鼓舞……”

“我们的后代，新社会各阶层的继承人，从今以后在民族自豪精神的鼓舞下不断成长、壮大，抬起头来做人，在祖国最辉煌的发展时期里得到欢乐、得到学习、得到工作……”

“我们对得起千年来的祖先……”

“我们没有辜负世界上兄弟、朋友对我们的信赖和关怀……”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是经过四千年建设和保卫祖国斗争锻炼的英雄民族传统的胜利。这一传统在革命过程中得到保持和高度发扬……”

“这一划时代的胜利，是唯一正确的革命路线和完全正确的革命领导的胜利。它把我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直到彻底胜利和辉煌的未来……”

“在这庄严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怀念伟大的胡志明主席，深刻铭记他老人家大海一样的恩情……”。

“今天的光荣首先属于炸弹炸不垮、牢狱吓不倒、三十年来为民族大义奋斗牺牲的全国同胞……”

“光荣属于忠孝双全、能完成一切任务、克服一切困

难、战胜任何敌人的英雄的人民武装力量……

“西贡——嘉定人民成了自己城市的真正主人……

“革命是为了实现和发扬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解放群众无限的创造力……

“大家都知道，连续30年战争以后，和平刚刚恢复，在生活和工作中免不了会遇到不少困难。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还会在我国人民生活中贻害深远。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头子越奸们，为了卑贱的个人权益开门揖盗、引狼入室，要对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在我国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的、长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一切爱祖国、爱民族的越南人要同心协力重建家园，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消除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滔天罪行给每个人、每个家庭造成的痛苦……

“现在不论多么困难，都不会再像抗美、打败美帝那样困难了……

“我们的民族战胜了美帝国主义，一定有足够的勇气和聪明才智解决一切问题，迅速恢复和稳步发展国家生活……

“有了独立、有了和平，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思想，就会有一切……”

• • •

显然，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我们就清楚地知道将会遇到许多困难。我们也知道，在开始的阶段，将会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障碍。以1975年春季大捷而告终的三十年战争，是来自1945年、1957年、1959年……的艰苦岁月，在前进的道路上不知遇到多少障碍、犯过多少错误，使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了。没有竹枪，也就没有大炮、坦克。

没有冬寒憔悴景，
将无春暖的辉煌。

（摘自胡伯伯《自勉》诗）^①

我们决心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温饱幸福胜利的春天，难道还怕克服不了开始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挫折吗？这就是越南的意志。

一九八二年春

^① 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越南文学全集》第662页。——原书注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